

武大校友通讯

2017 年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主	编	邓小梅		
执	行	陈东华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新才	邓小梅	叶琳娜
		刘赛男	肖艾芹	吴根友
		张发林	陈东华	金 诚
		胡庆方	徐 毅	涂上飙
		涂险峰	黄楚安	潘迎春



目 录

卷首语

乘风破浪创一流

——2017 年新年献辞 校党委书记韩进 校长窦贤康 / 3

特别报道

我校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 肖 珊 赵治乐 / 9

努力把武汉大学建设成高端人才的聚合平台

——新华社专访窦贤康 江亚平 / 13

泰晤士报亚洲大学排名武大再入 50 强 陈丽霞 / 16

QS 世界大学排名武大稳居 300 强 付晓歌 / 17

泰晤士报 2017 全球 CEO 母校排名武大第七

..... 贾 敏 编译 / 19

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武大遥感全球第一

——两个学科进入世界前十

三个学科位列中国大陆高校第一 肖 珊 万舒良 / 22

我校 6 项成果获 2016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王 泉 / 26

武汉大学新入选 12 位长江学者

——入选数并列全国高校第五 邓 倩 / 28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我校 27 人次上榜

——入选数居全国高校第四	肖 珊 / 30
2017 年中国大学文化影响力排名武大第二	/ 32
武汉大学 2016 年十大新闻	/ 34
武汉大学 2016 年度新闻人物：余功茂——感人的坚守	/ 38

1977 级校友专刊

“原住民”级校友话珞珈	陈 超 / 41
武大游泳池的回忆	董宏理 / 47
珞珈忆	
——纪念 1977 级入校 40 周年返校聚会	金明洁 / 50
从白暨豚到江豚，35 年的研究与保护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学者王丁的奋斗与期待	
.....	金 陶 / 58
我的武大缘	刘澄清 / 62
那一年，那场考	刘建萍 / 64
大学梦	李名宪 / 67
忆四十年前的高考	刘治山 / 72
我的珞珈情缘	宁百齐 / 74
与象棋相伴其乐无穷	阮宜正 / 78
难忘武汉方言，我那遥远的乡音	汪晶晶 / 81
岁月如歌	于 刚 / 87
以珞珈精神走出我们坚实的脚步	徐 杰 杨 铸 / 94
高考，让我一生与梦中大学结缘	张俊超 / 99
珞珈，起点和结局	白 牛 / 104
忆 1977 年高考	陈丹华 / 106
贺曾云鶚先生一百〇二华诞	陈丹华 / 107
诗三首	范卫谊 / 108
清平乐·珞珈忆	李名宪 / 109
老同学聚会有感·调寄江城子	李永红 / 110



珞珈情缘	汪晶晶 / 111
同学相聚有感	王一鸣 / 112
致武大 1977 级校友	余从年 / 113
一剪梅·樱花	叶劲松 / 114
七律·金秋聚武大	叶劲松 / 115

珞珈风采

回忆江天骥先生	陈刚 / 119
哲学给我的七个锦囊 ——在哲学学院 2016 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丁邦清 / 125
我的导师李德仁	龚健雅 / 136
张培刚的世纪传奇	胡艳华 李旭玫 吴瑞芳 / 145
直心宁独觉 无待自相忘 ——缅怀萧羹父先生	景海峰 / 167
忆李达同志与解放后武大哲学系的重建	刘纲纪 / 173
八桂珞珈五老校友	李烈荣 / 177
珞珈山下岁月留声	柳叶 / 187
珞珈故居	鲁孝年 / 190
我的导师董辅初先生	毛振华 / 193
向武大的人文学科、人文精神致以感恩的敬礼 ——毛振华校友在振华楼启用仪式上的讲话	毛振华 / 199
青春的哲学系，青春的我们	倪素香 / 205
清虚自守伴书香 ——怀念恩师樊凡教授	单波 / 207
李达与武汉大学	宋镜明 / 214
缅怀我们的李达老校长	陶德麟 / 217
我眼中的大教授 ——纪念张瑞瑾教授 100 周年诞辰	谈广鸣 / 221
涂允成先生与武大及武大附中	涂光瑜 / 226



首任文学院院长闻一多的珞珈留痕	涂上飙 / 237
曾经在武汉大学和湖南大学工作过的湖南名流们 ...	涂上飙 / 243
传感领域的“跨界”英雄	
——记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张学记	王 军 / 251
这条道，铭记终生	
——我与老师樊凡的点滴往事	王慧敏 / 261
忆家父王世杰	王秋华 / 263
怀念恩师李崇淮教授	王时杰 / 271
珞珈记忆点滴	王向规 / 275
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	吴湘韩 / 281
女生张静	王晓莉 / 290
“理论界的鲁迅”李达	汪信砚 / 294
青年，任重而道远	许 锋 / 303
奋斗到最后一息的朱英国院士	肖 珊 / 307
我的哲学人生	杨祖陶 / 318
窦文涛：这辈子最好的住处是武大樱顶 ...	张 聪 贺 俊 / 336
我与学生	郑公超 / 340
青年女科学家王艳丽：专注才能成就科研梦想	张晶晶 / 346
我们的导师陈美兰先生	周元镐 / 350
青年女科学家王琳：“新丝绸之路”上实现报国梦	
.....	周韵曦 / 353

校友文苑

大九湖之恋	陈应松 / 359
大潮赋	何五元 / 367
夏日东湖清晨即景	珈 言 / 369
盛在纸碗里的青春	申思婕 / 372
东湖，最优美的邻居	王晓莉 / 376
追忆我们的似水流年	谢春枝 / 380
珞珈山的春天	许 锋 / 384



最是青春好读书	王新才 / 387
入学卅年感怀	吴伟文 / 389
水调歌头·忆老武大	陈 卫 / 391
珞珈晨音	陈 卫 / 392
诗意的珞珈赋我光华	陈 勇 / 393
请把所有的荣光都种在珞珈山	陈 勇 / 394
丁酉初秋, 时值武大中文系 83 级毕业三十年, 同学集会东湖翠柳客舍	耽嘉福 / 396
沁园春·珞珈山	黄德华 / 397
步原韵再唱年度捐赠(2017 年)有感	孔令仁 / 398
东湖三题	刘传铁 / 399
老工学院楼	刘代高 / 400
老理学院楼	刘代高 / 400
遇见珞珈	李福信 / 401
相约樱顶	李立屏 / 403
咏珞珈故园律诗六首	刘鲁颂 / 405
毕业三十年聚会有感	刘文杰 / 408
珞珈, 我们那匆匆的年华	刘予丰 / 409
珞樱情	陶佳珞 / 412
七律·咏东湖绿道	陶佳珞 / 413
“佛山缘·珞珈情”迎新记	涂鹏博 / 414
远在记忆之外	田 伟 / 415
让错过的美好如群星散落	吴根友 / 417
楝树	吴根友 / 418
少年游·楚天千里正秋色	王 浩 / 420
水调歌头	王新才 / 421
青春的珞珈山	汪晓清 / 422
珞珈的秋, 都是未及出口的告白	谢春枝 / 424
咏珞珈山	向 东 / 426
虚石牧场	阎 志 / 427
容纳	阎 志 / 428



回武大有感	周 林 / 430
七律·聚会母校感赋	曾世竹 / 431
樱约	周中华 / 432
命运	周中华 / 433

《武大校友通讯》捐订名录

(2017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	435
征订征稿启事	436
关于进行校友信息登记的通知	437

卷首语





乘风破浪创一流

——2017 年新年献辞

校党委书记韩进 校长窦贤康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校友们、朋友们：

转眼又是新的一年，珞珈山上的树又添一圈年轮。

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在珞珈山下东湖之畔，我们向全校师生员工、离退休老同志、海内外校友，以及所有关心、支持武汉大学建设与发展的各级领导、各界朋友，致以新年的祝福！

岁月有痕，人生有迹。2016 年，是我们全面实施“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全速向着“武大梦”前行的奋进之年。这一年，学校在 QS、THE、USNews 等国际权威大学排行榜中稳定在全球 300 名左右，在 QS 亚洲大学排行榜中从百名开外跻身第 44 位，在最新发布的“中国校友会网”中国大学排行榜、“人民网”中国高校社会影响力排行榜中均位列全国第三；新增数学和计算机科学 2 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 1%，化学继续保持 ESI 全球前 1‰，我校进入 ESI 全球前 1% 的学科增至 14 个，哲学学科连续 5 年进入 QS 全球前 100 名；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 74 人，新增“长江学者”12 人，位居全国第六，新增“青年千人”23 人，位列全国第五；获国家科技奖励 5 项，获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数居全国第一、教育部哲学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数居全国第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数居全国第三，马克思主义学院获批“全国首批重点马院”；武大学子在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国际名校赛艇挑战赛等国内外重大赛事中屡获佳绩；校友和社会捐赠签约总额达 2.6 亿元，位列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



榜前三。回顾 2016 年学校的改革发展，体现核心竞争力的办学指标稳中有进，社会声誉和国际影响持续上升，办学条件继续改善，外部环境不断优化，发展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校师生员工用实干、热情、智慧续写了学校发展史上新的篇章！

回望 2016，学校的点滴发展都是武大人抱团作战、戮力前行的结果，凝聚着前任领导班子的宝贵心血，浸润着全体师生的辛勤汗水，饱含着广大校友和社会各界朋友的深情厚谊。在此，谨向你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

2017 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关键之年，也是学校全面推进“十三五”、奋勇冲刺“双一流”的关键之年。迈入 2017，让我们沿着“武大梦”的指引，共同开启新的征程！

展望 2017，我们要添一份坚守。身处变革的浪潮，来时的初心决不能改变。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积极探索和遵循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办学规律，全面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强化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切实把发展重点放在学校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上，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

展望 2017，我们要多一份担当。争创“双一流”，时代的使命决不能淡忘。124 年来，学校发展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我们要主动把“双一流”建设放在国家发展的大格局中布局谋篇，勇于担当、率先作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展望 2017，我们要增一份果敢。面对发展中的战略机遇和激烈竞争，深化改革的脚步决不能停歇。我们要以更昂扬的心志、更进取的精神、更团结的作风，直面问题、攻坚克难，切实按照大学章程办学，全面推进依法治校，深化人事分配与人才制度改革，突出人才在大学发展中的核心要素作用，调动一切资源为人才成长和事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营造最好氛围，让师生更有尊严地学习、工作和生活。

皇皇武大，巍巍珞珈；终日乾乾，与时偕行。85 年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在珞珈山新校舍落成典礼上豪迈地向世人宣



告，“请大家看看我们所走的路是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是不是人类向上的路”，这是何等的宏大气魄与勇毅追求！如今，这一重担落在我们这一代武大人身上。让我们应时代之大势、乘改革之大潮，凝心聚力、提振精神，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在服务国家战略、引领社会发展、谋求人类福祉的历史进程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后，衷心祝愿所有武大人以及关爱武大的人新春快乐！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特别报道





我校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肖 珊 赵治乐

9月21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共计137所高校入选。我校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A类名单，10个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

入选的10个学科分别是：理论经济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化学、地球物理学、生物学、测绘科学与技术、水利与土木矿业工程、口腔医学、图书情报与数据科学。

名单显示，这次全国共有42所高校入选一流高校名单，其中A类36所、B类6所。在汉高校中，两所进入一流高校(A类)建设名单。

学校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办公室负责人表示，入选一流大学(A类)建设名单，一方面倍感振奋，这是对武汉大学的肯定，值得师生员工、校友以及关心支持武大发展的所有人骄傲；另一方面，也倍感动力。一流大学必须以“一流”的标准，培养一流的人才、打造一流的师资、营造一流的环境、做出一流的科研成果、贡献一流的服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全面达到世界一流，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担当，需要再思考，再谋划，再出发。

“国家进步的原动力在于创新，而创新的原动力在于人才的培养。”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德仁院士指出，“双一流”体现了国家意志，学校和学科均入选“双一流”建设名单，这对今后的学科建设



和人才培养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据了解，学校制订了一流大学整体建设方案，组织海内外专家论证修订，目前正抓紧方案的贯彻落实。在一流大学建设中，学校按照“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的原则，以“世界一流学科领军计划”实施为核心，引领带动一流大学发展；强化“一流基础学科行动计划”，支撑一流大学的整体建设；实施“生命医学学科腾飞计划”，推动生命医学学科整体跃升；布局“战略前沿学科发展计划”，抢占学科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旨在建成结构优化、协同发展、以世界一流学科为核心的高水平学科体系，实现一批学科从高原向高峰跃升，推进学校整体快速发展。同时，坚持以党的坚强领导统领一流大学建设，全面推进以问题为导向、以内涵发展为模式的综合改革，通过一流质量标准体系、一流质量保障体系、一流质量评价激励体系的建立实施，扎实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致力成为服务党的建设、国家和地方治理的生力军，成为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建设、培养各类杰出人才的主力军。到 2020 年，初步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到 2050 年，学校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武汉大学报》社论

扬帆正当时

万众瞩目中，“双一流”建设大学与学科名单终于出炉了。这标志着国家“双一流”建设“破土动工”，标志着中国大学向“世界一流”冲刺的大幕正式拉开，也标志着武汉大学从此迈上新的历史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个国家能否在世界舞台全面崛起，核心在教育，关键在是否拥有世界一流大学。新的历史时期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既为大学发展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与广阔发展空间，也迫切需要大学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通过提升教育质量和自主创新



能力，培养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产出高水平创新成果，为我国在“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两年前，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为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画出了清晰的路线图，也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

建设“双一流”，是武汉大学服务社会发展、推动国家富强、逐梦民族复兴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进入“双一流”建设序列，对于武汉大学来说，虽是意料之中，但无疑意味着又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意义之重大，如何衡量都不过分。新一轮高等教育竞争好比千帆竞渡、百舸争流，不发展、慢发展都将失去先机。全校师生员工要坚定信心、团结一致、认真谋划、全力以赴，抓住这一重要的历史机遇，推进“双一流”建设各项任务落实落地。

推进“双一流”建设，面临的重点工作头绪繁多，难点问题也纷纭杂沓。怎样落实人才强校战略，更好地服务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怎样培育更多的顶尖学科，进一步提高主流学科竞争力？如何加强学科布局总体规划，统筹协调一流学科、主流学科、特色学科的发展？如何打造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如何遵循教书育人规律，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能力和水平？……

千头万绪，需要找到抓手；任务繁重，应该牵住“牛鼻子”——我们要始终扎根中国大地办好武大特色的大学。学校各项改革应牢牢把握三个核心问题：是否围绕立德树人，落实以学生为本？是否对标世界一流，着力提升师资水平？是否着眼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建设一流大学？为此，要进一步强化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发展，切实把履行好立德树人职责作为学校发展的根本，突出人才在大学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通过深化综合改革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今年是学校全面推进“十三五”、奋勇冲刺“双一流”的关键之年，是学校的“人才强校年”“内涵发展年”和“深化改革年”。如



今，2017年已过去大半，广大师生员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力冲刺“双一流”建设上，认真贯彻学校“十三五”规划的基本工作思路：以提升质量为核心不断充实发展内涵，以创新发展为引领着力提升核心竞争力，以开放办学为依托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以依法治校为抓手大力促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学校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内部凝聚力不断增强，外部环境明显改善，社会声誉和国际影响不断拓展。全校上下政通人和，师生员工士气高昂。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校党委书记韩进强调，“我们对学校的发展状况更有信心，前途更加明朗，希望武汉大学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走得更健康、更平稳、更长远。”校长窦贤康号召：“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们的脚步决不能停歇。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进取的精神、更加果敢的气魄，在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征途中迎难而上、不断超越！”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7 年 9 月 24 日）



努力把武汉大学建设成高端人才的聚合平台

—— 新华社专访窦贤康

江亚平

10月15日是周日，坐落在美国纽约中央公园附近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少了平日的喧闹，显得有些冷清，但在国际关系大楼的一个会场里，武汉大学人才招聘会场热闹不已。

“我们希望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武大来，让他们在这个美丽的校园里实现梦想。”武汉大学校长窦贤康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谈到这次赴美之旅，窦贤康直截了当地说，武汉大学的优良传统和立校之本就是一句话：以最优秀的人培养最优秀的人。而美国



是海外优秀青年学者的聚集地，因此他上任后第一次赴海外招聘人才，就把目标锁定在这个丰富的人才库。

他告诉记者，自己到美国的首站是波士顿，中方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才招聘会引起积极反响。随后他们马不停蹄地来到纽约，在纽约总领馆教育组和武汉大学大纽约地区校友会的配合协助下，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了这次招聘会。哥大招聘会结束的当天下午他就飞往旧金山，并于16日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各举办一场招聘会。



他说，麻省理工学院素以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而著称；纽约是全世界的金融之都，是金融人才、法律人才和艺术人才的荟萃之地；而旧金山是硅谷所在地，是科技人才的集中地。武汉大学是综合性大学，各种人才都需要，故特地先到这三个地方招聘人才，以后还将加强在欧洲等地的人才招聘。

吴贤康说，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归根到底取决于一流人才，人才的高度决定大学的高度。为此，学校决定把2017年定为“人才强校年”，希望加大优秀人才培养引进力度。“我们计划在未来5年，努力引进300名左右的优秀中青年人才。”

他在谈到这一计划时，提出了一个“引凤筑巢”的概念，即变被动为主动，把凤凰引来后，为他们量身打造适合他们科研教学需



要的平台，围绕人才这个第一资源配置其他资源，把武汉大学打造成高端人才聚集地。

那么，把人才吸引过来后，又如何留住他们，让他们在此生根开花，与学校共同成长？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工作的窦贤康深有体会地说：“我认为做好人才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大力营造尊重学者、尊重学术的校园文化，让人才有归属认同、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

提到硬件配备，他说，武大目前拥有 2 个国家高端智库、2 个国家协同创新中心、3 个多学科交叉研究院、4 个全国排名第一学科、5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可为各类海外人才提供一流的发展平台。

除了在价值上尊重、教学设备上满足，还要在物质上给予充分的保障。为此，武大成立“人才与专家工作办公室”，全方位做好人才的引进、培养和服务工作。对高端人才，不但提供高薪，还免费提供住房，解决配偶就业、子女教育和医疗等一系列后顾之忧。

为了保障经费支持，武大还设立了“人才引进基金”。窦贤康说，武汉大学的校友们仅今年前 9 个月捐资就超亿元，他们计划将基金最终扩大至 5 亿元，这样学校就有充足的资金和更加灵活的方式引进更多优秀人才。

除了“引进来”，武大还鼓励“走出去”的人才培养政策。学校计划在“十三五”期间，重点支持 300~500 名中青年学者，以访问学者或博士后的身份派往世界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 1~2 年高质量的合作研究，使他们快速成长为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人才强校、人才兴校已逐步成为全校师生的共识。

窦贤康说，武大已入选“双一流”建设 A 类高校，也迎来了历史发展的新契机。决定一个学校品位的，除了恢宏的大楼，更需要一大批享誉学界的名家大师。所以，引进人才，尊重人才，服务人才，成就人才，是他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稿件来源：新华社，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7 年 10 月 17 日）



泰晤士报亚洲大学排名武大再入 50 强

陈丽霞

英国时间 3 月 16 日,《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发布了 2017 年亚洲大学排名。在入围的 300 所亚洲高校中,武汉大学跻身前 50 名,排名第 49。

与去年排名相比,今年亚洲大学排名入围高校数增至 300 所,中国大陆前 10 名高校分别是:北京大学(2)、清华大学(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5)、复旦大学(16)、上海交通大学(18)、浙江大学(19)、南京大学(25)、中山大学(47)、武汉大学(49)和同济大学(61)。包括港澳台在内,中国共入围 87 所高校。

与之前公布的全球排行榜相比,《泰晤士高等教育》2017 年亚洲高校排名虽然采用了同样的 13 个指标,涉及教学(权重 25%)、科研(权重 30%)、国际化(权重 7.5%)、论文被引(权重 30%)和产业收入(权重 7.5%)四大方面,但为突出亚洲高校的优势,在一些权重设计上做了特别调整。

这也是武大继 2015 年首次进入泰晤士报亚洲大学 50 强后,再次进入该榜单前 50 名。2013—2017 年,我校在该榜单中分别居于第 58、63、49、55、49 位。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7 年 3 月 17 日)



QS 世界大学排名武大稳居 300 强

付晓歌

英国时间 6 月 8 日，QS 全球教育集团发布了第 14 届 QS 世界大学排名，武汉大学居全球第 282 位、中国内地高校第 9 位，连续 3 年稳居世界大学 300 强。

QS 全球大学排名是世界三大权威排名之一。本次共评估了全球 965 所大学，结果基于过去 5 年全球 100 多个国家顶尖的 7 万余名学者和 4 万多家用人单位的同行评议，以及对全球最大论文数据库 Scopus(斯高帕斯)中过去 6 年 1 231 万学术期刊和 6 630 万论文引用的数据分析。排名考察 6 项指标：“全球学术声誉”占 40%，“雇主声誉”占 10%，“师生比”占 20%，“师均论文发表数”占 20%，“国际教职工比例”和“国际学位生比例”分别占 5%。中国内地大学最突出的进步是，体现人才培养的全球雇主声誉最近 5 年提高显著。清华大学以第 25 位，登顶该排名中国内地大学之首。同时，中国成为拥有世界百强大学最多的亚洲国家，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QS 全球教育集团中国总监张岷博士表示：“数据显示，中国大学整体稳步向上发展。中国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通过‘双一流’建设，让更多有学科特色的大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应有的国际地位。”

QS 世界大学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是由教育组织 Quacquarelli Symonds(QS)发表的年度世界大学排名。与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一起，被公认为世界三大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性大学排名，其排名报告被世界各地的在读学生、大学申请者、高校教授和政府机构广泛参考和引用。该排名旨



在将全球的大学视作多功能、全方位的组织机构，考察其在保持或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使命下所获得的成就，提供全球范围内的比较。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7 年 6 月 12 日)



泰晤士报 2017 全球 CEO 母校 排名武大第七

贾 敏 编译

《泰晤士高等教育》日前发布了 2017 年度全球 CEO 母校排名。该榜单以大学授予世界五百强首席执行官的学位数量为评选依据，共收入全球一百所大学。

世界五百强即美国《财富》杂志每年评选的全球最大五百家公司，在全球经济中影响力巨大。以 2015 年为例，当年五百强公司的总收入为 27.6 万亿美元，而美国该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为 18 万亿美元。尽管该榜单采用的统计方法相当简单，并受限于可以获得的公共数据，但仍然清晰地勾勒出了这些顶级 CEO 的教育背景的大致情况。

占据榜首的哈佛大学共计授予了 29 个学位给 26 名五百强 CEO，他们所在的公司 2015 年的收入总和为 1.4 万亿美元。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分别是斯坦福大学和巴黎高等商学院。

中国大陆地区共有 17 所大学入选。其中，排名最靠前的武汉大学排在第七位，共授予 9 个学位给 5 名五百强 CEO，也是亚洲地区唯一一所进入前十的学校。其余 16 所大学分别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6)、山东大学(27)、清华大学(30)、南开大学(31)、中国石油大学(35)、西南交通大学(57)、哈尔滨工业大学(58)、哈尔滨工程大学(59)、北京大学(61)、东北财经大学(61)、西安交通大学(69)、合肥工业大学(71)、北京科技大学(78)、华中科技大学(83)、上海交通大学(87)、西北工业大学(99)。



进入《泰晤士高等教育》2017 年度全球 CEO 母校排名的中国高校

全球 CEO 母校排名	2016—2017 年度 THE 世界大学排名	机构	国家	授予 CEO 学位数	培养 CEO 人数	CEO 所在公司收入 (10 亿美元)
7	401~500	武汉大学	中国	9	5	439.78
26	未有排名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中国	4	4	180.18
27	未有排名	山东大学	中国	4	4	161.76
30	35	清华大学	中国	4	4	129.02
31	未有排名	南开大学	中国	4	3	156.92
35	601~800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中国	3	3	367.07
57	801+	西南交通大学	中国	3	2	95.65
58	501~600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中国	3	2	94.68
59	未有排名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中国	3	2	90.44
61	29	北京大学	中国	3	2	70.74
61	未有排名	东北财经大学	中国	3	2	70.74
69	501~600	西安交通大学	中国	2	2	171.26
71	未有排名	合肥工业大学	中国	2	2	137.55
78	601~800	北京科技大学	中国	2	2	99.85
83	401~500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	2	2	86.64
87	201~250	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	2	2	82.52
99	601~800	西北工业大学	中国	2	2	52.07

从国家和地区来看，美国共培养了 231 名五百强 CEO，位列第一。中国大陆第二，贡献了 116 名，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分列三到六位，各培养了 68、46、40 和 35 名。不过，这一数据与该国家地区的人口规模以及当地五百强企业的数量直接相关，大约 2/3 的五百强 CEO 都是在公司所在地获得的学位，因此并不能说明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具备显著优势。



洛桑国际管理学院领导力及组织行为学教授乔治·科尔里瑟 (George Kohlrieser) 曾担任埃森哲、可口可乐、摩根士丹利、雀巢等多家五百强公司高级顾问，他在接受《泰晤士高等教育》采访时表示，对于成为领袖而言，个人表现比教育背景更为重要，但名校优势也十分显著。2017 全球 CEO 母校排名中的前两名，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在 2016—2017 年度《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分列第六和第三位。科尔里瑟认为，能够进入哈佛大学这样的学校的人本来就不平常，他们有着很强的学习动力，愿意为了达成目标而辛苦工作。并且，顶尖名校的环境也会影响学生的观念模式，身处于高表现人群之中的人会被激励奋进，这种时刻想要在竞争中获胜的思维模式将激发出管理大公司所需要的雄心壮志。

法国国家教育部前副部长、埃塞克商学院院长让-米歇尔·布兰彻 (Jean-Michel Blanquer) 认为，培养未来大公司 CEO 的前景是政府在决定高等教育投入时的一项重要考量。由于大公司需要的高级人才越来越多，他们很可能迁往人才更为充足的国家地区，而这些大公司带来的巨额收入使得高等教育在国家经济繁荣方面处在了中心地位。在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将是社会和经济的心脏。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7 年 2 月 2 日，有删减)



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武大遥感全球第一

——两个学科进入世界前十

三个学科位列中国大陆高校第一

肖 珊 万舒良

上海软科近日正式发布 2017“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覆盖 52 个学科，排名对象为全球 4 000 所大学，我校“遥感技术”学科排名全球第一。

在各学科“状元”榜单上，中国高校在 7 个学科位列世界第一，分别是：武汉大学(遥感技术)、清华大学(通信工程)、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同济大学(土木工程)、上海交通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北京科技大学(矿业工程)、中南大学(冶金工程)。

“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ShanghaiRanking's Global Ranking of Academic Subjects)覆盖 52 个学科，涉及理学、工学、生命科学、医学和社会科学五大领域。此次排名的对象为全球 4 000 所大学，共有来自 80 个国家的 1 400 余所高校最终出现在各个学科的榜单上。中国大陆共有 162 所高校上榜，上榜总次数 1 289 次，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二。

该榜单中，我校上榜学科数为 27 个，居中国大陆高校第 9 位。其中进入世界前十的学科有 2 个，分别是：遥感技术(第 1)、图书情报科学(第 4)；进入世界 11~50 的学科有 4 个，分别是：水资源工程(第 27)、地理学(第 44)、纳米科学与技术(第 45)、仪器科学(第 50)。其中，我校有 3 个学科排名中国大陆高校第一，分别是：遥感技术、图书情报学、地理学。



软科，全称为“上海软科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原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使用一系列国际可比的客观学术指标对全球大学在相关学科的表现进行测量，包括科研规模(国际期刊论文数量)、科研质量(论文的篇均引用)、国际合作论文、高水平科研成果(顶级期刊论文)、国际奖项等。其文献数据来源于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旗下的 Web of Science 和 InCites 数据库。在今年的排名中，软科首次采用“学术卓越调查”(Academic Excellence Survey)得到的 27 项权威学术奖项和 94 本学科顶尖期刊作为指标设计的标准。

另悉，在世界大学排名中心近日公布的 2017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前 10 名大学中，武大遥感学科也位列世界第一。世界大学排名中心(The Center for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CWUR)总部设在沙特，是唯一一个根据公开的客观数据进行大学和学科排名的机构。遥感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新兴学科，从 2017 年起，CWUR 将其作为单独的学科进行排名。



2017“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覆盖的 52 个学科



专家指出，国际上两个不同的世界学科排名机构都将遥感学科作为一个一级学科进行排名，说明遥感已经成为国际公认快速发展的新兴学科；而武汉大学的遥感学科在两个机构的排名中都位列第一，说明它已经进入世界一流学科行列，并开始引领世界遥感学科发展。

“武汉大学遥感技术学科的发展，源于多年来国家的支持、学校的支持、学科带头人的努力，以及所有从事与遥感技术相关工作的师生的贡献。”李德仁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的任务更加艰巨。我们要响应国家号召，要在原始创新的基础上引领发展，唯此才能继续保持领先。”



2017“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指标体系



中国大陆高校遥感技术学科排名情况 (软科发布)

排名	学校名称	PUB	CNCI	IC	Top	AWARD	总分
1	武汉大学	100	66.1	55.7	100	/	277.2
3	北京师范大学	79.8	62	79.4	83.8	/	241.5
17	清华大学	44.1	70.8	84.1	45.6	/	177.3
17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60.1	57.6	48.5	49.9	/	177.3
35	南京大学	50.6	56	66.1	45.3	/	165.1
37	北京大学	41.7	60.5	72.4	47.5	/	164.2
40	国防科技大学	51.2	51.9	50.9	45.3	/	158.6

C W U R			About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Methodology
REMOTE SENSING					
World Rank	Institution	Score			
1	Wuhan University	100.00			
2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96.55			
3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96.29			
4	Xidian University	95.43			
5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90.14			
6	Paul Sabatier University - Toulouse III	90.06			
7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85.12			
8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84.71			
9	University of Valencia	83.62			
10	Ohio State University	81.72			

世界遥感学科排名情况 (世界大学排名中心发布)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7 年 7 月 10 日)



我校 6 项成果获 2016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王 泉

1 月 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京隆重举行 2016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我校共 6 项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其中主持完成的 2 项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参与完成的 4 项成果分别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刘延东等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

我校刘泉声教授主持完成的“深部隧(巷)道破碎软弱围岩稳定性监测控制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该项目针对深部破碎软弱围岩稳定性监测、模拟和控制开展研究，提出了深部破碎软弱围岩地应力测试的流变应力恢复法原理及严密解算分析方法，发明了多向压应力传感器及其推送定位系统；发明了围岩表面-内部变形实时监测预警及掘支放样自动一体化技术系统；提出了围岩破裂碎胀大变形预测分析的数值与物理模拟系统方法；研发了深部破碎软弱围岩分步联合控制技术及底臆控制技术。项目成果广泛应用于矿区深部巷道、交通隧道及国防洞库隧道等工程，整体提升了我国深部隧(巷)道破碎软弱围岩稳定性监测控制的技术水平，经济效益显著。

我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主持完成的“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研发与系统建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集成了全国地理信息资源，向用户提供



权威、统一、高效的网络地理信息服务，在“分建共享”地理信息公共服务模型、面向网络协同服务的地理信息数据体系、地理信息云服务平台、地理信息服务质量等方面取得了创新性成果。项目成果在维护国家地理信息安全、促进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推进地理信息深入广泛应用、促进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参与完成成果方面，武汉大学作为第二完成单位，由水利水电学院崔远来教授等参与完成的“生态节水型灌区建设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数学学院陆君安教授等参与完成的“复杂动态网络的同步、控制与识别理论与方法”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动力与机械学院郑怀副教授参与完成的“多界面光-热耦合白光 LED 封装优化技术”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郭庆胜教授参与完成的“国家电子政务协同式空间决策服务关键技术与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据悉，本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授予两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279 项成果和 6 位外籍科技专家(国际组织)。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赵忠贤院士和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屠呦呦研究员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 42 项，其中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41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66 项，其中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63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171 项，其中特等奖 2 项、一等奖 20 项、二等奖 149 项；6 位外籍科技专家(国际组织)获国际科技合作奖。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7 年 1 月 9 日)



武汉大学新入选 12 位长江学者

——入选数并列全国高校第五

邓 倩

教育部近日正式公布了 2016 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入选名单，我校共有 12 位专家入选，其中特聘教授 4 位、讲座教授 2 位、青年学者 6 位，入选数并列全国高校第五。

4 位特聘教授是：哲学学院吴根友(中国哲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杨必胜(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测绘学院姚宜斌(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数学与统计学院张希承(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2 位讲座教授是：澳门大学徐杰(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香港城市大学杨海滨(企业管理学)。

6 位青年学者是：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付磊(材料物理与化学)、法学院秦天宝(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信息管理学院孙永强(情报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汪涛(企业管理学)、药学院王连荣(微生物与生化药学)、历史学院魏斌(中国古代史)。

分析显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从 1998 年开始实施，至今我校有近百人入选，总人数居全国高校前列。此次我校入选情况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测绘、法学、信息管理等传统优势学科继续强势表现，在聘长江学者人数全国领先，形成人才集聚效应；二是基础学科人才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数学学科有所突破，历史学科连续两年有青年长江学者入选；三是我校“351 人才计划”培养成效持续显现，此次 10 名长江特聘教授和青年学者中，有 8 名曾获得该计划资助。



据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是国家重要的高层次人才计划，有效地培养了一批高层次人才在高校从事科研、教学工作，也吸引了一批学术上卓有建树的海外优秀学者回国工作或为国服务。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7 年 4 月 5 日）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 我校 27 人次上榜

——入选数居全国高校第四

肖 珊

3月28日,《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2016年版)》首次发布,根据作者转载数据和同行专家评议的结果,2016年共有525名作者入选。其中我校27名学者上榜,总数居全国高校第四。

该榜单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联合研制,将转载分析法和同行评议定性分析法相结合,基于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论文,对不同学科、领域的人文社科论文成果与作者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和比较分析,以期挖掘学者分布、成长等规律。

榜单按20个学科划分,分别是:哲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体育学、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历史学、地理学、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上述学科中,我校学者分布情况如下(作者姓名按音序排列)。哲学5人:哲学学院丁四新、何萍、李佃来、汪信砚、吴根友;理论经济学1人:经济与管理学院简新华;应用经济学2人:经济与管理学院辜胜阻、郭熙保;法学2人:法学院江国华、周叶中;政治学2人: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虞崇胜、法学院周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7人:马克思主义学院陈曙光、李斌雄、骆郁廷、余双好、沈壮海,哲学学院汪信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虞崇胜;体育学1



人：法学院熊瑛子；中国语言文学 1 人：文学院王兆鹏；艺术学 1 人：文学院冯黎明；工商管理 1 人：经济与管理学院辜胜阻；农林经济管理 2 人：经济与管理学院郭熙保、简新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 2 人：信息管理学院马费成、邱均平。

从入选学者所在学院分布来看，依次为：经济与管理学院 6 人次，哲学学院 6 人次，马克思主义学院 5 人次，法学院 4 人次，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文学院、信息管理学院各 2 人次。

我校 27 名入选作者中，有些作者入选单一的学科名录，有些作者则入选不同的学科名录。据统计，15 名作者入选单一学科名录，辜胜阻、郭熙保、简新华、汪信砚、虞崇胜、周叶中 6 人入选两个学科名录。入选多个学科名录的作者，多涉及哲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政治学等学科。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7 年 3 月 30 日）



2017 年中国大学文化影响力排名 武大第二

《2017 年中国大学文化影响力排行榜》近日发布，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位列前三名。

名次	学校名称	得分
1	北京大学	94.67
2	武汉大学	94.17
3	清华大学	94.17
4	复旦大学	92.83
5	南京大学	92.67
6	四川大学	90.83
7	厦门大学	90.67
8	上海交通大学	90.50
9	浙江大学	90.17
10	中山大学	89.83

该榜单是世界范围内首次对中国大学的文化影响力加以深入系统地研究并进行排名，由中国自贸区（福建）文化产业创意研究院（CIF）执行，于北京时间 2017 年 2 月 23 日、纽约时间 2017 年 2 月 22 日发布。



此次排名从中国各大学的历史文化、校园环境、校友的社会贡献及社会影响度、媒体显示度、人文学术影响力、国际化程度等方面进行分项分析评价，最后得出文化影响力总分并据此排名。

据了解，该排行榜形式新颖，方法科学，内容客观真实，对于高考考生、考研考博生报考，其他各类大学排名及国家“双一流”高校评价和建设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7 年 2 月 24 日)



武汉大学 2016 年十大新闻

12 月 28 日，学校十大新闻评选委员会经过严格认真评审，评出了“武汉大学 2016 年十大新闻”和“武汉大学 2016 年度新闻人物”。分别是：“刘延东再次来校视察，高度肯定我校创新创业教育”；“李晓红任教育部副部长，窦贤康任武汉大学校长”；“我校人才队伍建设获新突破”；“首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我校入选数全国第一”；“三大顶尖国际测绘学术组织主席盛赞武大世界一流测绘学科”；“我校入选全国首批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雷军捐资建设武汉大学科技楼，校友爱校热情高涨”；“中国高校社会影响力排行榜武大位列第三”；“东湖南路沿线校园环境整治工程启动”；“武大早期建筑入选‘首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名录”。年度新闻人物：余功茂。具体内容如下：

一、刘延东再次来校视察， 高度肯定我校创新创业教育

10 月 1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再次来校视察，热情寄语武大，“把高等教育改革创新进一步推向新的高度，真正朝着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而努力。”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湖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晓东等一同来校，参观了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中心，刘延东称赞“学校的创新创业教育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2016 年，我校获评首批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学生在“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创青春”全国大学



生创业大赛等赛事中获得多个金奖。

二、李晓红任教育部副部长， 窦贤康任武汉大学校长

11月2日，国务院任命李晓红为教育部副部长，此前，中共中央决定李晓红为教育部党组成员。李晓红2010年12月任武汉大学校长。

12月6日，在武汉大学教师干部大会上，中组部有关负责人宣布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武汉大学校长人选的决定：窦贤康任武汉大学校长。

三、我校人才队伍建设获新突破

2016年，我校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新突破。16人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入选数居全国第三，迄今共有近90人入选，总数居全国前列。13人入选第二批“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其中科技创新领军人才8人、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3人、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2人；此前10人入选“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入选数居全国高校第六位，其中哲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类4人，仅次于北京大学，居全国高校第二位。

四、首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我校入选数全国第一

7月1日，教育部公布第一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名单，我校61门课程入选，入选数居全国高校第一。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称号有效期5年，在“爱课程”网上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参与课程建设的高校和课程团队为推进高等教育开放、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三大顶尖国际测绘学术组织主席 盛赞武大世界一流测绘学科

在武汉大学测绘学科创建 60 周年之际，10 月 22 日，学校举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端论坛，国内外顶尖专家学者共话测绘学科发展与一流学科建设。三大顶尖国际测绘学术组织——国际大地测量协会、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国际制图协会的主席亲临大会，盛赞武大测绘学科为“世界一流”，称“武汉大学已成为本领域国际上最大和最好的人才培养摇篮之一，在国际测绘学科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着非常卓越的贡献”。

六、我校入选全国首批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

1 月 20 日，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从 61 所申报高校中脱颖而出，入选全国首批 9 个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我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镇，学校将把马克思主义学院建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意识形态建设的坚强阵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示范辐射地，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理论教育阵地、科学研究高地、人才培养基地、文献信息中心、高端智库平台。

七、雷军捐资建设武汉大学科技楼， 校友爱校热情高涨

10 月 20 日，校友雷军捐赠 1 亿元，用于建设武汉大学科技楼。雷军曾数次向母校捐款，总额达 1.14 亿元。其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的 1.5 亿元珞珈创新天使基金 5 月份正式启动；校友企业家联谊会在长三角、泛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设立分会，联手打造全国第一校友商帮。校友爱校热情高涨，10 月 15 日，123 对新人回校参加首届校友集体婚礼，让爱回“珈”。



八、中国高校社会影响力排行榜武大位列第三

12月23日，人民网发布《2015—2016中国高校社会影响力排行榜》，武汉大学排名第三，仅次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该榜单以126所部属高校及地方重点高校为研究对象，结合教育部权威数据，基于高校在媒体、网络舆论场各项传播综合指数及科研指标体系而形成。其中，武汉大学在媒体影响力、网络舆论影响力和校友影响力维度上位列第三，在新媒体影响力维度上排名第四。我校新媒体已连续3年入选“全国教育系统新媒体综合力十强”。

九、东湖南路沿线校园环境整治工程启动

9月10日，东湖南路沿线校园环境整治工程全面启动。该工程西起文澜门，东至枫园东门，包括沿湖区域工学部第一教学楼拆除和等面积还建，以及老旧建筑维修改造和环境整治，以提升品质，改善条件，更好地服务教学科研工作。这是武汉市和武汉大学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携手共建“湖山共美”校园和东湖风景名胜区的重大举措。

十、武大早期建筑入选 “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9月29日，由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评选的“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公布，人民大会堂等98项入选，武汉大学早期建筑榜上有名。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群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罕见的中西合璧的大学校园建筑，2001年，15处26栋建筑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学校对早期建筑进行大规模维修，今年9月，封闭修缮近一年的樱园老斋舍重新开放，在校内外引起热烈反响，网友纷纷感叹“最美的大学，最有格调的宿舍”。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2016年12月30日）



武汉大学 2016 年度新闻人物：余功茂——感人的坚守

“我是教师，是党员，三尺讲台就是我的战场，如果有什么不幸，我希望是在讲台上。”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师余功茂，在每周要做三次血液透析的情况下，仍坚守讲台，体力不支时跪在椅子上讲课。他的感人事迹经校内外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网友称他为“最美大学老师”“中国好老师”。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以及教育部领导对余功茂事迹作了批示。

3月31日，校党委下发文件，授予余功茂“武汉大学教书育人楷模”荣誉称号，号召全校师生员工学习他忠诚教育、敬业奉献的高尚精神，不惧病魔、顽强拼搏的坚韧意志，热爱教学、刻苦钻研的进取意识，心系学子、教书育人的优秀品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余功茂获湖北五一劳动奖章。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6 年 12 月 30 日）

1977 级校友专刊





“原住民”级校友话珞珈

陈 超

楚天高阔，东湖清澈，我的前半生就在那天水之间。

我应该是珞珈山“原住民”级校友，在武大度过了童年、少年，直至1982年外文系本科毕业留校任教，再到1985年研究生毕业。

远方的儿时玩伴告诉我，在故乡，风起，风又落，每一阵风，还像从前那样，都从家门口经过。她把这风留在了诗行里，留在了记忆深处，四季的雨，沙，沙，沙，捎来浅唱轻吟。

笔墨香醇，惹得我就想光了脚丫子，去噼啪噼啪地踩雨水；穿起花裙子，和蜻蜓、蝴蝶一起，把风抓住。黑黑秀发，挂着水珠晶莹；飘飘衣衫，带着熏风微微，和我的男同学女同学，还有他们的狗，一起遛弯，梦回千年、万里。

上 篇

大河水滔滔

狮子山脚下，23户人家。土坎上三排房子，各四户一排；土坎下一排平房共10家；房后另有一单户，葡萄藤蔓攀墙，无花果树齐檐。

我们家是10户人家中西头的第三门。

门前梧桐高大，绿荫洒在有方格纹水泥板铺成的人行道上。嵌在这排大树和小路之间的是一道残留的山涧，由东向西，顺坡而



下。坡，时缓时急；涧，起头浅平，逐宽且深，复又浅而窄。

浅窄处，抬脚就能迈过去；而宽深的地方则需先助跑几步，再奋力跳越，这就要点胆量，要点体魄，冒几分险了。遇到说不服的人，摆不平的事，男伢女娃就聚在涧边，挑战这一越，逞强扬威。

大雨初停，涧里山水奔流。沿着这山涧上下，我们玩筑泥坝。涧里就地取土，参水和泥；一团团泥，揉、捏、拍、摔，稀了加点土，干了添点水；添水，加土；加土，添水；反反复复，来来回回；慢慢地，就变出很粘的泥了。筑坝用泥时，再塞些草根枝叶，蓄水保土。发掘、收集，搬运残砖碎瓦，这些都是加固泥坝的好材料。

泥坝筑成，截断流水，坝里的水位，上涨、上涨……越涨越高。

“上游水坝注意！上游水坝注意！预备，开闸！”

洪流滚滚，破坝而来，携石裹沙，直奔下游水坝冲去。

下游，守住，人在阵地在，不能坍塌。

谁家的米饭烧焦了，糊味不小。闯祸了，有娃儿今晚又要领教他老子的“军法”了。不会是敌我两方阵营里的俩兄妹吧。

从前，有个山，山里，有群孩儿，雨后玩耍小涧旁，疑是大河水滔滔。

北风那个吹

北风起了，冰天冻地。柴房里的滑雪车该翻新了。

天黑后，三五个孩子从各自家里悄悄溜出，去“取”做滑雪车的材料。

倒霉的哥哥，不带着我吧，怎么保证我不会“告密”？让我跟着，肯定是个捣乱。唉，我怎么就有个妹妹呢，多余。

出门也就是六七百米远，坡顶上有一个单门独户的大院子，神秘地掩藏在七八米高的竹篱笆后面。一片片竹篾用铁丝紧密地编排成墙，几乎无缝隙，外面完全看不到里面，里面的人也看不到外面吧？

孩子们轻手轻脚，恨不得连自己的心跳和呼吸都是静止的，一



步步靠近竹篱笆墙。夜色里，借着似有若无的月光，一片片地摸索着竹篾，寻找有没有松动的。

“哎，我这有一……”

一个巴掌捂住了我的嘴。“跟你说过不许说话。看以后还带不带你来……”

“慢点，慢点，莫慌。来，帮我抓着这一头。拉！往下拉！……”

我们就这样“取”来了两片竹篾。白天是没胆去“拿”的，可是，有这么大院子的人家肯定是资产阶级，所以，用资产阶级的东西又怎么啦？这样和自己狡辩着，压住心里的慌张。

这竹篾片不宽不窄，不厚不薄，柔韧有弹性，光滑还细润，绝对好材料。

竹篾片有了，还需要几块小木条，小木板。家里可以找找。往年修缮组来换纱门，补窗修墙或是别的工地上剩下不要的边角废料，总会捡回来收着，到时做个拉煤的滚珠车，钉个小板凳，搭个鸡窝，架个鸽子笼，这样那样的，就派上用场了。

厨房里15瓦的白炽灯晕着黄蒙蒙的光，开工，做我们的滑雪车。第一步，先把竹片锯成一米多长的小段，再将这小段的一头削尖；下一步，在煤炉上烘烤尖头的这一端，竹片遇热变软时，使劲把尖头向上弯；抓稳了，保持这个尖头翘着，赶快沁入冷水里，淬火，定型。“哧——”，蒸气在窄小的厨房里升腾，墙上的人影晃悠起来，有了第一块滑板。

接下来的工序是在滑板上加一块木条，然后一前一后将座板和脚踏板钉在左右两块加了木条的滑板上。竹子不同于木头，直接钉钉子容易劈裂，于是就把通蜂窝煤的铁条烧红，先在竹板和木条上烫好洞孔……

竹子和木头烫焦了，有香味弥漫开来，一大一小，两架新滑雪车，还有兄妹俩，一起听北风敲打着冬夜的门窗，憧憬那铺天盖地的大雪，寒假，过年……

加块煤，封好炉子，今晚有个好梦。

北风那个吹。



捉麻雀

捉麻雀的工具简单：一个笕箕，一条绳子，一节木棍，几粒米。

笕箕没什么好挑的，家里最多就那么一两个。多半是一个结实点儿的，另一个旧损些，修补过，可还没舍得做别用或是当柴烧了。绳子和木棍的长短、高矮、粗细要讲究点。木棍粗到能撑得起那反扣在地上的笕箕，留个口，高矮要让鸟儿飞得进来。在撑起的笕箕外围撒四五颗米，撒得稀疏点，一步一步先把麻雀引来；在笕箕底下，离开口处远点，米撒得密集些，进一步诱敌深入。把握好了这些机关，拉绳子时，笕箕才会扣得又快又严实，麻雀来不及逃出。

工具备齐后，天井就是个好场地。时辰该是下午。大人没下班，记不清我们为什么没上学。是秋天？细细的雨有点凉，麻雀可能也找不到那么多虫子吃了。

布下我们的天罗地网，暗道机关，牵好绳子的这一头，到纱门背后，隐蔽起来——别出声，麻雀很快就会飞来的。

屋檐上什么地方积了些雨水，溢出来，落在水泥的台阶上，滴答，滴答，滴答……

下 篇

赶着羊儿去吃草——回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珞珈山，遛个弯去。

1971 年，附小养了 7 只羊（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这一年我在学校不守规矩，摔折了胳膊）。

礼拜天，我到学校去赶羊。

没想到这些羊还蛮听话，我拿着根细小的树枝，招呼着头羊，其他几只就跟来了。

怎么走呢？没想好。走着就是了。

田野芬芳

从面朝中东区的侧门出了校园，顺着泥土路一直往二区走。小



路两旁有杨树，圆圆的叶子油绿着，还有灌木丛，零散的菜地，丝瓜豆角，大蒜小葱；过了东中区，再往前，右边是一片湿地水杉，左边是一片农田，种着蚕豆，绿叶丛中花儿白中带紫，或者是油菜，繁花锦簇，招蜂引蝶着，或者是红苕，一垄又一垄的黛绿，也可能是正灌浆抽穗的稻子，微微弯垂着……

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羊儿咀嚼着路边各种各样的青草。我叫得出名的有：灰灰菜，叶背一层银灰色的粉粒；鸭趾草，我喜欢它蓝色的小花和像竹子那样的叶子；马齿苋，肥嫩得透明；地菜抽了苔，小花星星点点；蒲公英，白色的乳汁黏手；车前草，狗尾草，灯芯草，大青叶，苍耳子，野菊花……

天道酬勤

上几级石板台阶，就看到东头老二区的两栋二层楼和西头新二区的四排房子了。有窗户下挂了几串红辣椒，橘子皮。门前空地上，晾了被单、衣裳，新洗的；有张竹床，铺了旧报纸，晒着白萝卜条；还有方凳上搭着块木板，那是糊的祿褙，准备做新鞋呢——先在板上刷一层自家用面粉熬的糰糊，然后将一块块大大小小形状不一的旧布碎，平平展展地粘贴上去，边缝要对严了，不留间隙，也不能重叠；贴了刷，刷了贴，一层又一层，这番劳作，看似简单重复，却得耐性和仔细。筹吃备穿，赶个日头正好。礼拜天，有人家早早就忙活着，也有偷个闲，睡睡懒觉的。勤快的还有蓬头鸡，芦花鸡，九斤黄，大鸡，小鸡，半大的鸡，三三两两，四下里觅食。

新二区和老二区之间的泥土小道，铺了烧过的煤渣，雨天不会烂泥黏得鞋掉。穿过这条小道，下几级石板台阶，再过了右边的一小片水杉树，泥土路就到了头，接上柏油马路了。

车少路自宽，屋矮蓝天阔

上街了，羊儿依旧要紧不慢的，无需提防什么。你想啊，这街可比不上珞珈山伢说的“进城”——到街道口、武昌、汉口城里的那些个大马路上去。这里总共会有四种车经过吧，脚踏车、三轮



车、板车、解放牌大卡车，对了，再算上个手扶拖拉机。所以这会儿最多也只是一两辆自行车经过吧，更可能的是没车。几步宽的马路，不吵不闹，路旁的商铺全是平房；车少路自宽，屋矮蓝天阔，人和羊，自然，自在。

左边瞧瞧，右边看看，左边这一溜院落门面有交通组、新华书店、缝纫组、合作社，右边这一溜第一家是个餐馆：一间屋子，宽窄十来步，黑泥地面，光木的方桌条凳。接下来是杂货店：迎门一张长柜台，柜台上带盖儿的玻璃罐里装着一颗颗水果糖、奶油糖、炒蚕豆、橄榄、话梅、八珍梅、盐金枣（灰黑的小粒粒，也叫老鼠巴巴），高级点的有芒果干、杨桃干，几分钱买个三五颗、一块两块的，用马粪纸、旧报纸包一小包，店家在放学后的孩子们手里做的是点点滴滴的小生意。紧挨着是菜场，水产，豆制品，青菜，不过，各水泥柜台多数时候是空空的。酱菜部好像总是有货，长柄的竹筒勺搁在酱油缸的木盖上，碰到拿着小嘴瓶子来打酱油的，就把漏斗也用上。还有装在盆子里的辣萝卜条，酸藟头；红白豆腐乳，泡在坛子里，舀出三两块，盛到碗里，再浇上点酱汤水——路上端稳啰，别还没到家就洒了个大半。

我这羊赶的，一不小心，就掉进时光的隧道，回去了。

草木青青，珞珈山。

（作者系外文系 1977 级校友）



武大游泳池的回忆

董宏理

武大游泳池位于现在校园的凌波门之外，站在游泳池岸边可以远眺湖对岸的东湖湖心亭、毛主席来汉经常居住的梅岭园区以及风景秀丽的磨山，东湖的大部分水域和湖岸线也可以尽收眼底。游泳池选址在此，不得不钦佩当年决策者的独具匠心。前几天，我用轮椅推着在武大工作退休的母亲来到凌波门外的东湖边散心，驻足望着现在的武大游泳池，思绪不禁飞回了童年，武大游泳池“鼎盛时期”的一幕一幕又浮现在眼前，游泳者的欢闹笑声也回响在耳边。

在我的记忆中，武大游泳池原是武汉大学和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合建的，在建设初期我还参与了它的建设工作。记得1964年我还在水院附小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我们小学的劳动课内容之一就是给游泳池的底部做“垫层”，学校给我们每两个小朋友发一个挑土用的簸箕，由班主任老师带着我们在游泳池旁边的湖边上捡一些圆形的鹅卵石装在簸箕中，鹅卵石装满后，两个小朋友抬着将其倒入现在的游泳池浅水区中，以防游泳者的脚被水下的坚硬岩石或石块划破。

建好投入使用后的游泳池管理相当规范。游泳池的岸边（接近现在的马路边）设置了铁丝网，用铁丝网当“围墙”将游泳池范围的岸边围了起来，以供武大、水院学生和教职员专用。除学生集体上游泳课外，进入游泳池是需凭游泳证的（也许大人凭工作证或大学生证也行），附小的学生办证是在小学申请办理，但需经过家长签字同意。游泳池的每个拐角处都设有一个有救生员值班的救生亭，木质结构，游泳池开放时，救生员必须到岗并时刻关注着游泳



者的安全。在游泳池的浅水区与深水区之间、深水区与游泳池之外还设置有铁制隔离栅栏，阻拦不会游泳者进入深水区，不让游泳者游到游泳池之外。即使有这样的防范措施，在游泳池中溺水事故仍时有发生。一是发生在游泳池浅水区与深水区隔离栅栏上。隔离栅栏是用约 12 毫米钢筋与角钢焊接成的，钢筋与钢筋之间有间隙，栅栏角钢与游泳池的底部地面有间隙，调皮的小孩喜欢从水面下栅栏的间隙或栅栏角钢底部与地面间隙潜水穿梭玩耍，但有时在穿梭的过程中，会因身体的某个部位被栅栏间隙卡住而不能通过造成窒息。二是发生在深水区外。当年东湖里生长着很多水草，游泳池深水区之外的水草从湖底的淤泥处长至湖面以下，游泳者要是被水草缠住又不会处理的话，也可能会溺亡。因此，为保证游泳者安全，老师、家长、救生员是不允许我们游到游泳池之外的。

在游泳池入口对面（马路对面）的山坡上，设置了更衣室和广播站，游完了大家可以到对面更衣室更衣。那时的更衣室非常简陋，只是给更衣者一个隐蔽的空间，没有冲淋设备，也没有物品存放处，但是是免费的（那时没有收费的做法）。更衣室隔壁的广播站不断地播出天气预报、长江水位信息以及游泳注意事项、通知、失物招领等内容。

在记忆中，每到夏天放暑假时，武大游泳池很是热闹，很多教职工及其子女都来此处游泳消暑（大学生此时大多离校），特别是浅水区，到了下午往往是“人满为患”。

水院附小的小朋友大多会游泳，原因是水院附小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有游泳课（武大附小的情况不详），老师先在岸上教小学生游泳的动作，然后再在浅水区教（当然下水学游泳的小学生要经过家长签字同意）。我的游泳就是这样学会的。

我在水院附小读的小学，家住武大四区，四区的小朋友大多在武大附小上学，他们也都会游泳。我读小学和中学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那时先是学校停课不上学，后来毛主席说要复课闹革命，小学、中学又开始上课，不过也就上半天课。由于没有学习负担，夏天的下午时间大多是和四区的小朋友在游泳池度过。那时的东湖水很清，我们在游泳池可以睁着眼睛在水下游泳（一般的商店没有



游泳眼镜卖)。不知谁发明了在水下捉迷藏的娱乐游戏,利用水中的能见度有限和游泳池边缘的若干水泥立柱作为遮挡,由一个小朋友去抓其他小朋友,摸着就算被抓住。在睁着眼睛潜水的过程中,经常可以看到成群的小鱼儿在眼前游过。我们有时躲在泳池水泥柱子下,偶尔看到黄黑相间花纹的鳊鱼就停留在水泥柱子旁边一动不动,要是合适的叉鱼器具,经常叉到鳊鱼。游累了,我们就躺在游泳池的水泥板过道上,侧脸远看武钢烟囱冒出的黑烟,仰望蓝蓝天空上飘着的白云。那时的天空很蓝,天空上飘着的云朵很白,朵朵白云如巨大的棉花,且不断变换着各种形状,在天空上慢慢地飘着。欣赏着广播室播放的《世界是你们的》等革命歌曲,听着广播站不断播放的长江水位公告和天气预报,那种悠闲、放松、没有压力的生活,以后再也没有享受到。

到了冬天,喧闹的游泳池安静下来了,这时游泳池的水更清了。我们冬天有时到湖边玩,走到游泳池深水区水泥板过道上观看游泳池底,那是真正的清澈见底,池底岩石、石块、贴着池底游动的鱼儿都清晰可见;游泳池深水区外由湖底淤泥长出的水草一根根垂直向上,随着水中的波浪摇摆。

时光飞逝,当年的小朋友已步入老年,眼前的游泳池就像一颗枯萎的老树,各方面的机能已经衰退,不再具有活力和生机,游泳池的救生亭已经没有了,设置在游泳池中各个部位供游泳者从水中爬上水泥板过道的钢制爬梯没有了,游泳池中的水浑浊不清,散发着一股臭味,昔日武大游泳池的风采已经不在了。

(作者系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1977 级校友)



珞珈忆

——纪念 1977 级入校 40 周年返校聚会

金明洁

2017 年 10 月 7 日的珞珈山格外喜庆，700 多位曾经的莘莘学子从世界各地、天涯海角回到母校欢聚一堂，庆祝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返校。

全校 1977 级返校聚会的创意来源于病毒系，这是恢复高考后成立的一个小系，当时与空间物理系同时成为全国重点学科。鉴于病毒系太小，又与生物系关系密切，病毒系提议两系合办返校聚会，得到生物系的支持。当时的病毒系学生会主席提出 2017 年是我们进校 40 周年，当年的 1977 级学生年龄参差不齐，平均年龄也该是 60 岁了，40+60，应该好好庆祝这个意义重大的 100 年。消息传到当年全校学生会主席胡树祥那里，举办全校聚会的想法产生了。胡树祥立刻与当年的各系学生会干部联系，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与支持，学校领导也非常支持这一活动。随着校友的捐款、出力及安排具体事项，1977 级全校返校聚会就这样开动起来了！

走在校园里，到处可以看到一群群头发花白、穿着相同 T 恤的中老年人，大家朝着一个目的地——小操场前行。这是 1977 级毕业后的第一次全校聚会，许多同学分别 36 年不曾见面。路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两人相互握手，看看对方的名牌才敢叫出名字。虽说开始时彼此好像不相识，一旦相认，熟悉的感觉立刻被找了回来。

小操场上一片热闹，学弟学妹们拉着条幅，欢迎离校 36 年后



重返校园的学长学姐们。回校的同学们找到自己所在的系，三两成群，有的相互诉说分别后彼此的生活经历，有的互留微信以保持联系，有的拍照合影留下珍贵记忆。

小操场见证了 1977 级学生的进校、毕业、成长与成功：当年，1 173 名幸运学子通过高考走进武大，第一次新生入学大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40 年后的今天，100 来人已经离世，但仍有 771 人重聚这里，占总人数的 2/3。大家欢聚一堂，感谢母校的栽培，同时也庆祝自己的人生抵达新高度。



上午 9:00，胡树祥宣布大会开始。胡树祥向大家介绍与会嘉宾，校党委书记韩进及各位校领导出席了聚会。当老校长刘道玉的名字出现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胡树祥回顾了 1977 年恢复高考这一历史事件：最先提出恢复高考的是武大的老教授查全性先生，且立刻得到了许多老教授的支持。正是有了老先生们的提议，邓小平的拍板决定，才有了我们这些“文化大革命”后的首批通过高考进校的大学生，才有了我们这些幸运的 1977 级



校友。

学弟学妹们朗诵的《珞珈赋》，抒发了我们对于母校的深深热爱之情；校宣传部制作的《我们这一代》，回顾了 1977 级学生孜孜不倦、积极向上的学习、进取精神，让我们每个人仿佛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仿佛又回到了那遥远的学生时代。场上许多人抹着泪水感慨万千——40 年弹指一挥间，我们又回到了亲爱的母校，又拾回了逝去的青春。

九一二操场，我们曾经在这里挥洒汗水，努力完成体育达标。今天操场上没有跑步和打球的人们，跑道上搭起了照相用的阶梯，我们以行政大楼为背景，以系为单位拍摄集体照。首先是全校集体照，老校长坐在我们中间，然后以系为单位拍照，这一下就看出了各系的阵容：人数最少的是病毒系，当年新兴的病毒系只有 23 名学生，毕业后 36 年过去，他们中间已有 2 人离世，今天回来了 12 人。





中午，大家来到桂园食堂，重温当年的学生生活。桂园食堂是原化学系食堂，如今修葺一新。几百位年过半百的老头儿老太太，排着长龙等待打饭的情景有些滑稽，却很有年代感。如今的食堂和以前大不相同，有十几种菜肴供大家自行选择，当年可没有如此“奢华”。记得最初是包伙，每到开饭，师傅拿着一个大勺，不论男女每人两勺，结果是男生不够吃，女生吃不完。后来情况有所改善，食堂实行饭票制，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和需要选择菜肴，不过当时可供选择的并不多，钱包也不鼓。

午饭后，我们顺着小路朝着老图书馆走去。路边的这座鲲鹏展翅雕塑，是我们 1977 级全体同学毕业时为感恩母校捐赠的，它寄托了学校对我们的期待及我们对自己的勉励——愿我们毕业后像鲲鹏展翅纵情高飞。如今许多同学在各行各业都事业有成，他们不张扬、不浮夸，踏踏实实地做着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



沿着樱花大道来到老斋舍(现已改名樱园),我们仿佛看到了当年在樱花树下读书的自己。顺着高高的台阶向上爬,大家想起了当年争先恐后奔向图书馆抢座位的情景。图书馆坐落在狮子山顶,在学校这座最漂亮的建筑里,当年活跃着我们的身影。如今,这座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建筑已成为供人参观的校史馆。走进大门,眼前还是熟悉的场景,一排排书桌依然安静地立在那儿;当年,为了这里的一席之地,我们会在图书馆开门之前早早地在外面排队等候,每每开门的一瞬间,大家蜂拥而进,座位立刻满员。找到座位的人兴高采烈,没有座位的人无精打采,只能垂头丧气地离开。我们坐在座位上,寻找当年的感觉。

我们第一次来到了图书馆的楼上——当年这里是不对学生开放的。墙上一幅幅照片展示着武大重要的历史人物,记录着武大的发展史。我们在参观中了解着学校的历史,重温着当年的大学生活。



顶楼风景最好，一边是水天一色的东湖及其风景区；另一边珞珈山向我们遥遥招手，行政大楼及其他建筑隐藏在郁郁葱葱的绿色中，中国最美校园名不虚传。

参观完校史馆，我们顺着老斋舍的阶梯向下走。途中遇到一位两鬓斑白的游客，年龄看上去和今天满校园的老校友差不多大，他看着我们身上的T恤问：“你们是77级的吗？”“当然，今天返校的都是77级的！”他说：“我爸爸是78级的。”我们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我们比他爸还高一年级。这就是我们那一届的特点，集中了10年的考生，年龄跨度十几年，最小的应届生只有15岁，最大的老三届已经三十好几。



从老斋舍出来经过一片小树林，里面有不少石桌石凳，一看就是读书的好地方，也是谈恋爱的好去处。当年的武大，在全国高校中走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学校最早实行学分制，学分修满即可提前毕业；学生也可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外系修课，当时我就在化学系修了好几门课。武大的开放还表现在不禁止学生谈恋爱。当时的中国高校大多禁止学生谈恋爱，还会在毕业分配时故意将恋人们分配两地，让他们天各一方，以示惩戒。而我们的老校长却说，77级大多是从农村、工厂及各行各业来的，年龄不小了，不让他们恋爱是不人道的，只要不影响学习就行。感谢刘道玉校长，我们小小的23人的班级，竟有3对结成终身伴侣，另还有3人与外系同学成双成对。

这个小池塘，当年是一片乱糟糟的沼泽地。如今柳枝摇曳生姿，莲花顾盼生辉，棉花般的云朵映在水中，红鲤探着头吐出圈圈涟漪。



绕过小池塘，我们朝着生科院走去，下午的活动在那里进行。



路边立起了一幢幢 20 世纪 90 年代后新修的建筑：万林艺术博物馆，由 1979 级校友陈东升捐资修建，正在展出武大人在南极考察取得的成果，是很好的科普教育基地；顺着小路继续向前，图书馆、物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一幢幢建筑各具特色，又保持了学校的整体建筑风格，让人感受到了母校的日新月异，却又不失传统魅力。

我们在生命科学学院与当年的老师团聚畅谈。生科院当时只有生物和病毒两个系，如今已发展到 7 个系了。30 多位曾为我们授课的老师都被请到了会场，老师、同学争相发言，气氛热烈温馨。大家回顾了过去，感谢母校和老师的培养和教育。

晚餐在珞珈山庄，终于又吃到了湖北菜！当年的热干面、豆皮、藕汤、红菜薹，大家如数家珍、记忆犹新。进餐期间，同学们纷纷上台纵情高歌，为晚餐增添了欢乐气氛。一时间欢笑声、歌声夹杂着清脆的碰杯响声，充满了整个大厅。

晚上我们又回到小操场，重温当年拿着小板凳看露天电影的情景。《女大学生宿舍》将我们拉回学生时代，这部电影就是在校校园里拍摄的，真实讲述了我们的学生生活，让人倍感亲切；另一部是最近很火的《战狼 2》，让同学中的海外游子感受到了中国电影的发展及时代的变迁。

紧凑、欢乐、兴奋、激动的一天结束了，这短短的一天跨越了 40 年，来之不易。感谢组委会的精心安排，让同学们在相聚时，真真切切地重温了自己的学生时代，让我们又年轻了一回。

2017 年 10 月 7 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

（作者系病毒系 1977 级校友）



从白暨豚到江豚，35 年的研究与保护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学者王丁的奋斗与期待

金 陶

1982 年，中科院水生所希望招一个开展白暨豚声学研究的人，当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空间物理系的王丁在机缘巧合下来到这里，开始从事珍稀水生野生动物的行为学、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与这些即将消失的“精灵”们打交道多年，王丁发现它们已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1999 年，王丁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8 年后他从这个位置上退了下来，全身心投入江豚的研究。“我现在不是副所长，请记住，我的职务是研究员。”

王丁的日常工作很忙，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秘书长，至今仍扛着一堆头衔，为水生态环境保护大业奔波四方。从东北的三江平原到西南的青藏高原，处处留下了他辛勤的脚步，而跑得最勤的还是长江流域。

今年快 60 岁的王丁经常往长江跑，做有关江豚的调研，也和渔民打交道，仿佛是在害怕自己错失为保护江豚而战的每一秒，似乎他还在为白鱘豚的灭绝而耿耿于怀。

当有人问他江豚的现状，他说道：江豚的种群数量在过去的几十年下降得是比较快的，我们有确切数据记载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2006 年和 2012 年在长江干流流域开展的全江段调查。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从宜昌到上海段的长江干流，大概有 2 500 头；2006 年下降到了 1 200 头；而到了 2012 年，只有 500 头了。





长江干流的数量呈加速下降趋势，2008—2012 年种群年均下降速率接近 14%，速度非常惊人。在鄱阳湖大概有 450 头，洞庭湖 90 头，总的来看，目前江豚的数量不到 1 000 头，如果不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很可能在未来 15 年内走向灭绝。

他还说：长江江豚有着自己的生命尊严，对人类而言，它们是长江的旗舰物种和指示物种，保护它们就等于保护我们的母亲河长江，这是我们整个团队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我们江豚保护工作最终的价值核心。健康的长江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维系长江流域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对国家生态安全意义重大。

王丁还说，我们感到比较欣慰的是，国家和社会层面对长江江豚乃至整个长江生态系统的保护态度已经有所转变，各部门开始高度重视长江江豚的保护工作。2014 年，农业部决定将长江江豚按照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进行保护和管理，今年将启动实施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会同沿江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和科研机构采取多种措施，共同保护好这个极度濒危的长江珍稀物种。后期的长江江豚的保护工作仍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从国家到社会，大家的环保意识都在不断地提高，江豚保护工作的意义不断得到彰显，大家逐渐意识到长江江豚以及长江保护工作的重要性，这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江豚保护工作的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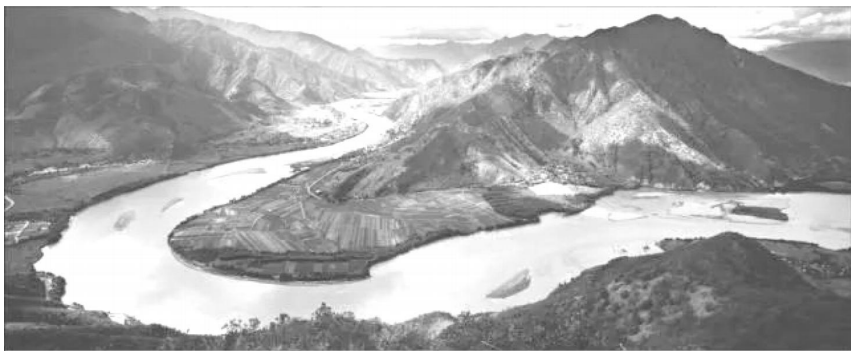
在人们问及白鱘豚、江豚等珍稀生物的保护工作中，最大的阻力或者说困难是什么时，王丁指出：作为中国的母亲河，长江的万古奔流孕育着我国 40% 的人口，创造了我国 40% 的 GDP，同时也孕育了我国特有的两种水生哺乳动物——白鱘豚和长江江豚。近年来，由于人类活动的不断增加，长江野生动物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白鲟、鲟鱼、白鱘豚已不见踪影，长江江豚、中华鲟种群数量大幅下降，极度濒危。日益升温的航运、水利工程建设、非法渔业活动等，严重威胁着长江江豚的生存，实质上也是在破坏着我们人类自己的生存环境。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江面上挤满了挖沙船。这些挖沙船对生态环境破坏特别严重，对白鱘豚、长江江豚的影响非常大；水质污染和水利工程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长江江豚的生存环境。此外，长江机动船螺旋桨、野蛮的无差别捕鱼方法都使得江豚



被诱捕、杀死。随着电捕鱼规模的扩大和冬季炸鱼的盛行，江豚被电死和炸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迷魂阵(湖里圩堤边相对平浅的湖面上，沿线设置着一道道网阵，用竹竿牵拉着一张张大网，向湖内延伸，圈出一大块水域)也属于非法渔具，江豚经常会误入迷魂阵而死。

王丁伤感地谈到，长江江豚是水生哺乳动物，处于食物链最顶端。长江是中国人民的母亲河，40%的人依赖长江生活。如果说长江的环境恶化、生态系统遭受破坏，长江江豚灭绝了，那么人类也必定会受到相应的影响。

因此，王丁坚持不懈地呼吁：真正能够保护江豚的，除了国家政府层面下大决心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之外，更需要社会公众有保护意识。他坚信：随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将进一步唤醒全民的环保意识。江豚目前恶劣的生存环境，终究能获得改善。



(本文由空间物理系 1977 级校友金陶根据睿传媒《拿什么拯救你，最后的江豚》2017 年 2 月 9 日改写)



我的武大缘

刘澄清

在武汉军区当兵 5 年了，自然听说过中南五省的著名高校——武汉大学，但却从来没有奢望过到武汉大学读书，更匪论以现役身份。然而，想不到的事儿有时一不留神也会梦想成真。

1977 年注定是对中国学子意义非凡的一年。这一年，中断多年的中国高考开始恢复（此中亦有武汉大学查全性教授建议之功），军队人员也可参加。但军队的参加非常粗放，不管个人的情况与想法，给各部队分派只能考文科或理科的参考名额。我所在的部队分得 5 个名额，只能考理科。我幸运地成了 1/5，考的是数理化，与外语风马牛不相及。

考试结果出来，通知说过线（只知过线，到底多少分，我至今不知）。依程序政审、体检，均合格，最后，填报考志愿。我那时喜爱无线电，填报学校长沙工学院（即现在的国防科技大学），专业为通信。依这个程序走向，我应是一辈子报效在通信事业上，也许会成个通信总工？

但录取入校时，通知单上却是武汉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匪夷所思，懵懵懂懂，1978 年 3 月，我一身戎装，到武大外文系报到。

自然，第一眼惊艳的是武大的校景，简直太漂亮了。而最先映入眼帘的外文系教学楼、老斋舍，依山而建，青砖绿瓦，古色古香，恍若仙境。再看那些陆续涌入的莘莘学子，满怀喜悦，朝气蓬勃，如阵阵春风扑面。

经摸底考试，我被分到快班，开始了武大的学业。那时，所有人都惜时如金，恨不得 24 小时读书学习；那时，老师们也全力施



教，一展所能，让人惊异武大有这么学养深厚的先生；那时，思想活跃，青春热情，生活艰苦却个个乐在其中。无疑，那是一段每个武大学子都终生难忘的岁月。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不可思议的临门一脚却进了武大门的独特经历，是因为当年全武汉军区参加文科考试者，无一人过武大外文系的录取线，让极具责任感的军区高考组织人心有不甘，下功夫翻查了当年考试过线人的档案，意外发现，曾有一个在武汉军区外语训练大队学过英语、成绩还不错的兵，就这样，作为补角，我进了武大。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出当年高考的仓促、多少有些混乱，另一方面，冥冥之中未尝不是我与武大的因缘？

进校是缘分，坚持到底对我而言就更是缘分。大学期间，那个一直视我不顺眼的原单位因某个说法，两次决定把我从学校要回。最艰难时，我也自认与武大缘尽，准备卷铺盖回去。这时，武大尤其是外文系的李泽渊书记拍案而起，极尽周折，终于使我得以留下，完成了本科学业。

毕业之际，又得益于李书记的鼓励支持，我参加了武大法律系的研究生考试，顺利入围，继续武大另外 3 年的学习生涯。7 年——无比宝贵的 7 年，让我与武大的老师，武大的同学，武大的山水，尤其是与李泽渊书记，结下了浓浓的化不开的情缘。

研究生毕业到深圳工作后，又恰逢我们的导师韩德培先生、李双元先生到深圳开会，执弟子礼期间，先生询问我为什么不再在武大读个博士，以便将实践中的有些问题做理论升华。我一想很对，有先生这些法学巨擘耳提面命，错过一定会追悔莫及。于是又一番紧张准备，1993 年我通过了博士生入学考试，又进了武大门，回到了梦中的珞珈山。

人生中孜孜以求的学位上的三个阶段均在武大完成，缘耶？命耶？这些无不令我感慨、感恩、感怀！

武大，承载着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记忆。

（作者系外文系 1977 级校友）



那一年，那场考……

刘建萍

有一阵，上高中的女儿 AP 化学遇到了一点儿问题，依照惯例，先叫游击队——老妈。老妈拿起书来看了看，像是分析化学的平衡方程式，不像是随便放两枪就能解决的事儿，于是招来正规军——老爸，原化学博士，现在做了计算机程序员。正规军果然不简单，迎难而上，而且越难越高兴，好显本事啊。看着父女俩两个脑袋凑在一起，一个讲得带劲，一个听得认真，不由得想起了大二时分析化学的那场期中考试。

1978 年 3 月，带着那颗在广阔天地锻炼了 3 年多的红心，和一副革命老苏区的红薯、南瓜养育出的好身板，我终于回到了武汉，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的一员。记得开学第二学期才领到校徽，每周回家都正正地戴着那白底红字的校徽，不动声色地享受着周围羡慕的目光。

我们这一届学生，工农商学兵俱全。我们班 8 个女生中有 4 个知青，3 个工人，一个实验员，其中一个走读生——一位老三届的大姐。可以说，除老三届以外，其余的基础知识都很差，而且程度参差不齐。比如英语，像我们会几句“毛主席万岁 (Long live Chairman Mao)”，“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The working class is leading class)”的人就算中等水平了，很多人得从 ABCD 开始学。教我们英语的汪明华老师可是费了老劲了。教高等数学的阮荆州老师，上课一丝不苟，认真调教我们这些年龄相差 15 岁的各界人士。刚进学校时，我连正负数都不懂。买来一本高数习题集，几千道练习题做完以后，期末考试就一点儿也不觉得难了。阮老师最后一次



冒着酷暑为我们复习，汗衫全部汗湿透了的情景让我们终生难忘，至今还会在我们的同学聚会时被提起。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虽然是在化学系，但很多人都是像我一样，不知化学为何物，填志愿根本没报化学系，是被扒拉去的。记得第一次化学摸底考试，我只得了 59 分。由于肩负着全国人民的希望和学好本领、建设四化的重任，更因为对知识的渴求，我和同学们可以说是拼了命地学习。由于“文化大革命”内乱的影响，那几年的晚上会经常停电。于是我们想方设法找有灯的地方读书，可以说哪里有灯，哪里就有我们的身影，包括路灯下。

当时系里各教研室都派出最强的师资给我们上基础课。当年提出恢复高考的查全性教授亲自给我们讲授了物理化学。无机化学是由查先生的夫人张婉慧女士执鞭。分析化学是由当年高校《分析化学》教材的主编赵藻藩教授亲自担任主讲。教有机化学的是刘盛荣老师。

虽然我们基础很差，但是我们不怕苦，敢拼命，于是“考不倒的 77 级”着实让老师们吃惊了。老师们当然也都使出浑身解数，毕竟他们也有 10 年没有真正教过“考进来”的大学生了，也希望把自己平生所学全部灌输给学生。老师们个个温文尔雅，风度翩翩，讲课时挥洒自如，态度和蔼可亲，回答问题非常耐心。考试时却是另一番景象，那年期中考试前，我们敬爱的赵藻藩教授就“恶狠狠”地叫嚣要考得我们 $1/3$ 的人不及格。

那次期中考试让我明白了，老师要是想难倒学生，他就真的能难倒学生。那次果然考得昏天黑地。记得总共是 5 道题，感觉就像是过刘文彩的“收租院”似的，一道更比一道难。考试从下午 1:00 开始，到了下午 6:30 我还在第四题和第五题之间兜兜转转。尤其是最后一题，简直就不是正常人能搞清楚的。记得最后一题有点像做菜的调料，在一个有水的容器里加了一把盐，加了点醋，加了小苏打，又加了一些可酸可碱的白色粉末，要我们写出方程式，算出最后产物的浓度。可怜我拿着笔东比划西比划，绕来绕去绕不清。到了晚上 9:00，就觉得脑袋绕得嗡嗡响，肚子也绕得咕咕叫，我带着满腔怒火交了卷。而等到 7 个女生都回到寝室已经是晚上



10:30 了。最后结果是两百多人只有 3 个在 60 分以下。还好，我不在那 3 个人里面，本人得了 72 分。从此以后，敬爱的赵教授再也不为难我们了，英雄相惜嘛！以后还有几次考试也很残酷，印象却没那么深刻了。

几年前听说赵教授丧生于一场车祸，愿赵教授在天国安息！

谨以此文向当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把一批集十几届工农商学兵的乌合之众训练成各科研院所及各行各业急需人才的老师们致敬！

(作者系化学系 1977 级校友)



大学梦

李名宪

我的故乡花坪镇，乡风淳朴，有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大人们教育孩子，都是说“要有出息，就要使力读书，争取考上大学”。

记得在我们家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考上大学的，是我大伯的儿子，我们都亲热地称他“名相哥”。

名相哥是在省城武汉市的华中师范学院（现已改名“华中师范大学”）读地理系。

名相哥长得一表人才，又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学的是郭沫若的字体。二胡、京胡拉得像模像样的，我们听起来，就跟广播里播放的二胡独奏一样好听。他的画也画得很好，那时大伯家孩子多，孩子的学费不是完全负担得起的，还要靠孩子自己挣一些，名相哥就利用学校放假到县文化馆去画画自己挣学费。

那时，我对名相哥非常崇拜，心想，大学生就是这样地了不起，并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也要考上大学！

我是 1961 年在家乡的花坪小学发蒙开始读书的，小学刚要毕业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初中没有及时招生，记得我们那一届小学生硬是在原来读书的小学里多挨了一年，读了个七年级（本来那时小学的学制是 6 年）。中学停止招生了，我们这些已经小学毕业了的学生没地方读中学，只好回生产队务农。

后来说复课闹革命，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我们这些同在小学毕业的伙伴们终于上了中学，但还是没有正规的书读，学白卷英雄反潮流，听仇大苦深的老贫农上阶级教育课，到田间学习农业基础知识等占去了大部分时间。当时好像还给我们发了一本书《工农业基



基础知识》(可能也算是教材吧),里面的内容有讲柴油机原理和手扶拖拉机操作的知识,还有如何种植杂交玉米等。

待到上高中时,语文、数理化、英语等基本上都有教材可学,但上大学不是考,而是推荐。我在湖北建始二中读高中时,目睹有推荐上大学的,他们代表了我心中的梦想,那时他们就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

其实,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很清楚,凭自己的家庭出身(上中农)想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非常渺茫,但我对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做法并不反感,我的心已经被卷入那个充满青春激情的年代中了。

我从小在家庭受到的是中国正统儒家思想教育,知道要做正直的人,坚信国家、党,坚信毛主席号召的都是对的。所以,当时的一切我几乎都能接受、理解。

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一年后,被推荐当了民办教师。

在我担任民办教师期间,大约是1974年下半年,当时的花坪人民公社实行推荐上大学,也要我参加了公社组织的文化考试。

记得考试是在花坪小学操场靠南边新盖的一栋两层楼的教室里进行,写一篇作文,题目忘了,写的是当时由花坪供销社的有关人员在一个名叫“大石板”的地方附近的刀背垭实验成功了腐殖酸肥料的事情,我自认为写得还不错。

文化课考试后,又组织我们到当时的下坪(清江边的景阳镇)的建始十中去体检。

当时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我们一伙来自花坪、怀揣大学梦想的青年结伴而行,一路过小西湖、穿长槽、上关口、下景阳,还在同去的一位青年的家在景阳河靠花坪这边关口坡下楠木社居住的亲戚家吃过饭。

可是后来,通知上大学时却没有我。

当时花坪人民公社管教育的领导专门找我谈过话,说本来要推荐我上大学的,但考虑到我刚到新场去代初中班(我任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如果我走了,找不到合适的人代替,所以把我留下来继续把初中教学搞好,以后有机会再推荐上大学。末了,还叫我(现



在回忆起来应该叫“怂恿”)写一份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放弃上大学机会,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贡献的决心书。

我立即答应并写了一份激情满怀的决心书,还用大红纸工工整整誊写了张贴在当时的公社场坝门口。

这样一来,很多人都知道我服从组织安排,放弃上大学机会,一心为家乡教育事业贡献力量的动人事迹。我当时也确实很激动,一下子成了名人。

多少年后才知道,原来我们那次所谓的“考大学,写作文”,都是掩人耳目的幌子,当时人民公社革委会压根儿就没有以考试成绩为依据推荐上大学的打算,被推荐上大学的所谓“工农兵学员”,首先是要根红苗正,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是托关系、找路子。我那次参加所谓的考大学纯粹是陪衬。

自那以后,我基本上不想上大学这事了,因为我确实太热爱我的乡村小学教学事业了。

在万重青山中,有那么一所乡村学校,每天早上迎着初升的太阳,一个个农家孩子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来到学校,见了我都以充满稚气的笑脸和童真的声音叫“李老师”,我感到这真诚的语言有如天籁之音。

随着半截无缝钢管的被敲响,“铛!铛!铛”的上课铃声在山谷回荡,一天的教学开始了。

在课堂上,我会以浅显生动的语言教给学生们知识。我似乎有天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学生在上我的课时,没有不愿意听讲的,平时我与学生们关系也很好,他们感觉不到师道尊严,但我在他们心中又是很受尊重的,这从他们对我真心的爱戴与尊敬可以看出。

下午4:00左右,到了放学时间,学生们在操场上排好队,值班老师讲过一些注意事项后,回家的学生依次出发。沿学校四周的山路上都有学生回家的队伍,而且每个队伍不仅有带队的学生队长,还有送学生的老师。我觉得放学后送学生回家,简直就是一种诗意的行走。

时间到了1976年,在农历年的春节前夕,学校放寒假了。学生们都回家去了,老师也基本上都回去了,记得好像是安排我和另



外一位姓田的年轻老师守校。

一天，大队民兵连长来学校通知我和那位姓田的年轻老师到公社参加征兵体检。

我说：“我没有报名参军呀？”

对于这一点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我家庭出身不是真正的贫下中农，深知一贯以政审严格著称的征兵是轮不到我的，我今天能担任民办教师，就已很知足，很感谢党的信任和贫下中农的栽培了。所以，我从未想过参军入伍，是决心一辈子当乡村教师的。

想不到民兵连长满带笑脸地说：“这次你们两人只管去体检，只要身体合格，政审的事情就不用管了。”

后来才知道，1976年——迷信的人都说不是一个好年头，说这年闰八月，而且在刚开年不久的1月8日，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就在北京逝世了，那可是共和国的顶梁柱呀！所以，尽管以往年年征兵有志青年都踊跃报名参加，这一年报名人数却骤减，体检都反复进行好几轮了，上面分派的征兵任务还是完成不了，因为身体合格的人不够。

所以，机会主动找上门来了！

那天，我和另一位老师一同到设在花坪小学的征兵体检站去体检。

几天后，结果出来了，我的体检合格。到部队后，因为我家当过教师，有文化，也有点口才，一到新兵连，就表现突出。新兵三个月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连队后，写写画画，活跃连队生活的工作给了我抛头露面的机会。半年后，连队文书要提拔任司务长，他就向连长推荐我接他的班担任了连队文书，在连长、指导员身边工作。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给了我所在部队9个参加高考的名额，分给我们连队一个。由于我是在连部工作，整天跟连长、指导员在一起，近水楼台先得月，当然也是他们最了解我，加上我的工作一直干得很不错，就把这个参加高考的名额给了我。

高考结果出来后，我所在部队9个参加高考的考生，只有我被录取了，是武汉大学！



当时，我的确是高兴万分！

为了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一个惊喜，我拿到大学入学通知书后，没有急于告诉他们，而是到了武汉大学后，才专门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书信寄往家乡。

后来才知道，那些天，我考上大学的事情成为了家乡人民的主要话题。从此，我家的地位骤然提高了，不再是被人们说来说去的“老黄了皮的上中农家庭”，而是出了大学生的“光荣军属”，大红的牌子就钉在我家大门边。每年春节前夕，生产大队都要派劳动力给我们家弄过年的木柴；另外，还有许多对军属的优待，等等。

这就是我的大学梦，从梦想到成真，如今又都成为了美好的回忆。

（作者系哲学系 1977 级校友）



忆四十年前的高考

刘治山

在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临之际，我心潮澎湃，不由得想起40年前参加高考的情景。

1975年2月，我从河北省南皮县北头中学毕业。那时，毕业意味着失业，我对于知识的向往和青年的理想只能暂时收回，开始和父老乡亲们一起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起、日落而息，饥饿和劳累相伴相随。

1977年深秋，从广播中得知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兴奋了几个夜晚。后来，我和全县40名优秀高中毕业生一起，参加了县教育局开设的“五七大学”师资培训班。县教育局选调全县最有经验的教师任教，当时的培养目标是补充县里紧缺的师资力量，主要是把高中所学知识再复习一遍。大家意气风发、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学习中。

1977年，高考主要是以省为单位单独命题，各县(区)自主组织。我记得考试是在12月中旬，考政治、数学、语文和理化4门课程。考试前几天，母亲默默地为我祈祷，期盼幸运能像雨点一样落在我头上。但是寒冬腊月，哪来的雨下？高考前那晚，当中学教师的父亲从学校赶回家，千叮咛万嘱咐：“以放松的心情去参加考试。”在那些几乎尝不到荤的艰苦日子里，母亲和大嫂专门为我做了余牛肉丸子。

上午8:30，考试开始了。做了几道题之后，激动的心情稍有平复，答题也比较正常了，能做的基本都做出来了。最后一天考理化，有一道化学题我从来没有见过，估计是为了拉开分数差距而设



立的。我根据已掌握的知识认真推理、大胆试探，用一种巧妙的方法做了出来。高考过后就是春节了，每个考生都忐忑不安地等待着那令人振奋抑或令人沮丧的消息。

当时填报志愿是在高考之前，到底按什么标准录取？能录取多少名额？哪所学校适合自己？对于这些问题，谁都不知道答案。我的任课老师鼓励我考北京大学，我个人认为河北大学较为稳妥，所以就报了河北大学和外省的两所普通学校。

两个月后，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农历正月十三，临近中午时分，我们一家正准备吃午饭，有人从公社捎来喜讯：“刘治山被武汉大学破格录取”。接过盖有“武汉大学”鲜红印章的录取通知书，心里泛起一股喜悦，那时的心情至今难忘。后来才得知，我当年高考成绩 303 分（满分 400 分），位列全县所有考生第一名，所以才能被武汉大学破格录取。

在武汉大学，我学的是物理系金属物理专业。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除了上课就是自习。30 多门功课，平均分数接近 90 分。后来又以优异成绩被分配到机械科学研究总院从事科研工作。国家恢复高考已经整整 40 年，为广大寒门学子提供了进步的机会，也为他们打开了改变命运之门。

（作者系物理系 1977 级校友）



我的珞珈情缘

宁百齐

如果有人问我这大半辈子登过次数最多的山的名字，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是珞珈山。近 60 年来，我与珞珈山结下了深深的情缘。

1 岁时，我随父母来到武汉，就居住在离珞珈山仅数百米远的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那时，父母忙，奶奶常带我和妹妹到珞珈山玩耍，那里的山山水水给我带来了许多快乐时光。儿时的记忆里，珞珈山就是一个大大的森林公园，除了古老的校园建筑外，几乎都是茂密的树林和荒野灌木。野莓、拐枣、山竹笋、松树菇、野木耳和梧桐果，只要我们去采摘，就会满载而归……慢慢地，我在长大，珞珈山的周围也在发生着变化，建筑多了，花草洋气了，过去的野味也几乎绝迹了，偶尔可以看到过去的拐枣树和梧桐果树，这时不会再有人问津了。城市化发展使她由过去的原始乡土面貌逐渐变成了一座风景秀丽的现代化大学校园。珞珈山是见证武汉大学所有变化的唯一证人，她让我永远忘不了。

1977 年，中国恢复了中断 10 年的高考，我作为知识青年在农村参加考试。填报志愿时，尽管有很多著名大学可以选择，但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珞珈山脚下的武汉大学，这是因为珞珈的情缘始终让我割舍不下。就这样，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无线电专业学习，珞珈山又成了我的好伙伴。每天我穿行在珞珈山边，去课堂、进阅览室、做实验和回寝室，都会闻到珞珈山花草树木的清香，度过了美好的 4 年大学时光。我永远不会忘记在珞珈山留下的印迹，那是我们师生烙下的情谊。亲爱的老师，犹如辛勤的园



丁，为我们这些极度饥渴的学子注入了成长的甘露。我与1977级无线电班的同学，在4年大学学习和生活中建立了终生的友谊。我不仅在知识上得到极大提升，更重要的是培养了自学和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对科技创新的浓厚兴趣，我的理想在珞珈山开始放飞。

大学毕业后，我参加工作，巧的是工作地点离珞珈山很近，在那里我认识了我的太太，可以说珞珈山成了我们两人的月下老人，我们的大部分秘密约会在这里进行，整个珞珈山尽收眼底，没有人再能窥探到了。我们相识、相知和相爱，直到孩子出生。再以后，我们的孩子也把珞珈山当成自己最好的朋友，奶奶有诗曾经写到，孙子爱山不爱水，珞珈山边绘乾坤。

1981年年底，我毕业后被分配到中科院武汉物理研究所工作，2004年来到北京。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从事电离层科学相关的观测技术和基础研究工作，用我的坚守和执著在科学道路上探索，取得了可喜成绩，这些成绩让我觉得自己无愧于深爱的珞珈山，无愧于珞珈山下的母校。

珞珈山边的武汉大学是中国开展电离层科学观测研究的发源地，也是我从事电离层科学研究的起步点。大学毕业不久，我有幸来到了珞珈山畔的中科院武汉电离层观象台，观象台与武汉大学有着紧密的合作，导师李钧院士也是武汉大学校友，他睿智、有远见、认真和执著地追求科学的精神影响着我去做科学研究，时常，他会给我们讲述他在珞珈山坚守电离层研究的心路历程，也会向我们描述电离层科学发展和应用的美好前景，使我深受鼓舞。由于学习和工作关系，我也有幸与武汉大学多位电离层科学前辈和老师进行交流和学，如我国电离层研究开创者之一的梁百先先生就给我很深印象，当时已70多岁的梁先生，是国际著名的空间物理学家，带着一副厚如汽水瓶底的眼镜，折射出丰厚知识的底蕴。我在请教和交流中得到很多启迪。他为人谦和，思路敏捷，工作执著，让我看到了一位科学家追求真理和认真做人、做事的品格，这也是珞珈山人科学风范的体现。我还接触到几位20世纪40年代在武汉大学参加电离层观测研究的科学家，了解到武汉大学桂质廷等老一辈科学家创立游离层实验室，并率先在我国开展电离层观测研究的奋斗



历程。王炘先生向我讲述了 20 世纪 40 年代他们在珞珈山采用手动式电离层垂直探测仪，每天 24 小时不间断开展电离层观测的艰辛，看到他们早年手工认真绘制的一张张电离图，了解到梁先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国内战乱的艰苦环境下，利用这些自主观测的武汉电离层资料，独立地与国外科学家同时发现了电离层赤道异常现象，为电离层科学发展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这些事迹让我感悟到，武汉大学这些具有珞珈情怀的科学大师们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还拥有严谨执著的科学探索、勇于创新 and 求真务实的精神。

正是在老一辈珞珈山人的启迪和感召下，我从珞珈山出发，开始了电离层观测研究的科学征程，始终是一名“追赶电离层的人”，尽管我追寻的物质，只是缥缈的电子和离子。30 多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在长期坚持和努力下，伴随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取得了多项重要成绩和进展。在台站观测上，我们发展和建立了国际上最先进的电离层观测仪器，观测站北起我国最北的漠河，南到三亚，并延伸到地球的南北极，形成了空间物理子午链综合观测网络；在观测数据上，我们对珞珈山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的武汉电离层数据进行整理、数字化和编研，形成了在中国观测时间最长的 70 多年的电离层连续观测数据，与国际上 60 多个电离层观测站建立了数据交换和共享；在科学研究上，我们电离层科学团队，近年来每年在本学科最具权威期刊——美国的地球物理研究杂志和地球物理快报上发表的电离层专业论文数，按研究单位排名国际第一，大大提升了我国电离层科学研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在应用上，我们承担的北斗导航卫星电离层时延修正项目，应用于北斗卫星系统工程，为我国空间工程和国防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我们发展的高频定时技术应用于我国远望号航天测量船和海军战舰上，获得国家发明奖；我们对电离层长期观测研究的科研成果，获得 201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更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团队有一批从珞珈山走出来的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学子，已经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他们挑起了电离层科学发展的重担，续写着我们与珞珈山的科学情缘。

这就是我和珞珈山的情缘，这个情缘就像一根红线牵动着我的



成长，伴随着我在祖国科学事业上探索。珞珈山让我同导师李钧先生——一位中科院院士，成为良师益友。珞珈山蕴含的科学精神也让我我和我的团队充满活力，其中院士万卫星、杰青刘立波和魏勇都是武汉大学的学子。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是珞珈人，我有珞珈梦。珞珈山让我和我的科研团队走出珞珈，走向世界……

珞珈山是武汉大学成为中国最美丽校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一个搬不走的历史见证者，一曲最美的校园交响曲。它将山、水、草木和琉璃瓦建筑融为一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珞珈山人积淀的教育、科学、人文和创新精神，更有众多的名师大家铸就了珞珈山的风骨和灵魂，正如武汉大学大门上的校训——自强、弘毅、求是、拓新——永远激励着从珞珈山走出来的学子们。

我与珞珈山的情缘还将继续，直到永远……

（作者系空间物理系 1977 级校友）



与象棋相伴其乐无穷

阮宜正

走进哲学系的 1977 级同学，大多都性格较沉稳，能坐、喜静、肯想。课堂上倾慕于老师们的精彩讲授，课后却与棋结缘。一班同学有不少喜欢围棋，二班同学则更钟情于象棋。这也让我暗暗高兴，因为只有在象棋中我才能找回一些久违的自信。我从 6 岁起即爱上象棋，投入过相当多的时间，且在武汉市棋坛上小有名气。由于象棋对我思维的训练，使我遇事能多动脑筋，也更加热爱科学以及其他各门功课。

班上的同学，在作棋盘上的较量时文质彬彬，少有输赢冲突，此君子风度也让我高兴，不过从内心上讲却是互相不服输的。多次较量下来，渐渐形成了班上所谓的“五大元老”，包括谢钟（曾经两次获得 1977 级二班象棋赛冠军）、骆郁庭、李东、吴志峰和我。其实“元老”只是戏称，“元老”外的同学与“元老”比起来并不差多少，胡继堂在一次非比赛对局中，一盘棋竟然下了两个多钟头才最终获胜。

象棋有它许多的“小”道理，而人生与世事却有更多的“大”道理，学哲学的人容易产生联想，这也是我们喜欢下棋的一个原因。除了同学喜欢下棋，我们授课的老师中也有好几位喜欢象棋，比如黄德华老师、陈克金老师、陈祖华老师，还有早我们两年毕业的陈建国同学等。

1980 年，校学生会文体部组织了一次全校象棋（团体）赛，每个系选派三名棋手，哲学系由我、杨朝仁、吴志峰组队参战。比赛进行至最后一轮时，形成了哲学系与中文系争夺冠军的局面，哲学



系历经艰苦奋战之后最终夺冠，中文系获得亚军。杨朝仁是哲学系1978级学生，本次比赛他奋勇拼搏功不可没。

在校期间，柳大华曾两次被请进武汉大学校园。柳大华从小就家境贫寒，兄弟三人都酷爱象棋，他是在比他大5岁的大哥柳大中的带动下走上象棋之路的。他二哥柳大昌先是下象棋，后改学国际象棋，曾夺得武汉市国际象棋赛冠军。我与他们家同住汉正街，仅相隔一里多路，经常一起下棋，还常到武汉市硚口区文化馆作象棋表演，我在与他作象棋表演时输的时候居多。柳大华对象棋既痴迷又刻苦，记忆力特别好，曾在1995年创造过1人对19人的象棋蒙目棋吉尼斯世界纪录，被棋界称为“东方电脑”。

第一次请柳大华来校是在1979年，那年他获得了全国象棋比赛的亚军。那次只是我们班请他来作1对10人的车轮战表演，结果他是8胜、1和、1负，输的一盘棋是输给了哲学系1978级的杨朝仁同学，和的一盘棋是与吴志峰战成了和局。开赛前的欢迎会由刘金联（班长）主持，黑板上的“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14个字是我提议写上去的。第二次请柳大华是在1980年，以校学生会的名义请他作1对4人的蒙目棋表演，1980年正是他在全国象棋比赛中夺得冠军的一年。蒙目棋表演在学校大礼堂进行，礼堂的舞台上摆放4个木质大棋盘供观赏。当时的场景十分热闹，偌大一个礼堂连过道都挤满了人，他当时下的4盘蒙目棋全部获胜。

1982年元月，1977级本科生毕业。毕业后有次聚会是在1983年4月，同班同学之间举办过一次“樱花杯”象棋赛，由任华忠同学任裁判，结果是姜锡润夺冠，捧回了“樱花杯”。奖杯是陶瓷做成的，高约30厘米，色彩艳丽。姜锡润将此奖杯小心翼翼地保存了好多年，但在十几年后的搬迁中还是弄丢了。

毕业之后，我也曾单独回校参加过几次象棋活动，一般都是应武汉大学象棋协会的邀请。其中印象较深的有两次：一次是1982年4月参加湖北高校象棋选拔赛，那是为迎接湖北省第四届运动会组织的象棋选拔赛，由武汉大学体育部组织，当时有16所高校参加选拔，结果我获得第一，中南财经大学李光新获第二，如果没记



错的话是武汉大学学生黄文俊获得第三。我们三人参加了当年 10 月举行的第四届湖北省运动会的象棋比赛，由于三人成绩均不理想，团体名次也比较靠后。还有一次是武汉高校象棋赛结束时的 2008 年 10 月 25 日，由专业棋手党斐（柳大华的学生）作 1 对 25 人的车轮战，我被邀请到 25 人圈中，且与武汉大学象棋协会主席、统战部部长李物让相邻而坐同战党斐，其他 23 人是那次比赛中的优胜者。车轮战最终结果是党斐获得了 18 胜、5 和、2 负。他输掉的两盘棋恰恰是对阵的我和李物让。党斐作为柳大华的高徒，也具有超强的记忆力，曾在 2015 年创下过 1 对 25 人的象棋蒙目棋吉尼斯纪录（此纪录 2017 年又被象棋特级大师蒋川以 1 对 26 人的成绩刷新）。

象棋至今仍是以竞技为主，但其实它并不仅仅只是竞技，而是具有极深厚的文化内涵。曾经引领过一代风骚的著名棋手、象棋特级大师许银川于 2009 年接受采访时说，“象棋里面有很多文化的东西，需要去挖掘、整理，这样象棋就不会仅限于竞技。”并且指出，挖掘象棋中的文化内涵，“这一工作棋手虽然也可做一些，但主要还得靠学者来做”，这样也就能使象棋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可能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一些”。（引自施绍宗：《象棋之道好比人生之道》，载于 2009 年 2 月 23 日《广州日报》。）

由于在母校读书时热爱象棋，又受到文化的熏陶与哲学的训练，我一直认为弘扬象棋文化既包括“形而下”层面的“竞技”，更包括“形而上”层面的“悟道”。经多年努力，我于 1992 年出版了《象棋系统论》，在全国引起了持续反响。教育部曾在 1995 年发过文件，鼓励有条件的中小学开设象棋课。在当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潮中，象棋正在不断走向世界。能为弘扬象棋文化作出自己的一份努力，内心甚感欣慰。

（作者系哲学系 1977 级校友）



难忘武汉方言，我那遥远的乡音

汪晶晶

有一天，我所在的“天涯若比邻”微信群中，有人贴了一段易中天的视频，把群友们笑得前仰后合。在那段视频中，易中天满怀深情地诠释着著名汉骂“婊子养的”，然后信誓旦旦地向全国人民表示，那绝不是骂人，那是武汉人民表示惊诧乃至赞美的一种特殊方式。

五洲四海的群友们，本是我在医学院校园中共度童年的发小，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了武汉方言，让我想起那久违了的、遥远的乡音。

在语言文学的汪洋大海之中，搞文学的，有点小聪明就够了。只要能哗众取宠，差不多就能指鹿为马了。但语言学却是一个有着绝对真理，因而需要青灯古卷，皓首穷经的地方。没有毕生坚韧不拔的努力，随随便便就开口，就动笔，哪怕你官高爵显，威震四方，也完全有可能在瞬间就留下千古笑柄。

而方言，又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东西。在古代汉语的语言学研究领域中，属小学训诂；在现代汉语中则属语音、音韵和发声学。人一辈子，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是可以选择、也可以抛弃的。但父母、故乡、母语和方言，却无法选择也无法抛弃，那是老天爷赐予的、将伴随你终身的珍宝。老一辈有许许多多杰出的语言学家，最初都是从对自身所属方言的观察和记录中，最终走上学术之路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中国硕果仅存的小学训诂专家，是时任武汉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老教授刘博平先生。我虽然不是中文系的，但因为母系家族姻亲的缘故（刘先生和我的外祖父是儿女亲家），我



本来是有可能近距离地去向他老人家请教的，而且在刘先生身边长大的大表哥对我宠爱有加，有求必应。

可惜的是，我刚刚在珞珈山上把东南西北搞清楚，刘老先生就溘然长逝了。

记得上大学的第二个学年，我们系开了必修课古代汉语。老师是从中文系请来的，不仅也姓刘，还是刘博平老先生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所带的研究生，算得上是嫡传弟子了。古代汉语本是一门极为枯燥的课，但刘老师却讲得好极了，好到什么地步呢？好到喧宾夺主，让大家竟忘了自己所学的本专业并非语言学；好到余音绕梁，让饥肠辘辘的莘莘学子忘记了下课。

我那时是学习委员，又很喜欢这位刘老师，很快就和老师混熟了。

有一次刘老师病了，我在回家的路上去看他。到了老师家中，我才孤陋寡闻地得知，老师不仅在古代汉语专业方面学识渊博，还是珞珈山上极负盛名的钓鱼专家。“文化大革命”那 10 年，对别人是“浩劫”，对老师而言，却在物质层面上是“丰年”。老师逢水必钓，逢钓必中，最后竟搞到到家中“求鱼者众”的地步。而老师又极尊古代圣贤的教导，“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于是，竟有了浩浩荡荡一群学钓鱼的学生，成了革命年代的珞珈一景。

我并没有告诉老师，我因母亲的缘故认识刘博平老先生，但老师自己却在聊天时想起了导师。老师说，刘老先生年轻时在北京求学，之后又到上海任教，中年之后才返回家乡湖北。但老先生毕生都对自己的母语方言——湖北广济方言，怀有深厚的感情和浓厚的兴趣。老师当年在刘老先生身边当研究生时，老先生常常以广济方言为例，为他讲解湖广音韵。老先生曾对弟子们说，楚地自古人杰地灵，名家众多。只有用楚地方言吟诵楚地名篇，人们才会明白，什么叫“惟楚有才”！

老师随后感慨地对我说，你没听过广济方言。以后有机会碰到广济人，你注意听听他们所发的“我”这个字的音。

我当时就笑了。我对老师说，我对广济方言的熟悉，甚至超过武汉方言。童年时，家中为我请的那位保姆（竟也姓刘，我叫她刘



妈)，就来自广济武穴。我早就注意到广济人所发的这个“我”字的音。假如非得要用现代汉语中的拼音字母来标识的话，广济人所发的“我”字，韵母可以不变，但得用 ng 做声母。

老师听后大笑。

后来古代汉语的考试，我得了 92 分，不免暗自窃喜。但很快听说，班上竟有一名同学得了 93 分。我一面假惺惺地惭愧，一面相当不服气地去打听究竟是谁。后来，我完全彻底地服气了。得 93 分的是我所在的第五学习小组的组长，人称老陈。老陈来自重庆，是老高中的。上大学之前，当过 6 年中学语文老师。老陈所在的寝室，全寝室的人古代汉语都考得很好。大家白天上完大课，晚上还能听老陈神侃。

据说老陈对老师过分仁慈的考题一直心怀不满，曾说《左传》《楚辞》，都是小菜一碟，怎么也该考一段《尚书》。

大概是两个学期之后，我又到中文系去选修过“现代汉语”。“现代汉语”中有一个部分，讨论的是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区问题。

当年的现代汉语，一共分为 9 个独立方言区：

北方方言(以华北为中心)，赣方言(以江西为中心)，湘方言(以湖南为中心)，吴方言(以江苏为中心)，越方言(以浙江为中心)，粤方言(以广东和广西为中心)，闽北方言(以福建北部为中心)，闽南方言(以福建南部和台湾为中心)，客家方言(无中心)。比较麻烦的则是安徽省，那里 4 种方言并行，却没有中心方言。

我这一说，让医学院的发小们大失所望。原来我们无比熟悉，无限热爱的武汉方言，在现代汉语中，竟然根本就不构成独立方言。

这 9 个独立方言区中，最大的是北方方言区。北方方言区笼罩着汉族人口的半壁江山。北方方言区下，又可以分为规范化北方方言区和非规范化北方方言区。

规范化北方方言区包括华北方言，陕北方言，东北方言。

非规范化北方方言区包括陕南方言，宁甘青方言，藏蒙新方言，晋方言，鲁方言，豫方言，鄂方言，川方言，云贵方言。武汉话属于鄂方言，是一种非规范化的北方方言。



在鄂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武汉话的历史甚短，并不是中心。历史上，鄂方言的中心是湖北省的荆州地区。我的一位同窗是德国政治学教授，有一次凤凰卫视采访他，碰巧被一位武汉朋友看到。朋友说，你那个同窗，普通话讲得真好，完全不像湖北人。那位同窗来自沔阳仙桃。当年下乡时，我在潜江待过几个月，潜江老百姓说话，语音语调上，也比武汉方言更接近普通话。而潜江和仙桃都属于荆州。

整个湖北省，除了咸宁地区的个别县，都属非规范化的北方方言区。

咸宁地区的通山、通城和崇阳，混杂着湘方言和赣方言。上大学前，我曾和好友端端一起，背着药箱到通山的生产小队去巡回医疗。老乡想问我们要药，说的话我们却全然不懂。那时湖北台已经开始教广播英语。我和端端还开玩笑，说老乡们不如慢一点跟你说英语。

那么，究竟武汉的哪一个城区的居民，说的是最正宗的规范化武汉方言呢？

不久前微信群流传过一篇短文，说汉口话是全国各大省会城市中最难听、最粗俗、最别扭的市话。却又同时称赞武昌话，说武昌话结合了吴越的柔和，却没有阴晦；结合了北方的方刚，却没有生硬，因而是流行全国的最佳交际语言。

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偏激之语。

事实上，当代汉语中的所谓汉口话和武昌话，在语音语调上所具有的差异，根本不构成方言特征。强行划分，只能是牵强附会。

既然大家都要把武汉方言分成汉口话和武昌话，我也只能随此大流。

整个武汉方言，不管是汉口话还是武昌话，历史都不悠久。假如要较真，汉口话的源起应该略早于武昌话，二者都源于鸦片战争之后。

具体地说，汉口话的源起在 1861—1898 年。根据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那一段时间不叫改革开放，也不叫引进外资，而叫丧权辱国。因为腐朽没落的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了若干割地赔款的



不平等条约。一大批中国沿海和沿江的城镇，包括当年的汉口镇，开始出现英、俄、德、法、日等国的租界。

所谓汉口话，就是汉口成为通商口岸，成为租界云立的中心之后，西风东渐的必然产物。

而武昌话的源起，则在1866—1907年。也就是从张之洞任湖北学政起，到清廷为削减封疆大吏的实权，让他和袁世凯奉调回京为止。正是张之洞从任湖北学政到任两江总督的数十年间，武昌成为了中国中部的文化教育中心。

至于说这两种差异不大的武汉话中，哪一个更好听、更雅致，那就涉及审美趣味了。

基本上，汉口话已经脱离了泥土，完全是城市语言。

20世纪20年代为纪念国父孙中山逝世而修建的中山大道，沿途居民基本上说的是正宗汉口话。其中最雅致的地段，则在中山大道以六渡桥为圆心，以两公里为半径的区域。

当年中国铁路运输的大动脉——京汉铁路，曾穿过整个汉口城区。铁路下面的洞，不管是单洞，还是双洞，都是城门，所以也叫单洞门或双洞门。到了铁路外，那就不是汉口，而是乡下了。所以我和我的发小们一直到今天都视为家园的那所武汉医学院，完全建在乡下，可以说是整个汉口最土气的地方。

那么武昌话呢？武昌话离乡土很近。大家千万不要看到今天，“过了街道口，博士不如狗”，就以为武昌的大学多、院士多，武昌话就一定比汉口话洋气。武昌话实际上比汉口话土气多了。但同时，当年参与构建武昌话的居民，有不少来自传统乡村的耕读人家。所以，武昌话诚然带着乡土气，但却比汉口话更接近于书面语言。此外，武昌话的语速比汉口话稍慢，于是无形中，也就带上了几分雅致。

那么究竟何处是正宗武昌话的中心呢？

流行的说法至少有两种：一种认为是司门口，那是千方百计希望武昌话城市化的居民；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是紫阳路，认为正是从那里起步，民众才走上了知识与科学的康庄大道。

第三种是我个人的看法。从语音学的角度上，我倾向于认为历



史上武昌话的中心，应该大东门谭家湾。

正是大东门的谭家湾，孕育了日后中国京剧老生鼻祖谭鑫培。

大家都知道，京剧的源头是200年前的徽班进京。而谭鑫培在京剧史中，更有着任何人都无可比拟、更无法取代的奠基性的作用。要知道，在京剧的全盛时期，那是无生不谭呀。正是谭鑫培，完善了京剧老生演员最重要的念功，也就是所谓韵白。在京剧的全盛时期，京白只有二丑和花旦才说。所有由名伶任主角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管是老生、青衣，还是净行，都得老老实实在地说韵白。如泣似诉，婉转回旋的京剧韵白，那是京剧念功中最难恰到好处掌握的真功夫！

江青曾渴望通过学表演而出人头地，却从无机缘去学京剧中的韵白。她在延安张罗着演后来因为毛泽东的捧场而被载入史册的《逼上梁山》，不过是评剧，评剧中当然没有韵白。后来，手中有权了，能随心所欲地强奸京剧了，江青便愚蠢且霸道地把京剧中灵魂般的韵白，整个地从样板戏中给抹掉了。

于是，所有我们这些“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一代人，就再也无法欣赏京剧中的韵白了。大家都以为，京剧的念功不过是话剧中的普通话罢了。一些想附庸风雅的电影演员，无中生有地把三更天中那个“更”字，照着京剧的韵白读成京，听上去不伦不类的。规范北方方言中的“更”字，从来就没有“京”这个发音。

更不幸的则是，本当名垂青史的大东门谭家湾，最终无人知晓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呜呼！我的故乡，我的母校，我的方言！

（作者系图书馆学系1977级校友）



岁月如歌

于 刚

上篇

岁月如歌——为 1977 级空间物理系 无线电专业毕业 30 周年聚会而作

机遇

浩然苍穹，繁星点点，时间与空间交替，沧海桑田。时光像天边的云，来去匆匆，时而凝为雨为大地滋润着种子，孕育着生命；又像海上的风，悠然从容，剥蚀着悬崖上的岩石，留下历史之痕。在这史书中，有一个章节铭刻着我们，历经磨难的一代，无所畏惧的一代，肩负重任的一代，继往开来的一代，无比幸运的一代！我们的岁月如歌，如火，如光，如同海边沙滩上的贝壳，拾起后化为一首诗。

30 多年前的我们曾是血气方刚的少年和青春荡漾的少女，却遇到那荒谬到不可思议的年代。那时候，知识沦为糟粕，专研被斥为罪孽。我们彷徨过，我们迷茫过，我们痛苦过，可我们的意志没有消沉，我们的梦想没有破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1977，这个不可磨灭的年轮，这个改变了我们命运的历史瞬间，冬日里一声惊雷，驱散了云雾，消融了冰雪，为大地送来一缕呼唤生命的春风。机遇眷顾了我们，我们也牢牢地把握住了人生的转折点。我们插上了理想的翅膀，从五湖四海，大江南



北，黄河上下，飞到了珞珈山，相聚于东湖畔，开始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征程。

圆梦

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睁开双眼尽情饱览、拥抱我们的奇妙世界，我们像嬉戏的孩童来到了知识的迷宫享受万物的新奇，我们像虔诚的朝圣者来到了神圣的殿堂感受智慧的尊严。我们如饥似渴、激情四射。我们像海绵一样吸收着一切，我们最稀缺的就是时间。

我们在樱花道上伴着晨露朗诵英文，我们在浸着桂花芳香的教室里全神贯注地聆听教诲，我们在琉璃瓦下的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吸收养分，我们在茂密樟树林里顶着夏日的炎、冬天的寒滔滔雄辩，我们打着手电躲在上下铺的被子里孜孜不倦地挑灯夜战；我们在东湖击水，球场驰骋，操场上军训，实验室里动手实践，舞会上小试身手，运动会上英姿尽展；我们年轻，我们气盛，我们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风华正茂，豪气冲天，充满活力，拥有世界；我们欣赏贝多芬，钦佩阿基米德，敬仰牛顿，崇拜爱因斯坦。世界，我们来了，请张开双臂拥抱我们！

四载春秋樱与桂，两千晨暮露和雪。梦萦绕，多少手足缘，挥难别。4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们的母校把我们从蛹化蝶，从幼稚到成熟，让我们去勇敢地面临世界。母校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基因已融入了我们的血液。4年的日日夜夜，风风雨雨，同窗共月，灌注了我们的友谊，结晶了手足之情，这种纯真掺不进世间的俗气，只能接纳我们升华的真诚。分别时，我们感伤，对酒当歌，我们将美好的记忆珍藏。别了，同学们，未来不总是阳光明媚，未来还会有荆棘纵横；未来不总是一帆风顺，未来还会有狂风巨浪。我们各自起航了，我们带着理想，带着智慧，带着希望，带着坚强。

奋斗

我们奔向了世界，翱翔到祖国的四面八方。我们去异国取他山之石，回到故乡回馈父老的培养。我们去政府、校园、企业、科研



机构实现我们的人生价值，将我们的所学付诸实践，我们坚信“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

我们太幼稚，太书生气，太文质彬彬，充满太多幻想。刚踏出校门的我们，才发现现实与理想的差距，理论到实践的鸿沟，才理解将概念变为现实是质的飞跃而不是量的升降，将理念变为价值是量子跃迁而不是梦中幻想。我们像一颗颗螺丝钉被拧在机器上，保证航船的顺利前行，但不知驶向何方。我们努力去寻找自我，挣扎着去辨清方向。前方大海波涛汹涌，大雨茫茫。我们没有气馁，没有退却，没有躲避，没有沮丧，“我流浪儿般的赤着双脚走来/深感到途程上顽石棱角的坚硬/再加上那一丛丛拦路的荆棘/使我每一步都留下一道血痕”。我们深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迎风破浪才能去追逐人生的梦想。

岁月洗礼了我们，时代成就了我们。我们成为企业的领袖，国家的栋梁，科技界的领头人，桃李满天下的教师，创业路上的探索者，发明创造的中坚力量。我们培养了健康的下一代，他们不仅继承了我们的基因和情感，更传承了我们的朴实和正向。我们一路走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无惧艰苦，迎难而上，靠的是坚韧，智慧，勇敢，情商。

心路

回过头来，看到我们深浅不一但踏踏实实脚印呈现在泥泞的路上，路边有那灿烂的山花为我们的生命绽放。我们感到自豪，幸福，无憾。我们赢得了自我的尊严，世界的尊重，家人的依赖，朋友的爱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别忙，我们只是结束了一段人生篇章，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我们还有未竟的事业，还要培育儿女，孝敬爹娘，把我们的知识传递，将我们的智慧分享。为社会创造价值，才能让我们的心灵充实，让我们的人生闪亮。我们的心态更平和了，性情更温和了，思路更清晰了，心智更成熟了。我们对世界充满了爱，把亲人、朋友、师长、学友、儿女给我们的爱回馈社会，愿人人都幸福，都能享受



人生的乐趣和真谛，都能“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尾声

是缘分让我们相识，是时代让我们同运，是生命让我们同行。让我们永远一起“相信未来，热爱生命”。只要心中有爱，人生永远春暖花开。

下 篇

岁月如歌后记——为 1977 级 入校 40 周年聚会而作

“1977，这个不可磨灭的年轮，这个改变了我们命运的历史瞬间，冬日里一声惊雷，驱散了云雾，消融了冰雪，为大地送来一缕呼唤生命的春风。机遇眷顾了我们，我们也牢牢地把握住了人生的转折点。我们插上了理想的翅膀，从五湖四海，大江南北，黄河上下飞到了珞珈山，相聚于东湖畔，开始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征程。”

这是我为我们武汉大学 1977 级空间物理系无线电专业毕业 30 周年聚会所写的《岁月如歌》的引子。回想起当时的创作过程，仍感到热血沸腾，也不时激起我在母校求学时的美好回忆。真乃谓“梦萦绕，多少手足缘，挥难别”。

2012 年，我们班决定 8 月中旬在北京举行毕业 30 周年聚会。同学们都一致盼望能有一个反映大家过去和现在并可永久珍存的纪念品。在中央电视台主管动漫的范玲大姐领了制作视频的任务，她和我通了电话希望我能为这个视频写剧本。同学们的委托让我感到责任重大，也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重任。

可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去写时才感到巨大的压力，迟迟动不了笔。我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每天晚上都躲在家里一个安静的地方，把灯也关上，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让读大学时的点点滴滴流淌过去，同学们的音容笑貌都浮现在眼前，那些年的那些事和那些人都成了生命中不可忘怀的章节。有欢笑，有眼泪，有磨砺，有挫



折，有锐变之痛苦，有成熟之欢欣。我很享受这个回忆的过程，好像又重新去经历了一遍。

整整一周的时间，像挤牙膏一样只写出下面这一小段：

“浩然苍穹，繁星点点，时间与空间交替，沧海桑田。时光像天边的云，来去匆匆，时而凝为雨为大地滋润着种子，孕育着生命；又像海上的风，悠然从容，剥蚀着悬崖上的岩石，留下历史之痕。在这史书中，有一个章节铭刻着我们，历经磨难的一代，无所畏惧的一代，肩负重任的一代，继往开来的一代，无比幸运的一代！我们的岁月如歌，如火，如光，如同海边沙滩上的贝壳拾起后化为一首诗。”

我心怀忐忑地把这一段寄给了范大姐，她立即给了我反馈，她建议以我自己的经历和感悟来写，相信其中许多就是大家的共性。她所选的背景音乐想表达的意思有：（1）幸运：当机遇到来时，我们抓住了！我们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2）骄傲：我们满怀理想踏入社会，责任感和奋斗精神成就了我们，我们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3）快乐：当我们步入中老年，真正懂得情义比任何物质的东西都珍贵，快乐生活最重要。（4）感悟：我们的人生与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我们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用包容、淡定的智慧和大气、豁达的情怀面向未来。

范大姐和她的丈夫李晴是我们班唯一修成正果的一对夫妻，为大家所羡慕。李晴还曾是我的上铺。李晴建议我喝点小酒灵感就来了。我再拿起笔的时候还真的喝了杯白酒，颇有文豪李白之风。

得到这些反馈和建议后我的灵感真的来了，接下来两周时间思潮如水，落笔成文。我先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搭建了5个章节的框架：“机遇”“圆梦”“奋斗”“心路”“尾声”。

我想在“机遇”里表达我们这一代大学生不仅仅面临天时地利人和，更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时机。1977年高考时，我们是工厂的工人，是上山下乡的知青，是保卫祖国和平的军人。我们同班同学年龄相差十几岁，但我们都抓住了机遇，有缘聚在一起，谱写了一段青春之歌。

我想在“圆梦”里描写我们在大学里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于



是在我的文中有了樱花道，桂花香，樟树林，林荫道，东湖水，琉璃瓦……不用太多修饰，即使平铺直叙，这些本身就是诗。而在这诗情画意的地方，我们“像嬉戏的孩童来到了知识的迷宫享受万物的新奇，我们像虔诚的朝圣者来到了神圣的殿堂感受智慧的尊严。我们如饥似渴、激情四射”。我们的圆梦是像海绵一样吸收着知识，打下事业坚实的根基。我们不光学到了知识，更是学到了做人，做一个靠谱的人，一个阳光有激情的人，一个创造价值的人。

我想在“奋斗”里书写我们毕业后奔赴世界各个角落，去深造，取经，实践，创造，磨炼，实现人生价值和梦想。我们失落过，挫折过，失败过，成功过。我们弘扬着母校的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精神，“我们一路走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无惧艰苦，迎难而上，靠的是坚韧，智慧，勇敢，情商。”

我想在“心路”里透露我们心态的转变历程和升华，我们从追求个人的事业成功到追求人生的幸福再到追求世界的美好，爱是这一切的源头，“我们对世界充满了爱，把亲人、朋友、师长、学友、儿女给我们的爱回馈给社会，愿人人都幸福，都能享受人生的乐趣和真谛，都能‘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我希望在“尾声”达到交响曲的最高潮，留下深沉和绵绵的余味。

我几乎一气呵成，完稿后，压在心里的一块巨石终于落地，无比轻松。然后立即把稿子寄给范大姐。我的作业完成了，这却只是范大姐艰巨任务的开端。她找到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读研的刘芳来具体制作。开始选择了《激情燃烧的岁月》《菊次郎的夏天》《士兵突击》的主题曲作背景音乐，后来觉得《菊次郎的夏天》不对路子，又换成了关峡《第一交响序曲》中的副主题。要找全班 59 位同学分别去收集各自在大学和近期的照片，把照片按剧本的主题一一分门别类。范大姐还建议刘芳用沙画来表达我们在经历挫折时不消沉不堕落，跌倒了爬起来继续前行的意境，但在实施时发现做沙画时间不够了，好在刘芳是学版画的，最后采用了版画的形式，效果相当好。

范大姐和刘芳来回的邮件接近上百次，讨论每一张照片的取舍和摆放位置，剧本内容与版画和照片的搭配。朗诵是请海南广播电



台的播音员罗大明做的，他的声音深沉，有磁性，富有激情。视频最具创意的是把每一位同学 30 年前的照片和 30 年后的照片做了个渐近过渡切换，生动地表现了时光给每个人打下的烙印，不可逆转的时光之痕迹。

聚会那天在放映视频时，大家几乎都站着看完，激动万分，热泪盈眶。让我讲我的写作过程时，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我只记得说了这不是我用脑写的，是用心写的。范大姐极为谦虚，她把功劳都归于其他人。

在班集体里大家热情洋溢地评论，罗启宇说：“这是出于屈原的老乡的手笔，催人泪下，促人奋进！”雷晓宁说：“用如此恢宏的笔墨展现我们的心声和体验。”王雪说：“（视频）让我们激动、享受、回味。回想整理品味自己 30 年心路和奋斗经历，又一次新的心路经历，也是走向未来的自我指示，我们感谢你们！”宁百齐说：“感谢于刚用自己的人生，用武大 77 级无线电同学 30 多年的人生，为我们谱写了一曲壮丽、感人的岁月之歌；感谢范玲的努力，将这首歌以震撼的艺术感染力展示在我们面前。”康宁说：“（视频）引领了我们的思潮，创造了我们的历史，汇聚了我们的情思，吐露了我们的心声，激励了我们的斗志，引发了我们的自豪。”

范大姐致谢刘芳：“片子很成功，很多同学还流下了热泪，你的辛苦没有白费！谢谢！”刘芳回复：“我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参与和体会您这一代老大学生的人生，在做这个片子的过程里我也有一种被洗涤和升华的人生体验，同样感谢老师们。”

几年又匆匆过去了，我把这个视频前后看了不下数百遍，还和家人一起看，和朋友一起看。每次看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和情感的释放。我为当时创作的灵感所惊喜，激情所感染，音乐所陶醉，过程所沉浸，成果所自豪。这确实是用心血所凝成的作品。视频结尾那舒缓的钢琴声伴着那漫山遍野的山花绽放：“是缘分让我们相识，是时代让我们同运，是生命让我们同行。只要心中有爱，人生永远春暖花开。”

（作者系空间物理系 1977 级校友）



以珞珈精神走出我们坚实的脚步

徐 杰 杨 铸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之间我们离开武大已经 36 年。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添霜，每个人带着“恰同学少年”的梦想走向社会，在我们各自的领域留下了武大人深深浅浅的足迹。36 年的岁月中，无论是浓墨重彩，还是淡写轻描，珞珈精神都成了支撑我们这一代人干事创业的精神力量。

一、激昂青春：在勤奋务实中构筑美好梦想

我们离开武大的这 35 年，既是我国改革开放、高速发展的 35 年，也是武大学子报效祖国、建功立业的 35 年。

1982 年年初，四载武大的学习生活画上句号，我们选择了继续求学，求学的地方就在与武大只有一湖之隔的南望山下的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1976 年，这里发生了中国通信史上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诞生了，并有了一个从此为中国通信业界所公认的名字——中国光通信的发源地。这里也是中国通信业界创新的热土，我们选择这里，是希望用我们最好的青春年华，为中国通信业的创新发展做出贡献。

作为光通信的发源地，当时的专业自然也是向“光”靠拢，这里集聚了当时国内光通信领域最优质的师资和生源。虽然光通信在当时是一个较新的事物，并且与本科所学内容“大相径庭”，但是“大道相通”，特别是在武大 4 年打下的坚实基础，以及珞珈人“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精神，让我们在同批研究生中很快脱颖



而出。从武汉邮科院研究生毕业后，我们都留院工作。徐杰被分配到了系统部第六研究室从事光纤图像传输系统研究工作，杨铸则被分配到系统部第二研究室从事数字光纤通信系统的工作。从同学到同事，未曾想这段同学缘一直延续了几十年。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通信业一片热火朝天，改革开放以来释放的巨大活力涌现在神州大地。“放开”意味着要“破墙”，意味着要打破技术瓶颈，打破国际限制；通信技术的突破和创新成为必然要求。

在那个“废寝忘食都嫌时间不够”的年代，作为年轻的科研人员，我们快马加鞭、只争朝夕，亲身参与了中国最早的光纤骨干网建设，见证了多个“中国第一”在武汉邮科院诞生。我们在工作中勤奋务实，精益求精，行胜于言，以珞珈学子的精神风貌为同行青年树立了榜样。

回望我们的青年时光，在最美的年华，我们选择了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用我们的点滴积累为中国通信产业拨云见日、走在世界前列贡献了微薄的力量。这是我们的幸运，这是一段无悔的选择，这也是一段充满激情的难忘岁月。

二、壮怀岁月：在创新创业中打磨快意人生

2000年前后，国家开始深化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的，应用开发类科研院所要转制为企业。响应党中央号召，武汉邮科院积极面向市场、面向社会，成为第一批转制成企业的部属科研院所，国家停止了划拨经费，作为科研人员的我们也迎来了人生的分水岭。

转制前，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的目标就是倾尽一生之力成为“专家”或者“科学家”；而转制之后，作为一个企业人，我们则需要思考如何“求生存、后发展”。

虽然转制带来诸多变数，但有一点我们是认定的，作为一家科研院所转制的企业，“科研”和“市场”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柱。

我们究竟该去做哪一根支柱呢？在这种抉择面前，“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武大精神又一次指引了我们，让我们做了此生



无悔的选择。

1998年，徐杰以武汉邮科院系统部六室主任的身份，带领十来年轻员工，在一间20来平方米的红砖瓦房内成立了武汉邮科院第一家公司——武汉虹信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成为了这家公司的第一任总经理。以斗室为天地，简单的实验台，几台旧仪表，公司很快运转起来，事无巨细大家一起干，急难险重大家一起扛。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徐杰利用在无线通信和光通信上的积累，在国内首创了“光纤直放站”系列技术，并花大力气将这些技术很快转化为系列产品。作为一个科研的老兵，却是一个市场的新人，徐杰开始“一片一瓦”搭建市场体系，“一枝一叶”构建管理体系，从一个“与产品技术打交道的人”向一个“与市场打交道的人”转变。这一过程中，徐杰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期间有夙兴夜寐，有舟车劳顿，有风餐露宿，亦有危机四伏，但是每每难以为继之时，源自内心深处的自强弘毅精神，都支撑着他咬牙坚持了下来。

武汉虹信公司从1999年成立后，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如今已经成长为有4000员工，年销售收入近40亿元的国内知名企业，成为了武汉邮科院四大产业板块之一，其产品不仅应用于全国各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大型体育场馆、展览中心、火车站、机场，也应用于我们美丽江城的各个角落。

转制后的武汉邮科院成为了中央企业科技创新的一面旗帜，杨铸作为副总工程师，以其对光通信发展的敏锐洞察，为武汉邮科院的科研方向积极谋划，并作为武汉市政府参事，为武汉国家中心城市积极建言。他先后参与了近百项科研项目，其中主持了多项重大科研项目，部分项目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和部委表彰。从转制到今天，武汉邮科院已经累计取得500多项重大成果，90%以上均已转化为产业，累计申请专利近4000项，主导制定国际标准13项、国内标准上千项。仅“十二五”期间，就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3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省部级一等奖12项，中国发明专利金奖1项。诞生了以“超高速率超大容量超长距离”光传输、光芯片、超低损耗光纤为代表的、在国际上“叫得响”的领先技术，推动中国光通信实现了从“与发达国家差距最小的领



域”向“部分领域全球领先”的转变。

在创业和创新中，我们两个珞珈人路径各异，但是精神相通、目标相同，我们都将自己人生的大半光阴播撒在最富生机的土壤，也结出了丰硕成果，为我国的通信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快意人生，不过如此！

三、只争朝夕：在开拓进取中不负韶华时光

当时钟拨向 50~60 这个区间的时候，半生奔忙的我们，反而越发觉得时光飞逝，“老当益壮”成为了我们心中“弘毅”的另一种表达。

从 2004 年开始，徐杰开始担任武汉邮科院副院长，杨铸则继续担任武汉邮科院副总工程师和新成立的武汉邮科院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我们都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棒上奋力冲刺。

徐杰分管无线通信产业、新业务拓展、生产制造与质量管理等工作，每一项都事关企业发展的持续性。作为一个管理者，需要从更高层次、更广视野做好引领和指导，需要从公司战略、组织结构、人力资源、市场拓展等方方面面为企业做好布局。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几代人的接力奋斗，从 2004 年开始，武汉邮科院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已经成长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信息通信产业集团。2016 年，全院累计实现合同额、销售额双双突破 300 亿大关，资产总额突破 400 亿。在英国《自然》杂志发布的“2016 自然指数排行榜”中，武汉邮科院位列“全球产业机构实力”排行榜全球第 38 位，位列中国产业机构排名第三位。作为信息通信产业的国家队，在“宽带中国”建设和“信息强国”建设中，发挥了中央企业的脊梁作用。

在科技创新方面，杨铸所在的光纤通信技术和网络国家重点实验室先后诞生了以“实现 135 亿人在一根光纤上同时通话”为代表的国际领先技术；在光通信领域，武汉邮科院已经连续 5 次冲击世界最高水平，所制定的国际系列标准获得全球 40 多家系统厂商和芯片产商应用，成为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技术被国外引用的重要范



例，增强了我国在信息通信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今天，世界经济正加速向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为重要内容的经济活动转变，网络与通信成为了全球各类工程科技中创新最活跃、技术更新换代最快、应用普及传播最广、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领域之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信息经济最活跃、信息改变生活最显著的国家。这一喜人的格局，可以说是我们信息通信人 40 年驰而不息的结果，也是我们武大学子孜孜以求的目标。

再聚珞珈，回首往事，无限感慨。可以欣慰的是：我们努力过，我们奋斗过，我们坚持过，我们也成功过！

（作者系物理系 1977 级校友）



高考，让我一生与梦中大学结缘

张俊超

1971年高中毕业后，我就回生产队种田了。因当时“极左”思潮肆虐，唯成份论横行，高考被停止，上大学要通过各级组织推荐、政审，组织上认为你根正苗红才会被推荐。我的祖父为了生计而为驻扎在当地的一支国民党部队当过三个月账房先生，就成了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我曾渴望参军，希望通过这一途径证明我家的历史是清白的，但因政审不合格，三次被刷掉。

历史问题成了我背上沉重的包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家人都劝我别瞎折腾，以免别人再念这点陈年旧事的经而弄得全家不舒服、不安宁。我心里不服，又没有摆脱这种煎熬的好办法，因此对





前途完全失去了信心。像推荐上大学这等好事，对于我来说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美梦，且当时的名校也很少有光顾红安县这种穷乡僻壤的。经过几次政审的挫折，我也就死了那份蠢蠢欲动的心，决心扑下身子当一辈子农民。

因为心里苦闷，我不愿老待在家里干活，所以只要哪里有外出干活的事我就争着去，红安县很多水利工地都留下了我的身影。1975年，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上马，需要修一条从长江引水至轧钢厂的渠道，我积极报名当了一名民工，在这个挖民渠的工程上苦干了两年。1977年3月份工程结束，因在工地宣传工作中展露的一点文字功夫，我被当时的工地指挥部领导垂青推荐到红安县广播站当了一名“土记者”（月工资37.5元，交生产队20元，记10个工分），从事采编工作。

1977年10月，我在县城听说要恢复高考，兴奋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是报考还是不报考？我纠结再三，不敢轻易定夺。一来高考太神秘、太陌生，功课丢的时间太长，高中期间学工学农，本来就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心里没有底；二来现在还有一份临时的还算体面的工作，怕考砸了，无颜面对单位的同事和领导，也可能丢掉这份来之不易的临时工作。思前想后，我还是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决心不计后果地背水一战。

为了备考，我将高中的课本从老家搬过来，主要突击复习数学和物理，前后总共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这期间，一位高中同学问我一道函数题，我也不会，就一起攻关做出来了，不承想当年湖北省的高考数学中就有类似的一道问答题，让我捡到了10分，当时的侥幸心理自不必言说。复习的一个星期里，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人好像被上满了发条，有使不完的劲儿，不知疲惫。待高考体检时，称体重才发现轻了十多斤，眼睑都凹下去了，人瘦得变了形。母亲看到我的高考登记照，心痛地大哭了一场。

通过复习期间获悉的各种消息，我感到在红安这个偏僻的小县城里，如果自己考不上大学，就没有人能考得上。这让我增添了巨大的自信和力量，看到了光明和前途。后来事实证明，武汉大学是红安县考生当年考取的最好学校，与我同时考取武汉大学的还有一



位下放的武汉女知青，她被外文系录取。其他人考取的多为一般院校。我考取名校，且是本地考生，这个消息传开，一时轰动了小小的红安县城，成为人们街头巷尾的美谈，确实让我风光了一回，为家里人争了光添了彩。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姐姐还买了糖果发给全村人吃，以示庆贺。

11月份，我踌躇满志地回老家的镇上参加了高考。当年湖北省的语文作文题是“学雷锋的故事”，这对于一个“土记者”来说不难。我回想了不少在采访中得到的具有浓郁乡土味的素材，故胸有成竹，笔走龙蛇，一气呵成。考数学就麻烦了，前面的几道计算题大多能做，但后面的几个问答题，除了一道题是复习过程中巧遇而会做外，其他一概不能动笔，估计只能得二三十分吧。考完走出考场一问，做不出的大有人在，我的心也就坦然了一些。地理题有一道是京广线经过哪些省份、城市、河流、山脉，对于我这个没有出过省、没有坐过火车的人来说，只能瞎猜了。

高考发榜，我的通知书寄到了老家的镇上，被镇上的一位乡干部收到，他立即高兴地打电话通知我。我正在县广播站做猪圈。这位田姓干部说：“你被武汉大学历史系录取。”我一听有点懵，心想：我没有填报历史系呀！历史系是干啥的呀？毕业后回家乡来当中学历史老师吗？因为当时填报志愿时，我不知道大学里设置有什么专业，自认为学文科的就填中文，学理科的就填数学。愚昧吧！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因为当时流行过一句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人们不读书不看报，也没有什么书报可读可看，大多数老百姓也不知道大学的门往哪里开。我填的是武汉大学中文系，不知怎么会被历史系录取。到校以后才知道，犯我这种低级错误的人不在少数，是在招生录取时被调剂的。

说来也真有趣，我此前不知武汉有什么大学，在一米七工程当民工时曾到武汉大学去玩过一次，才知道这所藏在深山人未识的美丽大学。那是1976年的暑假期间，看到武汉大学古朴、美丽的校园，看到当时的工农兵学员在茂密的树林里高声朗读英语的情景，鸟叫蟾鸣，书声琅琅，好一幅夏日美景图，让我沉醉、唏嘘、嗟叹。我还曾望校园兴叹，赞叹武汉大学校园的幽静和美丽，真乃世



外桃源，理想的读书治学宝地；感叹命运的不公，感叹与我这一生无缘的大学梦。

没想到幸运之神真的降临到我的身上，恢复高考的英明决策圆了我的大学梦。多年后听说首先提出恢复高考倡议的是武汉大学化学系的查全性教授（后来被评为院士），是在邓小平主持的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更感到能进入武汉大学读书是我的荣幸和自豪。后来在武大工作时，我曾拜访过查先生，对他当年的义举表示过感谢。

武汉大学历史系七七九二班毕业留念1981.11.



武汉大学历史系七七级入校三十周年珞珈山聚会留影



数十载时光流转，只在两张旧影之间



武汉大学历史学系师资力量雄厚，当时有著名的唐长孺、吴于廑等教授执教，我们这届学生受到了良好的大学基础知识训练，如饥似渴地拼命学习。

那时的武汉大学由年富力强、睿智开明、具有改革精神的校长刘道玉执掌，实施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措施。学分制让我们这届学生受益良多。各学科均开设了很多选修课。我们可以随意选修，大大扩大了知识面和眼界，改造了知识结构。我选修了中文系、哲学系、法律系、经济学系、图书馆学系的很多课程，有的只听不考，有的是既听又考。4 年的学习，使我积累了较为厚实的文史知识，终生受益。

大学毕业后，我又幸运地留在武汉大学人事处学生科，从事的第一份工作竟然是大学生招生分配。1986 年 11 月，我调至当时的副校长吴于廑先生任总编辑的学校出版社，在他老人家的直接领导和教诲下工作，为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服务，这一干就是近 30 年，直至在出版社退休。高考让我这一生与这所梦中的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所大学给予我很多很多，我也把一生献给了这所美丽的大学。

（作者系历史系 1977 级校友，稿件来源：《北京考试报》2017 年 4 月 5 日）



珞珈，起点和结局

白 牛

1

四十年
历史天空中的一道闪电

2

四载
让春风生出翅膀的时光

3

我正在重温樱花花瓣编织的梦
仍是那么新鲜
我还记得老斋舍闪烁的灯光
像好奇的眼睛
点亮了思想
世界从此有了灵魂

4

道路也许东拐西弯
结局也许五花八门
但我们都有一个欣慰
被东湖水滋润的珞珈



永远是那么青春

5

我喝过滋润珞珈的东湖水
和珞珈因此有了血缘关系
风中有父亲的呼唤母亲的叮咛
岁月的刀再锋利也无法割断这亲情

6

我可以没有故乡
不在乎四处流浪
因为我知道
我已经有了归宿
那樱花飞舞
桂香弥漫的地方
距离不过是座虚拟的城池
太平洋一池丰富的想象

(作者系外文系 1977 级校友)



忆 1977 年高考

陈丹华

高中毕业时，“文革”近尾声。
大学无缘进，推选“工农兵”。
择优啥标准？白卷张铁生。
七七科教会，高考即施行。
天降大喜讯，举国齐欢腾。
回家找书籍，弹去五年尘。
考前填志愿，武大排头名。
白天忙工作，晚上啃书本。
临阵磨枪迟，考场只好拼。
政治考时事，“四人帮”何人？
语文考试题，基础加作文。
“学雷锋故事”，工友是原型。
数学不算难，函数与方程。
物理化学卷，一看就头疼。
“工业基础”课，误人真不轻。
考完心没底，终日盼佳音。
突然让体检，莫非好事成？
时光过得慢，熬到七八春。
正在工厂混，家中电报进：
“录取上武大，分析化学生”。
喜出望外情，无法表欢欣。
扔下锤头柄，握笔进校门。



四十年回首，心潮如海腾。
七七年高考，改写众命运。
五百万应试，集十年才俊。
其中不乏有，叔侄与师生。
我系查教授，实乃掘井人。
武大刘校长，同为大功臣。
邓公言九鼎，一语定乾坤。
饮水思源处，永记准考证。



贺曾云鹗先生一百〇二华诞

陈丹华

辗转求学寻真经，
留洋苏俄为中华。
科学研究掌帅印，
学术创新贡献大。
教书育人海不倦，
桃李满园遍天下。
老骥伏枥志千里，
百年沧桑前景佳。

（作者系化学系 1977 级校友）



诗 三 首

范卫谊

四载同窗情谊牵，
几回梦里度关山。
眼前老友不敢认，
复向画中觅少年。

年年杨柳绿灞桥，
岁岁风霜染鬓毛。
昔日伤情休提起，
任它离恨一条条^①。

远窗丽人影徘徊，
几回梦里唤不来。
相逢诺诺欲伸手，
却被一把抱入怀。

(作者系外文系 1977 级校友)

① 借雍陶《题情尽桥》。



清平乐·珞珈忆

李名宪

我和我的同学们是幸运的，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高考，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读书四载。而今回首四十年前会聚黉门攻读，百感交集。

珞珈修炼，
四载倾书卷。
珍惜秒阴休怠慢。
哲学殿堂薪传。

黉苑一别他乡，
志在四面八方。
几聚共觞欢语，
朝花夕拾情长。

（作者系哲学系 1977 级校友）



老同学聚会有感·调寄江城子

李永红

珞珈四载咏残樱，枕春湖，弄琴箏，半年轻红，双影携无声。
满目江山宏愿里，辜负了，女儿情。

老来聚首意难平，盞狂飞，说功名，细语高歌，依旧舞聘婷。
微信谁言身后事？音暂歇，共伶仃？

（作者系外文系 1977 级校友）



珞珈情缘

汪晶晶

昨夜清风今宵云，
卅载重聚总关情^①。
浪迹天涯鬓虽改，
此生终是珞珈人。

(作者系图书馆学系 1977 级校友)

^① “卅”读音为“稀”，四十之意。



同学相聚有感

王一鸣

昔日骄子会珞珈，
今朝同窗聚家园。
三十余载弹指间，
人生沧桑苦酸甜。
君去异国成大业，
我留杨园开桑田。
隔山隔水常相望，
见君思君同月圆。

(作者系化学系 1977 级校友)



致武大 1977 级校友

余从年

—

珞珈登书山，
东湖游学海。
英姿求经去，
华发追梦来。

二

珞珈攀书山，
东湖搏学海。
英姿寻梦去，
华发藏经来。

(作者系生物系 1977 级校友)



一剪梅·樱花

叶劲松

梦里樱花齐竞芳，
花在家乡，
春在他乡。
暖风拂面乐徜徉，
别了冬阳，
又见春阳。

昔日同窗年少狂，
四载湖旁，
四载山旁。
今秋再聚珞珈堂，
听也风光，
看也风光。

（作者系生物系 1977 级校友）



七律·金秋聚武大

叶劲松

金秋十月珞珈旁，
昔日同窗相认忙。
问暖嘘寒聊往事，
谈天说地话沧桑。
悠悠岁月云浮散，
滚滚红尘鬓染霜。
再饮一杯犹未醉，
东湖水畔桂花香。

（作者系生物系 1977 级校友）

珞珈风采





回忆江天骥先生

陈 刚

著名哲学家、哲学教育家和翻译家江天骥先生于2006年10月16日在武汉与世长辞。江天骥先生是我国哲学界泰斗，是中国逻辑学、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乃至整个哲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为中国哲学界与西方哲学界的交流与沟通，为中国哲学研究走向世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江天骥先生虽然已经仙逝，但先生的著述将永世长存，先生的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是一个纯真的时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是一个尼采、萨特、波普、库恩盛行于大学校园的时代。作为武汉大学科技资讯专业的一名本科生，当时我也开始对科学哲学产生兴趣，读了一些介绍波普、库恩的著作，聆听了江先生及其弟子的每一次演讲。临近本科毕业的时候，我决定报考江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于是拜访了江先生位于珞珈山半山腰的住所，开始了与江先生的个人接触。江先生以平和的态度接待了我，表示欢迎理工科的学生报考，但是对外语要求比较高。“如果明年还是60分及格的话，我要求80分才行。”我在哲学系的同乡夏光帮我从江先生的研究生手上弄到一本巨大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油印本。我如获至宝，读了8遍，最终以93分的专业成绩和81分的英语成绩于1985年成为江先生的最后一届硕士研究生，与董毓和郑华同学。当时，兰征、罗毅、王小光、曹秋华、陆健体、朱志方、吴云秋、陈真等是我们的师兄师姐，陈维航、桂起权是我们的老师。



当时的江先生已经 70 高龄，头上经常戴一顶灰色的鸭舌帽，眼镜像茶杯底一般厚，背有些驼，是一位干瘦的老头。接待外宾的时候会穿上一件带黄铜纽扣的海军蓝西服上装 (Blazer)，显得精神许多。江先生走起路来完全不像一位 70 岁的老人，步伐坚定有力，我们年轻人需要小跑才能跟上他的速度。江先生精力旺盛，是一位非常勤奋的学者：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就起床读书，然后是早锻炼，上午工作，午睡较长，下午和晚上根据需耍有时工作、有时上课，晚上就寝较早。江先生好读书，走进他的书房，到处都是杂志和书籍，绝大部分是外文的。书房看起来有点凌乱，但是江先生竟然知道每本书放的位置。武汉大学哲学系的资料室在江先生的管理下，收藏极为丰富，当时可能为全国高校哲学系之首。哲学系资料室常年订阅 50 多种西文杂志，而江先生阅读或浏览了其中的大部分。有时江先生跟来访的外国学者谈起国外某杂志上最新发表的某篇论文，经常出现外国学者还没有看过那篇文章的情况。

江先生讲课，因为浓重的广东地方口音，加上牙齿漏风，比较难懂，慢慢听习惯后才能感觉到其中的力度和韵味。学习进入讨论阶段以后，课堂由教室转到了江先生的书房。当时武汉的冬天没有暖气，但因先生的夫人准备了一台带通风管道的大铁炉子，非常暖和。我们发言的时候，江先生基本上保持沉默。如果偶尔谁的表述条理不清，江先生就会问一个摩尔式的招牌问题，“你到底是什么意思？”(What do you mean exactly?) 江先生的论文和著作，据某些同行反映，有些晦涩难懂。我倒没有这种感觉，相反，我觉得江先生的文字接近完美，一字不多，一字不少。读得越多，越能感觉到字里行间的激情和节奏。研究生阶段我重读了先生作为教材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2003 年开始哲学教学工作以后，又重读了一遍，每次都有新的收获。《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出版以后变成了一本体积很小的书，应该说是国内科学哲学著作中水准较高的一本研究性著作，包含了江先生对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流派的准确而又深入的理解，20 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研究生的科学哲学必读书目。总之，这是一本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书。

江先生不是一个擅长交际的人，当时中国的大学还没有“国际



化”的提法，但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武汉大学哲学系来访的外国学者络绎不绝，而且其中许多是不请自到的。江先生是提倡“走出去”的。在改革开放初期，江先生出访美国马里兰大学并任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委员会兼职教授；在耶鲁大学哲学系和政治学系任访问研究员；在范岱年先生的推荐下，江先生于 1983 年 4 月赴南斯拉夫的大学校际研究生研讨班以及贝尔格勒大学哲学研究所参加科学哲学课程的讲授工作。江先生提交的论文《科学合理性：形式的还是非形式的》，在全面掌握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非形式科学合理性的独创观点。论文影响大大超出了项目主持人、牛津大学的牛顿-史密斯博士的预期。在牛顿-史密斯博士的推荐下，该文于 1985 年发表于国际顶尖的《英国科学哲学杂志》。牛顿-史密斯博士还主动帮助申请国际基金，将 1986 年的“国际波普哲学年会”安排到武汉大学召开。记得当时来的外国学者中，有一位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科学哲学系主任 John Watkins 教授。据说 Watkins 教授被认为是波普的“正宗传人”，与拉卡托斯和 John Worrall 不同，他反对任何对波普思想的修改。显然 Watkins 与其他几位外国学者处得不好，吃饭时和夫人选择单独坐了一桌。于是我们几个学生主动上前陪他和夫人吃饭。Watkins 指着邻桌的几位外国学者，低声跟我说，“他们根本不懂波普，不过你们江教授懂波普，你们江教授最近的那篇文章很好，而且他的英语很好。”Watkins 是那种典型保守的英国人，不会轻易夸奖人，能说一个外国人英语好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可惜当时我辈的英语水准不足以判断江先生的英语好在哪里。在国外留学工作十几年后，2003 年重读了江先生的 *Scientific Rationality: Formal or Informal*，才开始理解 Watkins 的话，Watkins 说江先生英语很好显然用的是本国人的标准。令我汗颜的是，即使在国外待过十几年，最终发现自己的英语水平与江先生精湛的英语仍然相差甚远。江先生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语系，抗战时长期给美军“飞虎队”当翻译，随后又在美国工作留学 3 年；最重要的是，江先生长年坚持阅读英语哲学文献，这可能是江先生英语精湛的主要原因。

每当有外国学者来访，江先生总是说，“不能让外国学者躺在



外招睡大觉。”除了听讲座，江先生总是安排我们研究生分批去外招与外国学者谈话交流，有时骑自行车围绕东湖漫游，哲学社会人生无所不谈；有时甚至陪同出访讲学或旅游。这一方法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学术水准和国际视野。记得有一次美国著名数学史专家，纽约市立大学的 Joseph Dauben 教授来武汉大学讲皮尔士，特别介绍了被 19 世纪主流的欧洲学术界所忽略的皮尔士在数学无穷大方面的研究，并比较皮尔士和康托工作的异同。我们哲学系的研究生不仅能提出有效的问题，而且能指出 Dauben 教授板书数学公式中的笔误，这让 Dauben 教授很感意外。当时来访的还有波士顿的 Robert Cohen，多伦多的 Ian Hacking，西安大略、哥伦比亚的 Alison Wylie 博士，牛津、夏威夷的 Mary Tiles 教授等。来访学者回国后，常常会写中国访问见闻发表在哲学通讯之类的交流性杂志上，他们往往对武汉大学哲学系教师、研究生的学术能力和外语水准赞美有加，这极大地提升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国际影响。许多英美加学者到了北京上海以后，主动提出要到武汉大学讲学。

当时来访时间最长的是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分校的 George Gale 教授。该大学是爱德加·斯诺的母校，George Gale 是作为“斯诺教授”来访的，为期半年，给我们研究生上了两门课。那是我们第一次见识美国风格的讨论班教学模式。Gale 教授是位随和甚至随便的人，讨论班的气氛轻松活跃，但轻松之中也交织着智力的紧张。Gale 讲得精彩的时候，我们会睁大眼睛紧张地听，Gale 本人也显得比较得意；Gale 讲得不精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走神，于是 Gale 自己就紧张起来；有时 Gale 举的例子不恰当，逐渐讲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在下面窃笑。Gale 有许多令人难忘的另类特征：他一来就买了一辆只有中国农民才会买的那种带垂直站架的 28 载重型自行车；只带了一件西服上装，还是灯芯绒的，据说是见我们校长时穿的；一台纯机械尼康照相机旧得露铜；出行的时候不喜欢日本的丰田皇冠车倒喜欢中国的上海车，其次是苏联的伏尔加。Gale 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这在美国人当中是不多见的。Gale 有一个重要的爱好，那就是品酒，在美国会自己酿葡萄酒和啤酒，还是地方的业余品酒师。江先生也喜欢品葡萄酒和啤酒，所以两人经



常相饮甚欢，估计在一起品酒的时间超过谈哲学的时间。在我们这些学生面前，Gale 对江先生的哲学素养评价颇高。Gale 说自己在美国是教学型的教授。实际上 Gale 的哲学感很好，在美国科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力。访问临近结束时，江先生让曹秋华带他去参观鄂州啤酒厂，回来时带了两大箱免费的啤酒，于是 Gale 用那两箱啤酒在外招的顶层平台给我们研究生搞了一次 barbecue，江先生牙不好，没有参加。Gale 很胖，蹲在火炉边烤肉，很辛苦的样子。我们站在后面，一边喝啤酒，一边开玩笑：把 Gale 烤了，可能味道更美。Gale 在武汉交了许多中国朋友，的确是传承中美友谊的“斯诺教授”的最合适人选。

3 年的研究生学习很快进入毕业论文准备阶段，江先生要求我们以英语原始文献为主要参考资料，尽量不要读别人翻译的东西，因为读别人的综述或翻译就好比是“吃别人嚼过的饭，你不可能尝到食物原本的味道”。我自己提出的毕业论文方案是讨论分析与综合的区别，即数学知识与经验科学的关系。江先生否定了我的方案，建议我研究劳丹的科学哲学。现在看来江先生是对的，我的确准备不足，题目也太难。但是当时我并不理解这些，心里颇为不快。当时的我年轻气盛，经常毫无顾忌地发表不同意见，自认为对江先生多有得罪。毕业后去了华南理工大学教书，后来又去英国和加拿大留学，然后是在多伦多和南加州工作。当时通讯不像现在这样方便，与国内的亲友联系很少，自己在国外的生活轨迹就像断了线的风筝，翻滚飘摇不定。在国外走了一圈，发现国外的教授并没有我们当初想象的那么高大，我们在国内了解的是最拔尖的那部分，从整体来看，比得过江先生的不多。江先生如果年轻几十岁，到国外来做个教授，水准应该属中上等。后来听说，江先生经常向别人提起我，“我有一个学生叫陈刚，现在在加拿大……”，我才发现江先生当初并没有生我的气。江先生的胸怀是宽广的，这让我自己感觉非常惭愧。

1998 年回国时我曾经拜访过江先生，此时的江先生比以前衰老了许多，体力和脑力明显不如从前。记得那天天气不好，他家里又没有暖气，我自己心中产生了一种凄凉感，这与 20 世纪 80 年代



的阳光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江先生对我带去的安大略西洋参没有表示任何兴趣，似乎他不相信这类东西。

2003 年我回国到华中科技大学教书。再次看望江先生是在武汉的中南医院。江先生正在午睡，躺在病床上，缩成一团，身体异常干瘦，让人不忍心看。江先生醒来以后，也许是喜欢我带去的鲜花，心情特别好，头脑也异常清醒，拉着我的手和我交谈起来。问我现在研究什么，还问我牛津剑桥的 high table 是怎么回事。我突然意识到，应该趁江先生现在头脑还清醒，赶快把自己对他的钦佩之情说出来，不然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江先生打断了我的话，操着浓重的广东口音对我说：“你过奖了。”

（作者系哲学系 1985 级硕士研究生校友）



哲学给我的七个锦囊

——在哲学学院 2016 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丁邦清

校友名片：

丁邦清，1990 届武汉大学哲学硕士，中国著名品牌、广告、营销专家，曾获中国广告 30 年突出贡献奖。现任中国本土最大、第一家国内上市的广告公司——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中国广告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广告研究院品牌分院院长。





各位师长、各位同学上午好：

首先，祝贺与恭喜同学们在最美好的年华，来到中国最美的校园、最好的哲学学院！

上周接到来自母校陈老师的电话，我不知道有没有叫母系的说法。（既然原来的学校叫母校，那么原来的系是不是可以叫母系？）虽然有几次被召回到母校，但这是第一次受到母系的召唤，我赶紧推掉一箩筐琐事，应召前来，荣幸参加 2016 级新生开学典礼。感谢学院、感谢陈老师！

记得在读哲学系的时候，旁人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学哲学的人做什么啊？”工作的时候，旁人问得多的一句话是：“学哲学的人为什么可以把广告做成这样子啊？”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我也像大家一样，意气风发地来到美丽的珞珈山下的武汉大学哲学系报到。清晰记得，那时枫园路旁的枫树刚刚栽下，新土还撒落在地面。我走进武大校门时，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屌丝，特别穷、特别丑、特别宅；从哲学系毕业，走出武大校门时，没有变的还是身无长物、一无所有，但是内心特别强大、思维特别活跃、浑身特别有力量，因为哲学给了我 7 个锦囊——

第一个锦囊是逻辑性(条理)

哲学，特别是逻辑学与西方哲学教会我逻辑思维的能力。让我明白什么是概念、判断、推理、交集与并集、分析与归纳、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现实和可能、内容和形式、现象和本质、系统与要素、结构与功能等。逻辑知识与逻辑思维使我终身受益无穷，对我的工作与事业帮助特别大。

在我们的专业工作中，一般先会有市场调研，会形成厚厚的一本市场报告与调研数据，我们要做出结论、形成战略，指导品牌建设与市场营销的工作。这需要有清晰的逻辑思维能力，正确的定义、正确的判断、严谨的推理，横向比较、纵向推导、交叉分析、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条分缕析、抽丝剥茧。很多人看着调研报告常常一头雾水，我却觉得像看小说一样津



津有味。而且我们做出的研究报告与策划报告，总是能够技高一筹。在我 20 多年的竞标生涯中，即使面临的是比我们强大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外资企业，我们也能碾压一切，逆袭成功，百战百胜，无一败绩！

在我们的经营与管理中，逻辑思维的训练，使我们能做到条理清晰、目标明晰、流程科学，统筹兼顾、抓住关键、要事优先等。现在的省广股份集团，有 112 个成员公司、本部有 16 个事业部、12 个职能部门，服务范围涵盖所有的整合营销传播的产业链，服务的网络遍布全国各地，但我觉得管理起来并不复杂，我的手机很少会响（除了朋友的电话）。按照商业逻辑、市场规律、规范制度去管理，就会井井有条。我曾经是一个文学青年、“2B 青年”，在青少年时代，把所有的课都上成语文课，特别多愁善感、特别腼腆害羞、特别感性散漫，大学特别想读的是中文系（现在也还是文学爱好者，热衷诗歌、宋词与外国小说）。感谢哲学给了我逻辑思维的能力、理性思维的素养。这个能力与素养完全是后天附加的，它深刻地改变了我的人生与命运。我经常要求我的同事无论如何要看一本逻辑学的书，会大大提高思维能力与工作的效率。

我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本书《品牌成功链——成功品牌的成长规律》，是中国第一本打造品牌的方法论的著作。首创八链理论——实现 8 个环节的环环相扣的系统思考与方法论。这是我策划、创意服务几百个品牌的总结（很多品牌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路探索过来的）。

第二个锦囊是创造性（角度）

哲学教会我独立思考的能力。大家知道哲学 philosophy，词根是爱与智慧。哲学具有批判精神、怀疑思维，最不盲从、不媚俗、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古。笛卡儿“怀疑一切”，所以“我思故我在”。尼采：假如你要做一个真理的门徒，探索吧。我们是文化创意产业，我们也是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文化创意产业最需要的是原创精神、思想的火花、独特的灵感、创造性思维，追求独特



性、差异化、崭新的视角与视野；最忌讳的是同质化、雷同化、陈词滥调、拾人牙慧、人云亦云、模仿前人、抄袭别人。

我们核心的工作是创意，好的创意就是要有新意，要标新立异，才能脱颖而出，鹤立鸡群。“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无论我们的电视广告、网络视频、平面广告、广播广告、户外广告、H5、公众号软文、微信推广、展览展示、产品包装、栏目植入、微电影、游戏等，都必须有创意，别出心裁、独辟蹊径，才能抓住眼球与注意力，使人眼前一亮、心头一动。“万绿丛中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对司空见惯的东西，大众只会视而不见、索然无味。所以我们的设计、文案、视频、声音、制作、技术等，必须具有创造力、创意力、思想性、创新性。国家把广告业作为我国现代服务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特别需要打造中国自主品牌，尤其需要创造性思维、差异化思维。

20多年前，我离开大学讲台，开始做文案，也就是文字写作，然后做策划创意。我不仅不觉得吃力，反而觉得驾轻就熟，如鱼得水，很多作品与案例一出街就家喻户晓，风靡全国，引起良好的社会与市场反响。从业2年就拿到中国行业的最高奖金奖，3年就成为中国广告奖最年轻的评委；3年就担任公司创意总监，再后来做执行创意总监(ECD)，也就是总监的总监，负责公司全面的创作创意工作。这些很大部分得益于哲学的批判精神、创新思维及独特视角。

省广股份集团视创意为灵魂与核心竞争力，我们在IAI中国广告作品年鉴的中国创作实力排名中，从2003年起，连续9年蝉联本土公司第一。2012年以综合评分570分，位列中国所有广告公司创作实力第一名。从成立至今共获得国际国内1000余个奖项，包括伦敦广告奖、美国莫比金奖、中国广告长城奖、时报广告奖、香港区徽优秀奖等。

我带来的第二本书，是“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广告创意》，我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写“创意是智慧之花”，大家可以从中了解我的创意、创作与作品。



第三个锦囊是战略性(高度)

哲学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总结和概括,是宏观性、概括性与抽象性程度最高的学科,形而上者谓之道,是抽象中的抽象,概括中的概括。但它确实能提升我们思维的高度,并增强高度提炼与总结的能力,给我们一个望远镜。

在我的实际工作中,我们给企业做发展战略、品牌战略、市场战略、营销策略、传播战略等,需要有宏观性、战略性、方向性的思维。如果高度不够,就会鼠目寸光,就会短视近视,只能停留在术的层面、形而下的阶梯上,因为高瞻才能远瞩。纲举目张、以道御术,战略才有可行性、科学性。

互联网时代,有一个说法叫“高维简一律”,就是说面对很多复杂的因素,难以判断与取舍,怎么办?上升到高一个维度,在更高的维度上观察低维度的事物,会显得十分简单。高屋建瓴,“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更高维、更高度的思维,更能看得远、看得广,更能把握趋势、看准方向。孙子说:“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企业高层的职责是做顶层设计:战略规划、制度制定、目标管理。思路决定出路。今天的省广股份集团正在打造平台战略,整合中国营销新力量,确立了五大发展方向:品牌管理、全媒介代理、数字营销、内容与场景、自有媒体。目标是打造成为国际化的整合营销传播集团。我们上市6年,股票涨了6倍,市值从30多亿增长到近200亿。我们刚刚完成22个亿的定向增发,加大对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数字营销等的发展力度与速度。作为中国广告业的扛旗者与龙头企业,站在中国与行业发展的高度,集结8所著名高校专家团队,研究了102个行业的1000多个品牌,研发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评估模型,指导中国自主品牌的建设。这是我带来的第三本书《中国品牌白皮书》,也是中国品牌的第一本白皮书。



第四个锦囊是洞察力(深度)

哲学给我们看本质的能力，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哲学给我们思维的深度、深刻与深邃，看透现象背后的东西，不在现象层面兜圈圈，不会浅尝辄止，对深刻的追寻，摆脱肤浅与表面化，不断下探深度的能力；能透过林林总总的纷繁复杂的表象，直奔本质而去，由表及里；甄别与剔除障眼晃眼的假象，除伪存真。

我们这个行业经常要使用一个词“insight”——洞察。洞察消费者内心的需求，洞察市场的态势等，我经常对同事们说：你这个研究的洞察在哪里？洞在哪里？我没有看到洞。什么叫洞？入木三分谓之洞！往往最多的是观察，是对现象的描述，而不是对本质的洞察。洞察就得往下深挖，再深挖！挖掘本质！而本质都不是用眼睛能够看到的，那是要用思想去看的。所以我们的策划与创意，常常比对手看得深、看得透、看得准，企业的竞争力就大幅度提升，生存能力就得以增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不缺乏信息，缺乏的是有深度的观点与思想。我带来第四本书，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广告策划与创意》，其中有我与团队的一些实战案例，大家可以从看出我们的洞察力。

很多人问我：几千个有创意的文化人你怎么管？“靠制度，基于人性的制度设计”。马克思说“我们每个人所奋斗的一切都与自己的利益有关”。管理——尤其对思想工作者的管理，表面的管卡压、鸡汤式的说教、繁文缛节的形式主义、虚头巴脑的花花架子都是没有用的；即使管住了员工的手，也管不住员工的心，最多只是增加了管理成本。“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管理的本质是要充分激发人性的正能量，激发员工内心的创造性。好的制度设计，深入了解员工的内在需要，洞察人性，把员工的利益(物质的或精神的)嵌入到业务管理之中，让员工自我管理、自我激励。我们这个文化创意行业，恰恰需要员工用心去创造、创意、创新。所以，洞察力可以大大提高专业能力与管理能力。



第五个锦囊是创新力(变革)

哲人告诉我们万物皆动，“我们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变化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很多人、很多企业都是被过去的成功与模式绑架了未来，不要为自己过去的成绩唱赞歌，一个只知道缅怀过去的人，都是过时的；要敢于打破过去，敢于颠覆自己，敢于否定自己与成绩，不僵化、不保守、不故步自封、不因循守旧，对新生事物充满好奇，敢于试错，勇于变革，对变化充满渴望而不是排斥。我现在的 QQ 签名就是“拥抱变化，迎着未来而来”。创新从何而来？就是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眼界与思维。我从武大毕业后，一直坚持每周至少读一本书、并且做读书笔记的习惯。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省广股份集团是行业最早的公司之一，同时代绝大多数同行的公司早已不存在了。我们为啥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好？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用《诗经》的一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做了回答。因为我们不断刷新、不断蜕变，一直是行业的变革者、引路者、拓荒者。我们是最早进行改制的企业，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中最核心的要素，2002 年改为股份制企业，当年的营业额是 4.4 亿，去年营业额是 97 亿，13 年增长 22 倍。我们是行业第一家上市的公司——中国广告第一股(002400)。最近 10 年每年增长都在 50% 左右。今年 7 月我们进入中国企业 500 强。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更是加速创新转型。2013 年年底，我提出的口号是“全员全速跑步进入移动互联最前线”。如今的省广股份集团的数字营销板块，在做 DSP 精准广告、游戏营销、双微营销、大数据营销、网络公关、二次元营销、电子商务、互动营销等。省广集团的 IP 内容与场景板块，有与赵薇合作的省广合宝娱乐(浙江卫视《一路上有你》)、与黄晓明合作的省广影业、与杨澜合作的省广阳光，还有省广体育、省广体验等。

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我在一本书的序言里写道：不去创新，被过时的知识与惯性所绑架，只会越来越感受到萧瑟的



“无边落木萧萧下”；热烈拥抱新的变化与趋势，并努力付诸思考与行动，就会迎接浩瀚的“不尽长江滚滚来”。

第六个锦囊是行动力(执行)

哲学不仅仅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思想理论要转化为物质力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哲也强调知行合一，“知而不行，是谓不知”。我们是一个文化创意企业，是一个知识密集型企业，是出思想、出创意、出内容的大企业，现在有 5 000 个文化人，很容易出现坐而论道、空谈误事的现象。我们特别强调执行力，培养与打造一支集思考力与战斗力于一身的团队。我刚进入公司时，给创作团队的 16 字原则是“张扬个性、学术自由、思维从宽、行为从严”。在思考与创作空间上尽量宽松，在执行与实施上面是“铁的纪律，钢的执行”。强调结果、效果、成果，务实、求实、落实，推动推进，卓有成效，有效产出。困难是用来锻炼的，挫折是用来提升的，问题是用来挑战的。只为困难找方法，不为问题找借口。

拿破仑说过一句话：“先投入行动，然后才见分晓”。学以致用，用以致学，在岸上你永远学不会游泳，学会游泳只有一个方法，下到水里去！“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是老师傅”，现在叫“老司机”。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目标(梦想、设想)——规划方案(蓝图，把目标具体化为行动方案)——阶段落实(小目标、二级目标、步骤分解、切实推行、克服困难、付诸行动)——实现目标(专注目标、排除干扰、化为现实)。现在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晚清重臣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大变局之中，大潮流之下，很多人在看，看热闹、看笑话、看故事。很多人在想，准确地说是在焦虑——“互联网焦虑症”。把梦想变成现实，第一步应该是什么？答案：起床。把菜鸟变成老司机，唯一的方法就是“现在去做”“当下去行动”！加缪说，对未来的真正慷慨，就是把一切献给现在。

今天带来的第五本书，也是我们省广股份集团新鲜出炉的《实



战互联网+》，选了66个“互联网+”整合营销传播的实战案例，这里不仅有说法、想法，更有做法、打法与战法。

第七个锦囊是世界观(格局)

哲学让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哲学。宇宙——“四方上下曰宇，往来古今曰宙”，宇是空间，宙是时间。面对浩瀚无垠之宇，川流不息之宙，会油然放大自己宇宙的情怀、豁达的胸怀；会正确地看待世界、社会、他人与自己。哲学系绝对是治愈系！

我经常对我们的团队骨干说，你们要反复做一个运动——扩胸运动，扩大自己的胸襟与胸怀。不要限在自己的小我里面，克服自己的小心眼、小聪明、小便宜、小动作、小情绪，要有大格局、大智慧、大胸襟。老子说：“为人己愈有，与人己愈多”，“外其身而身先，后其身而身存”，特别强调不要单纯囿于自私自我的立场，特别强调换位思考，你只能交换你有的东西，用真诚交换真诚，用温暖交换温暖。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个人来说，哲学教会开放、包容、乐观、豁达的心态，从不为小事纠结，从不为吃亏懊丧；对鸡毛蒜皮、蝇营狗苟的事情少计较、不记怀，更不会耿耿于怀。否则一个人就会纠结、郁闷、苦恼，就会把大把的美好时光浪费在琐碎无聊上。我最早的QQ签名是这样的：“尽量拿得起，绝对放得下；尽量看得远，绝对看得开。”

省广股份集团是一个诚信公正的公司。以诚相待，以信取胜，向上向善，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小成以智，大成以德”。省广股份集团也是一个特别开放、特别包容的公司。有容乃大，开放包容，这也是母校给我的最大收获！给员工无限的空间，不封顶、不设限。你的头顶上永远没有天花板，只有天空。我们今年刚刚实行期权激励，400多个员工成为股东，很多是90后；内部倡导孵化机制、创业平台，员工可以创业做老板，集团在品牌、资金、管理、资源等方面支持你，你可做大股东，集团做老二或者老三，都可以。我们已经成立了员工持股的10个平台公司，让员工在这里



成为合伙人、合梦人，实现梦想，实战才华。

最后给学弟学妹们两个建议，我认为大学时代靠谱的打开方式：

一个职业建议：“认识你自己”，认识自己的强项与弱项，特长与兴趣。如果你的特长与兴趣是从事哲学研究的事业，武大哲院有很多大咖大师，你就听导师的建议。如果你是想走进社会去从事实际工作，我建议学弟学妹们，先安安静静、扎扎实实地学好哲学，这是巨大的财富、宝藏与力量，同时选修或者自学一个应用性专业，如广告、传播、旅游、设计、营销、法律、游戏、网络等，你感兴趣的任何应用性学科。跨界，才能跨越；跨界，才能拥抱世界。跨界就体现出杂交优势，能发生化学反应。互联网时代，时空可以自由漂移，万物在融合连接，嫁接融合，会裂变、会质变，这样你会脱颖而出，成为奇才。哲学家罗素写的《西方哲学史》，获得的竟然是诺贝尔文学奖，而他本人是一位数学家。无论怎样选择，越早规划越好。我是在武大读书的第二年，无意中接触到广告与传播的，在离开武大之前，我已经读完了图书馆所有广告与传播的书，还发表了三篇这方面的论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有目标，定规划，去行动！

一个生活建议：大学校园时光是人生特别美好的时光，也是特别重要的时间段，多读书！以后难得有这么完整的读书时间与这么宁静的读书心境。苏轼说：读书万卷始通神。今天更流行的说法是“人丑就要多读书”。其实读书就能更漂亮，能提高颜值，因为“腹有诗书气自华”。多行动！没事别宅在宿舍，别猫在床上，别总是低头刷屏，多参加校内外的各种活动，哪怕就是去玩也好。多与老师、同学、社会交流，生命在于运动，能力在于行动，动静结合，知行合一。

感谢武大，让我懂得开放包容，感恩哲学与哲学学院的师长。我总结的7个锦囊分享给同学们：逻辑性、创造性、战略性的思维、洞察力、创新力、行动力的力量以及有格局的世界观。在人生道路上，面对挑战、压力、挫折、艰难、困苦……我常常拿起这些锦囊，武装自己，奋力前行！



祝福同学们，在最美好的年华，在中国最美的校园、最好的哲学学院，增进智慧，砥砺前行，唯有时光不可辜负！

我们每年都有声势浩大的校园招聘，也非常希望哲学学院有志于文化创意的同学们，加盟省广，施展才华，成就自己，贡献社会！

谢谢各位师长、各位同学！谢谢大家！

（作者系哲学系 1987 级硕士研究生校友）



我的导师李德仁

龚健雅

学者的一生要经历小学、中学、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在这过程中，遇到好的老师引导和指导是人生的幸运。一次偶然的机会与李德仁老师相识，由此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与命运。

一、从相识相知到信任

1982年，我从华东地质学院（现东华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并作为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主讲航空摄影测量课程。

一名毕业于华东地质学院工程测量专业的本科生留校当老师，要教好航空摄影测量课程，会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工作以后，学校将我送到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摄影测量与遥感系（现为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进修。

1983年，我和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十余名教师一起，成为航测系的插班生。华东地质学院给我的任务是，用一年时间学完航测系的主要专业课程，包括基础摄影测量学、解析摄影测量学、数字摄影测量、近景摄影测量、遥感基础等课程，而这些课程当时跨越了几个年级，我要同时选修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甚至是研究生的课程。

在进修的一年里，除了这些专业课程外，我还选修了其他与航测相关的课程。由于我的基础比较好，学习目标比较明确，学习比较努力，这些专业课学得都很好，所以系里的老师对我印象比较深，我们关系比较好。当时近景摄影测量课程由李德仁老师



的夫人朱宜萱老师主讲，在这门课程的考试中，我考了年级第一，有一道题仅有我一个人做出来了，所以朱老师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我在跟班学习的同时还跟着几位老师做科研项目。由于我在华东地质学院留校以后教过计算机程序设计，编程能力挺强，就帮老师们编软件。在武测进修的一年间，我不仅圆满完成了航测系主要专业课程的学习，还用当时的 PC1500 编写了航带法空中三角测量软件和近景摄影测量直接变换数据处理软件，后来移植到苹果机上。由于那时微型计算机才刚刚兴起，我编的这些软件是最早的微机上的摄影测量软件，所以航测系就作为系里的科研成果组织了鉴定，同时举办培训班推广使用，获得了较好的效果，我作为项目负责人获得了两项省部级科技成果奖。这样，虽然我仅是一名进修的学生，但是航测系的老师包括朱老师都对我印象很好。

1984 年，结束了武测一年的学习后，我回到华东地质学院继续担任测量系讲师，主讲航空摄影测量课程，期间我又参与了中南矿业大学杨善慈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采用数学地质和矿体几何的方法，用微型计算机计算矿产储量。几年时间我们完成了南京梅山铁矿、江西东乡铜矿和湖北大冶铁矿的储量，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1982—1988 年，在华东地质学院执教的 6 年里，我相继被学校记大功两次，还被评为“江西省优秀教师”。

1987 年，我借在大冶铁矿做科研项目的机会回武测探望航测系的老师，当我去拜访朱宜萱老师时，朱老师不在家，李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和我交谈起来。我在武测进修时李老师还在德国留学，他 1985 年回国后可能经常听航测系的老师或者朱老师提到我，所以当我一报名字，李老师就对我说系里老师和朱老师经常提到你，说你既聪明又很勤奋。他说，“你调过来吧，我们系会很欢迎你。”我当然非常高兴，但是我说我现在只是一个本科毕业生，没有研究生学历，调武测可能会有困难。他又说那你考研究生吧。但我当时凭研究成果正在申请中南矿业大学在职人员的硕士学位，所以我说我已经 30 多岁，工作了 6 年，再来考硕士研究生，似有不



值。李老师又说那你直接考博士吧。我当时真是高兴坏了，没有想到我一个本科生，李老师能够让我直接考博士。在这之前我与李老师并不认识，既不是他的学生，也没有深入交往过，仅凭其他老师的相传评价和当时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李老师就让我一个当时仅有本科学历的年轻老师直接考博士，足可见李老师对我的厚爱和担当。

李老师答应让我考博士，我自然很开心，但是挑战也是非常大的。虽然我在武测进修期间选修了几门研究生的课程，但是要数学、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都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还是有相当难度的。1988年，武测航测系只招收两名博士生，一名是王之卓先生与李德仁老师合作指导，一名是王之卓先生与张祖勋老师合作指导。李老师向自己的恩师王之卓先生推荐了我，说我特别勤奋和聪明，虽然不是研究生，但有研究生的学力，是个可造之材。

向来以治学严谨著称的王老先生对录取博士生十分慎重，尤其当他了解到我仅有本科学历时，更加慎重。不仅亲自向给我上过课的老师了解情况，还询问我的同学，甚至给中南矿业大学杨善慈教授写去亲笔信了解我的科研能力。即便如此，在我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初试以后，王先生还是决定组织一场严格的面试。

当时组织的那场面试，我现在还记忆犹新。王先生、李德仁教授、张祖勋教授、郑肇葆教授四位坐在台下，我在台上，他们现场提问，我现场解答。有时问概念问题，有时要写公式甚至推导公式。他们整整考了我一个下午，从14:00考到了18:00以后。经过认真考察与面谈，他们认为我的基础很扎实，反应也比较灵敏。复试完离开武汉前，我与李老师告别。他告诉我，王先生和其他几位教授对我很满意，录取应该没有问题。就这样我被破格录取为王之卓院士和李德仁教授联合指导的博士生。

1988年3月，距上一次进修近5年后，我再一次来到武测当起了学生，只是这一次，是正规的博士生，还是当年航测系唯一的博士生。师从王先生和李老师后，我的学术方向和科研视野上了一个新台阶，慢慢地融入了行业最新科学研究行列。

王先生和李老师原来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摄影测量，我是摄影测



量的博士生，理应从事摄影测量方向的研究。但 20 世纪 80 年代末，GIS 开始在中国兴起。王先生和李老师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希望我从事 GIS 的研究。当时的地理学科、地图制图学科都在涉及这一领域，而我们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科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还比较少。如何让我进入这一领域并能够顺利毕业，李老师颇费了一番心血。在我进入武测攻读博士学位几个月以后，他就决定送我出国进修，到国外从事地理信息系统的学习和研究。1988 年 5 月，李老师借在芬兰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向丹麦的 Jacobi 教授推荐我到丹麦技术大学从事 GIS 的学习和研究，Jacobi 教授欣然允诺，还帮我申请了丹麦政府奖学金。

当时的丹麦在数字制图和地理信息系统领域处于国际先进水平，20 世纪 80 年代就建立了全国的地理信息系统。我到丹麦以后，丹麦技术大学为我创造了良好的学习和工作条件，不仅给予了我与丹麦技术大学摄影测量系老师一样的工作环境，还专门为我买了一些设备和软件，如世界上第一套基于关系数据库的面向对象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System9，使我能够接触到国际上最先进的地理信息理论、方法与技术。

在丹麦留学期间，李老师叮嘱我，“要敢于跨越，有跨越才有创新，你仅仅跟在人家后面，捡人家做过的重复做，你就总在后面。”我不敢辜负李老师的期望，潜下心来做研究，主攻面向对象的 GIS，但是没有走前人的基于图层数据模型的 GIS 和基于关系数据模型 GIS 的研究路子，而是提出了新一代面向对象空间数据模型和一体化数据结构，在此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国际上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我提出的面向对象空间数据模型，在 1990 年召开的欧洲第一届地理信息系统年会作口头报告时，获得好评，两篇相关的学术论文分别在德国和澳大利亚摄影测量与遥感学报上发表。现在，面向对象地理信息系统成为了 GIS 的主流技术。

我在丹麦留学时，有几个单位如丹麦农业部等希望我留下，但是李老师一直给我写信，王先生也很关心我，说国内现在很需要人，希望我能够按期回国。我现在还记得李老师当时给我写信的一段话，他说：“我现在正在看欧洲杯足球赛，各国的球员都是回祖



国参加比赛的，你也回国参加比赛吧。”从我个人来说，两位导师录取了我，并送我出国，我要是不回来，感觉不仅对不起国家，更对不起他们。所以，1990年10月，我按期从丹麦回国“参加比赛”，继续跟随王先生和李老师攻读博士学位。李老师为了能够让我更好地从事面向对象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花5万多元人民币给我买了当时最好的微型计算机 IBM0520 和相关的软件。那是李老师用从别的课题节省下来的结余经费为我买的计算机。李老师为了发展新的研究方向，总是利用其他课题结余的经费购买设备和资料支持新方向研究。由于有前面出国进修的基础和武测良好的研究条件，我很快就完成了博士论文，于1992年3月以全优的成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1992年3月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龚健雅与三位导师王之卓院士、李德仁院士、丹麦技术大学 Jacobi 教授合影

我是统招统分的博士生，毕业面临找工作的问题。当时清华大学和同济大学都希望我去工作，但是李老师坚持把我留在武测，而



且找到当时的学校领导，把我爱人从江西调入武测工作。我非常感谢李老师的挽留，使我有机会继续跟随李老师从事教学和科研。

留校工作以后，李老师把国家测绘局的一个几百万元经费的“七五”重点攻关项目“面向对象 GIS 的研究与开发”交给我主持，并说服校领导从全校多个院系调集 20 多位老师和研究生参与项目研究，让我全面负责组织实施。这对我来说，挑战也是非常大的，我刚刚博士毕业，要组织协调这么大的团队协同攻关，没有李老师的全力支持是很难完成的。经过几年的攻关，我们研发出国际上第一个基于面向对象空间数据模型的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吉奥之星 (GeoStar)，并开始在市场上推广应用，扭转了我国 GIS 人才出口、软件进口的局面。我本人也得到学校和国内有关专家的认可，1992 年博士毕业后，1993 年被晋升为副教授，1994 年被破格晋升为教授，1995 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1999 年入选教育部第一批长江学者，成为武测最早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入选长江学者计划的年轻学者。



2007 年 9 月，龚健雅与李德仁在泰国访问



1996年1月,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领导换届,我又被学校任命为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李老师1996年下半年担任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校长之后兼任重点实验室主任,我继续在李老师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李老师对我十分信任,放手让我去管理和发展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2006年换届,武汉大学又让我担任实验室主任,李老师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经过20多年的发展,实验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不到10名教师发展到上百名教师,连续4次评估获得国家优秀重点实验室称号,不仅在武汉大学,而且在全国都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的一个标杆。

二、以远见卓识推动学科不断发展

李老师是公认的战略科学家,我国的测绘学科能够发展得如此红火,与他和其他老一辈科学家不断推动测绘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分不开。我在李老师身边学习工作近30年,深刻体会到他对学科发展的敏锐眼光和远见卓识。

1988年我进入武测读博时,李老师当时主要从事解析摄影测量的研究,特别是在粗差检测和光束法区域网平差方面做出了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他回国以后带的几位硕士和博士生也都从事摄影测量方面的研究。我当时也想选摄影测量方向做博士论文,一是我可以参与李老师现有的研究课题小组,相对比较容易进入研究状态;二是我自己对摄影测量也相对熟悉,我在华东地质学院教的就是摄影测量,在武测进修时也编过两个空中三角测量的软件,做区域网平差有研究基础。

但是,当时地理信息系统开始在中国兴起,地理、地图制图和计算机领域许多学者都向这一方向发展,而我国当时的摄影测量与遥感的学者从事这一研究方向的比较少。李老师认为这是一个新兴研究方向,而且摄影测量与遥感的学者应该在这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所以李老师动员我从事地理信息系统方向研究,而且亲自帮我联系到丹麦技术大学的Jacobi教授,邀请他作为我的合作导师,请他为我申请丹麦政府奖学金,使我在入校的第二年就能够到丹麦留



学。在丹麦留学期间，我一直与李老师和王先生保持密切联系，经常讨论论文的研究方向，当我提出选择当时最前沿的面向对象 GIS 作为研究方向时，他们全力支持。李老师把我介绍给当时国际摄影测量遥感学会 (ISPRS) GIS 理论与方法工作组组长，ITC 的著名学者 Molenaar 教授，让我参加 ISPRS 的理论与方法工作组。经过几年的研究，我们提出了面向对象一体化数据结构和数据模型，文章分别在澳大利亚和德国的相关学报上发表，并有两篇论文在华盛顿召开的第 17 届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大会上口头报告，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这一研究也初步奠定了我们在地理信息系统领域的工作基础。

“七五”期间，国家测绘局立项研发国产地理信息系统基础软件，而且明确要研发面向对象的地理信息系统，李老师和我作为主要负责人承担了这一课题。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推出了国际上第一个基于面向对象模型的地理信息系统基础软件——吉奥之星 (GeoStar)，成立了吉奥公司，尔后又发展了新的版本和系统如 GeoSurf、GeoGlobe、GeoSmarter 等，在全国得到广泛应用。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天地图) 就是基于吉奥的系列产品，扭转了国家大型地理信息系统依赖国外软件的局面，推动了我国测绘遥感向地理信息领域的发展。

20 世纪 90 年代，与测绘领域相关的三项技术——卫星导航定位技术、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但是它们之间的关联和集成研究不够。李老师就组织团队开展“3S”集成的研究，先后解决了 GPS 辅助空中三角测量，使外业工作量大幅减少；解决 GPS、惯导和 CCD 等传感器的集成问题，研发出移动测量系统，成立武汉立得公司，推动移动测量系统在国内外的广泛应用；将遥感影像与 GIS 数据集成，形成了虚拟数字地球平台 GeoGlobe，成为各种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城市的基础软件平台。

最近，李老师又意识到遥感与地理信息实时服务的重要性，提出了导航、定位、授时、遥感与通信 (PNTTC) 集成的天基空间信息系统，以及对地观测脑的概念。通过“一星多用、多星组网、天地互联、在轨处理、实时服务”，大幅提高天基导航系统和天基对



地观测系统的系统效能与应用效率。相信在李老师的全力推动下，一定会将测绘遥感与通信进行更紧密的结合，为测绘遥感与地理信息学科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作者系测绘学院 1988 级博士研究生校友，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7 年 9 月 8 日）



张培刚的世纪传奇

胡艳华 李旭玫 吴瑞芳

校友名片：

张培刚(1913—2011)，1929年春，插班考入武汉大学文预科一年级；1930年秋，预科毕业后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就读。张培刚先生是发展经济学奠基人，经济学一代宗师，我国卓越的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曾任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兼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湖北省首批“荆楚社科名家”，获得“华中科技大学终身成就奖”。他毕生致力于理论创新，为发展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年少大志

1913年7月，张培刚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属相为牛的张培刚，一生就像牛一样，有牛的韧性，有牛的干劲，勤恳而不计回报。他出生在农村，从小在与家人放牛、砍柴、种植庄稼的农活中，砥砺品行，激励斗志，并逐渐形成了对中国农村的最初认识。中国农民生活之贫困、劳动之艰苦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在内心深处早早立下了改善农民生活、改进耕作技术、促进农业发展的终生志向。



张培刚先生 1934 年摄于北平

张培刚天资聪颖，5 岁入私塾，一年后转入湖北省红安县八里湾镇东边田村下陈家田的启人小学。1925 年春，年仅 11 岁的张培刚只身离开家乡，考入董必武为校董的私立武汉中学，受到董必武的国文熏陶。次年春天转学到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受当时“民主与科学”社会思潮的影响，张培刚刻苦攻读数理和社会科学。但是不久，他逐渐意识到，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大国，要富强起来，必须从发展农业经济入手。他在报考大学时放弃了学习自然科学的打算，决定专攻经济专业。

1929 年春，张培刚插班考入武汉大学文预科一年级，学校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他当年的报名表。这张修业证明显示，张培刚当年只读了一年半的高中就跳级考入武大预科。当时国立武汉大学刚刚成立，招生非常严格，当年的文预科班只录取了张培刚一人。1930 年秋，张培刚预科毕业后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师从周鲠生、杨端六、皮宗石、刘秉麟、陶因、任凯南、李剑农、刘博平、袁昌英、陈登恪、何定杰等名师。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人民生活水深火热的疾苦激发了张培刚奋发学习的斗志，他在大学期间学习极为刻苦，他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在这个时期基本



形成。

从1929年春到1934年夏，张培刚5年半的大学时代，几乎将所有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在数学、英语、德语、法语、经济学方面的扎实基础为他将来走向更广阔的学术天地打下了重要基础。

1931年，在武汉大学为张培刚讲授外国经济史和外国经济思想史两门课程的是任凯南老师。他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经济学教授之一，湖南乡音极重，但条理分明，十分详尽。任凯南先生不但在课堂上讲课认真，还要求学生在课堂外阅读关于欧洲经济史和产业革命史的英文参考书。任凯南爱惜人才，见张培刚读书用功，特在自己的书库中拿出英国女教授瑙尔斯(L. C. A. Knowles)撰写的英文名著《19世纪产业革命史》(伦敦，1927年版)，送给这个好学的少年仔细研读。18岁的张培刚在任凯南的课堂里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到西方经济学说。当任凯南讲到英国产业革命，特别是讲述纺织工业的兴起过程时，说得滔滔不绝，极为详细。这一略带喜感的湖南方言的讲述，使少年张培刚第一次领会到了工业生产“爆炸式”铺展开的威力——如果说农业时代的生长是线性的，那么工业时代已经变为指数增长，从农业中国中走出的几代人，数千年形成的旧经验旧眼光，将在此巨变来临之时或束手无策或齐齐失效。这堂课令张培刚印象深刻，在教室听课做笔记时，为求快以免遗漏，来不及另行措辞，一向注重笔记整洁的张培刚也写下了多处的“满山跑”，成为这堂特别课程留下的特殊记忆。

1934年，张培刚以武大历史上第一个各科全优的成绩从大学毕业，以全院第一的成绩被选送到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农业经济调查研究工作。这前后约6年的时间，是张培刚基本功形成的时期。此前的学校学习使他具备了理论基础，研究所的实践调查研究又使他掌握了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受益于社会学家陶孟和重视调查研究，及自己长期深入农村和乡镇的调查实践，张培刚逐渐掌握了1934—1940年关于中国农村巨量而又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他走遍大江南北，足迹遍及半个中国，调查研究对象包括上百个村镇和数千农户；调查项目涵盖了以土地为主的各种生产要素、农家经营(包括农作物和家庭副业)、农家收



支和借贷、农产品价格和变化趋势以及粮食的生产、加工与运销等。那几年里，张培刚相继写出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粮食问题》《浙江省粮食之运销》和《中国粮食经济》4部著作。除最后一本因1941年夏他办理出国留学手续而未能及时定稿付印外，其他三本均由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在张培刚当时的这些研究中，人们感到惊讶的是他早早就涉及了“交易费用”这一经济概念。

1935年2月，张培刚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杂志上发表《第三条路走得通吗？》一文，提出了具有特色的观点：“工业化一语，含义甚广，我们要做到工业化，不仅要建设工业化的城市，同时也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他的这一观点早在本科时和进社科所初期就逐步成型。张培刚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近代历史变迁中便已认识到，它们的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乃得力于进行“产业革命”和“工业化”。因此，张培刚认识到在中国及其他农业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就不能仅限于农村而要包括农村。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但对他个人的意义是重大的——文章的发表，意味着他找到了毕生奋斗的目标。

1937年夏，张培刚赴桂林广西大学经济研究室出任研究员。在对广西粮食问题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他发现了水稻分布和人口分布的密切关系，并分别作出广西水稻产量的分布图和广西人口分布图，然后进行比较，最终得出结论：人口密度和水稻产量是成正比的。原因是水稻耗费人工，只有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才能得到推广，反之也只有水稻才能供养大宗人口——二者互为条件。

1938年，张培刚因广西大学的一年之约满期，在写完《广西粮食问题》并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仍回到当时已迁至阳朔县的中央研究院社科所。1939年元旦前后，由统计员许钧协助，他前往贵阳担任社科所图书资料转运站负责人，在战火中保护社科所的珍贵书籍向更安全的地方转移。1939年早春，时迁广西宜山县城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和农业经济系主任梁庆椿教授邀请张培刚担任讲师，为农经系毕业班讲授了一个学期的农场管理和土地经济学两门课程。此时的张培刚已是一位经验丰富、著作颇丰的青年学者了。1939年秋，他结束了广西宜山的浙大教职，赶往昆明，重新



回到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因为战乱，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匆匆从阳朔迁往昆明。这一年年底，张培刚写完了《浙江省粮食之运销》一书。他在1934—1940年撰写的农业经济方面的一系列著作和论文，深深植根于中国农业社会的土壤之中，是最早的中国的农业经济学著作。

1940年早春，受困于西南的张培刚离开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得知清华庚款留美考试委员会即将在全国招生，虽然知道希望渺茫，但依然决定报考。

多年后，谈到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张培刚说出了自己的考量：“一则全国招考，而录取名额却极为有限；再则，复习时间仅有半年，而我离开大学，从事农业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已届6年，大学课程大多荒芜。考试的科目有英语、经济学原理、外国经济史、外国经济思想史、工商管理、会计学（含成本会计），我不仅要重温大学课程，还要补充数年来各门课程的新增内容。但我深知在研究所继续下去难有发展之日，遂决心报名应考。为了备考，我自己买书、请友人代为向云南大学图书馆和其他从内地迁来的研究机构借书，共计近二百册。”备考时间有限，但张培刚在昆明城内却找不到一间安心看书的住所，只好与友人商议，在距离春城80华里的安宁县内的温泉小镇寻到一处两层楼大院。

1940年，张培刚在昆明云南大学参加了第五届清华留美公费留学生考试。考完之后，他随友人迁至云南大理喜洲镇华中大学，一面等候发榜，一面利用过去数年累积的资料撰写《中国粮食经济》一稿。张培刚常常茶饭不思、昼夜颠倒，在一人独居的宿舍里潜心阅读中西有关经济学科的书刊至深夜。

1941年4月，考试结果公布，张培刚成为录取中仅有的两名文科生中的一名，这也是武汉大学第一次有学生考上清华庚款留美。这个消息仿佛为战乱之中的张培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发榜后，酬酢很多，往来道贺的师友人员络绎不绝。张培刚一面紧张地筹备赴美行程，另一面加紧了写书速度，力求在出国前完成《中国粮食经济》一书手稿。

5月初，张培刚告别了令人依依不舍的喜洲，告别了滇南的山



水和风物，在其好友万先法、吴醒夫、陈全生三人的陪同下，雇牛车来到昆明城附近的下关，准备赴美。

哈佛岁月

在陈岱孙、杨端六的指导下，1941年9月，张培刚进入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习。陈岱孙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与“威尔士奖”失之交臂的遗憾会在1947年由这个经自己亲手指导去往哈佛大学管理系的学弟张培刚来弥补。按当时的惯例，政府给每位庚款出国的留学生都买了头等舱船票——票价500美元，以免他们在美国上岸时遇到西方人的刁难。第一次坐海船的张培刚初时还觉得很新鲜。此前一直在祖国内陆读书工作的他，从未见过浩瀚无边的大海；但蓝天碧海总看也会生厌，张培刚很快就觉得寂寞了。傍晚时分，他常常站在甲板上吹着海风凝视湛蓝的海水陷入沉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蚕食文明，国内的抗日战争不知何时才能胜利，以自身所学，能为国家、为民族做些什么呢？



1941年冬，于哈佛大学(前排左一为张培刚)



到达哈佛大学之后，安置好不多的行李，张培刚舒适地在暖气上暖着手脚思考着：家乡的父老乡亲还住在冰冷的泥土房子里，更别提那些生活在贫困中的幼儿孤老了。想到这里，刚刚还沉浸在西方先进文明洗礼中的张培刚，心情便沉重起来，心里禁不住涌起一阵阵难言的苦涩。

张培刚是带着问题到哈佛大学求学的。他决心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借鉴西方先进的理论水平，探索改变中国落后经济的道路。

进入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张培刚学习了制图学、时间研究学、动作研究学、产业组织学、运销学、采购学、统计管理学、会计管理学等实用课程，并在哈佛特有的案例教学课程中，系统地了解了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情况和特点。

1942年秋冬之间，美国华盛顿召开全世界青年联合会，会议的宗旨是将全世界青年联合起来，争取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凝聚和壮大反法西斯力量。张培刚作为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代表参加此次会议，受到罗斯福总统的接见。与会期间，他拜访了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

1942年秋，张培刚结束了包括“暑假学期”在内的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三个学期的学习，转入文理学院经济系学习。“如何让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达到先进工业国的境地，如何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在张培刚脑中挥之不去。而他当时所处的哈佛大学管理学院虽然名满天下，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在个人事业上等于生下来就含着“金汤匙”，但这并不是张培刚的目标。为了给苦难的国家和民族探求一条复兴之路，让这个古老的农业国早日搭上工业化的快车，张培刚决定从管理学院转到文理学院经济系研究生部，在这里真正找到救国的线索。

在当时哈佛大学的经济学系，聚集了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教授专家，在这些导师的教导下，张培刚学习了经济理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农业经济、货币金融、国际贸易等课程。

以撰写《垄断竞争理论》著称的张伯伦教授时任经济系主任，张培刚选修了他的经济学原理和垄断竞争理论课程。在一次讨论课上，西方同学依据最新出版的书刊中的观点提出：在农村还存在完



全竞争。而有着童年乡村生活经历和6年农村经济实地考察经验的张培刚则持不同意见。他大胆地反驳这种观点，向同学们提出：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市场，无论是农民的买方市场还是他们的卖方市场，都不存在“完全竞争”。理由有二：一方面，农民向城镇粮行出售小额稻谷、小麦、杂粮等粮食作物或花生、芝麻、油菜籽等油料作物时，这种市场主要由少数粮商垄断，农民只有出售与否的微小选择权，而无讨价还价之力，还经常因情势所逼不得不贱价出售；另一方面，农民需要的生产资料为城镇另一批商人垄断。张培刚在课堂上数次用他在国内的调查研究加以说明和辩解，并指出“农民参与市场的人数多，只能说明他们难以形成垄断力量；另一方面，粮商或农业生产资料的经销商在小城镇只有两三家或者一家，易于形成垄断”，这正好可以用张伯伦的独家垄断理论或寡头理论来解释。同学们听后，开始是愕然，继而感觉新鲜，后来认为有说服力。张伯伦在课堂上频频点头。学期结束后，张培刚做了一篇论文《关于“厂商均衡理论”的一个批注》，甚得张伯伦赞许，给这篇论文评分为“A”。

在哈佛大学，最欣赏张培刚的莫过于被誉为“美国农业经济学之父”的布莱克教授和经济史学家厄谢尔教授。布莱克教授作风朴实，重视实践。他给张培刚讲美国农村的情况，张培刚给他讲中国农村的情况。两人师生之情甚笃，布莱克非常喜欢这位勤奋并有农村经验的中国青年学子。厄谢尔教授主讲经济史，张培刚对历史很有兴趣，在课堂上发言积极，甚得厄谢尔的喜欢。

以创新理论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大师熊彼特对张培刚的影响也很大。熊彼特在哈佛大学开设的两门课是高级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史。熊彼特学识渊博，其学术思想已从经济学扩展到历史及哲学领域。他的学历和经历对张培刚日后在学术上的哲学观点、政治见解和经济学说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张培刚还曾为熊彼特的几本中译本著作写过序言。

张培刚用两年的时间学完了课程，顺利通过了1943年12月的硕士论文答辩，获得了撰写博士论文资格。针对博士论文的选题，张培刚做过慎重的思考。以他当时的情况，如果选择以中国农



业经济、中国粮食经济为题，可以很轻松地完成任务。但张培刚发现，偌大的哈佛大学图书馆居然没有一本著作系统地论述过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考虑到当时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世界形势和多灾多难的祖国、人民，张培刚决定以中国工业化为中心目标，从世界范围内来探讨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探索出一条实现工业化的道路。

在博士论文题目确定后，张培刚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申请了一个6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房内有一桌、一椅、一小书架，使用者可以随意取阅图书库里的任何书刊，只是不能携带出书库——按照学校当时规定，凡撰写博士论文的研究生，均可申请此项特许待遇。张培刚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用英、法、德等文，翻阅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阅读了200多本参考书，涉及的经济学家不下180余人，包括了当时经济学有关的主要论著。他摘录了几小铁盒卡片，卡片记述了英、法、德、美、日、苏联诸国各自从“产业革命”以来实现工业化的主要情况和经验教训，以及少数农业国家的实际情况和重要问题。接着他又花费大半年时间坐在打字机旁，根据草拟的提纲，花了9个月的时间，在1945年年底完成了20万字的博士论文英文文稿。1945年12月上旬，张培刚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几天后，论文被送“威尔士奖”评审委员会参加评奖。按照惯例，张培刚需要隐去真名，他顺手取了个“Peter Chandler”的假名填在论文封面上。

1945年，在张培刚博士论文写到最后一章时，相继收到了大哥张卓群的两封信件。来信分别告知，母亲与父亲已相继去世。两次噩耗使张培刚痛苦不堪，当即写下了悼念诗句：康桥阴雨落纷纷，游子外洋哭双亲；养育恩深何以报，且将眷念化宏文。他沉重地在扉页上写下“To the memory of my father and mother（将这本文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永远怀念两位老人对他的无限恩情。

在哈佛大学学习的5年时间，张培刚勤奋学习，从不懈怠，充分利用哈佛大学丰富的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广泛仔细阅读有关书籍，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几乎每一位教师的讲课和参考书目，他都做了工整而又详细的笔记，大



概有 30 余册。哈佛大学自由的学术气氛、丰富的图书资料和造诣深厚大师们的教导，使张培刚视野得以开拓，学术功力得以升华。哈佛大学求学的岁月，是张培刚一生中最辉煌、最难忘、最重要的时光。在哈佛大学 5 年的时光里，张培刚与赵元任、吴保安、吴于廑夫妇、谢强、任华、严仁赓夫妇、牛顿·伯克、谭崇台等结下了深厚友谊，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1947 年发生了张培刚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事。这一年里，张培刚的博士论文获 1946—1947 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David A. Wells Prize)，这也是迄今为止，华人在经济学领域所获得的最高级别奖项。他的博士论文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 85 卷，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时国内的《武汉时报》和《大公报》也以“哈佛最高奖，东方第一人”为标题，刊载了这一消息。

《农业与工业化》作为世界上第一部从历史和理论角度全面系统地剖析发展中的农业国走向工业化的问题的著作，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这本专著是张培刚在国内经过长期调查，又在国外大量阅读有关文献书刊，对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所做的系统性理论探索。正如张培刚本人所说：“读书使我了解世界，获得知识，但如果没有我青少年时期在农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没有大学毕业后数年工作的实地考察，特别是没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心，我是无法写出这样的论文的。”

对于获奖张培刚十分高兴。之所以高兴，并非出于个人原因，更多的是觉得扬眉吐气了。因为在留美期间，张培刚接触了不少发达国家的老师、同学和其他人，他们对张培刚个人，因其哈佛大学研究生的身份是尊敬的；但对于当时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则不时在言谈间流露出瞧不起。哈佛大学地处美国东部，正是充满英国绅士派的新英格兰地区，表面上大家很有礼貌，可是美国人的那种“民族优越感”和“强国优越感”却使外来的张培刚心中万分难受。现在获得了哈佛大学经济系最佳论文奖，总算可以说明一点：中华民族不仅有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而且即使在现代化上，在那些有“优



越感”的西方民族的“强项”上，也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一决高低。



1947 年个人摄影

得知这一消息，张培刚国内导师、早年哈佛大学博士、经济学泰斗陈岱孙先生万分欣喜。陈岱孙说：“当时，我获知这一消息，十分高兴。我终于看到了有一位中国留学生跻身于哈佛大学经济学论文最高奖得者的行列。”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对此评价道：“张培刚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和萨缪尔森（美国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博士论文获得相同的该校论文奖，而萨缪尔森由于自己的那篇论文而成名，甚至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

学成归国

1946 年 8 月，张培刚从哈佛大学毕业，张伯伦曾邀请他留校任教，但这时的张培刚已经决定回国。满怀赤子之心的他一心想在自己的祖国实践农业国工业化的理论。他与同窗好友吴于廑、韩德培相约一起回到武汉大学任教，三人后来有珞珈“哈佛三剑客”之称。



张培刚先生在经济发展座谈会上

张培刚回国后担任武大经济系主任。经济学家董辅初曾回忆说，“1946年我考进武汉大学经济系，结识了我人生中第一位重要导师张培刚教授。”在学生们的共同记忆里，这位年轻的老师讲课非常有吸引力。他上课时穿着笔挺的西服，打着领带，操一口流利英语。他没有讲义，少有板书，往往是旁征博引，“想到哪里讲到哪里”。比如他讲边际效益时，会用“第三个烧饼最解饱”作比喻。往往讲到一半时，连走廊里都挤满了人。董辅初回忆说，张老师讲课风趣幽默，对学生的要求不放松，包括他在内的学生都被严格训练。

1948年1月，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邀请张培刚担任顾问和研究员。为了搜集资料，今后更好地研究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在征得武大同意后，他前往任职，度过了人生中与世界经济学界交往最为频繁的一段时光。



在联合国期间，张培刚是委员会中位居第三的高级官员。由于他是哈佛大学获得“威尔士奖”的博士，个人备受尊重。但中国当时还是处于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并不受重视，张培刚暗下决心，立志“在学术上也要争气，早日摆脱落后，做到真正的独立和繁荣。要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

任职期间，张培刚多次以农业经济专家、顾问的身份，参加在菲律宾、印度举行的各种国际会议，并发表了《东南亚新独立和尚未独立的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情况》调查报告。也就在此时，张培刚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许涤新、冀朝鼎等人，通过他们的介绍，开始阅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等著作，并开始认真研究《资本论》。诚如他后来所说的，“我当时就想切实地为国家经济建设做贡献，但是还不太懂得不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我的那套理论并无实现前提。”在认真研究了《资本论》后，张培刚思想豁然开朗，认为只有通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实现工业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培刚毅然舍弃了舒适的工作条件和600美元月薪的联合国职位，并再次婉拒了导师布莱克、厄谢尔请他回哈佛大学任教的邀请，放弃在学术上可以取得更高成就的机会，再次回国继续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及系主任，并代理法学院院长。1950年，张培刚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及武汉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51年秋至1952年夏，张培刚被派往北京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一年。此时的张培刚虽暂别讲坛，但心里怀着一份期待：希望经过学习后，自己所学西方经济学也能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但这样的机会并没有来临，当时苏联模式迅速席卷了国内经济学界，全国都以社会主义经济学思想为纲领，西方经济学思想作为“资本主义”的一部分，从意识形态上遭到了排斥。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选择学习苏联，走计划经济的道路，熟稔西方经济学的张培刚失去了用武之地。1952年，为了适应工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国家决定进行院系调整，在武汉新建三所工科大学——华中工学院、中南动力学院和中南水利学院，并成



立“三院联合建校规划委员会”。张培刚被任命担任正在筹建中的华中工学院(后更名为华中理工大学,今华中科技大学)建校规划办公室主任和基建办公室主任。张培刚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那时他们认为我是从美国回来的,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教书用不上,但人还可靠,就被调来筹建华中工学院。”

到过华中工学院的中外学者都对学校的校园环境非常赞赏,认为校址选得好,校园规划布局合理、舒适方便。在这其中,倾注着华中工学院首任院长查谦和具体主持建校工作的张培刚的心血与汗水。建校规划工作的第一件事是选择校址,查谦和张培刚等人察看了很多地方,经过反复研究、比较,最后选定在喻家山、关山地区建校,虽然当时这带都是农田和坟场,但查谦和张培刚都认为:大学校址的选择既要考虑当前的情况,更要着眼于今后的发展,校园郊区化已成为一种普遍趋势。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高瞻远瞩的。为了顺利建校,当年的张培刚作为基建办公室主任,首要工作就是劝农民搬家迁坟和为工人申请水泥沙石,他几乎一天到晚泡在工地上。

不仅如此,华工校园的规划设计方案也是由张培刚主持制订的。1953年,华工的建校工程基建投资额为1326亿元(相当于币制改革后的1326万元)。为保证建校工程顺利进行,中南教育部调集了一批有名望的建筑学教授专家参与规划设计。张培刚根据教育部关于“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照顾美观”的指示,提出“合理、美观、完整”的设计原则。专家们最后决定采用按城市式规划、棋盘式铺展的方案。

从经济研究到搞基建,张培刚的学术研究暂时中止了。由于和西方的隔绝,此时他并不知道发展经济学在国外已悄然兴起。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1956年,两位智利学者来到北京,要求见Peikang Chang(张培刚)。北京外事接待人员听明白了南美朋友的要求,却不知道谁叫“背钢枪”,辗转打听找到武汉,才吃惊地知道工地上的基建主任便是。华中工学院领导把张培刚安置在一个临时“接待室”里会见智利学者。原来,1951年《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已在墨西哥出版了西班牙译文版,并在南美洲等地产生了很大影



响。智利学者想与作者就一些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探讨。但因为当时的国内形势，张培刚只能应酬了几句，并含着深深歉意送走两位客人。日后听说了这段历史，经济学家张五常感慨地说，大材何止小用，中国浪费了一个顶级经济学人才。

就在不少经济学家为他唏嘘叹息时，张培刚却坦然豁达。谈起做基建主任的经历，他略带自豪地说：“当年修长江大桥投资6 000万元，华中工学院第一期工程就有1 300多万元，在这方面他们是信任我的，觉得我不会贪污”。1954年，张培刚与夫人谭慧在工地的工棚里结婚，自此两人相濡以沫走过了57年。

1955年，华中工学院成立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张培刚被调去担任教研室主任。在那时作为政治课老师，首先要接受政治审查和思想教育。张培刚被首批下放到湖北红安县的建苏公社进行劳动教育。虽然当年他住过的公社宿舍和集体食堂现在只剩下了残墙，但是村里的老人还记得那个戴着眼镜好像领队模样的张老师。在建苏公社，除了白天劳动，晚上张培刚就在水塘边的大枫树下教农民识字。村民还记得，村里常用的独轮车最难推，但是张培刚竟能一下子用它推动几百斤重的粪车。张培刚在《学海扁舟》中谈到这段岁月时，并没有过多地提到自己的遭遇，反而很坦诚地写道：“我有缺点，也有错误。就拿五六十年代来说，受‘左’的影响，我也曾不够公正地写过批判文章，不够客观地评价过西方经济理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的《农业与工业化》不仅没有得到认同，反而被冠以一系列罪名，张培刚本人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已经53岁的张培刚被发配到湖北咸宁向阳湖农场劳动。张培刚在逆境中仍保持乐观性格，养牛养得壮、马路修得好。国家安排他去劳动，他觉得认真劳动即可，不必怏气。他还劝慰身边的同事：虽然专业不对口，但也可以用学到的知识尽量高效地完成国家安排的任务。谭慧记得，那时张培刚白天要“拿榔头修马路”，他在讲座上曾自嘲地笑称那是在“修理地球”，还对学生们说自己“放牛都放得比别人好哟”。

艰苦的劳动生活并没有压垮一代经济学大师的肩膀。张培刚曾经讲过“文化大革命”时在农村放牛的情形：早上天不亮就起床，



带着两个杂粮馒头去牛棚牵牛，把牛引到水草丰盛的地方，找个树桩木杈将牛绳拴牢，就能一边欣赏湖光山色和水田上站立的白鹭，一边从矮树丛中捡一些干柴，升起火来烤馒头吃。从湖北农村走出来的、生肖属牛的张培刚，对牛这种动物始终抱有一份特殊的感情。1971年冬，张培刚在放牛的实践中总结出“牛肚子理论”，他是这样描述的：“有一次放牛时，一头大牯牛不慎陷入泥沼，我们赶忙牵牛鼻子，拉着牛头使劲往上拉，可是牛身却越陷越深。正束手无策时，有人扛来几根粗木杠，垫起牛肚子部位，大家齐心协力，很快将这头大牯牛拉出泥潭。”张培刚说，中国这么大，上海和沿海城市就是“牛鼻子”，广大中部地区就是“牛肚子”，重庆和其他西部城市是“牛尾巴”。如果这头牛要飞奔，中国经济要起飞，只拉牛鼻子、只扯牛尾巴，牛肚子还坠在地上，会有用吗？“牛肚子理论”就是在沿海开放同时实行中部崛起，带动西部开发，促成整个国家经济的腾飞。此后，这个理论成为“中部崛起”的理论依据。

老牛奋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进入了空前的经济快速发展期。张培刚这时才得以在学术上重新施展才华，并在华中工学院这所工科院校里开设了经济学专业。现任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记得，张培刚为了弥补他们这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学生们在知识上的空缺，专门请国际上知名的学者来校讲学。“为了让当时英文并不好的学生们都能听懂，他又找到国外学者，恳请他们慢点讲课，或尝试掺杂一些中文来讲。”

张培刚说自己站了30年，总算有张凳子可以坐下来歇歇脚了。此时的他，比谁都清楚自己已经远离学术研究很多年了。他省掉了节假日、寒暑假，把自己关在招待所，找个僻静处奋笔疾书。他每天凌晨两三点钟才上床睡觉，早上8:30就坐到书桌前，中午稍事休息即一直工作到傍晚，似乎要把失去的时光抢回来。他说：“我



现在深深感到时间不够用，只有拼命干，把一天当两天来使用。”“自古人生谁不老，奋力求真总是春”，这是张培刚自勉诗中的两句。因为生于牛年，他还常以老牛自喻，“老牛奋蹄”也成为他的一句格言，他开始马不停蹄地著书施教。1981年，华中工学院经济研究所成立，张培刚担任所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经济学科的开办和建设当中。同年4~6月，张培刚赴美国新泽西州参加“中美经济合作学术讨论会”。会后，他从东部到西部访问，考察了哈佛、麻省理工、伊利诺伊、哥伦比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11所著名大学。



1984年，专心备课的张培刚先生

1983年，张培刚积劳成疾，疾病迫使他在医院治疗达一年半之久。当时全国工作重点已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病榻上的他决定将《农业与工业化》翻译成中文出版。1984年暑假期间，武汉酷热似火炉，张培刚仍在书堆里写作。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回忆，当时自己路过武汉去看张老师，只见一张单人病床上，堆了两排摞得高高的书，剩下不足一半的面积，很难容一个人安稳躺下。陪在边上的夫人谭老师说：“你要是把书拿开，他睡不着觉！”就这样，只要病情许可，张培刚就伏在床上、桌上审阅和修订中文稿。前前后后花费了整整10个月的时间，作



了三次审订，终将中文稿交付原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积压达40年之久的《农业与工业化》中文版，终于在1984年第一次与国内读者见面了，这时张培刚已经71岁了。周其仁后来撰文感叹：我相信这世间确有把学术与生命完全融为一体的人。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刚定期要给政府部门编写国情资料，在他的文章中经常引用张培刚的理论。胡鞍刚认为，张培刚早在1945年写他的博士论文时，就提出了对外开放的理论，也就是说农业国必须要参与到全球化的过程之中，从全球化过程之中及与工业国的交往过程中，获得资金和技术支持。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遵循这样的一个理论，其实张培刚先生早就为此做出了理论铺垫。胡鞍刚说，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的领导人能够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或者像今天的政治局那样，请他讲几堂课，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如果50多年前在中国没有像张培刚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似乎还可以原谅自己。但是我们不仅有，而且张培刚先生是毅然决然地从美国返回了中国。这是历史的遗憾！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经济学热和《农业与工业化》的再版，让张培刚空前地忙碌起来，“张培刚”这三个字逐渐见诸报端。他在发展经济学上的贡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经历逐渐为众人所知。1987年，在一次图书展上，由杜润生主持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现了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引起重视，内部人手一本。不久，华中工学院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公函：“华中工学院办公室：我们最近读了张培刚先生的著作《农业与工业化》，感到张培刚的研究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决策有很多的帮助，我们想把有关的课题交给张培刚研究，并给他提供一些支援。”

以此为代表，一时间各种邀约如雪片般飞来。虽然已声名鹊起，张培刚却只是继续埋首于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中。每天晚饭后是张培刚的休闲时光。他要看一会儿电视，关注国内、国际上的新闻；然后就是两个小时不间断的阅读和思考，不受任何人的打扰。张培刚喜欢阅读高等数学和数量经济学方面的书刊，特别注重知识



更新，古稀之年的他仍然能阅读英、法、德语资料，还常常温习、回忆归国后学会的俄语。

1987年，华中工学院主办“中美经济合作学术研讨会”，张培刚担任中美经济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当年7月，就“湖北战略将叫什么战略”的问题，湖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专门开会，张培刚的“牛肚子理论”成为了“中部崛起”的理论依据之一。

20世纪80年代，面对西方发展经济学正在走下坡路，而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未发展起来的现状，张培刚再次扛起开拓创新的大旗。1988年10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华东分会在青岛召开，张培刚在会上作了一次学术报告，题为《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同时，他在《经济研究》（1989年第6期）上发表了这次报告的内容，主张从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和根本利益出发，在借鉴和吸收以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比较全面的、新型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张培刚提出：新型发展经济学应拓宽研究范围，以发展中大国为研究重点；改进研究方法，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方面探根溯源，从经济和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非经济方面的综合分析；把体制转轨纳入发展经济学的分析视野。根据这一设想，他率众多青年学子，完成著作《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初版，1999年修订再版），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1988年，华工老校长朱九思为给张培刚提供一个学术研究的平台，在经济学院成立了“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并给了他七八个编制和一笔经费。张培刚领到经费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直想买而买不成的、由台湾“央行”翻译的战后经济学名著系列。以前一直苦于钱不够，这下一口气买了一套半。一个全套放在华工的图书馆，供全校师生借阅，另外半套精选，放在了经济学院的小图书室。

虽然有了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但长期以来横亘在张培刚心头的一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其实这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甚至不仅仅是经济学院，乃至华中理工大学的问题。当时的整个中国高校都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高校的待遇微薄，留不住人，辛苦培养



的人才或从政或经商，高校学术建设无从谈起。20 世纪 90 年代初，华工还没有经济学博士点，张培刚与武汉大学谭崇台教授决定用谭崇台的博士点共同带博士生，目的是为华工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培养几位青年博士教师，作为华工申请博士点的梯队。

1998 年，经过多年的艰苦拼搏，华中理工大学经济系申请的博士点终于获批。85 岁的张培刚成为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在此之前，虽然张培刚的个人学术威望很高，但是没有接棒的梯队，华中理工大学又是工科为主的学校，经济学科方面的博士点就获批得比较晚。张培刚总是调侃地说，自己在中国 85 岁才当博导是史无前例的，不会有第二个人了。但他也表示自己并没有刻意去推动这件事，“姜太公去钓鱼还说明他凡心不死，我却鱼都不钓。我就是这个性格，不刻意去追求这些事情”。接着，张培刚又带领一批又一批老师积极奋斗、努力建设，使华工的经济学科迅速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并率先将西方经济专业建设成国家重点学科，成为华中科技大学文科专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典范。

在张培刚的学术威望和人格魅力的感召下，社会各界和他的众多学生共同资助成立了“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以推动我国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和传播，并设立了“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奖励了何炼成、林毅夫、史晋川等一批为发展经济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海内外学者。该奖现已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的一项重要奖项，逐渐产生国际影响。“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和“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为推动我国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杰出的教育家，张培刚为中国经济学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倾注了毕生精力，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一生教书育人，注重言传身教，为人师表，桃李满天下，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人才，弟子遍布海内外，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中流砥柱。1946 年回国后，张培刚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培养了董辅初、李京文、何炼成、曾启贤、万典武等一批著名经济学家。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他又在华中科技大学培养了徐滇庆、张燕生、张军



扩、胡和立、李佐军等一批知名中青年学者，以及一大批政界和实业界的精英。

张培刚一生始终充满爱国主义情怀，解放前两度回国，共赴国难，爱国与求真始终是他人生道路的主旋律。张培刚常说：“我们作为中国人，不仅要在经济上争气，早日摆脱贫困，做到真正振兴和发达，而且在学术上也要争气，早日摆脱落后，做到真正的独立和繁荣。要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



2004年，张培刚先生夫妇结婚摄影

张培刚一生光明磊落，对人真诚豁达，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学术上，他严于律己，不墨守成规，勇于创新，追求真理，重视知识更新；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吃苦耐劳，宽厚待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乐观向上。面对一生坎坷，他的总结是：“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看透，岂可以全看透，须有所作为。”



张培刚的一生，爱国不甘为人后，求知立志作人先，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始终有一颗赤子之心爱国，执著追求学术，追寻他的经世济民梦想。尽管道路坎坷，却从来不妥协、不放弃、不后悔。他在经济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已在国际经济学界闪闪发光，成为我们中国人共同的骄傲。

2011年11月23日，张培刚走完了他98岁的人生。大师一生，虽历经坎坷，却光芒灿烂。

（注：本文经张培刚夫人谭慧女士及张培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建华教授审阅。）

（作者工作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直心宁独觉 无待自相忘

——缅怀萧蕙父先生

景海峰

“直心宁独觉，无待自相忘”句，出自萧蕙父先生写于60年前的《峨眉纪游诗十四首》。当时先生刚从武大毕业，任教华西，意气风发，与情侣偕游峨眉，直抒感天慨地的精神美。其早年的纪游句深达《庄子》意，风骨嶙峋，透显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气质和向往，每每想起萧先生，不经意间就会联想及此。在惊闻先生驾鹤西归之后，深切缅怀，这个印记就愈发地突出了。先生曾经著文大加赞誉船山之人格美，为其精魂画像，想起已经离我们远去的先生，他那极富感染力、令人景行仰止的人格辉光同样也熠熠夺目、让人神往。

萧先生与业师汤一介先生友情甚笃、交往频密。早在1983年，他们就因仰慕湖北乡贤熊十力先生的学问和人品，而思共同筹划编印其著作。当时，余就读于汤门，自然参与其事，在两位先生的教诲和指导下，就有了一段搜集、整理和编校熊十力著作的长长经历。在这个过程中，萧先生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和提携，言传身教，瞩望殷殷。记得当时他派了学生郭齐勇、李明华等由武汉来北京，我们一起往访梁漱溟、熊幼光等先生，搜集各种资料和线索。接着又与齐勇兄结伴到上海，拜访了田慕周、潘雨廷等先生，并联合熊世菩及其家人，查找、探访熊先生的遗物和旧踪，竟意外地发现了一批新的材料和书籍等，大喜过望，那份激动的心情，至今想来还记忆犹新。

1984年初夏，系里委派我请年事已高的张岱年先生去武汉参



加“中国《周易》学术讨论会”，在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慕名已久但尚未谋面的萧萐父先生。那时，萧先生刚刚年届花甲，头发似已稍白，面庞清俊而红润，与人接触，总是笑声朗朗，亲和感人，显得非常有活力。令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讲话时极富感情，语调抑扬顿挫、高亢激越，恰似那极具穿透力的川江号子。作为大会的主要召集人，萧先生忙前忙后，调度一切，为会议的顺利进行付出了极大辛劳。正像他在闭幕词中所说的，这次会是在“朋来无咎”的愉悦气氛中开始的，东湖七日，如切如磋，又在“同人于野”“笑言哑哑”的欢快心情中挥别。这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易》学研究的第一次盛会，对推动《易》学的发展，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研究的繁荣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全国性的《周易》研究会筹备组织也是在这次会议期间酝酿组建的，为20多年来的“易学热”之持续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5年春，余随汤一介先生南下粤地，供职于新建的深圳大学。不久，汤师联络各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齐聚深大，召开“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协调会议”，当时可谓群贤毕至，极一时之盛。北京有汤一介、庞朴、乐黛云、刘梦溪等，上海有王元化、庄锡昌、朱维铮等，还有武汉的萧萐父，杭州的沈善洪，西安的陈俊民，广州的张磊、袁伟时等，以及来自美国的魏斐德（Wakeman）和杜维明。这批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学者，齐集一处，开怀畅叙，筹划评点，为推动中国文化研究之大好局面的早日到来而谋求大计。作为与会的重要人物，萧先生作了“文化哲学启蒙以及改革开放反思”的主旨发言，并应邀为深大师生作了一场有关“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开放和文化交流之关系”的演讲。记得当时在深大中文系执教、后来任深圳图书馆馆长的刘楚才先生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内中有对这次演讲现场情景真实而生动的描写，总之是气氛热烈、人头涌动，异常的火爆。那时，萧先生刚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一文，力倡中国的“哲学启蒙”和“文艺复兴”说，又在构思《对外开放的历史反思》一文，主张我国新文化建设中的否定性批判功能和现代化思考中的“补课”意义，所



谓“新的突破旧的，死的拖住活的”，这样一种千回百折、艰难困苦而又步履蹒跚的困局，需要理性的觉醒和哲学的批判。以萧先生为代表的理性启蒙之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大讨论中，被视为诸多主张之中的重要一派。

在那年的年底，萧、汤两位先生又联手发起组织，以武大和北大的名义在湖北黄冈召开了纪念熊十力先生 100 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冉云华、成中英、杜维明、姜允明、坂元弘子等海外的学者远道而来，北京、上海也来了不少人，有些是熊先生的学生或亲炙其门的，虽年事已高，也不辞辛劳地千里迢迢赶来。当时的交通极为不便，加上天寒地冻，出行很不容易。记得我先从广州乘火车到武汉，因为去黄冈的时间已晚，只好在汉口火车站附近的旅馆里耽搁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赶往会议地点，却又在渡口滞留了几个小时，下午才到达，开幕式早已经过了。听说有人赶到汉口机场，因为大雾，又不得不折返。所以，那些老先生能莅会，实属不易。开会前，在萧、汤二位先生的指导和亲自参与下，我和郭齐勇等将悉数收集到的熊十力先生的书信、遗稿等作了初步的整理。由我负责的那一部分，经过辨识与分类之后，编辑成一册《十力书简》，油印了百余份交给大会分发给各位代表，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在会间或游览黄州赤壁、参观熊十力墓和十力学校时，我不时地向萧先生请教，交流甚多，这对于我理解熊十力哲学的一些关键问题帮助很大。后来，先生还叮嘱了一些研究时需要注意的事项，并且将撰写会议综述的任务交给了我。会议中，记得有书画展览，萧先生对一幅描绘熊十力的人物画颇为赞赏，于是我请坂元帮我和先生在画像前留了影。这次会议，对推动中国现代哲学的研究起了很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开了深入探讨现代新儒家人物的先河，是 20 余年来国内新儒学研究的一块里程碑。

1988 年岁尾，由霍韬晦先生发起，在香港举办了“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来自海峡两岸（包括香港、澳门）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首次有机会以较大的规模聚首一处，共同参与同一个主题的学术讨论会。会议主办单位法住学会邀请了十几位大陆学者，由萧蓬父、方克立、李锦全等先生领衔，台湾方面来了牟宗三先生，以及《鹅



湖》系的一干学者，杜维明、墨子刻(T. Metzger)等海外学者也参加了。会议组织得非常细致和周到，分组讨论，设有主持人和评论人，有提问与回应环节，程序和时间都是严格按照事先约定的来进行，这些“程式”，现在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但在当时却颇感新鲜。萧先生作为四川人，对乡贤唐君毅先生夙怀敬仰之情，他在提交会议的论文《唐君毅先生之哲学史观及其对船山哲学之阐释》中，称唐君毅“德慧双修”“教泽广远”，是自成一家之言的“一代哲人”。这些评价，在当时还是不多见的。萧先生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在会议期间到尖沙咀一带看圣诞节灯饰，一路上谈笑风生，欢语不断，至今想来，还似就在眼前。会议结束之后，萧先生偕齐勇兄由港返汉，途中曾在深圳小住，我将他们安排在学校粤海门客舍，亦邀请来家中做客。当时，小儿方3岁，先生喜之，抱于膝上，以一玩具偶人逗之。小儿曰：“鬼。”先生说：“哪来的鬼！”意思是哪里有什么鬼。一时满堂人哈哈大笑。

1990年12月初，中国文化书院等单位在北京发起召开“冯友兰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不料会前数日，冯先生竟遽归道山了。后来，会议还是确定如期举行，收到通知后，我匆忙乘火车赶到北京。会议安排在较为偏僻的万年青宾馆(属中央团校)，不易找到，又因为火车晚点，七拐八弯的，等辗转找到驻地时，夜已经很深了，快12:00了。服务台给了一个房号，说是已有人入住，打开门一看，竟是萧先生，他已经睡着了。我赶忙退出，一边嗔怪服务员，一边要求另行安排，觉得不该去打扰老先生。但找来找去，竟然没有其他空床位了，不得已，只好又打开了门。这时，萧先生醒了，我连忙道歉，并说明情况，先生没有丝毫的不悦，看我窘迫的样子，反而连忙安慰我，一个劲地说没关系，并问我路上的情况，又问饿不饿，还要找东西给我吃。我再三道谢并劝止，他才没有起来，不然我会更愧疚。

与萧先生同住的几天，睡前总要唠唠家常，但谈论最多的还是现代学术和老辈学人这方面的话题，一说起来，两人常常是兴奋不已。先生的绘声绘色，固然引人入胜，我的穷追不舍，也使打开的话匣子关不住，就这样，联床夜话，不知东方既白。使我深受感动



的是，萧先生不但对我的学业状况很是关注，而且对我的粗浅研究也颇为了解。有一次谈到熊十力哲学的定位和时代特征时，先生随口举了我一篇文章中的几句话，虽然是大意转述，但也让我吃惊不小。想来是一年多前，与友人所编《东西方文化评论》登载的《熊十力与中国现代哲学》一文，当时曾将这本书托人转呈先生，想不到他不仅读了，而且看得还很仔细。每每想到先生对后学的那份用心和关怀，心里总是暖暖的，这也成为日后自己带学生的一种鞭策和激励。

后来的十多年中，不论在外地开会，还是相聚于珞珈山，见到萧先生时，总是那么亲切，话虽不一定多，但时时能感觉到他的关切，尤其是对年轻人的那份爱护和期待，殷殷之情，溢于言表。这些年我常去武汉，1995年的徐复观会、1999年的郭店竹简会、2001年的熊十力会、2002年的傅伟勋会、2005年的当代新儒学会、2007年的国际中国哲学会，均是由武汉大学来做东的，照我看来，萧先生始终是那里的主心骨和总舵手，不论他参与多少，只要往台上一坐，你就能感觉到那份力量。而且，萧先生每每都有出彩的表现，他的激情澎湃、诗哲才华和铿锵有力的语调，往往能感染所有在场的人，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只是近些年来，萧先生明显地衰老了，最后的两次会，已经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当时，只好匆匆地见面问候，不忍心再叨扰，只有默默地祝福。

今年元旦，意外惊喜地收到了萧先生托人带来的《萧氏文心》四卷，这是先生的精心之作，也是赠予我的最好礼物。几天之后，我与大华兄特地到武汉去拜会各位师友。在一个冬日的早上，齐勇兄陪着我们一起去看望萧先生，那天的天气虽然寒冷，但格外晴朗，阳光洒满整个客厅，茶几上摆着一盆盛开的蝴蝶兰，先生的精神也相当好，说了许多话，还与我们一起合影留念。在我送给萧先生的礼物当中，有一只工艺仿古的青铜鼎，先生笑谓：“一言九鼎。”数月之后，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言犹在耳，但斯人已去，呜呼痛哉！

记得有一年在中山大学开会，萧先生与李锦全先生有酬唱之雅，他不无遗憾地对我说：现在你们年轻人已经离这个越来越远



了。当时先生是带着一丝惆怅说这番话的，而此时我也只能仍怀着深深的愧疚无言以对。很想赋诗一首，寄托哀思，但面对萧先生那伟大诗哲的灵魂，不可贸然，只好写下这片段回忆，来表达我的缅怀之情。

（作者工作单位：深圳大学人文学院）



忆李达同志与解放后武大哲学系的重建

刘纲纪

李达同志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名哲学家，同时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尊敬的革命前辈。他是解放后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重建者、创办者，今天我系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同他当年对哲学系无微不至的关怀分不开。

我在解放前就曾看到过李达同志所著《货币学概论》一书。但由于我当时对经济学方面的问题没有兴趣，所以也就没有去仔细阅读它（其实，这本书的意义决不限于经济学，它是通过经济学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195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之后，我才知道李达同志不仅研究经济学，而且是一位很早就系统研究与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名哲学家。大约在1955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专家都主动提出带研究生。1956年我毕业的时候，系里负责分配工作的同志通知我，组织上决定分配我到武汉大学给李达同志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生。我表示服从组织安排，同时也为能做李达同志的研究生而感到荣幸。但我长期以来的兴趣集中在美学与艺术的研究上，让我离开北大的邓以蛰、宗白华、马采诸位亲爱的老师以及留在北京的同班同学前往外地，在情绪上我是有某种失落感的。离京前，一向体弱多病极少出门的邓以蛰先生约我一起游颐和园，并在石坊旁的餐馆里请我吃饭。师生的依依惜别之情至今仍历历在目。虽极不舍，但服从组织分配是第一位的事，邓先生也鼓励我好好地在武大学习与工作。不久后，记得是在一个晚上，我告别母校，乘坐一辆



三轮车前往火车站。当车子经过天安门时，我回首久久凝望，一向讨厌感伤与哭泣的我，眼泪几乎夺眶而出。这种突发的情感绝不仅仅是出于个人得失的考虑，它深含着一个青年对伟大祖国的爱。这种情感支撑着我奔向武大，并在这儿工作了几十年。除此之外，李达同志对我的关心，他的道德情操对我的感染，以及武大的良好环境，也是我始终在这儿尽心尽力地工作的重要原因。

来武大之前，我对武大可以说一无所知。一到武大，校园的自然环境给我留下了出乎意外的良好印象，我确认了她是一个重要的学府。但一心想要从事美学研究的想法仍然困扰着我，于是我坦率地向当时负责哲学系工作的同志讲了自己的想法，讲后又深恐这是对李达同志的冒犯。过了不久，那位负责同志告诉我，李达同志同意我的想法，并说将来哲学系也要开美学课，让我再回北大进修美学。听到这个决定，最初的感觉是惊讶，接着是无比的感激与喜悦。李达同志在百忙中能体察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的兴趣与心愿，并助成他去实现，让我始终难以忘怀。不仅如此，在我回北大进修前，他还让当时担任他秘书的陶德麟同志为我写好了给北大江隆基校长及著名美学家蔡仪同志的介绍信。这样细心地关怀和培养青年的精神是多么的可贵！于是，我在武大只待了20多天后又重新回到了北大。我去拜访江隆基校长时，他很亲切地笑着对我说：“好呀！李达同志给你写了介绍信，你又回来了，好好在这里再学几年。”

我在北大进修时，萧蓬父、朱传启等同志也正在北大学习研究，并且也都答应李达同志的邀约决定来武大执教。李达同志每进京开会，只要时间允许，总要接见在北大学习、进修的同志。记得有一年他在天桥饭店接见了我们，十分亲切地与我们交谈，鼓励大家好好学习，叮嘱我们要注重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也是他始终不断强调的办好武大哲学系的根本指导思想，对哲学系的健全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次会见中，我刚好坐在他的旁边，趁机大胆地向他请教怎样学好美学。他说：“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外，要注意研究心理学，还有中国历代的文艺理论，比如说《文心雕龙》，也要好好研究。”虽然是简短的几句话，却给我



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我也认识到他作为一位著名的学者和哲学家，是很了解各门学科的不同特点的。

1958年，哲学系师生下放到红安七里坪劳动。李达同志来此视察工作及看望全体师生。一天，在七里坪镇上开会，当时七里坪的负责同志向大家讲他们实现共产主义的计划，还列出了一些具体指标：如每户有三床被子，两个衣橱等，说这样就达到共产主义了。我觉得这和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并不一致。当时李达同志也在场，我不禁把目光投向了。他虽然也在听，但直至会议结束，始终一言未发。三年困难时期，记得有一次我和其他同志一起到他的住所去看望他，他以所了解的山东的情况为例，十分激动地批评了浮夸风所造成的危害。这些片断印象，使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李达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精神和理论勇气。他不愧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自“五四”前后以来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理论贡献是我们应当永远学习与纪念的。

李达同志在解放后重新创办武大哲学系，为哲学系树立了良好的风气与传统。现在看来，这种我认为应当继续发扬光大的风气与传统，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多年来，武大哲学系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哲学思想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哲学界居于领先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其他哲学学科也都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各有创获，形成了我曾称为“打通中、西、马”的理论格局。与此相联，武大哲学系学科门类齐全，各学科均有著名学者做学术带头人，各学科之间不是“隔行如隔山”似地互不往来，而是相互沟通，因此又形成了各学科之间优势互补的良好格局。

第二，武大哲学系既努力坚持严谨求实的学风，高度重视对原典、原著的解读，又有一种进行理论建构的气魄与雄心壮志。多年来，武大哲学系的理论思维是活跃的、富于探索性的，不保守、不僵化，不把某个学术权威奉为神明、偶像，不忽视对西方现当代思潮的了解研究。我认为这是武大哲学系能在科研上不断推出新成果的重要原因。



第三，武大哲学系老一辈的学者一贯高度重视对青年学者的培养、提携，不遗余力地为他们创造条件，使有抱负、有才华的青年学者能够及早脱颖而出。因此，武大哲学系的发展没有出现后继无人的现象。相反，经过多年的努力，造就了一批在哲学界很有知名度的中青年学者。他们的发展潜力甚大，前途未可限量。

第四，武大哲学系在她所经历的沧桑岁月中，虽然在内部也曾产生过一些摩擦、矛盾，但又有一种顾全大局、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的思想信念，因而使哲学系保持了一种相互尊重、团结合作的工作作风。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愿武大哲学系努力发扬光大李达同志奠定的优秀传统，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把武大哲学系办成国内外一流的哲学系。

（注：此文原以《忆李达同志》为题发表于1996年出版的《珞珈哲学论坛》。此次刊印，作者作了补充修订。）

（作者工作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八桂珞珈五老校友*

李烈荣

我熟悉的众多广西校友中，有五位年龄已过八旬的老学长，他们在 20 世纪 50 年代都就读于母校武汉大学，在本职工作岗位上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对母校和校友们都怀有深厚的感情，并且都曾担任过广西校友会会长或副会长。我尊称这五位德高望重的老学长蔡建章、邓生才、袁志强、韦其麟、卢斯飞为广西校友群的“五老校友”。

一、用文史哲知识为壮乡培养人才的蔡建章学长

蔡建章学长(1932—)1955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蔡建章学长和武汉大学有一种特别的情缘。1951 年，他考入湖南大学中文系；1952 年，我国进行高等学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中南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委员会于 1953 年 7 月决定，将湖南大学与南昌大学的中文系同武汉大学的合并；同年 9 月，湖南大学中文系近 30 名同学来到武汉大学中文系学习。蔡建章学长从此成为了武大校友。恰逢原来担任湖南大学校长的李达先生在 1952 年 11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 19 次会议上被批准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因此蔡建章学长说他和湖大的同学们是追随着李达校长，从长沙岳麓山来到武昌珞珈山求学的。多年以后，蔡学长回忆在武大母校学习的两年里最大的收获有三点：一是较为系统和全面地学习了文学的基础

* 广西简称桂，又叫八桂。八桂珞珈即广西武大校友群体。



理论和知识；二是亲身感受了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教书育人的精神；三是在参加1954年武汉市防汛斗争中经受了锻炼，提高了自己对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全面认识。1955年，当蔡学长正要从武大毕业时，恰逢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马列研究班为培养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在武大挑选保送生，蔡学长获得保送读研资格。孟宪鸿老师知道蔡学长获得保送读研并有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想法后，对他进行了热情鼓励与指导。

1957年7月，蔡学长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班哲学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了广西，先后在广西自治区委宣传部讲师团和广西医科大学工作，开始了他50多年里用所学文史哲知识为党和人民服务、为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的人生历程。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蔡学长担任过本科生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科学思维方法等课程及研究生自然辩证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课程的教学。在科研中，蔡学长曾主编《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医学职业道德》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书，公开发表论文50多篇。其中《医学伦理学》作为“广西高校精品教材建设立项项目”，对高等医科院校开展医德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对医学伦理学的教育研究和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蔡学长在行政和党务工作中，曾长期担任学校马列教研室和社科部主任。1990年代曾担任广西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纪检书记。2010年，广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为蔡学长出版《蔡建章集·广西社会科学专家文集》，广西只有约100位社会科学界优秀专家获得这一殊荣。

蔡学长受教于武大，感恩母校，对母校一往情深。他说，在湖南大学学习的前两年，虽然也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汉语知识”“英语”“写作基础”“文艺学引论”等基础知识，但到武大后更进一步较为系统全面地学习了文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使自己初步掌握了一个综合性大学中文系学生需要掌握的有关理论和知识，从而更加热爱自己所学的专业，并立志为自己酷爱的文学事业奋斗终生。蔡学长说，1950年代初期，武大中文系师资有“五老”“八中”等国内知名大师、教授。母校老师们的严谨治学态度和教书育人精神，永远是我们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蔡学长热爱母校，积极参加校友会活动。他在1982—2003年担任过武汉大学广西校友会理事、副会长。母校1983年、1993年、2003年、2013年分别举行庆祝建校90、100、110、120周年活动时，他都积极返回母校参加庆祝活动。蔡学长曾写过《重回母校武汉大学》：

一别珞珈五十年，多回好梦东湖边。当年防汛声犹在，百万市民夜不眠。珞珈今日换新天，皓首登临忆旧年。昔日春风仍育我，叫人能不敬前贤。

2013年11月29日，蔡学长又为庆祝母校建校120周年写下《武大母校一百二十周年华诞》，抒发了他对母校的感恩情怀：

武大喜庆日，重返珞珈山。樱花迎远客，桑榆何璀璨。校园处处新，学友大会亲。全会指方向，再圆武大梦。

二、政务之余在广西诗书文坛 享有盛誉的邓生才学长

邓生才学长(1931—)作为调干生，195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后留校工作，曾先后担任《武汉大学学报》编辑及科长、中文系党总支第一副书记、系副主任。邓学长才思敏捷，在留校工作时就被人称为“秀才”。1970年，邓学长调回家乡广西，曾先后担任玉林地区文化局局长、文联主席，广西教育局办公室副主任，中共广西区党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干部处处长，广西广播电视厅副厅长、厅长、党组书记，广西电视台台长。1992年，邓学长退居二线，担任广西第七届政协常务委员兼妇青委主任，还兼任全国及广西新闻、电视艺术、文化交流、书法教育、盆景根雕石雕等群众学术团体的10余个领导职务。

邓学长政务之余，兼攻文翰，是广西有名的作家、诗人和书法



家，以诗、书、文三绝熠耀于书坛、诗坛及文坛。先后获得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华诗词学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资格。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邓学长就在《人民日报》《广西日报》上发表散文及通讯文章。改革开放后，邓学长在全国及省级报刊发表的作品有数百篇（首）之多。邓生才除了出版《邓生才诗集》，还著有文学作品《死囚的新生》，后被改编成 8 集电视连续剧剧本《死囚》，正式上映后，获 1988 年广西政府振兴广西文学创作铜鼓奖。他还策划组织摄制大型艺术文献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在广西》《桂林文化城》等。

邓学长自幼习字，平生喜欢用一般人较难掌握的鸡毫笔书写。他的书法自成一体，清逸俊秀，洒脱自然，尤其他的行书和狂草，追求气势磅礴、痛快淋漓的画面效果，深受人们喜爱。邓学长的书法作品，曾数次在日本展出，两次获一等奖。1993 年 2 月，邓学长在首都民族文化宫大厅成功举办了大型书法个展，博得不少书画名人及观众的好评。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原院长、著名书画大师张仃看了邓学长的书法之后，亲笔题赠“蓄怒拂郁，放逸生奇”，给予了极高评价。《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专访文章，中央电视台等十余个新闻单位进行了新闻报道。1990 年代，邓学长将他多年来访购珍藏的数十面汉代铜镜捐献母校。他说这是为母校筹备建设中的博物馆做的一点贡献。据我所知，邓学长曾把他的书法作品献给母校。

邓学长和我们见面时，常常回忆起在母校学习与工作的情景，饱含深情。他学习制作古、近体诗时，曾得到母校中文系胡国瑞、沈祖棻、李格非、周大璞等恩师及数学系李国平教授的点化、指教，师生情谊终生难忘。

邓学长是武汉大学广西校友会活动的首倡者和组织者，曾担任广西校友会首任会长。1982 年，邓学长和莫尔高等一批老学长在南宁发起倡议，正式组织成立了武汉大学广西校友会。在邓生才会长的带领下，在母校成立 90、100、110、120 周年之际，广西校友会都在南宁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并派出校友代表返校参加母校校庆活动。广西校友会活动一直开展得丰富多彩、形式多样，



离不开邓学长和其他老校友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

三、为广西水利事业倾情奉献的袁志强学长

袁志强学长(1933—)1955年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建系。袁学长从母校毕业后回到广西,长期在广西水利系统工作,是一位资深专家,教授级工程师,为广西水利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可以说,袁学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西水利事业发展的见证人。1956年10月,袁学长出席水利部在北京大兴县召开的全国机电排灌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袁学长参加编写广西第一部小型水利工程定型设计文件,提供水利业务部门使用。袁学长1950年代中期参加了在广西桂西北的靖西县、东兰县、巴马县、天峨县的小水电站试点工程建设,这些小水电站试点工程建成后,对推动广西小水电站建设起到了示范作用。1960年至1990年代他还参加了柳州、来宾电灌片工程建设,为广西建设了一批大、中型电力提水灌溉工程;参加了金光农场等一批国有农场甘蔗、水果、茶叶喷灌工程的建设。他和同事们开创了广西节水灌溉先河,是广西节水灌溉创始人之一。1960年代,袁学长受国家派遣到了越南,负责援助该国高平、谅山省小水电、提水灌溉工程建设。1980、1990年代,袁学长主持编写的《广西桂中治旱工程水利规划报告》分别获得广西水利厅科技进步二等奖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袁学长主持编写的《广西喷灌区划》《广西国营机电泵站更新改造规划》也获得广西水利厅科技进步三等奖。袁学长从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几十年,兢兢业业,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一步步成长为水利专家,被评为全国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先进工作者。从1980年代国家恢复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制度后,袁学长得到连续晋升,由工程师、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直到晋升为教授级工程师。袁学长退而不休,曾担任广西老科技工作者协会水利分会秘书长、副会长,组织广西水利厅离退休技术干部发挥余热,为广西水利事业再做贡献,由此被评为广西老科协优秀工作者。在他的积极参与带领下,由广西老科协水利分会组织有关水利专家和基层技术人员100多人深入基层



调查研究，编写成《广西中小灌区挖潜配套调查研究报告》，供水利业务部门参考使用，受到欢迎。

袁学长热爱母校，关心校友，以自己是一名武汉大学校友为荣。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12 所全国重点高等院校在南宁成立“全国高等院校广西校友联谊会”，武汉大学广西校友会和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广西校友会都名列其中。20 年前，在一次全国高等院校广西校友联谊会上，我认识了代表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广西校友会参加活动的袁学长。袁学长知道我是武汉大学的校友后，激动地说：“我也是武大校友啊！”原来袁学长入校就读时，正遇上我国高等院校系统改造，院系调整将水利系从武大分出，与河南大学等高校相关系科合并成立武汉水利学院，袁学长由此成为武水校友。直到 2000 年，原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而成立新武汉大学，袁学长终于恢复成为了武大校友。袁学长非常热心校友工作。1970—2004 年，袁学长相继担任武水广西校友会秘书长、副会长、会长。2004 年，袁学长积极参与新武汉大学广西校友会的组建工作，并担任常务副会长。此后，他每年都要和理事会的校友们认真探讨开展广西校友活动的方案、内容，为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友活动出谋献策。正是有了像袁志强老学长这样许许多多热爱母校、热心校友会工作的校友，广西校友会的工作才能不断取得新成绩。

四、一辈子都在勤勉创作的韦其麟学长

韦其麟学长(1935—)1957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说起韦学长，人们最先想到的一定是他刚刚 20 岁、正在读大学二年级时创作并享誉国内外的，根据壮族民间故事再创作的长诗《百鸟衣》。由于时代的原因，尽管韦学长发表的《百鸟衣》等优秀作品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誉，但因“反右”风暴来临，他在当时以及后来的日子里经受了許多磨难。从母校毕业后，韦学长分配回广西，先是到了广西民族学校，接着又把他下放到广西贵县(今贵港市港北区)平天山林场劳动，育苗挖坑，植树造林。后来，韦学长被调到广西



文联工作，但很快又被下放到农村，和生产队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还在柳州“五七干校”养过马，到防城县马路公社当过干部，参加过广西桂北枝柳铁路“三线建设”，到广西药用植物园种过树木花草。在这20多年时间里，韦学长所干的事与文学创作大多不沾边，但他心中的文学创作种子却一直在孕育，盼望着发芽。改革开放后，韦学长才调回恢复后的广西文联工作，之后到广西师范学院教书，复又调回广西文联，终于能够比较专心地进行自己的文学创作。

韦学长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玫瑰花的故事》（1953年发表的叙事诗，曾被翻译成英文和日文）、《百鸟衣》（1955年发表在《长江文艺》上，是韦学长的代表作，建国10周年全国优秀文学作品之一，1956年、1959年两次出版单行本，并被翻译成英、俄等文字）、《凤凰歌》（1964年发表在《长江文艺》上，1979年出版单行本，1981年获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等奖）、《寻找太阳的母亲》（1985年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奖）、《童心集》（1989年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奖）、《壮族民间文学概观》（1990年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首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优秀著作奖）、《依然梦在人间》（2008年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短文集）等。《百鸟衣》写得非常好，人们把它与广西壮族民间故事《刘三姐》并称为广西壮族文学史上的两座丰碑。韦学长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中，始终坚持自己认定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道路，文笔优美，感情真挚，文浅义深，富有哲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他始终热情地拥抱生活、关注现实，始终坚信文学具有滋养心灵、启迪心智、道德教化的功能，这是他笔耕几十年而不知疲倦的原动力之所在。

韦学长以他的勤勉、才华、人品、作品，赢得人们的敬爱。1980年代，韦学长被评为副教授、教授，担任广西师范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所长；之后还担任自治区社科联副主席，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主席、党组副书记、书记，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中国作协第五届、第六届副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等社会职务。韦学长对母校有感恩之情，热心校友活动，深受校友们爱戴。从1980年



代起，韦学长连年被广西校友选为武汉大学广西校友会理事会理事和荣誉会长。

五、孜孜不倦教书育人的卢斯飞学长

卢斯飞学长(1936—)195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卢学长在母校读书期间，曾任班长、校报《新武大》副总编辑，毕业后留校工作，在学校多种经营办公室工作数年。1963年，卢学长响应国家支边号召，到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中学、内蒙古师范学院、乌盟师专等院校任教19年。1981年，卢学长被爱才心切的南宁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学院)袁似瑶院长作为人才引进到广西。

卢学长的大半辈子都行走在教书育人的路上。在内蒙古乌兰察布草原工作19年，卢学长克服语言不通、气候严寒和生活习惯上的诸多困难，以他的激情、诚挚和敬业精神得到了农牧民子弟的喜爱。教学工作以外，卢学长深入进行理论研究。1978年，他写的《驳唐晓文“名家是法家的同盟军”的谬论——兼评惠施公孙龙的主观唯心主义和诡辩术》一文，得到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同志的推荐，发表于1978年1月31日《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上，受到学界好评。30多年来，卢学长为大学中文系本科生、研究生和外国留学生开设了中国文化概论、现代文学思潮、现代散文研究、港台文学研究、鲁迅研究、新诗研究十几门课程。卢学长开课或讲学，都十分注重掌握前沿知识，搜集资料，严格推敲，反复提炼。在课堂上不照本宣科，而是把有关内容经过筛选、消化和重新组织，融合自己的观点和体会，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在教学中，卢学长注意理清脉络，突出重点，提供信息，引导思考，体现他“广、新、深、活”的特色和风格，收到了很好的“激活”和“聚焦”效果。他在本科开设的选修课，通常有一两百人听讲，气氛热烈。他的教学心得体会，曾在全院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工作大会上作为重点发言。他曾为广西特级教师高级研讨班和区内外高校作过《治学方法纵横谈》等报告，受到欢迎。卢学长还曾应邀赴越南高校讲学，赴新加坡等地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赴台湾出席“海峡两岸



华文文学研讨会”，为中外和两岸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

卢学长善于从教学中发现科研论题，拓宽科研领域。他对自己有四个定位：一是从教学中发现问题，尽可能理清一些诗人作家和文艺思潮的关系；二是开设新课，探讨一些台港和海外华人的创作；三是从个人兴趣爱好出发，涉猎有关幽默文化和现代杂文的问题；四是作为客家人，思考一些与客家历史文化相关的问题。1981年以来，卢学长出版专著（含两人合著）23部，参加编写教材和工具书6部。其中《闻一多作品欣赏》和《孙犁作品欣赏》获全国首届优秀教育图书评比一等奖和中南五省优秀读物一等奖；《中国幽默文学史话》获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广西高校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洛夫诗歌欣赏》《余光中诗歌欣赏》《大学生与人际关系》分别获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北京杂文奖一等奖、广西师范学院优秀教学成果奖等多个奖项。卢学长长期从事客家学研究，主编有《客家历史文化纵横谈》；还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诗刊》《北京社会科学》、香港《大公报》、台湾《客家》杂志、美国《洛城文艺》及全国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论文、评论200余篇，杂文100余篇。其中收入各种文集的有30种，有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卢学长于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并当选为中国闻一多研究会理事和广西语言文学学会顾问；1992年获国务院“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以来先后荣获广西先进工作者、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奖、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模范教师等荣誉称号和表彰。1990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曾发表专访《乐为天下育英才》，全面介绍卢学长事迹。

2015年9月19日，广西师范学院为卢斯飞学长举办“文学教育的传承与创新”学术思想研讨会。研讨会上，学生、同事、嘉宾们都赞许卢学长学问扎实，态度严谨，是极具情趣和幽默感的可敬又可爱的教授。卢学长回顾自己与学校的“结缘”，感谢学校提供给了他施展教学人生的平台，让他感受到至诚的“尊严”。他说，作为教师，“其乐多矣”！一乐新苗茁壮，脱颖而出薪火相传，生生不已；二乐可常“充电”，更新知识，追求新知；三乐与学生相互切磋，教学相长；四乐与年轻人在一起变得更加充实；五乐师生



互动，激发灵思，心理沟通，频生笑意。

卢学长关心母校，关心校友工作，是广西校友会第一批会员，从 1980 年代起就担任武汉大学广西校友会理事、副会长。

老学长们是我们的前辈。他们心怀母校，热爱母校。他们在那个时代里，尽管也曾遭到过不公正的对待，但都能够不计个人荣辱，不向困难低头，彰显母校精神，体现个人人生价值，为国家、为人民努力工作奉献。我们每一位年轻校友都应当向他们学习。

（作者系历史系 1978 级校友）



珞珈山下岁月留声

柳 叶

前日接到江柏安老师来信，邀约为武汉大学校园文化写点感想的文章。时值清明的雨季，追远之思还在朋友圈中蔓延，此时提起校园一词，未免感触岁月匆匆、流年易逝。于是翻出一个纸盒子，那里收藏着我过去十几年间看过的音乐会节目单，其中大多数都是在武汉大学上演的。节目单一张张翻过，那时的声音和画面不时地从字里行间闪现，仿佛一张张老唱片，凝固了一段音乐，一段时光。

大约是在2002年一个秋天的傍晚，我顺着一张校园音乐会海报的指引来到5号教学楼报告厅，听了在校期间的第一场音乐会，后来知道这是“周末艺苑”，每两周举办一次。在此后的几年里，我便成了那里的常客。每逢周末我都会关注节目信息，提前半小时入场，还在音乐会之后查询感兴趣的乐曲的资料。其时参加演出的都是在校学生，是一起生活在珞珈山下的同学，因此倍感亲切。记得2007年“周末艺苑”第100期举办了一场纪念音乐会，有些曾经在那个舞台上演出过的毕业生又回到了这里。不知怎地，至今我还记得那次音乐会的标题——我和音乐有个约会。到如今，有时周六的晚上我还会想起，“周末艺苑”或许还在如约上演罢。

音乐会听得多了，也就记住了一些参与演出的学生的名字，D君是其中一个。或许是因为在一架破旧的钢琴上帮我订正过钢琴曲的指法，或许是因为从他那里记住了斯克里亚宾这个古怪名字，总之我记住了他的名字。2007年临近放暑假的时候，D君在鲲鹏广场演奏了840遍萨蒂的钢琴曲《烦恼》。我还记得那天支起的帐篷、



铺开的凉席和翻动着的计数牌。

樱顶的大学生俱乐部我只去过两次，其中一次便是去看人文爱乐合唱团的演出。时间已模糊了，大约是 2006 年某一天的午后。也许是因为周恩来曾在那里发表过抗日救亡的演讲，也许是因为斗状的屋顶和长条的椅子，那次演出竟蒙上了一层浓郁的民国色彩。结束时合唱 1919 年的《武昌高师校歌》，一种历史的、人文的、自由的、自信的情怀瞬间被激发起来。后来每逢毕业季，常常会看到一些身着民国学生装的同学在校园里拍照留念，又会想起那天听过的老校歌。

梅园小操场和大学生活动中心有时会举办大型晚会，比如迎新文艺晚会和金秋艺术节的合唱与舞蹈等。大型演出往往需要凭票入场，我看过的并不多。印象最深的却是观看一次彩排。那是一个初秋的傍晚，我骑着自行车从实验室回枫园宿舍，经过梅园小操场附近时被传来的声响吸引了过去。这是一次文艺汇演前一晚的彩排，却也引来了不少观众，有的在台下围着站着，有的在远处的台阶上三三两两地坐着。我在小操场中央停好自行车，靠在后座上观看起排练来。晚风徐来，皎月初上，那一刻便定格在记忆中，至今又是八九年了。

新年交响音乐会或许是每年最隆重的音乐会了，于是就少不了有一番讲究。音乐会上演的前两天会有一场讲座来介绍音乐会的曲目，还有鼓掌的纪律，返场的礼仪，甚至细节到穿什么衣服穿什么鞋。音乐会的门票也在这个时候派发，一人可以领取两三张票，隔天就约上同学一起听交响乐去了。记得第一次举办的新年音乐会是在 2006 年元旦前夜，那也是我听过的第一场交响音乐会，后来又连续听了两届，再后来就中断了，连同其他音乐活动也去得少了，大概是因为做实验更繁忙了吧。

2013 年 9 月，我离开学校去另一个城市工作，出发前夕在江柏安老师的提议和支持下，我与老友武金龙同学举办了一场古琴与箫的音乐会，这也是我唯一一次以演出者身份参加的音乐会。珞珈山下的音乐会我听了 10 年，而这最末的一次，于我而言，是向过往演出者的致敬，是与一段岁月的告别。



最近几年工作之余，我在苏州、武汉等地的音乐厅观看过不少音乐演出，尽管演奏水平更为专业，到底不复校园音乐会的感觉。有时在这样的下雨天里，我又会想起，在最美的校园，最美的时光里，在珞珈山下邂逅的那一场场音乐会。

（作者系生物学基地班 2001 级校友）



珞珈故居

鲁孝年

早上拉开窗帘，外面下雨了，各式各样的建筑在雾气蒙蒙中若隐若现。离开武汉 20 多年了，对这样湿冷的天，已然不太适应。犹豫片刻，还是决定依约前往武大。这样的天正适合怀旧，不是吗？于是在微信里给同学留言：我要去看我的故居。

所谓“故居”，便是我整个孕期直到女儿 2 岁一直居住的小楼——珞珈山十八栋中的 27 号别墅。

这是一栋真正的半山别墅，标准的英式田园风格，由两个哥特式风格的拱形门栋分隔成两个单元，红瓦青砖，掩映在高大的树丛中。

如果看到挂着“周恩来故居”的牌子，目的地就到了。没错，这里正是当年周恩来和邓颖超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事实上，周恩来夫妇只在这里住了 4 个月，而我却实实在在地住了 3 年。

我正住在周恩来当年住的这个门栋的 3 楼，有一大一小两个房间，自带厨房和卫生间，地板和楼梯都是实木的。楼梯狭窄幽暗，微带旋转上升，但主卧非常明亮，阳台尤其阔大。夏夜里，皎洁温柔的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夜凉如水，静谧安详。我时常在这样的夜晚躺在床上，静听山下隐隐传来的人声和山上虫鸟们的动静。

据说邓颖超在世时，有人建议把这里建成一个纪念馆，被她否定了，但最终这里还是改成了纪念馆。2013 年，修葺一新的 27 号别墅正式对外开放。

今天我很想看看当年我拎着油漆桶亲自涂刷的淡黄色墙壁改成了什么模样，想看看当年的红漆地板是否依然完好。但我到时，门



楼紧闭，我转到屋后，依然没有“开放”的迹象。据网上信息，说里面陈列有“周恩来在武大”“珞珈山十八栋”等专题展。其中“珞珈山十八栋”专题展分为物外桃源、三任校长、十八栋的主人们三部分，展示了1932—1938年珞珈山十八栋的辉煌岁月。

但我住在这里时却是艰难岁月。

我们搬来时，楼下有两家人住，但不久就陆续搬下山去。先生彼时在海南工作，所以一直是我独自带着女儿住在这里。女儿1岁左右的一个周末，师妹赵艳姣带着她2岁的女儿来做客，我小弟因为在武汉上大学，周末也正好过来打牙祭。我刚好新换了一罐煤气，打算好好地给他们做顿饭。当我拧开煤气罐低头打火的瞬间，砰的一团火球从煤气罐口弹出，喷上我的脸面。在那一刹那，我呆住了，本能地抹了把脸。师妹见状惊叫一声，抱着她女儿就往楼梯口跑。我反应过来，也转身一把抱起女儿，两个妈妈连滚带爬抱着自己的孩子跑出屋外。几乎在火团蹿起的瞬间，理工男表现出了他的冷静——我弟弟冲进卧室抱出一床被子，简单淋了一点水，猛地捂到煤气罐上。当学校的消防车赶到时，火早已灭了。我们几个傻傻地站在楼前抬头看着房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事后照镜子，发现自己面前的头发眉毛都被火燎焦了，好在没有毁容。

今天再次站在小楼前，看着“故居”两个字，真有些百感交集。那天如果没有弟弟在，这“故居”只怕已经不存在了。当时那两个昏了头的傻女人，心里只想着孩子，根本就没想过怎么灭火。

那个时候女儿经常生病，有次半夜里发烧，我实在不敢下山去医院，硬是挨到天亮，才抱着孩子飞奔下去。由于房子年久失修，天漏屋漏，于是家里地上桌上总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盆，床上有时还得撑着伞。后来实在支撑不住，鼓起勇气找到维修处。维修处处长人很好，当即给我开了个证明，证明房子需要大修，不适合居住，学校这才在山下给我分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从山上下山有好几条路。正面有一条隐于草丛中的石径，往下即是南三区，买米买菜，接送孩子，大多走这条小路。主要的大道是环绕山间的环山路，当年是石沙和着泥土的路面，如今则是柏油路面了。我怀孕期间上下班，每天就走这条路。之后换煤气或有其



他沉重之物，则用飞鸽二八自行车由此推到山上。

清风轻拂，小雨霏霏。再一次走在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山路上，不禁感叹时光飞逝。过去，永远回不去了。

下山来，经过珞珈山庄，便到了行政大楼旁。樱花已谢，落红满地。一句歌词不断在耳边回响：风袅袅，雨霏霏，故园今又动芳菲。有学生在樱花树下留影、嬉戏，看着他们，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大学时的陈同学就在行政楼后面的校友之家上班。天有些阴冷，我走进校友之家，寻找家的温暖。

人一生会面临许多选择，不同的选择，往往意味着不同的人生。我不知道当时离开武大的选择是否正确，但我们已无法回到原点。好在，我有机会经常回到武大。陈同学说，每天在风景秀丽的地方上班，下班后又可以在风景如画的珞珈山散步，幸福指数爆棚。

真好，愿我们无论在哪里，都有幸福的人生。

（作者系中文系 1983 级校友）



我的导师董辅弼先生

毛振华

2004年7月30日下午3:15，我在登机口接到(陈)东升同学的电话，他低缓的声音告诉我，董老师已于下午3:03去世了。

放下电话，我的双手无力地垂下，泪水也无力地流下。一种无边的懊悔浸泡着我。原本我和东升是计划第二天去美国，由于得知董老师可能已是最后的时刻，我们商量东升今天就走，而我只能先赶回北京，再乘第二天的航班去美国。打电话的时候，东升已经办好登机手续了。

为什么没有在29日就走？接到电话就出发，直接到机场，也





许能赶上最后的航班，大约 20 个小时就能到，这样，我们就能陪董老师最后一程。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8 个多月）就不能去一趟呢？为什么我就这么相信一向健康的老师不会这么快离去？

悲痛和懊悔折磨着我。接下来的两天，我怎么也平静不下来。老师的音容笑貌，不时地在我脑海里闪现。睿智的严师，和蔼的慈父，董老师，我没有送上您最后一程，您永远留下向我们挥手告别的那坚毅、自信的眼神……

我初次见到董老师，大约是 1980 年年底。那时我是武汉大学经济系二年级的学生，在学校四区大阅览室听董老师的学术报告。董老师的报告，讲的是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重点是对国家所有制的分析和批判。在那个年代，第一次听到一个“北京来的大学者”那么明确、系统地冲击当时被认为无比神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我们感到新奇而震惊。但他的讲演，他讲演中的逻辑和论证，他讲演中表达的对国家和民族振兴的热情，教育和感染了我们每一个人。后来，许多在不同场合听过董老师报告的人，都因此奠定了自己的中国经济改革观，我就是其中一个。

这次报告后，我开始研究所有制问题。几个月后，我将我的自认为“很有见地”的作品——一篇约一万字的文章《论公有制本质》，认真抄了一遍，寄给了董老师。但没有收到他的任何反馈。几年之后，我已经和董老师比较熟了，终于鼓起勇气问他当年是否收到过一篇这样的文章。老师说，你大概看了一些马克思著作和分析东欧特别是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理论的文章，文字组织得不错，字写得也不错，但是对公有制本质的认识不是简单地从概念中得到的，在中国，要从历史、国际环境和中国人民奋斗的目标中体现出来，从这个角度研究公有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董老师说，你现在可以继续研究这个题目。董老师的回答令我无比惊讶，他看过我的文章，有印象，还记得。但没有告诉我，为什么没有给我一点回音。也许太



忙，也许是后来我才体会到的：这个题目太凝重，而我太年轻。

我当时在政府的研究部门工作，多是实证性的。董老师的鼓励，使我重拾研究理论的信心。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国内一些关于所有制改革理论方面的论述，找到机会，也向董老师讨教。终于有一天，我表达了师从他进行某个侧面研究的愿望，得到了董老师的支持，他鼓励我向母校报考。完全可以说，是董老师的思想，吸引我在10年机关和公司工作后，下定决心攻读博士学位的。

我的论文进展得很不顺利。董老师否定了我原来拟的两个题目，都是我自认为站得很高的、很理论化的题目。董老师说，你结合一点实践吧，中国最需要的、实际上也是你最擅长的，是改革的原理和实际需求的结合。受此启发，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微观的题目——《资本化企业制度论》，研究中国所有制形态的微观基础——企业制度。

选题不顺，写作也不顺。董老师不赞成我的观点，而我又很坚持己见，矛盾在对国有资本的看法上。我认为把国家看成一个普通的所有者是很重要的，这里面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不能有特权，二是必须和一个普通财务所有者一样，让自己的资本最大限度地保值增值。而董老师则认为，国有资本应退出竞争领域，放弃资本化过程（他理解为圈钱），这样才能实现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最后，还是导师用宽阔的胸怀理解了一个“技术层面意识太强”而执拗的学生。他同意保留我的论述，并为我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他请了其他几位著名学者审阅我的论文，并组织了厉以宁、萧灼基、王梦奎、王积业、伍新木等著名教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我的论文通过答辩后，老师握着我的手说：祝贺你，你的观点大家接受了。眼睛里充满了高兴和慈祥。

受答辩委员会评论的鼓舞，我联系商务印书馆出版我的论文。在审核同意后，我兴奋地请董老师为我作序。老师听完我的话，并没有马上回答，说了一点别的事，就打发我走了。过了几天，我收到董老师司机送来的一封信，信封上认真地写着“毛振华同志收”，我一打开，几张格子稿纸上，董老师隽秀的字体跃然在上。他为他的学生的作品写了序。他十分郑重地重申：“博士生的见解可以与



导师的渐渐不一致，只要论文言之有理，导师不应将自己的见解强加给学生。”他花了很大的篇幅阐述了他与我不一样的观点后说：“当然，这是学术讨论，不仅他可以坚持他的看法，我觉得还应该维护他坚持自己主张的权利。正因为这样，我不仅支持他的论文提交答辩并通过，而且也支持他的论文出版。”这就是我慈父般的严师，一个倔强学者对他与学生的争执所画的句号。

这就是我的老师教给我的学问和为人之道的哲理。写到这里，再看董老师的评语，觉得一个伟大的师魂正在弥漫我的感官神经，仿佛导师那慈祥、睿智而执著的目光，正在淡淡地注视着他的学生。

二

7月19日，是我最后一次与董老师通话，他说他每天上网看中国的消息，说现在的总理很成熟，宏观调控中注意到了保护经济增长，保护民营经济，中国不会出大波折、大问题。

董老师是我国第一个系统研究所有制改革理论的经济学家。他遵循“公平”“效率”两个衡量经济体制优劣和改革的原则，第一次揭示了国家所有制必然要经过改革，逐步过渡到混合所有制。

随着我国实践的发展，他关于所有制的理论，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开始，他提出我国所有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八宝饭”模式，这是第一次把混合所有制作为我国所有制模式提出来，很多人是在很多年以后才提出与他大体相似的主张。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股份制企业的发展和证券市场的发展，是实现混合所有制的主要途径。他一直坚持，发展民营经济是我国所有制改革的关键。正因如此，在晚年的学术活动中，他大量地参与到关于证券市场和民营经济的研究中。

董老师的学术生涯，可以说是光辉而又坎坷的。说他的光辉，是在近25年来，他一直站在引人注目的弄潮儿的位置，并且不断地被实践证明他的观点的科学性、前瞻性；说他坎坷，是由于他坚持独立思考，勇于坚持真理，多次遭到不公正的批评甚至迫害。历



次“左”的思想占上风的时候，他都受到种种非难和限制，甚至支持他观点的人也受到牵连。他对证券市场的爱护和“唱好”，由于许多人不理解他历史性的角度，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责难。作为近10年来比较多地和他在一起的学生，我常常为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与他争议，甚至保留自己的看法，但我理解和尊重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学者，在中国转轨时期所坚持的最重要的判断。

董老师生命的最后10年，是他最忙碌的阶段。眼见他所研究推动的改革不断深入，而传统的体制也在这一进程中经常表现出反复，他经常站在实践前沿，希望以他的努力，推动事物向他理想的方向发展。他常年奔波在国内，包括西藏、新疆、云南、贵州、广西等边远地区，他还要经常出国从事学术活动。他担任了两届全国人大常委和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在年届70后，又出任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积极参与到人大、政协的活动中，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他利用各种场合，发表文章和谈话，支持中国改革的新生事物，研究问题并提出改进的政策措施。

晚年的董老师向人们展示的不只是旧体制的批判者，而且更多地表现出他对于新经济体制建设性的热情和贡献。他反对一些人用所谓普遍的、无可争辩的原则否定发展中的中国改革的一些有待改进的事物。对于证券市场和民营企业，他认为发展才是最大的公平，才能让社会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才能让更多的人最终参与这个过程，获得改造国企的机会。记得有一次，我郑重地找老师商榷他对德隆的产业整合的看法，表达了我对德隆模式的否定以及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德隆不倒，永无公平”的看法。董老师说，中国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才是根本。德隆违法了，就应受到法律和市场的惩处。但他们想做大做强产业，我很佩服，我说的是这个意思。今天德隆出了问题，如何看待和处理，我觉得，董老师的角度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三

董老师是一个忙碌的人，也是一个犀利的人，那是在学术研究



和讨论之中。在我们这些学生看来，晚年的董老师，更像一位慈祥的父亲。他柔和的目光，开朗的笑声，常常会出现在他与学生的交往中。他说最愿意看到他的学生们相互支持和帮助。我们这些学生，不仅在学问上得到指导，在工作和生活中也多得到老师的帮助。在他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他给我们打来为数甚少的电话，多是关心那几位今年毕业的学生的就业和在读学生的实习问题。

曾有节假日我带着孩子去看望董老师，这时候的老师，完全是一个充满爱意的爷爷。他会用大师的思维和幼稚的孩童对话，我则在这种时间的流逝中看到了老人的轻松和快乐。

董老师的两个儿女都在国外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师母也是国内知名的眼科专家，他们一家很难相聚。前不久，董老师的长女回国，向我们谈及董老师在美国治疗的这一段日子。她说，“这是20多年来父亲第一次和我们一起过春节、过圣诞节、过父亲节。他和母亲在儿子、儿媳、孙子、女儿、女婿、外孙的陪伴下，体会到人生的天伦之乐。这是我们家庭的特殊的团聚，我们享受这一段温馨的时光。”我回家向太太讲述这一段，我太太噙着泪说，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的确是最重要的。这个感受能替代董老师所有的痛苦。我们相信，生命最后一刻的董老师，是一位普通的父亲，是一位普通的爷爷。

上帝是公平的，一个一生奉献于社会的人，最后弥补了他对子女的爱的亏欠，这正是他伟大一生最伟大的结局。

我们的董老师，在我们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普通老人。

我们的董老师，应该是问心无愧离开这个世界的。

(作者系经济系1979级校友)



向武大的人文学科、人文精神致以 感恩的敬礼

——毛振华校友在振华楼启用仪式上的讲话

毛振华

校友名片：

毛振华，1979 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师从董辅初先生，1996 年获得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武汉大学杰出校友；武汉大学董辅初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著名企业家，“92 派”企业家代表人物，参与创办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首开中国市场化评级先河；现任中诚信集团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南开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专家委员，国家大数据发展专家委员会委员。





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校友，尊敬的曹副省长、王副主席、韩书记、窦校长：

谢谢大家出席今天的活动，见证“振华楼”竣工交付使用。原本我希望以我母亲的名字为这幢大楼命名，将它命名为“惠芳楼”。我母亲曾是一名乡村教师，以她的名字命名，一是想表达对教师这个群体的感恩，二是想表达我像爱我母亲一样爱着我的母校。这个念想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也许是大家觉得我的名字有振兴中华之意而更具励志之意，因此我也理解和接受了这个命名。

能为文史哲三个学院捐资建设办公大楼是我的荣幸。它给了我感恩武大人文学科给我教育的机会。我是1979年从农村考入武大经济系的学生，进入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我就上了哲学系的形式逻辑课程（张巨青老师主讲），中文系的古代汉语（陶梅生老师主讲），这是当时经济系课程设置的选修课内容。我们很幸运地赶上了当时的校长刘道玉教授主导的武汉大学教育改革，这项以学分制和可跨系选修课程为重要内容的改革，我成为直接受益者。我选修了哲学系杨祖陶教授主讲的西方哲学史和历史系张德旺老师主讲的世界近现代史等课程。这些课程的学习，帮助我开阔了视野，建立了历史的、逻辑的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让我了解到，人类社会千百年来，为了探求真理，追求平等自由公平正义，产生了很多伟大的思想，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让我们更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坚定了我对真理的探求、对道德的坚守、对理想的追求。人文学科对我的影响，一点也不亚于经济学。而这一时期我所习得的知识，成为我终生的财富，在人生成长的不同阶段，都起到了很好的指导和引领作用。我和田源、陈东升同学1992年创业时，正是在这种世界的、历史的眼光和思考下，选择了学习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商业模式，各自创立了中国新的行业。陈东升同学更是总结性地提出了“创新就是率先模仿”的著名论断，引领了一个时期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的潮流方向。

当时我接触到的文史哲对我来说是开眼眼的理论和知识，我强烈地意识到，在我上大学之前所认识的所有人，他们从不知道世界上早就有如此伟大光辉的思想，引领了人类文明的方向。也就是那



那个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我应该去当一个传授者，把这些知识传授给更多的和我有一样经历的人。正是当时的这个愿望，引领了我在商业初成功的10年前，即开始投身教育事业。今天，我也是一名光荣的武汉大学教师。

我感恩武大人文精神对我的教育，感恩文史哲的老师们。今天我有机会做一点事来表达我的敬意，是我的荣幸。我的名字被放置在大楼的外墙上，就像我每天站在这里，向我尊敬的老师们、向我伟大的母校、向母校的人文学科、向母校散发出的人文精神、大学精神致以感恩的敬礼。

我感谢帮我完成这一心愿的人们。

我的导师董辅初先生和我经济系的老师们，你们教育我专业知识，让我获得了发展的能力，并影响我力所能及地回馈社会。谢谢你们！

我的同班同学、创业伙伴陈东升，前任校长李晓红院士，你们对我的劝捐，促使我达成捐建人文科学大楼这一幸事。谢谢你们！

我的夫人杜兵，我的两个弟弟毛振亚和毛振东及其家人，他们毫无保留地支持我完成了这一心愿，他们今天也来到了现场。当时我未与他们商量就做了这个决定，而这笔捐赠是当时我们家族史上最大的开支，为完成这一承诺，他们作了很大的努力，甚至改变了原来的商业和生活规划。我们来分享今天的感恩之情、分享我们的爱与信任。谢谢你们！

我还应该感谢母校的领导、基建部的老师和这一工程的设计者、施工者以及为达成今天大楼启用仪式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人。我们一起完成了一个关于感恩母校、感恩教育的故事。谢谢你们！

最后，最重要的，感谢文学院、历史学院、哲学学院的老师们，感谢你们选择这里，希望每天都能感到学生对你们的敬意，希望你们满意，欢迎你们！

>>>

“振华楼”由武汉大学校董、杰出校友、中诚信集团创始人毛振华及家人于2012年捐资5000万元与武汉大学共建，2013年年



底动工兴建，总建筑面积 21 200 平方米，2017 年 6 月 7 日正式交付启用，将供文学院、历史学院和哲学学院教学科研之用。

“振华楼”启用仪式开始时，播放了题为《我的确已留在这里》的主题宣传片，宣传片深情地回顾了毛振华校友在武汉大学的求学经历，展示了他励志奋斗的人生。宣传片还引用了他在大学时代创作的同名诗歌，表达了他对武大深深的眷恋和感恩之情。以下为诗歌《我的确已留在这里》全文：

我的确已留在这里

——为七八级鲲鹏展翅诗朗诵会而作

这是一个永生难忘的日子
从橙红的光影里
从苏醒的树林里
我扛着简单的行李
顺着山的标志
走向这高大的梧桐
幽静的山林
走向这绿色的琉璃瓦
灰白的墙壁
顺着这通向藏书的台阶
一级又一级

在这里，我们汇聚
于是，随着我们的汇聚
敲门声、渴望和进取心
像宫殿的洪钟
搅醒了中国昏睡多年后的晨曦

从此，地平线的太阳对于我也不再是抛弃
尽管，我的影子被拉长



像我走过的路，弯弯曲曲

我从来不敢唏嘘我的经历，因为它平淡、无奇
我和所有的，经历了死亡的窒息和窒息的死亡的所有的人
有着相同的经历

只有过早爬上额头的
和土地一样深深的裂痕
和祖国的伤口一样的皱纹
证明着我曾和这土地一同呼吸

池塘边的石凳和石桌子，肯定忘不了
一个痴心少年对于它的痴情
我曾将我闲暇余时
以及我的忧愁，我的欣喜
我的面对宫殿壮观的沉思
都告诉了它
它亲眼看见一个白净的灵魂
像白纸一样纯洁而单薄的灵魂
是怎样经历了苦闷、迷惘
走向浑厚，走向充实
它一定还记得，一个年轻人在这里呓语
图书馆宫殿形象的庙宇，肯定忘不了
一个每日必来的朝拜者对于它的忠实
古老的长桌上，将永远的留下我匍匐的痕迹
从这书的神秘里，我得到了无数琼浆玉露
每当我又一次，走向这水磨石的石级
我总觉得欣慰、充实
像一个聆听了上帝絮语的教徒
我又一次忏悔我愚昧的过去
啊，图书馆！



在我的心里，你树起了庄严神明的形象
即使我离开了你
从你身上得到的启示
也将永生充满我的记忆

我最后一次徘徊，告别曾使我获得理想的樱花道
春天对于我，已不再是东方的秘密
三月，也将成为悸动的回忆
照相机按下的快门，已把我留在这里
的确，我已留在这里

这里有所爱的和爱我的所有奋发的人们
他们理解我，懂得我的言语
正午的太阳，已抹去最后一道阴影
我告别夏日，向秋天、向桂花异香的气息走去

在枇杷核里，我已成为种子
我的心和着三月的风，停驻在这坚硬的土地
我将托起种子，托起紫色的屋檐和琉璃瓦
用我挺直的身躯，充当土地的脊梁
即使，我是最不起眼的
甚至，被人忘却了的那一枝

在这精确的纬度，我种下了我的信念，我的职责，和我的毅力
我的诗，将永远写在跋涉者的行列里
我的躯干在上升，我的根在一层层地下延
我的上升是去摘取熟透的果子，我的下延是为了熊熊地燃烧
直到这山成熟，这土地，再没有一丝黑暗和冰冷的记忆
(一九八二年七月)

(作者系经济系 1979 级校友)



青春的哲学系，青春的我们

倪素香

20年前，在中国正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进入一个新的春天的时候，年轻的我们——1984级的哲学学子来到了朝气蓬勃的珞珈山，来到了再次焕发青春的哲学系，开始了青春的大学时光。

我们的青春因珞珈山而精彩。当时，我们有全国最美的校园，有全国最年轻的校长，有在全国率先实行的学分制，有华中地区最大的图书馆，还有那么多的讲座、社团及太多太多的惊喜和激动……让年轻的心欢快地跳动，感受祖国的进步和校园的快乐。我们感叹，生在20世纪60年代是个错误，但在20世纪80年代上大学实在值得庆幸。我们唱着改革开放的赞歌，呼吸着自由的空气，陶醉在东湖之滨、珞珈山下，不断地学习、奋进、思索，让青春的足迹深深扎根在珞珈山上。感谢时代，感谢青春，感谢青春的珞珈山。

年轻的我们真是幸福，今天已离开本科教学岗位的老教师、老教授，当时正是人生的第二个青春，他们借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东风，将自己最美的时光、最渊博的知识奉献给了我们。陶德麟、陈修斋、杨祖陶、萧萧父、朱传荣、雍涛、陈祖华……他们今天都已是大师、名师，而当年他们在课堂上对我们的谆谆教导和学术引导，他们在讲座上对我们的深深教诲和启迪，至今犹在耳边、心中。老师们诲人不倦的高尚风范、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超的学术智慧，让年轻的我们终生难忘、终身受益。

年轻的我们真是幸运，在今天已是名师、博导的正值人生壮年的各位老师，当年也正是风华正茂之时，他们不仅年轻，而且以他



们最旺盛的精力、最富创新的思想，为我们打开哲学之门，带着我们一起去思考、去探索。他们就像哥哥姐姐领着迷路的小弟弟小妹妹一样，带我们穿梭在中外哲学之林中，使我们这群年幼无知的孩子，终于走进了哲学的殿堂。郭齐勇、李维武、汪信砚、何萍、邓晓芒、赵林……没有他们手把手的指引，我们终将徘徊在哲学的大门之外。感谢他们——感谢他们用青春为我们的人生画上了最绚丽的色彩，使我们的青春格外艳丽。

年轻的我尤其庆幸，不仅在哲学系读完了本科和硕士研究生，还有幸在工作几年之后又回到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陈楚佳老师是我攻读伦理学方向硕士研究生的指导老师，没有陈楚佳老师的引路和指导，我也不会从事伦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陶德麟教授是我攻读唯物史观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我的成长道路无不凝聚着先生的心血，先生在我攻博期间担任着繁重的行政、科研工作，不惜牺牲休息时间给予我学业上的指导。几年的博士生时光，在导师的指引下，并借助于导师的深厚哲学功底，为我的伦理学研究奠定了学理基础。两位导师不仅在学业上给予我教诲与鼓励，更是在为人师表方面给我树立起了榜样与楷模，能在学术的道路上遇到两位恩师是我人生之大幸。今天如果说我在伦理学研究上取得了一点成绩的话，完全是我的两位导师和各位老师精心指教的结果。老师的恩情无以为报，此文算作学生的一份薄礼献给两位恩师，献给培养我的哲学系和哲学系的各位老师。

如今已经不再年轻的我，对于一直未能在哲学系工作深感遗憾。好在我还在珞珈山这片热土上耕耘，这不仅使我可以近距离地关注哲学系的发展，而且使我因一定距离而对其所生的美感时时荡漾在心中。在我心中，在我们心中，我们的珞珈山永远年轻，我们的哲学系永远年轻！

（作者系哲学系 1984 级校友）



清虚自守伴书香

——怀念恩师樊凡教授

单 波

2017年2月16日是一个令人无比悲伤的日子。一直在微信上亲切互动的恩师樊凡教授突然断了音讯，一连几天没有听到他的爽朗语音，令人心悸的消息在这天早晨传来，樊老师在旧金山医院因术后感染陷入昏迷。到了下午，令人心碎的噩耗传来，樊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跟随樊老师问学28载，如今痛失恩师，只能靠怀念来平复心中的悲痛。

樊老师1933年出生于广西横县，家境贫寒，没有祖地，靠租种他人土地为生。微薄的收入抵挡不住物价飞涨、沉重赋税，贫困如影随形。幸好天无绝人之路，当地政府推行小学免费教育，樊老师5岁时被母亲挥鞭赶进学堂，由先生点破童蒙，爱上读书。青年时梦想以教书立于世，躲避兵役，然战乱频仍，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无处寻梦，遂在1948年投笔从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求解放中拯救自己；戎马倥偬，自修写作，卸甲之后，转入地方报社，始与新闻结缘；继而痴迷创作，怀抱文学梦想，旋即于1957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涵泳于刘博平、黄淦、程千帆诸先生的学问之中，并留校任教，圆梦珞珈山。“文化大革命”中进入沙洋农场改造，依然坚持梦想，不坠传道之志，不失仁爱之心，为大师大德所称道。及至改革开放，人到中年，与吴肇荣、吴高福等先生协力开创武汉大学的新闻教育，筚路蓝缕，培育出国内一流的新闻传播学科。在主政新闻学系期间（1989—1993），挽狂澜于既倒，变革办学思想，凝练学术方向，稳定学术队伍，优化人才培养，涵育



优良学风，出色地完成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使命。退休后，樊老师一边受聘为武汉大学教学督导，匡正教学时弊，指导教学创新，一边心系新闻改革，深入调研，探讨新闻传播的新问题。到如今，珞珈梦寻60载，成就“清虚自守伴书香，乐天无忧享天伦”的美丽人生，开出一片令人向往的心灵境界。

即人生以言学术，樊老师总能以返璞归真之心探究新闻传播现象，强调从存在出发而非从概念出发，寓深刻学理于朴实表达之中，以文学家的气质撑开学术话语的想象空间，也偶尔显露一点军人本色，用“进军”“征程”等词汇使学术表达生动起来。即学术以言人生，樊老师由新闻入文学，专研音韵文字、诗词歌赋，又由文学返回新闻，开拓新闻写作学、中西新闻比较研究、经济新闻研究等领域，追寻中国新闻传播业的现代化、科学化、人文化的梦想，理想与忧患同行，批判与建构并存，自由与责任不悖，凝结成独特的理想主义人格气质。

20世纪80年代，新闻改革全面启动，新闻界开始从“党报本位”理论回归“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理念，新闻的信息功能、舆论监督功能也随之凸显出来。当时的研究者大多着眼于新闻观念的变革，试图从意识形态、民主理论、交往理论、信息理论、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导入各种理论资源，引导新闻改革。此时樊老师找到的新闻改革支点是新闻写作，看上去过于微观、过于经验化。其实，对于具有改良特性的中国式新闻改革而言，这是最有效的探索路径，当理论的探索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时，经验层面的研究往往能稳步推进新闻实践的变革，进而悄然寻求新闻观念的变革，这常常体现了在并不宽松的媒介环境下的一种实用主义态度，但这并不与理想主义相背离，只不过使其冷静下来，把理想与理性嵌入新闻实践之中。

樊老师冲破就新闻论新闻的封闭状态，用多角度、多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新闻写作，建构了新闻写作学的方法论。“封闭”曾是新闻改革难以攻克的一大堡垒，也是新闻学的一大痼疾，樊老师大胆质疑，试图让新闻界摆脱“思想失明症”，看到这样的事实：新闻写作领域的理想风帆，长期搁浅在我们固有的经验系统的沙滩上，



重复一些已有的原则和原理，在已知的领域和约定俗成的熟路上踟蹰，其指导思想是知识论，而不是认识论，更不是创造论。渴求认知与创造的心灵，急迫地寻找探索的路径。在哲学层面，他强调认知新闻与事实的统一与矛盾的关系；在美学层面，强调从接受美学转换思维，把受众看成既是新闻的接受者，又是新闻价值的实现者，破天荒地提出，受众是新闻写作改革的动力，暗合了当今公民媒介改革运动时代的一个主流观点，即公众是媒介改革的主体；在心理学层面，强调分析记者写作的起因和写作中的心理活动，以及受众在接受过程中的心理状态，从而转变新闻批评方法，由惯见的作者生平、社会影响等外在观察，转为内在掘进；在系统学层面，强调用整体性原则、结构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分析新闻写作。尽管只是一些初步的设想，但这些思想的火光已照亮了学术创新的出口。

樊老师这一代学者心系现代化，这不仅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影响的结果，更来自于个人突破传统的冲动，因为无论对传统做多宽泛的、合理的理解，它所显示的禁锢的力量都是一种客观存在，而这正是他们的切身体验。在他看来，现代化的实质是不断地变革与创新，以顺应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的需要。很明显，现代化是突破禁锢的一种可选择的路径。以此反观传统新闻写作理论，他发现了其中的根本缺陷，即研究的直观性、思考的粗放性、论理的机械性、体系的封闭性，并试图寻找心理层次的突破、方法论层次的突破、学科构造层次的突破（1987年），提出了对于新闻写作学的理论基础的构想，包括能动反映论，即新闻写作是反映与创造的结合，再现与表现的结合；系统整体论，即在内容与形式、新闻性与艺术性以及主体、客体、载体、受体三组矛盾关系中整体把握新闻写作；互动互制论，即假设新闻与社会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社会的多元变化会成为新闻写作变革的复杂因素（1986年）。这些框架性的论说构成了一个具有创造性的理论图谱，新闻写作不再是技巧问题，而具有“学”的意味，贯通了理想与理性的灵魂。

樊老师总是习惯于把思想的触角伸进新闻实践的矛盾漩涡，以此检测新闻领域的思维定势，打破思想的僵化，寻找新闻写作多样



发展的可能性。20 世纪 80 年代曾经出现向各个领域广泛渗透的美学潮流，一些人担心美学损害新闻的“纯洁性”，拒绝导入美学，樊老师意识到了在貌似合理的观念背后存在明显的思想僵化，他从新闻与人的关系出发，认为新闻不仅使人有所知，而且使人有所感，客观上存在审美关系，客观上会把新闻作品作为审美对象，进而大胆提出新闻审美与新闻美创造的原则，即真实性原则、新鲜性原则、功利性原则、感染性原则，实现了新闻学与美学的有机融合（1990 年）。穆青在 1982 年重提“新闻散文化”，一时引起新闻界激烈争论，樊老师从新闻与人的审美关系层面看到，客观事实因记者的理性与情感的烛照而得到发现，记者的理性与情感也因事实的发现得以寄寓外化，同时散文的结构优势能带来新闻写作的开放性，创新新闻写作，这些构成了散文式新闻存在的合理性（1991 年）。许多类似的研究表明，樊老师常常站在理论的“险要处”思考，在看似不合理、充满悖论的地方寻找可能被遮蔽的创造路径，这应该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种经验。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在比较的视野中展开，在学术领域，比较文学、比较法学、比较社会学、比较文化学等比较研究蔚为壮观，打开了视野，推动了思想解放。樊老师顺应这种潮流，较早地关注到新闻比较，起初是把比较作为一种方法引入到新闻写作研究中来（1985 年），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他站在当代新闻的理解、沟通与重建的高度，较早地开拓了中西新闻比较研究领域，并使之成为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科的一大特色。这个方面的研究源于他内心的焦虑，即在漫长的五千年文明进程中，为什么新闻活动长期沉沦在邸报的黑暗中而显现不出自身的光辉？为什么中国新闻业到近代才出现，而且要由西方的军事侵略和文化侵略来催生？在“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 20 世纪，为什么西方的声音强大，而我们的声音却那么微弱？这种落差是怎样造成的？应该怎样改变？中国新闻业能更快更好地走向世界吗？这里蕴含着浓厚的忧患意识，同时也回应着构建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的时代命题。樊老师遵循比较学的基本方法，采用平行研究、影响研究、关系研究、整体研究等路径展开中西新闻比较，同时，科学分析影响新闻发展的主要变量，选



取了文化、思维、道德、风格、记者个体等角度进行观察。他强调既用东方的眼睛看西方，又用西方的眼睛看东方，但又不是把一方作为另一方的反衬，更不是把一方作为另一方的论据，而是对来自不同故乡的文明作出科学的估量，把两种理论和经验都视为人类共同的财富加以认识，力求从现象到底蕴、从微观到宏观发现特征与规律，找到相互吸收的共同点，实现新闻的交流与沟通（1994年）。他主编的《中西新闻比较论》（1994年）风行学界，被童兵教授视为中国大陆比较新闻学的代表作，台湾著名传播学家李茂政先生高度评价这部著作，认为视角独特、视野开阔、发人深省。

邓小平讲话之后，经济新闻成为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明显存在认识模糊、视野狭窄、观点陈旧等问题。当时流行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诸如经济新闻是经济建设、经济改革、经济生活的报道，是关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报道，是对经济信息的报道，等等。在樊老师看来，这些定义没有触及经济事实的本质，没有抓住经济运动的基本矛盾和人们从事经济运作的基本出发点，因此，按照这样的观点搞经济新闻报道，画地为牢，只能是被动的甚至是机械的、镜像式的反映，限制了经济新闻的发展。他主张回到经济生活的本质，即经济选择与经济决策，放宽经济新闻的视野，打破经济新闻与其他新闻的界限，认为经济新闻应该是关于人们如何进行经济选择与经济决策的报道（2001年）。这样一来，不仅使经济新闻回归人的生活本身，不再被简化为生产、流通、分配、交换等格式化的领域，更重要的是让新闻记者转变思维，用经济的眼光审视一切领域的新闻，真正进入对新闻事件的经济学观察。樊老师进而立于人文主义立场论道：

经济新闻必须关怀人的现代化，关怀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通过新闻报道，从精神上加以启蒙，从榜样上加以示范，帮助人们从无所作为的“非我”的“自然人”，成为有“我”而又文明的“经济人”，再向重义利人的“社会人”的超越，最后成为社会经济发展最根本动力的“资源人”。（2001年）



这里似乎赋予了经济新闻太多的力量，但同情地理解，樊老师注重的是以此建构经济新闻的人文反思，恢复经济新闻和一切新闻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存在的道德力量，这是值得新闻界借鉴的。

樊老师身为武汉大学新闻教育的一位开拓者，把全副智慧投入到了教书育人的过程之中。在思想层面，他力主开放、自由、博雅的新闻教育，与他的学术风格相辅相成。当专业化成为新闻教育的潮流时，他提醒人们抗拒新闻教育的封闭与单一，开放视野，加强新闻传播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交叉。对于来自各方面的担忧，他曾这样解释道：“新闻既已独立成‘体’，自有自己的体与质，有自己独特的规定性，借鉴学习只会充实体格，而决不会被冲垮”（1989年）。他在教学中身体力行，既善于导入新闻改革中的现实问题进行思辨，又能以诗情画意的语言施教，还能把哲学、文化学、心理学、美学等方面的理论借用过来，打开学生的知识视野。在方法层面，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从不讲无实践内容的理论，也不讲无思想内涵的案例分析，而是使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启发学生的意识，强调培养学者型记者，试图使“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两种人格得以融合。深受熏陶的学生体会到，在他那里受教，思想不受限制，总是能产生直面现实的思考冲动，思维也能任意发散，获得多向思考、多元领悟的快感。在学风与人格层面，他注重言传身教，从不空谈学风与人格，学生们从他的讲授中可直接感受到小心求证的那份踏实，同情理解不同观点所显示的宽容，不盲从、不盲信且大胆质疑所表现的独立精神，谦逊自省之中那份对真理、历史的敬畏感，不由自主地接受他的引导。

樊老师的海人不倦在学生中是最出名的，学生拿作业或实习作品向他请教，他总是写上密密麻麻的批语，或是约上学生长谈，那种敬业精神已经很少有人能达到了。即使学生毕业了，他还是会主动关注他们的每一点进步，送去他的鼓励与抚慰。最令人感动的是，他主动向毕业生索要新闻作品，并及时进行点评，而且毫不留情地指出缺点。薛晓峰在《经济日报》发表的《“给营口号号脉”系列报道》、王慧敏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筑起的，不仅仅是一座大坝》、毕竟在《深圳特区报》发表的《波音兼并麦道告诉深圳什么？》、



瞿长福在《中国乡镇企业报》发表的《农村市场：农民富裕是前提》、章金生在《法制日报》发表的《“肯德基”为何越吃越小》等作品，他都写下长篇评析，郑重向新闻界推荐，其舐犊之情荡漾在热情的文字之中。

晚年的樊老师跃入人生自由之境，光风霁月，超越洒脱，与师母白头偕老，相依相守，云游四方，其乐融融。身边常有学子相伴，谈天说地，诉说衷肠，沐浴在珞珈山的阳光里。

如今，樊老师驾鹤西去，把美好心灵留在了珞珈山，热爱他的师生们不由自主地仰望着他的心灵境界。

（作者系新闻学院 1989 级硕士研究生校友）



李达与武汉大学

宋镜明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62岁的李达为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主持校政达13年之久，成为百年武大历史上迄今任职期最长的校长。



李达和学生们在一起

在武汉大学，李达强调要按照社会主义方向办学，始终坚持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李达校长的熏陶下，学校一直把马克思主



义理论教育放在学校工作的重要地位，使我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研究工作长期处于全国高校的先进行列。

1955年，根据高教部的部署，我校哲学系开始重建，由李达兼任系主任。李达的办系宗旨十分明确，即强调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教学与科研相结合，鼓励教师出高水平学术著作；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双百”方针，繁荣学术，形成特色，建立和发展珞珈学派；在招生和培养目标上，主张“集天下英才而教之”，要求学生“脑、口、手、德、体”并重，全面发展。李达亲自编教材，或组织编写高质量的学术性强的教科书，注意抓试验班，带头示范。这些办学理念及办学实践，影响深远。

使教学成为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把提高教学质量放在首位，这是李达主政武大期间的又一办学特色。李达认为，新型高等教育应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综合性大学则主要培养理论或基础科学方面的从事研究或教学工作的专门人才，德、智、体三者是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统一体，而德育是根本。李达在办学目标、人才培养定位等方面的真知灼见，进一步深化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内涵。他关于要使学生“能够独立地创造性地进行研究”的思想，就包含有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创造、创新、创业教育的内涵。

李达十分重视学校的科学研究，认为国家重点大学的教学与科研应当并举。他贯彻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鼓励独立思考，大胆创造，反对扼杀生机的教条主义，提倡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精神。他以“继续在理论战线上发挥一个老兵的作用”自勉，尽管校务繁重，但始终认为自己是教授，应积极带头培养研究生，组织领导科学研究。他要求各位系主任拿出4/5的时间带头向学术方面进军。李达的率先垂范，为传承和熔铸武大严谨求实、坚持真理、追求卓越的学术品格和学术精神，为学校学术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坚实基础。

李达重才、惜才、爱才，还不拘一格地用才、育才。他常说，大学是最高学府，教师要有最高学术水平，能否拥有一批学术大师，是体现学校实力的重要标志。他深感人才可贵和来之不易，为此含辛茹苦，呕心沥血。



李达深入群众，民主办学，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赢得了全校师生员工的崇敬和爱戴，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校长”。

老校长在 1961 年提出了武大要在 10 年之内赶上国内先进水平，进而向国际先进水平迈进的奋斗目标。对于“武汉大学在国家（重点）大学中占第几位，我很注重这事，有人说我们是第五位，要努力迎头赶上去”。现在的武汉大学人文底蕴深厚，学科门类齐全，办学实力雄厚，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正朝着“国内外知名高水平大学”迈进。抚今思昔，我们不禁深深怀念李达老校长，是他为学校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作者工作单位：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缅怀我们的李达老校长

陶德麟

李达同志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是我们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是杰出的革命家、理论家和教育家，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在 1990 年李达同志百年诞辰纪念会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领导小组副组长胡乔木同志作了题为《深切地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同志》的讲话，对李达同志的功绩作了准确的评价。作为他晚年的学生和助手，我在这里谈几点个人感受。



李达同志自 1918 年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介绍的杰出



贡献是众所周知的。用侯外庐同志的话说，是“无一人出李达之右”。但他并不是仅从书本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是学者型的战士和战士型的学者。他最可贵的贡献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他在建党前后的大论战中发表的那些影响巨大的论文无一不是密切联系中国实际的。他 1926 年发表的《现代社会学》，是联系中国实际阐发唯物史观的第一部专著，再版 14 次之多，革命者几乎人手一册。大革命失败后他在白色恐怖中写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民族问题》等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等作了非常正确的论断，给苦闷中的革命青年极大的鼓舞。他在 1935 年写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同志作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写信称他为“真正的人”。他在同一时期写的《经济学大纲》绪论中尖锐地批评“从来的中国经济学……专门研究外国经济，却把中国经济忽略了，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极大的缺点”。他敬佩毛泽东，把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职责，也正是因为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李达同志也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他一生都在办教育。建党初期他创办了“平民女学”，培养了丁玲、王一知等一批女革命家。1923 年他创办“自修大学”，夏明翰、萧劲光、吕振羽等同志都是他的学生。以后他在上海、北京等地大学讲坛上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又培养了大批革命战士。后来成了重要领导干部的段君毅、任仲夷、陈沂、黄逸峰、陶白、陈星野等许多同志都是在他的直接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革命的，他们对李达老师一直充满着崇敬和感激之情。

李达同志是武汉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他任职 13 年半，付出了大量心血，直到献出了生命。他有自己的办学理念，绝不随波逐流。我个人觉得，主要有这样几条：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百家争鸣。二是按教育规律和科学规律办事，决不搞违背规律的新花样。三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确保大家安心治学，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四是加强团结，反对内耗。他对当时“教育革命”中的“拔白旗”、批教师、师生“打擂台”等错误的做法



坚决抵制，向省委和高教部负责同志提意见，向毛主席当面陈述自己的看法。抵制不了就提出辞职。当时的大环境使他的正确主张不可能完全实现，“文化大革命”时期反而成了他的“罪状”。不过他的正确主张毕竟发生了作用，武大在那段时间里尽管一波三折，总体上还是有很大发展的。

重建武大哲学系是李达老校长的一大功绩。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有30年历史的武大哲学系没有了。1953年2月，李达校长到校后，认为这是一大错误。那时我还是学生，在校报兼做编辑，组织上派我帮老校长整理哲学讲稿。有一次他正在感冒发烧，却将我叫到他家谈了3个小时，除了讲到许多为人治学的道理，要我跟着他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外，还强调武大必须重建哲学系。他激动地说，没有哲学头脑的人也做不好别的学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当是首席科学；像武大这样的著名大学没有哲学系简直是荒唐。他的话震撼了我，至今还在耳边回响。从那时起他就准备重建哲学系了。没有教师怎么办？他采取了几条措施：一是在校内物色人才，由他亲自培养；二是选送青年教师到人大、北大进修；三是亲自到人大、北大和其他学校去登门拜访教师，动员他们来武大任教。经过几年的努力，1956年武大哲学系重建起来了，他亲自兼任系主任。那时哲学系只有他一位教授，两位副教授，两三位讲师，其余全是20多岁的助教。老校长对这支队伍充满信心，认为只要方向正确，团结奋斗，哲学系一定能办出特色。他的办系方针非常明确：第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他提出“一体两翼”的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体”，以中外哲学史为“翼”，带动其他学科全面发展。第二是排除干扰，不遗余力地提高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鼓励大家以“登山”精神做学问。第三是重视人才，放手让青年教师挑重担，同时关心他们的生活和身体，保护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老师。他不顾当时所谓反对走“白专道路”的“潮流”，鼓励教师成为名教授。第四是提倡学术争鸣。他以身作则，从不以权威自居，青年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同他当面争论。第五是强调要编写出适合学生需要的高水平教材。1961年毛主席要他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此他建立了毛



泽东思想研究室，带领我们全力编写。他要我一边写稿，一边讲课，听取学生的反映，反复修改书稿，他为此带病整整劳累了4年。在他的带领下，哲学系各学科都高度重视教学与科研结合，编出了自己的讲义。历经10年奋斗后，教师队伍迅速成长，学科逐渐齐全，武大哲学系在全国声誉卓著。令人痛心的是，“文化大革命”到来，老校长被诬陷为“武大三家村黑帮”的“总头目”含冤去世，哲学系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室被打成“李达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窝”，12位骨干教师被打成“李达黑帮分子”，还有二十几位骨干教师也被打成各种“分子”，哲学系受到惨重的摧残，实际上停办了10年。

令人欣慰的是，浩劫之后，李达老校长的精神还在，他培养的人才还在，他倡导的学风还在，武大哲学系也立即恢复了生机。这30年来薪火相传，一代一代新人茁壮成长，建立了哲学学院，而且更加发展壮大。历史证明，没有50年前李达老校长的决策和擘画，不可能有今天的武大哲学学院。展望未来，追思既往，我们不能不深深缅怀为重建武大哲学系而筚路蓝缕惨淡经营直到以身殉道的李达老校长。

(作者系经济系1949级校友)



我眼中的大教授

——纪念张瑞瑾教授 100 周年诞辰

谈广鸣

张瑞瑾教授 1917 年 1 月出生于长江之滨的湖北巴东县，1939 年从武汉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毕业后，曾去加州大学和美国垦务局进修，1947 年回到母校任教，1950 年 1 月成为武汉大学的第一位教授党员。先后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工学院副院长、水利学院院长；武汉水利学院副院长，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



谈广鸣与导师张瑞瑾教授

1982 年 2 月至 1988 年 6 月，我曾有幸在张瑞瑾教授名下攻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先生的才学品行至今仍历历在目，先生



的谆谆教诲使我终生受益。在先生 100 周年诞辰即将到来之际，特写上以下几段，以示缅怀。

先生的学术贡献

先生长期致力于河流泥沙运动基本理论的研究，取得许多重要成果。20 世纪 50 年代，他改进了紊动扩散理论，对重力理论作了系统评述，提出了泥沙沉速公式、泥沙起动公式和推移质输沙率公式。20 世纪 60 年代，他提出了著名的水流挟沙力公式，该公式至今仍在水利界广泛应用，荣获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他本人被授予“在科学技术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先进工作者”称号。先生对河道环流结构和蜿蜒性河段演变规律也有较深的研究，20 世纪 70 年代，他在大量野外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率先发表了高含沙水流方面的研究成果；20 世纪 80 年代，他提出了河工模型变态指标，推动了变态河工模型理论的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他和谢鉴衡教授合写出版了英文专著 *Sedimentation Research in China*。

1960 年前后，先生作为河流动力学及河道整治教研组唯一的教授，组织谢鉴衡老师和陈文彪老师等编著了《河流动力学》一书，由中国工业出版社于 1961 年 12 月出版。他亲自执笔编写了第 1~5 章以及附录 I、II、III。该书融入了先生自己较多的研究成果，既是当时的治河防洪工程专业、航道开发与整治工程专业、陆地水文学专业的教科书，亦是国内第一本反映当时河流泥沙研究国际前沿学术水平的著作。

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一个新的学科分支——河流动力学诞生。1981 年我国恢复学位制时，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学科就是由水力学学科分支和河流动力学学科分支组成的。目前全国已有近 40 所高校和科研院所设有该学科。

先生的学术眼界

先生是一位敢于挑战不合理的国际权威假定和不合理的国际通



用公式的学者。比如，他认为糙率 n 的使用，虽方便，但不科学，因为有量纲且无理论基础，应尽可能使用和推广阻力系数 f ；又比如对国际著名流体力学专家普朗特的掺长假定，他认为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既无理论根据，也与事实不符，应通过量测技术的进步，真正地将雷诺应力测出来。对这两个问题，本人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先生的指导下曾做过一些艰苦的探索和研究，虽有进展，但收效不大。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先生就开始黄河问题的研究，并多次对黄河进行了查勘，于 1947 年在《水利》杂志上发表了《黄河泥沙冲积数量之分析》，在当时实测泥沙资料很少的情况下，分析推断出黄河三门峡站年均输沙量为 15 亿吨左右的重要结论。而根据实测水沙资料，1934—1983 年这 50 年的年均输沙量为 14.63 亿吨！

20 世纪 70 年代在长江葛洲坝工程建设中，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先生敢于坚持真理，敢于阐述正确主张。以他为代表的泥沙研究人员，通过大量的试验和调查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船闸上、下引航道泥沙淤积问题的基本途径——“静水过船，动水冲沙，辅以机械清淤”。该成果是 1985 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创新点之一。



张瑞瑾教授考察三峡大坝



有关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的改建和小浪底水利枢纽建设目标的调整，先生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并被采纳和实施。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在先生担任三峡工程泥沙研究协调组组长期间，就三峡工程可能存在的泥沙问题的提出，研究方案的拟定和国内各研究单位间的合理分工等做了大量工作，为以后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的研究解决铺平了道路。

先生的学术品行

先生对自己要求很严格，记得一次正和先生探讨学术问题，先生要在纸上写点什么，我随手在先生的桌子上拿了一张印有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抬头的信笺递给先生，先生说这是公事用的，拿另外一种吧，那是自己买的。

由于葛洲坝工程所做的技术贡献，1982 年水利电力部奖励先生 1 000 元，当时动力系和河流系各有一位学生考上了国外的研究生，先生将这 1 000 元奖金转赠给了这两位学生。

“文化大革命”期间，先生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先后下放罗田县和长阳县劳动改造，1972 年年初，得到当时的省领导张体学同志的指示，连夜步行几十公里赶赴葛洲坝工地，进行现场查勘和试验研究，提出了著名的“静水过船、动水冲沙”葛洲坝引航道泥沙淤积解决方案。由于长期的艰苦和劳累，1975 年，先生始患帕金森综合征。

1980 年，中国科学院首次增补学部委员，中国水利学会可以推荐 1 人，经学会领导研究，考虑到中国的泥沙研究处于世界前列，推荐泥沙专业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申报。先生因病重正在上海瑞金医院救治。当学校告知先生这一信息时，先生说，我都病成这样了，还报什么学部委员？让钱宁同志报吧（先生是第一届泥沙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钱宁教授是第一副主任），结果钱宁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经过救治，先生的病情有所好转，时任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出访匈牙利时专门为先生带回了可以缓解病情的特效药。先生边工作、边休养至 1998 年去世。大约 1990 年前



后，我在先生面前提到了学部委员增选之事，先生告诫我：人的一生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健康状况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不要刻意追求荣誉。而中国水利学会泥沙专业委员会的第二届和第三届主任谢鉴衡、第四届主任窦国仁、第五届和第六届主任胡春宏后来都是院士。

先生作为 1981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选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对我们研究生要求也很严格。第一不准给老师送任何礼物；第二寒暑假不能全部用来回家；第三研究河流泥沙要懂辩证法、要有时空观、要实地查看；第四发表学术论文要少而精，不能图多图快。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通过系列实验研究高含沙水流结构。开始实验之前，1983 年暑假到当时水土流失严重的甘肃省庆阳地区，陕西省延安地区、榆林地区和山西省吕梁地区实地考察了一个多月。1984 年 11 月硕士答辩以后，第一篇拟发表的论文才修改完善，发表于《泥沙研究》1985 年第 4 期。硕士学位论文的部分成果同其他老师的研究成果综合在一起，分别发表于《中国科学》中、英文版。博士论文是通过系列实验研究河流阻力，同样先到下荆江实地查看，然后制作模型，开展较长时间的系列实验，1988 年 6 月答辩，其中有关回流段紊动流速的成果发表于《科学通报》1989 年第 1 期，而有关河势阻力的研究成果，1992 年才发表于 *J. Hydrodynamics*。上述 4 篇文章，先生均不让署他的名字，理由是文章中他未做具体的贡献。

综合上述，在我的眼中，先生是位实实在在的大教授。由于自己努力不够，只得到了先生的部分真传，还得继续好好工作。

（作者系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1977 级校友）



涂允成先生与武大及武大附中

涂光瑜

一、执教武大十年 热心培育英才

出身书香世家 越洋求学深造

涂允成(字述文), 1903 年 12 月 11 日(农历十月二十三日)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鲁台镇涂家大湾村的一户农家, 兄弟姊妹九人, 他排行第三。父亲涂德钧(字可卿)是个“遗腹子”, 一生较为平淡, 在科举时代曾应试多次, 都不得意。46 岁时患肺病, 发现时已是晚期。涂允成当时在武昌湖北省立师范学校念书, 得知这一消息, 特地以 20 块银元的高价从汉口请著名的西医为父医治, 但在当时医疗条件下, 已无能为力。其父于 1920 年 2 月病逝。

涂允成从武昌湖北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后, 心怀科学救国的理想, 刻苦攻读, 终于在 1924 年考取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读到二三年级时, 因家中经济接济不上, 加之身体不好, 曾休学一年。当时唐山交大的课本都是用原版美国书, 他买不起, 除了主修课如力学之类选购校中的“二手货”外, 其余均靠笔记与借阅, 足见苦学之一斑。

1929 年从唐山交大毕业后, 涂允成曾在湖北省水利厅从事水利工作, 任技士。1931 年长江大水后考取湖北省官费赴美求学, 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土木工程, 获硕士学位, 后转入依阿华州立大学, 专修水利工程, 获博士学位。1935 年学成归国, 曾受聘



天津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教授, 开出水力学讲座。

湖北黄陂本是个贫穷的地方, 教育也不发达, 涂家大湾在前清有人点过翰林, 有人中举, 也有秀才, 这都是家族的荣耀。辛亥革命后, 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湖北黄陂鲁台涂家大湾接连出了三位留美博士, 他们是涂允檀(毕业于北京大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涂允治(毕业于清华大学,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植物病理学和作物育种学博士)、涂允成(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 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水利工程博士)。从涂家大湾这个村子里先后走出的三位博士, 留美回国后都曾与武汉大学有过一段很深的渊源: 涂允檀, 回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1928 年曾是国立武汉大学的建校筹备委员会委员; 涂允治, 回国后受聘于多所农学院, 1934 年曾参与筹建武汉大学农学院; 涂允成, 回国后 1936 年受聘武汉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教授, 曾参与筹建武汉大学华中水工试验所, 在武大执教十年。

治学严谨认真 热心培育英才

1935 年, 涂允成在美国学成归国后, 曾在天津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任教一年, 1936 年受聘武汉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教授, 那一年, 他 33 岁, 从此在武汉大学执教十年。这是他一生中从事教育事业最重要的时期。

武汉大学是当时华中的最高学府, 设有文、法、理、工四院。院下设系, 工学院下设土木、电机、机械等系。他在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任教, 教授水力学、水力实验、河工学、灌溉工程、水力工程、高等水力学、水利工程设计等课程, 当时工学院教授水利的, 仅他一人。

涂允成教授在武大一向以教学严谨认真而著称。他上课时教室内清静无声, 同学们聚精会神听讲, 下课后同学有疑难问题, 他都不辞烦劳, 一定要讲清讲透, 使同学理解贯通, 方才罢休。作为教师, 他一向严格要求自己, 严肃对待学生, 讲课提纲挈领, 先易后难, 既传授知识, 又讲清方法。师生之间既严谨认真, 又融洽无间, 赢得了同学们的敬爱。



在工学院执教期间，除本科生教学外他还悉心培养研究生，武大工科研究所成立后，下设土木工程部，招收第一届研究生两人（方宗岱，邓先仁），入工科研究所土木工程学部水利工程门学习。两年的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严格地规定了必修的课程。水利工程门研究生课程为：第一年上半学期由专业课和公共课组成，包括高等水利工程、水利工程设计（Ⅰ）、德文或法文、高等数学四门课程，下半学期全部是专业课，包括防洪工程、水力发电、水利工程设计（Ⅱ）三门课程。第二年主要进行专题论文研究，课程相对减少。第二年上半学期须学习近代水利工程研究和水利工程设计（Ⅲ）两门课程，下半学期须学习水跃及回水（Hydraulic Jump and Back Wear Curves）和水利工程设计（Ⅳ）两门课程。除了上述必修的课程外，还可跨专业选修课程以及补修本科的课程。

在工学院执教期间，武汉大学与湖北省江汉工程局达成协议，在工学院设立华中水工试验所。华中水工试验所在工学院的南面，背靠珞珈山北坡，1936年4月建成，建筑面积2197平方米，工程造价9.8万元，由湖北省政府与国立武汉大学合建，上海六合公司中标承建。整个建筑采用琉璃瓦歇山顶，绿顶花檐的中国特色，屋内用弧型钢梁作屋架，地面设有环形水道。这一科研基地，竣工两年后就沦为侵华日军的马厩，抗战胜利后才又恢复水利实验和研究。湖北省政府还设置水利讲座，每年补助经费12000元。

在工学院执教期间，他为水工实验室购置了有相当水平和数量的实验水压力、水阻力的设备，供同学实习之用，由他指导的硕士研究生管理其事。就是在武大因战乱迁到乐山后，水工实验室仍能开出实验。他出的水力学习题，要求同学们掌握运用水力学原理，方能计算解答。每届测试，同学们都互相告诫，对涂先生的课要加劲复习，力争好成绩，不要落在水平线下。这些都为培养高级工程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武大的教学作风和教学质量有口皆碑。

涂允成教授教学认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除了在学校开设水力实验课外，1937年还亲自带领同学到武昌汉阳门的长江江面测量水流速度。他要求每一个人都要用大张坐标纸绘出江水速度分布



曲线，绘出的曲线呈“)”形，靠近江面和江底的流速较慢，中间速度最大。

1937年，涂允成教授曾邀请水力学专家张含英来武大讲演，会场设在工学院学术厅内。涂先生曾经师从张含英先生。张先生在讲演时谈自己对“不到黄河心不死”一语的理解，他说：“黄河两岸居民久受黄河水灾之苦，而不能享受其利，生活困苦，多数人家徒四壁。到黄河边的人见此景象莫不心凉。”他又说：“必须把黄河治好，让人民享受其利，生活富裕起来，这样心才能不死。”听讲者无不为之动容。几十年后，张先生当年变水患为水利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爆发全面抗战。一年之间，形势急转直下，大片国土沦陷。抗战时期武大成立了武汉大学防护团，由赵师梅教授任团长，涂允成是防护团的干事之一，还有普施泽、蒋思道、李国鼎、高尚荫、熊国藻、丁景香、缪恩钊等任干事。防护团的主要责任是组织师生学习防空知识和演习，购置器材，修建防空设施等，早期的武大防空工事就是这样起步的。

武汉沦陷前夕，1938年，武大决定举校从武昌珞珈山迁往四川乐山。涂允成先生作为当时武大最年轻的教授，最先参与组织了这一次武大全校向大后方的大搬迁，他自己则是最后一批撤离武汉的。1938年3月，作为迁校先行小组成员，他曾先期到乐山，为武大迁校选址做好安排。武大举校西迁，是一项系统工程。武大其时已有相当的规模，在当时的条件下，一个偌大的学校要从一个大城市迁到千里之外的一个偏远小县城，其工作的浩繁和艰辛，其间所遇到的困难和周折，是难以想象的。

当时武大决定，除了四年级暂不搬迁，留在原址上课外，其他班次一律迁往四川乐山。每个系留下两名教授给留校学生上课。土木系留下的是涂允成教授和俞忽教授。他们1939年才随最后一批撤离武汉的教职员工到了乐山。

因为有组织迁校的那段经历，涂允成教授参加了校务委员会工作。涂允成教授曾于1941年兼任武大总务长一年。他是乐山时期担任武大“三长”的十位教授之一。当时校部设在文庙，校办公室



及文、法学院设在那里，工学院则在高西门外的原三育学校旧址内，他每周除了几次到工学院上课外，还要到校办公室去一两次，处理一些重要事务。

1937年下半年开始，武大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开展学术演讲活动，在乐山县立民众教育馆的中山纪念堂讲演，每两周周六下午4:00~5:00点轮流讲演。1939年1月28日，武大开始兼办社会教育，有学术讲演、学术展览会、民众法律顾问。学术演讲的第一讲，便是由涂允成教授主讲，讲题为《抗战期中水电工程的重要性》。1939年下半年，应四川省地方行政干部第五区训练班之约，校长王星拱、四位学院院长和四位教授演讲，涂允成教授演讲的题目为《中国灌溉工程》。

1939年上半年，校务委员会公推学术展览会筹备委员，学校展览会定于1939年1月2~3日两天举行，推选高尚荫、马师亮、陈季丹、涂允成、严顺章、余炽昌、吴学义、袁昌英、张之品、蒋湘青十位先生为筹备委员，由涂允成召集。后分五组同时在五处展出，以普及科学知识。

1939年，涂允成教授还在武大校务委员会设立的多个委员会兼职，任仪器委员会委员，群育委员会委员，团体生活指导委员会委员，学生贷金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期间物价增长，生活艰难，1941年，武大教授会推举涂允成、蒋思道二代表赴重庆，请求教育部重视武大教职员的生活问题，设法予以解决，却没有什

结果。

涂允成教授除了讲学之外，业余还喜欢文史书画，广交朋友。除与工院长邵逸周教授、余炽昌教授(唐山交大同学)、赵师梅教授等过从甚密外，他与文学院的刘博平教授、理学院的萧君绛教授等也相往来。萧先生是数学系教授，业余钻研中医，收集、阅读古近代中医典籍，还善切脉，师生中有患小毛病的，经他诊治，其效如神。涂先生的广为交友，善结人缘，为日后在艰苦的抗战时期在乐山创办武大附中，打下了基础。



二、艰苦岁月办学 创建武大附中

战乱艰苦办学 创建武大附中

1938年武汉大学西迁乐山时，附属东湖中学并未随迁。抗战初期，乐山只有省立乐山中学、县立乐山中学和乐山女子中学等几所中学，武大迁到乐山后，教职员工的子女只能进当地的中学，而且除省立乐山中学设有高中班外，其他中学只办初中，带来了诸多不便。

1939年8月19日，乐山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为躲避空袭，乐山原有的地区或县立中学都纷纷迁到附近较小的县城，嘉属联立中学迁到了乐山西北四五十公里外的夹江农村杜公场，乐山县立中学搬迁到北部郊区的牟子场以北的毛锅厂，异地上学更增加了家长们的负担。同时，由于战乱，物价飞涨，法币贬值，使得原来并不宽裕的教授们交不起学费，就近求学成了他们急需解决的问题。乐山城遭到日军轰炸后，人们在城里再也住不下去了，便纷纷搬到郊区或乡下，住得更分散，学生上学就更困难了。涂家这时也由乐山城搬到城西乡下的辜李坝，在乡下同住的还有法律系教授蒋思道先生一家。1941年，涂家又搬到岷江对面山头上的一座孤零零的小山村陈庄。子女辍学，成了教职员心上的大问题。

武大的教职员都迫切希望有人出面在乐山就近办一所好的、初高中都有的中学，以便子女就近上学，让他们受到良好的中等教育，为以后的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于是，家长们把希望寄托在“年富力强，交游甚广”的工学院土木系教授涂允成身上。

当时在武大教授中，主张办学最力的是数学系的萧君绛教授，他对涂教授讲：“我们为国家造就人才，而我们自己的子女却只有在家里待着的份，心实不甘。希望你能出来办一所中学，以解决子女入学的问题。”武大教授陈源（即陈西滢，文学院院长）、方壮猷、刘博平、黄焯、刘正经和俞忽等也都有这个愿望。乐山地方人士，如乐山商会会长范倬生及蒋焕庭先生等也有此意。由于有参与迁校



先遣工作的那段经历，涂先生结交了许多乐山地方人士和军政人员，这也为筹办附中创造了条件。

于是，由涂允成教授出面约集有这一愿望的学生家长，开会商议此事。在大家决定要办之后，从武大经费处借款 400 元法币，又经过乐山地方人士范倜生、蒋焕庭先生的努力，最终筹集了 8 000 元的开办费，黄焯先生撰写了办学启事，是一篇漂亮的四六骈文。武大附中的校舍就在乐山铜河碛的一座供奉镇江王爷的旧庙“王爷庙”里，当时这个庙由当地驻军师长刘树成之妾的一个戏班子占用着。经涂允成先生与刘的参谋长汪某交涉近一个月，他们才退了出来。8 000 元的开办费用在了修理房屋及制作桌椅家具上。

涂允成教授受命于战乱，白手起家，多方奔走，苦心筹措，延聘有经验的教员，几经周折，终于 1941 年秋在战乱中的乐山，创办了武汉大学附属中学（初创时称“私立乐嘉中学”）。学校办起来后，数学系教授萧君绛欣然题写校训，中文系主任刘博平教授书写校名。受教授们推举，涂允成教授兼任武大附中的第一任校长，附中教导主任张远达，训育主任夏振东，事务主任童咏春。那一年，涂允成教授 38 岁。

1941 年 9 月，武大附中招生开学。开始招了三个班学生，即初中一、二年级和高中一年级。以后逐年增招新生，到 1944 年，高、初中各年级都办齐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武大教授们的子女，后来都进了武大附中，他们中有：肖而江、陈小滢、方克强、方克定、刘敬黄、刘遂生、刘宁姑、俞宝贞、俞宝芬、范锡畅、彭大振、柳绍铭（柳焯）、涂光晖等。

武大附中开学不久，乐山地区专员柳维垣（其子柳绍铭是附中初一班学生，其舅兄陈孝启是附中的国文教员）告诉涂允成先生，说成都四川省教育厅有公文来，称附中“未经呈准，擅自设校招生，应予查封”。他说：“你得赶快到成都去疏通，否则再有公文来催，就不好办了。”于是，涂先生赶到成都去找周君亮设法疏通。周君亮是武大毕业生周谟仁、周谟义的父亲，他当时是四川省主席张群的秘书。虽初次见面，既是老师找家长帮忙，态度尚好，他答应帮忙，但他说，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的话不好说。经周君亮向郭



有守疏通，郭说，私立中学是可以办的，但要有三个条件，即 30 万元的基金、校舍及校董会。

涂允成先生因有筹集 8 000 元开办费的艰难经历，对这 30 万元的基金觉得无能为力。这以后，他转向当时的重庆中央教育部活动，说明武大附中办学的经过及省教育厅要查封的情况。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说：武大教职员子女入学的问题，教育部是知道的，但私立中学立案是四川省教育厅的事，还是得满足郭有守提出的要求。事情仍然办得不得要领。好在成都有周君亮向郭有守疏通，乐山又有地区专员柳维垣的支持，郭没有催办，柳也没有执行查封，但学校仍处在没有立案的状态。

1943 年下半年开学后，学生家长着急了起来，因为转瞬之间高一班毕业，学校仍未立案，将来学生不能考大学。于是，学生家长联署向当时的教育部吁请，涂允成先生又专程到重庆找吴俊升司长，并设法找了余井塘。最后，教育部在批复武大教职员联署的吁请书时，将“私立乐嘉中学”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附属私立乐嘉中学”，简称“武大附中”，“每年补助经费 8 000 元，到抗日战争结束后一年为止”，这是 1943 年冬季的事。这样，武大附中的学生家长才安下心来。

武大附中校舍虽然简陋，办学条件虽然困难，但是校风、学风却十分严谨，教员阵容强大。武大附中因从一创办就有遭查封的危险，作为附中的创办人和第一任校长，涂允成校长认为必须把学校办出特色和影响来，学生功课学得扎实，升学率高，上面再要查封，必招致社会上的广泛反对，学校自然也会赢得社会的同情和支持。所以，武大附中从初创起就治学严谨，严格升留级制度，树立严格要求的校风。学校纪律很严，考试就更严。每逢招生考试或期末考试，涂校长对教学管理工作总是抓得很紧，很具体，在学校管理上从不徇私情。武大附中当时规定，严格淘汰，两门课不及格就要留级。当时不少同学留了级，包括一些武大教授的子女。

教师是办好学校的重要因素。涂允成校长从筹办武大附中开始就延聘了一批有经验、有事业心的教员执教，他们大多是武汉大学的教授、讲师、助教，受聘在附中兼课，对武大附中的建设和人才



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中有张远达、夏振东、余先觉、吴静仪、吴熙载、陆维亚、刘博平、黄焯、缪琨、赵君貽、李格非、杨人鞭、余名汉、罗明、许海澜、姚梅镇等。武大附中的教务主任先后有张远达和王功品，训育主任先后有缪琨、李格非和夏振东。武大附中的职员人数虽然很少，但办事效率却很高，事务处仅刘开诚和张云阶两人，教务处有刘光厚，训育处有傅如。

从严治校 培育栋梁英才

涂允成作为一校之长，以“严师”出名，他从早到晚，全身心地扑在办学上，在“严”字上狠下功夫。他经常在教室外巡视、查堂，观察、了解教员上课和学生听课的情况。一次，许海澜老师（后来成为武大外语系教授）正在高一班上英语课，班上的孙法理和同桌的陶坤（武大教授陶因之子）在下边说笑，没有好好听课。下课后，涂校长对这两个学生严厉批评，并给予处分。事情过去几十年后，已成为西南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的孙法理回忆往事，仍感慨不已。严师出高徒，没有当年的苦读，孙法理不会成为国内研究莎士比亚的知名学者，不会一本又一本地翻译出版外国名著。他说，这件往事他永生难忘。严格的纪律是附中教好学好的保证，几十年后当了华工附中校长的刘敬黄回忆说：“我们当时很怕涂校长，有时我们迟到了，就低着头往教室里冲，生怕碰到涂校长，挨‘刮’（批评）”。

武大附中对课堂教学要求高质量：语文讲唐宋八大家名篇，代数讲范氏大代数，英语除选读英文原版名篇和《读者文摘》英文版的文章外，还学整本的文法。课外也有要求，为了沟通师生之间的关系，涂校长还规定了学生每周要写周记。周记有固定的格式，除了一般记事还有质疑和批评的栏目，这样就便于各班主任了解情况，也加强了学校和学生之间的互相谅解和支持。涂校长还要求学生每天写毛笔字一篇，并有专人收阅检查，练了两年字，学生们的书法颇有长进，有的人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在郑州工业大学任教的俞宝贞教授回忆说：“如果不是涂伯伯当年在附中让我们练大字，我的字要比现在更差。”



武大附中涂校长管理严格，教员教书认真，学生读书用功，在乐山远近闻名。武大附中追求的办学目标，是向当时的重庆南开中学看齐。果然，功夫不负苦心人，武大附中的教学成果斐然，学生成绩优异。高一班前后共约五六十人，经过3年拼搏，1944年高中(第一届)毕业时仅剩21人，全班个个都考上了国立大学，有的还同时接到两三所大学的录取通知。在抗战时期学校较少的情况下，这样百分之百的升学率，实属罕见。一炮打响后，四川省内五通桥、荣县，甚至远到成都，都有不少学生慕名前来乐山，要求转入武大附中，以至于学校一时应接不暇。1944—1946年高中共五个毕业班(半年一期)，升学率很高。

武大附中在抗战艰难的日子里创办起来以后，在涂允成校长和全体教职员的共同努力下，1941—1946年短短的几年间，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有为青年。以高一班为例，史长捷，在高一班读书时就是品学兼优的高材生，年年第一名，武大毕业后，解放前夕参与组织了保护武汉市电信局资产的运动，后来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成了国内外知名的专家；赵宗人，附中毕业后，考入上海交大，几十年来一直在电力系统工作，曾任华中电管局调度局副局长，为华中的电力建设贡献了聪明才智；熊性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孙法理，西南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译著甚丰；王云从，后来参加了武大地下党组织的进步学生运动，曾任中国体育报副总编辑；段华文附中毕业后，在四川大学学法律，后在乐山任中学数学教员，游刃有余，成了乐山地区著名的数学教师；高二班的曹葆铭，后来成为人民日报驻武汉记者站站长，写出了不少优秀的新闻报道和优美的散文。

1941—1946年，武大附中培养的学生中还涌现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其中最有成就的是三位院士，他们是武大附中高一班的欧阳予、初1班的吴新智和初七班的杨弘远：

欧阳予(中国科学院院士)，武大附中毕业后，入武大电机系，后赴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留学，获副博士学位，国家设计大师，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秦山核电站项目总设计师，为秦山核电站的筹备、设计和施工，做出了重大贡献，1999年当选



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新智(中国科学院院士)，武大附中毕业后，在同济大学新生院和上海医学院学习，历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弘远(中国科学院院士)，武大附中初中部毕业，1946年，迁回武汉后在私立博文中学和东湖中学高中部学习。毕业于武汉大学生物系，武汉大学教授。长于植物有性生殖的实验研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武汉大学复员回汉，附中不能随迁，同时涂允成校长将调任江汉工程局局长。涂校长召集全校教师开会，问谁愿意接办附中，没有一人答应。附中面临停办的危险，这必然让众多学生失学。原附中校委会的同仁们经过磋商，建议请武大毕业的乐山籍学生出来接办。恰好，1942年毕业的乐山籍学生唐叔庆在武大工作，他接受了这一嘱托后便与吴正和、欧阳达、杜厚寿、徐平江等几位校友商量。由于大家都有为桑梓教育事业服务的热情，所以一致赞成接办这所学校。同时考虑到对附中情况不熟悉，为有利今后开展工作起见，于是恳请法律系蒋思道教授出任校长，唐叔庆任教务主任，吴正和任训育主任，欧阳达任事务主任，就这样从前任校长涂允成手里把附中接办了下來。

涂允成教授作为一名教育家，在武汉大学长达10年的教学生涯中，一贯认真办事，严谨治学。他在武大教书育人，精于管理，并在艰苦的条件下在抗战大后方的乐山创办武大附中，从严治校，培育英才，为此费尽心血，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表现出极强的事业心和极强的行政能力。10年辛劳，成绩斐然，他的辛勤耕耘和开拓业绩将和他的名字一起，永远载于武汉大学和武大附中的史册！

(作者工作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首任文学院院长闻一多的珞珈留痕

涂上飙

如果说王世杰、李四光、刘树杞、叶雅各、熊国藻等人，在国立武汉大学的基础建设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话，那么闻一多则是国立武汉大学制度建设、学科发展和文化传承的开创者之一。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出生于湖北黄冈浠水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到北京清华学校上学后，改名多。后经同学潘光旦建议加“一”字，于是改名闻一多。1912年，闻一多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22年7月入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学习美术和英语。1925年5月回国，先是任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务长，后任国立中央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

1928年8月，一位身材瘦削、戴着眼镜的年轻学者来到国立武汉大学，此人看上去很年轻，不到30岁的样子；一头浓密黑发，身着长衫布鞋，他就是闻一多。从学校初创来校到1930年6月离开，闻一多为学校的建设发展做了诸多开创性的工作。

一、参与学校管理

作为学校校务会议的成员，闻一多参与了学校诸多事情的筹划。如参与讨论学生的招生、课程设置、违纪处置，教师的聘任、待遇及休假，院系的设置等诸多事宜。

闻一多被聘任为文学院院长，但他还兼任过学校许多职务，如学校图书委员会委员、学校群育委员会主席、学校出版委员会委员、学校入学审查委员会主席、学校考试委员会委员长、学校课程



委员会委员长、学校国文学科委员会委员长、社会科学季刊委员会委员长等，这些职务都是负责学校方方面面的一些重要的工作。图书是一所大学必须具备的，但每年购置多少图书、购什么图书，是要经过认真斟酌的；学校的招生考试、入学审查、课程设置等把关如何，关系到学生的培养质量；刊物创办的好坏，是一个大学学术水平的体现。闻一多在担任这些职务期间都曾为之呕心沥血。

闻一多的职务多，因此参与了学校许多规章制度的起草制定工作，如参与《国立武汉大学学则》《国立武汉大学训育委员会规则》《国立武汉大学图书委员会简章》《国立武汉大学考试委员会组织章程》等规章的讨论确定，亲自拟定了《教员请假规则》等，为学校日益走上规范有序运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创办文学院

1928年8月，闻一多到校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筹建武汉大学文学院。对于文学院的重要性，王世杰校长曾经说过：一家大学能否至臻于第一流，端赖其文学院是否第一流。有了第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诸系，其校风自然活泼，有了好的文学院，理工学生也会发展对于人文的高度兴趣，可以扩大精神视野及胸襟。在闻一多的心目中，文学院应该包括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哲学（一度改称哲学教育）和史学等系。他首先筹设中国文学系。

在学院的建立过程中，闻一多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延聘名师，二是建立相应的学科规范。

1927年南京作为首都以后，中国的学术中心不断南移，一批批学者纷纷南渡。武汉作为中南之中心区域，自然对学者们有一定的吸引力。在国立武汉大学初创的时候，闻一多以他的魅力吸引了不少学术名流，如刘赧、刘异、刘永济、谭戒甫、徐天闵、周贞亮、张西堂、王葆心、游国恩等先生，其旧学功底都非常深厚，尤其以刘赧（博平）、刘永济（弘度）、刘异、谭戒甫、徐天闵和游国恩等先生的旧学研究闻名遐迩。刘赧是黄侃的直系弟子，也是章太炎的“再传弟子”，专治小学。刘异是经学大师王闿运的学生，擅



长经学、诗词。谭戒甫在子学方面著述颇多。刘永济是《文心雕龙》的研究专家，又以研究词学著名。徐天闵则以诗学见长。游国恩是著名楚辞研究专家、文学史家，后来成为北京大学的一级教授，闻一多研习楚辞多受其影响。除此之外，他还引来一批从事新文学的研究和创作者，如朱世臻（东润）、沈从文、孙大雨等先生。师资的大汇聚，为文学院的繁荣昌盛打下坚实基础。

文学院创设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社会所需要的、有素养和有知识的专门人才。人才的培养得有相应的学科规范。在闻一多的主持下，文学院先后制定了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的培养要求。包括必修科目、选修科目的设置，学科时数的确定，教师授课的基本要求等。

他除了负责文学院的培养要求的制定，还常常负责全校的一些培养规范的制定。如1930年5月8日，学校第75次校务会议确定，由闻一多会同石瑛、陈源、李儒勉等教授，共同会商学校基本英文的教授方法及授课时间。闻一多提出了英文授课按入学考试的成绩分为两类：第一类，入学成绩在70分以上者，每周学习3小时；第二类，入学成绩在70分以下者，每周学习4小时。教法要求：第一类学生文法练习，每周1小时；第二类学生文法练习，每周2小时。每组每月都应有3次写作练习。最后获得学校通过，照此执行。

三、改名珞珈山

现在的人都知道，武昌有个珞珈山，珞珈山上有座武汉大学（珞珈山上建黄门）。可以说珞珈山与武汉大学齐名，甚至珞珈山就成了武大的代名词了。若要追溯此名之由来，首先要提到首任文学院院长闻一多。

珞珈山在闻一多改名之前，大体有如下几种说法：

第一说是“落驾山”。传说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庄王为了平定东部的叛乱，从郢都一路东征，结果很快平定了叛乱。因死伤的人员不多，楚王决定继续出征，并将军营移到东湖西南岸一座风景秀



丽的小山上。在此，楚王为鼓舞士气，对参加平定叛乱有功的人进行了嘉奖，还赦免了参与叛乱的人。这样，全军上下斗志昂扬，楚军在战斗中又接连获胜。后来，人们就把楚庄王设营的这座山叫做落驾山。也有一种传说，吴王孙权巡视江夏，因天降大雨，停车驾于此暂避。两国国君都在此“落驾”，于是此山就具有十分高贵的身份了。因当时没有开发，此山就成为人们归葬的理想之地了。民国总统黎元洪在天津去世后，一心想落叶归根。他的理想之地就是埋葬在珞珈山。虽因王世杰校长反对迁葬不成，但其子黎绍基、黎绍业用他们父亲筹集修建江汉大学的资金，在珞珈山修建了以黎元洪名字命名的“宋卿体育馆”（黎元洪字宋卿），以表达黎元洪对珞珈山的念想。

第二说是“落袈山”。在远古的时候，传说观音菩萨有一次路过此山，落下袈裟一件。于是人们就把这座山取名为落袈山。也有人说是它是来自梵文中的“洛迦山”的谐音。传说中的洛迦山是观世音菩萨说法的地方，是有名的佛教圣地。洛迦山翻译为汉语就是“光明山”“小花树山”等意思。它在印度的南海岸，为观音的住所。

第三说是“罗家山”。新校区建设前，山上的山头、坡地、水田及荒地分属于几百户人家。其中较大的一座山原是一家姓罗的所有，所以此山又叫罗家山。

闻一多到来之后，无论叫落驾山还是罗家山，总觉得差点什么，于是就改成了具有一定含义的珞珈山。珞，是石头坚硬的意思；珈，是古代妇女戴的头饰。“落驾”与“珞珈”二字谐音，寓意当年在落驾山筚路蓝缕、劈山建校的艰难。

四、主持设计校徽

由于闻一多是学艺术出身，且擅长书画，在学校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他被安排负责校徽的设计工作。1929年3月27日，学校召开第69次校务会议，专门讨论了制订校徽校歌一事。会议决议：全校的教职员以及学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爱好优势，设计提出校徽校歌的式样。由文学学院院长闻一多负责对所有设计图样进行审



核，最后提交校务会议审定。学校通告发出后，响应者不多，且设计的图案不尽如人意。1929年5月1日，学校第74次校务会议对校旗、校徽、校歌的制订作了进一步的规定：推举闻一多、陈通伯、袁昌英和时昭瀛几位教授进行会商，设制出几套图案供全校员工选择。在大家选择的基础上，最后由闻一多审定后报校务会议决定。

1930年6月，闻一多离开学校后，校徽、校歌制订工作就暂时停顿下来。1931年2月20日，学校第109次校务会议再次提出校徽、校歌的征求工作。由于进展缓慢，4月24日的校务会议作了明确规定：在原有闻一多工作的基础上，校徽用“武大”二字，具体工作由刘博平、王星拱、林淑华、燕召亭、时昭瀛、陈通伯、朱东润、萧君绛等教授完成，报校务会议通过。最后，以篆体“武大”红底白字为校徽。另一种篆刻的“国立武汉大学”六字图案作为征集过程中的备用品，最后也流传出来。总之，学校曾经使用的两枚校徽，都凝聚着闻一多的心血和汗水。

五、带着遗憾离开

1930年6月，闻一多离开武汉大学。他的离开也许与当时旧派力量越来越强大有关。中国文学系经过闻一多的努力建成后，很快就分为新旧两派。旧派有刘赧、刘永济、谭戒甫、徐天闵等先生，新学有闻一多、朱世臻（东润）、沈从文、孙大雨等先生。两派常有争论，互有评品。对于新旧之争，王星拱校长曾经劝说过：“中国旧文学是根，新文学是花。有根始有花，有花而根始丽。两者相辅相成，实不应厚此薄彼。”在王星拱校长的调停下，新旧两派曾经一度共生共荣。

闻一多来武大，先是任文学院筹备主任，后任院长。虽为院长，但在中文系却没有他的发言权。他在中央大学任教一年，教过英美诗歌、戏剧和散文，也感觉到自己的一些不足。所以，闻一多在中央大学时就开始广泛涉猎古典文学，来武大后继续下苦功，但一直未能在中文系授课。闻一多为改变中文系的风气，曾经请外文



系的朱东润先生为中文系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结果收效甚微。沈从文因出身低微，文化程度偏低，当时虽讲授新文学研究，但表达十分有限，因而经常会碰到一些窘况。

闻一多离开武大的直接原因可能与刘华瑞教授的发难有关。闻一多主持的《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创刊后，中文系刘华瑞教授的一篇谈江汉文化的文章要求在刊中发表。闻一多看后，认为刘华瑞的文章荒诞不经，不予发表。这一举动激怒了刘华瑞，他在跟随其练习武功的学生中进行了宣泄。激于义愤的练功学生就给闻一多去函揭露此事，并要求其辞职。学校得知此事后，对为首滋事的学生冯名元、汪守宗进行了处理。

1930年6月16日，校务会议讨论了文学院学生“通函揭帖”排斥文学院院长案。议决：此事涉及学校纪律，按照学则第17条的规定，将鼓动滋事的学生冯名元、汪守宗开除学籍，并令其即日离校。同时，王世杰校长居中进行调解、竭力挽留闻一多。然而，闻一多去意已定，辞职回到浠水老家，此后再也没有回过武大。

时间虽然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但武大人没有忘记这位老院长。为了纪念这位为学校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功臣，1985年，学校在老图书馆东侧的文学院（现为数学与统计学院）旁，树立了闻一多的一尊半身铜像，并请国家主席李先念为其题名，寓意着闻一多永远活在珞珈山人民心中！

（注：节选自涂上飙编著《武汉大学故事》，长江出版社2017年版，第41-48页）

（作者系历史系1986级校友）



曾经在武汉大学和湖南大学工作过的湖南名流们

涂上飙

武汉大学和湖南大学是中国两所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学，在其发展壮大过程中，不少湖南的先辈们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在此撰文，说说他们在学校的经历及做出的贡献，以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

一、胡庶华

胡庶华(1886.12.24—1968.6.17)，中国早期有名的教育家，冶金学家，柏林矿科和工科大学博士，湖南攸县人。1920年，他获铁冶金博士学位后回到中国。当时湖南大学的前身之一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需要聘请知名专家。他被聘为教授，并担任事务主任。两年后的1924年，武大的前身国立武昌大学创办，校长石瑛决定改变原师范大学的性质，向综合性大学发展，聘请了不少名流，胡庶华被聘为教授。胡庶华为学校的转型及工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932年、1940年、1944年，胡庶华三次任湖南大学校长，还担任过同济大学、重庆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校长。一生从事冶金学的教学和研究。著有《铁冶金学》《冶金工程》《中国战时资源问题》《钢铁工业》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钢铁学院教授兼图书馆馆长。



二、李达

李达(1890.10.2—1966.8.24),号鹤鸣,湖南零陵(今永州市)人。1913、1917年李达先后两次赴日本留学。1920年夏天,李达从日本回国后,除了参与共产党的系列活动外,还在湖南大学的前身之一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后到湖南大学担任教授,主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949年12月2日,李达被毛泽东亲自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他也是由中央政府最早任命的大学校长之一。1950年2月18日,李达就职湖南大学,不久配合政治需要对湖南大学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主持了爱晚亭的重建工作。1952年11月,李达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从1953年2月24日正式在武汉大学工作直到去世,李达在武大主政长达13年,成为目前主政武大时间最长的校长。著有《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等。

三、任凯南

任凯南(1884.10.11—1949.7.16),湖南省湘阴县(今汨罗市)人,民国著名经济学家。早年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经济学,获经济科学士学位。回国后,在湖南大学的前身之一湖南商业专门学校任校长及在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任教,讲授经济学。1926年,湖南商业、工业、政法3个专门学校合并为省立湖南大学后,任经济学教授。1928年当选为湖南大学校长。1927年8月,国民政府大学院决定创办国立武汉大学,他被聘为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经济学教授。1932年10月任经济系主任,后兼任法学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1937年7月,湖南大学改为国立,应邀回湖大任教务长。他学识渊博,在经济学方面造诣尤深。在武汉大学执教时,在经济学界已被誉为“南任北马(马寅初)”两大家之一。



四、刘秉麟

刘秉麟(1891.6.24—1956.6)，湖南长沙人，近现代著名经济学家，武大校友、改革开放初期教育部部长刘西尧的伯父。曾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经济学。1917年在湖南大学的前身之一湖南商业专门学校任教，讲授经济学。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到国立武汉大学任经济系教授。1937年兼任法学院院长，多次代理校长。20世纪40年代被聘为“部聘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武汉大学教授，兼任法学院院长。1950年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并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全国院系调整后，他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编译主任。1956年6月在武汉大学逝世，终年65岁。著有《经济学原理》《各国社会运动史》《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史》《李嘉图经济学说及传记》《亚当·斯密经济学说及传记》《李士特经济学说及传记》《近代中国外债史稿》等。

五、皮宗石

皮宗石(1887.8.23—1967)，字皓白，湖南长沙人，近现代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学家。早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后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经济学。留学回国后，与刘秉麟、任凯南、李剑农、杨端六等湖南名流同在湖南大学的前身之一湖南商业专门学校任教，讲授经济学。1928年9月应邀到国立武汉大学任社会科学院教授、院长。1929年6月社会科学院改为法学院，继续任教授、院长，讲授财政学课程。1930年兼任法学院经济学系主任。1933年4月，任武大教务长兼图书馆馆长。1934年10月兼任法学院法律系主任。在武大执教9年，致力于武大特别是法学院的建设与发展。1936年7月辞去武大一切职务，应湖南省政府邀请任湖南大学校长。1949年7月至1949年12月再任湖南大学校长。1950年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54年任湖北省政府参事、湖北省政协常委。



六、杨端六

杨端六(1885—1966.9.30),原名杨勉,后易名杨超。湖南长沙人,近现代著名经济学家。1913年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回国后曾在湖南大学的前身之一湖南商业专门学校任教,讲授货币银行学。1930年后一直受聘于国立武汉大学,曾任法学院院长、教务长、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文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1938年,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任迁校委员长。20世纪40年代被聘为“部聘教授”。曾兼任国民政府参政员、军事委员会审计厅上将厅长,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武汉大学教授,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是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著有《记账单位论》《商业簿记》《现代会计学》《六十五年中国贸易统计》《工商组织与管理》等十多种著作。其夫人袁昌英是武大外文系著名教授,其子杨弘远是武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七、李剑农

李剑农(1880—1963.12.14),湖南邵阳人,近现代著名经济史学家、历史学家。早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后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曾在湖南大学的前身之一湖南商业专门学校任教,讲授政治学。1930年受聘于国立武汉大学,任文学院教授兼史学系主任,讲授中国近代政治史和中国经济史课程。1940—1946年,李剑农执教于国立师范学院,后借聘于湖南大学。1947年重返武汉大学执教直到去世。1956年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他对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变化作了系统的研究,对中国近代的政治也有翔实的探讨。著有《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经济学概论》《先秦两汉经济史》《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宋元明清经济史》等。



八、曹绍濂

曹绍濂(1904—1999)，湖南衡阳人，法学、历史学家。20世纪20年代初期就读于巴黎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在法国、英国、德国等大学任教，“九一八事变”后毅然回国。20世纪40年代任教于湖南大学，担任过文法学院、法学院政治系主任。1947年始任国立武汉大学教授直到去世。他在武汉大学从事美国政治制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是中国研究美国政治制度的拓荒者和著名专家。著有《近代欧洲政治社会史》《西洋古代史》《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政治制度史》《论美国民主》等。

九、谭戒甫

谭戒甫(1887—1974.12.27)，原名作民，改名铭，字介夫，又用介甫二字，湖南省湘乡县(今涟源市)人，先秦诸子楚辞金文专家。1928年在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任教，讲授“诸子要论”“诸子专书研究”“目录学”“形名学”。1945年到国立湖南大学任教授、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53年高校院系调整，调回武汉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着力研究先秦诸子、楚辞和金文。他一生主要研究先秦诸子，次为楚辞、西周金文。在先秦诸子的研究方面，主要有《墨辩发微》《公孙龙子形名发微》《墨经分类译注》《庄子天下篇校释》《屈赋新编》等著作。他的学问得到毛泽东的赞赏与鼓励，与毛交情甚好。1957年毛泽东还邀他在自己家中作客，并多次通信给以鼓励。1958年毛泽东到武汉，一见谭便说：“关于《哀郢》一文，已经看过，可以发表。”

十、余志宏

余志宏(1916—1972.10)，湖南省醴陵县(今醴陵市)人。1937年秋考入国立中山大学经济系。1948年7月，由王东原介绍到湖



南大学当讲师，在学校宣讲马克思主义。1949年8月5日，人民解放军进驻长沙市区，湖南宣告和平解放。当组织上问及余志宏对工作分配的意见时，余志宏表示还是想到大学教书。于是中共湖南省委分配他担任接管湖南大学的军代表、兼湖南大学的秘书长。1951年秋，余志宏调到北京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大学任临时党委副书记兼副教务长。当时李达已调武大任校长。1956年，李达校长创办哲学系需要余志宏的帮助，他于是辞去了临时党委副书记、副教务长的职务，担任了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兼副主任职务。后来李达辞去兼任的系主任，便由余志宏兼系主任。他为了办好哲学系，亲自授课、写文章、编书，孜孜不倦，耗费了全部心血。

十一、文斗

文斗，号拱之，湖南宁乡人。湖南大学工学院电机系毕业，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大学工学院研究生，曾获得 D. L. C. 学位。1938 年以前在湖南大学电机工程系任教授，1938 年以后任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电机系教授、工科研究所电机工程学部主任。

十二、席启骊

席启骊(1896. 7. 14—1966. 6)，字鲁思，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人，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武汉大学“五老”(刘永济、刘博平、陈登恪、席鲁思、黄焯，一说是徐天闵)之一，人称“鲁老”。1925 年任国立武昌大学教授。1928 年秋至 1938 年夏，任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1946 年秋直到去世，任武汉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讲授过《文选》《文心雕龙》《古代文学》《先秦诸子》及“陆游研究”等。熟读经史，大多能诵。治学严谨，不赞成对事作繁琐之考证，主张讲明大义，考证源流。精于小学，尤其对许慎的《说文解字》造诣尤深。他在许多高校讲授过文字学，口讲手画，深入浅出，闻者忘倦。他虽满腹经纶，但惜墨如金，著述不轻易示人，不以著作名世。一生只有《文选学》讲义、《世说中当时语释》以及《诵帚龔词集



序》等少数著作流传。

十三、刘永济

刘永济(1887—1966)，“五老”中的第一位，字弘度，人称“弘老”，湖南新宁人，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武汉大学中国古典文学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早年在复旦公学、清华学校学习，1932年秋至1937年在国立武汉大学任教，1939年在湖南辰溪的湖南大学任教。1940年重返武大，1942任文学院院长，1956年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刘永济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对屈赋和《文心雕龙》研究颇有成就。著有《文学论》《十四朝文学要略》《文心雕龙校释》《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屈赋通笺》《唐人绝句精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元人散曲选》《屈赋音注详解》《刘永济词集》《十四朝文学要略》《微睇室说词》等。

十四、刘异

刘异(1883—1943)，字夔龙，号隼礼，湖南衡阳人，经学家。1933年8月，任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武汉大学西迁乐山以后，他调往湖南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著作有《目录学》《国文选读》《春秋经十一卷》等。

十五、周鲠生

周鲠生(1889—1971)，原名周览，字荫松，湖南长沙人。早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1913年转赴欧洲留学，先后获英国爱丁堡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和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8年7月，国民政府大学院决定建立国立武汉大学。周鲠生来到武汉大学，参与国立武汉大学筹建工作。1929年9月至1939年6月，先后担任过国立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法律系主任，法科研究所所长、教务长。后赴美国从事讲学和研究。1945年7月



回国，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被湖南大学聘为名誉教授。他是著名的国际法研究专家，20 世纪 40 年代的“部聘教授”，首批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著作有《万国联盟》《法律》《近代欧洲政治史》《近代欧洲外交史》《领事裁判权》《解放运动中对外问题》《最近国际政治小史》《不平等条约十讲》《国际政治概论》《现代国际法问题》《近代各国外交政策》11 部。

十六、汤璪真

汤璪真(1898. 2. 3—1951. 10. 9)，字孟琳，湖南湘潭人。曾留学德国，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数学家之一。1926 年，汤璪真谢绝了德国朋友的挽留，与章伯钧等人同时回国。归国后，年仅 28 岁的汤璪真任国立武昌大学(武汉大学前身)教授，直到 1943 年。1947 年，汤璪真任教于湖南大学。在中国早期现代数学家中，汤璪真是研究微分几何的开拓者之一，曾与数学界名流韦尔(Weyl)、施乌顿(Schouten)、莱维-齐维塔、杜斯切克(Duschek)等屡次讨论绝对微分学。汤璪真精通英语和德语，还懂法语。汤璪真生前与毛泽东有着长期的友谊。作为毛的同学、同乡和老友，他多次到中南海毛泽东家做客。主要著作有《几何与数理逻辑——汤璪真文集》《新几何学》《绝对微积分学》等。

(作者系历史系 1986 级校友)



传感领域的“跨界”英雄

——记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张学记

王 军

校友名片：

张学记，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本科，1994年获武汉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北京精准医疗与健康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生物检测监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会士，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委员。回国前任(美国)世界精密仪器公司首席科学家、高级副总裁。2009年入选中组部“千人计划”回国。已在国际一流刊物发表论文近400篇，获得专利75项，在Elsevier、Springer、科学出版社共出版中英文专著7部。已有30余项技术产业化，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得到广泛应用。多次担任国际学术会议学术委员会委员、分会主席，在国际学术会议作大会报告或专题学术报告60多次。获首都劳动奖章，全国创新争先奖，中国杰出工程师奖，当选科学中国人年度人物。2012年经中央提名(全国2名)，当选中共十八大党代表，成为国家“千人计划”科学家中的唯一代表。

人类在与癌症对阵的痛楚时刻，常会尴尬地意识到，现代文明尚未走上终极巅峰。变化多端的癌细胞，像极了柯南道尔笔下的“犯罪国王”莫里亚蒂，神秘、危险、不遵常理。在波谲云诡的生



死迷局中，还没有人敢自恃为它的克星。

事实上，大部分癌症患者在确诊时就已经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假如早期诊断系统可以像夏洛克·福尔摩斯一样洞悉一切，将危机预警提前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那就等同于为患者争取到了一线生机。

造就这个“传奇”的不是某位知名医师，而是世界著名化学生物传感器专家、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北京科技大学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张学记。



“执拗”的“大牛”

在北科大，为人谦和的张学记教授被称为“大牛”。学生们常说：“听听张教授的‘牛人牛事’比吃饭更有营养。”

确实，他的科研履历精彩至极——早在1994年读博时，他研发的纳米传感器就获“中国大学生应用科技发明大奖赛”特等奖；自1989年投身生物化学传感器研发至今，已开发出30余种相关产品，被全球100多个国家广泛使用，创造了近亿元的经济效益；留学美国期间，开发的微型化自由基电化学检测系统，运用在航天飞机和宇宙空间站，获得了世界认可；由于成就卓越，他被聘为美国世界精密仪器公司高级副总裁、首席科学家，成为该公司近50年来聘任的首位外籍高级副总裁；迄今为止，他已在《美国化学会志》《分析化学》等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中英文研究专著7部，申请/获批专利45项。

不过，让更多人对他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执拗”。

在国外的15年间，所在公司和身边的朋友多次建议张学记加入美国国籍，“淘金族”梦寐以求的美国护照触手可得，他却不为所动；2009年，正值事业蓬勃向上的“黄金期”，祖国发起“千人计划”号召，他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放弃优厚的工作待遇和优越的



生活环境回国。

旁人眼中的意外，对他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从小学念到博士，整个教育阶段我几乎没有花家里的钱，所以总觉得欠祖国和人民的一份情，希望能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回报祖国和人民。出国时我就没想永久留在国外，在我内心深处，也从未改变过报效祖国的愿望。我们的先贤也曾经讲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新一代知识分子，我们更应该有这样一份责任，这样一份情怀，为祖国的繁荣和富强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如果癌症预警可以提前 18 个月

2009 年 10 月，张学记作为中组部“千人计划”引进人才进入北京科技大学工作，着手组建生物工程与传感技术研究中心。进校第一天，他就给自己定下了目标：抓科研、带学生，致力于把科研成果产业化。这也正是中国科技版图的命脉部分。

摆在眼前的第一个命题就是，选准方向。留美期间，张学记接触的多为精密仪器、传感器件、新材料领域，但基于知识产权和保密制度，回国后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发自那一颗“为万世开太平”的初心，他将科研方向瞄准了生物医学工程，尤其是病魔之王——癌症的早期检测。

是的，这片领域是与死神和魔鬼抗争的世界。近年来，全球平均每 8 个死亡病例中就有 1 人死于癌症，比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导致的死亡人数总和还要高。在我国，恶性肿瘤俨然成为了威胁国人健康的最大杀手，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每 10 万人中就差不多有 285 个人发病，每年新发肿瘤病例约 312 万例，平均每天新增肿瘤病患 8 550 人，也就是说，每 10 秒钟，中国大地上就有 1 个人被诊断为恶性肿瘤。张学记向记者介绍：“我国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大量临床数据显示，大部分的肿瘤患者在目前的影像学检查确诊时，已丧失了治疗的最佳时机。更为严峻的是，其中一些疾病，如乳腺癌、颅内肿瘤等的发病率还在呈逐年



上升态势。在这种背景下，防患于未然就显得尤为关键了。”

作为一种进行性发展疾病，恶性肿瘤的某些重度癌前病变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间，预防得当就有可能阻滞、延缓肿瘤的发生。举例来说，按照目前的医疗水平，早期胃癌患者治疗 5 年，生存率可超过 80%，而对晚期患者，治疗 5 年，生存率仍低于 10%。然而，目前的现实状况是，临床医学上所采用的各种检测手段很难满足肿瘤的早期诊断需求。

张学记一直致力于应用化学、材料、生物技术等不同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对生物体系或环境体系中的微量、痕量分子信号直接的相互作用与动态联系进行捕捉和信号转换，进而获得高灵敏的定量分析结果。在他看来，在看似神秘的生命图谱中，大多数疾病都是有迹可循的。

基于传感技术的癌症早期诊断系统由此立项，目前已经得到国家药监局的临床实验许可，进行了 3 万多次的临床试验。这个系统可以在肿瘤形成之前提前 18 个月进行早期预警，毋庸置疑，一旦它应用于临床，将会成为世界医学领域的重大突破。为了更好地进行临床实验，经上级批准，张学记兼任 301 医院临床生化部副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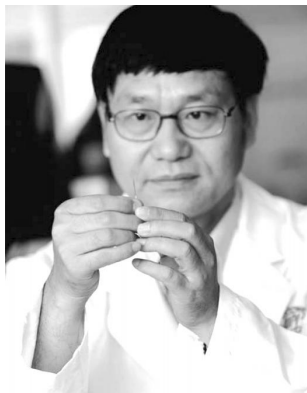
造就癌症预警领域的“神探夏洛克”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除了扎实的专业功底、卓越的研究团队，张学记更视“创新”为科研的灵魂。他常说：“创新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兴趣，二是有需求，正所谓兴趣驱动，需求牵引。”这项由需求牵引的成果，借助于纳米技术和微加工技术，结合酶催化放大、纳米技术放大、现代生物放大技术等检测信号增强策略，建立了新型生物传感与成像检测体系，综合应用了电化学传感、固体纳米通道、多模成像分析、光学生物传感、光电化学传感、质谱成像技术及微透析技术等多种手段。其中，生物传感与成像新策略构筑了新型生物传感界面，设计出具有高稳定性、可控性和高选择性的分子识别与信号提取及放大体系，发展了高灵敏性、高选择性、时空分辨的传感与成像技术。这在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原创性的分子诊断平台等方面均显示出独特的优越性，为乳腺癌等重大疾病的分子机制研究及早期诊断提供了分子基础和关键技术。

用五年时间打造精英团队

北大生物工程与传感技术研究中心并不大，不足 600 平方米。不过，从建立第一天开始，“顶天立地”的四字方针一直说得底气十足。顶天，就是要做一流的研究，出一流的研究成果，出一流的人才；立地，就是要把研究成果产业化，商业化，应用于实际，应用于社会。

中心筹建过程中，张学记遇到过很多棘手的问题——人员少、资金短缺、实验场地不足，创业不可谓不艰辛。即使有各级领导和学校的大力支持，实验室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也都必须做到事无巨细、样样关心。

为了打造一流的科研团队，他从海内外多所著名院校引进了多名化学、生物、医学、计算机专业的科研人员，





还依靠北科大材料、化学、生物等实力雄厚的重点学科，以学科交叉、融合为思路，着力搭建一流的学术研究平台。他说：“要想成为一流的大学，一流的企业，一流的国家，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流的人才。一流的设备可以买，一流的大楼可以造，但离开一流人才去使用和管理，就都是空谈。”

与吸纳人才相比，培养人才更加耗费心神。“我发现很多研究生都不敢去创新，因为博士生毕业有在核心期刊发3篇论文的硬指标，而实际上有时候做一个真正的创新性的研究需要5年或更长时间。如果真去做原始创新，许多学生恐怕都毕不了业。对老师的考评亦是如此，新老师过一两年就要考核，达不到要求就不会续聘，因此很多人只有做一些边边角角的修补或跟踪性研究。”

为了重建大家的科研精神、培养团队的国际视野，中心陆续建立了定期研讨会和学术汇报制度，并大力搭建国际交流平台。他邀请多名国际著名科学家，发达国家科学院院士，包括诺贝尔奖评委、诺贝尔奖候选人担任北京科技大学名誉教授；同时接受多批美国、加拿大、欧洲的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到北科大合作交流和访问。除此之外，他还先后选派多名教师和研究生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日本东京大学、日本京都大学、弗吉尼亚大学、欧洲一些大学及研究所学习交流。

为了引导更多有创新思维的年轻人入门，中心同时为本科生聘请了加拿大大学和美国大学教授为夏季小学期授课专家，张学记本人也在百忙之中专门为本科生开设了课程。他在课堂上说：“自由创新、善于发现、科学思维，要在科学研究道路上越走越远，勤奋才是真正的智慧。”据说，这门课程几乎无人缺课，有讲座时更是连过道上也站满了人。最让学生们佩服的是，他能把枯燥的生物化学传感、自由基化学分析等课程，讲得像故事一样引人入胜。

经过5年的悉心耕耘，如今中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以纳米生物传感技术、生物能源、生物医药和产业化研究推广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前沿基础研究基地、人才培养基地和技术创新基地。目前拥有教授4人、副教授4人、讲师2人、教师博士后2人、在校硕士研究生30多人、博士研究生20多人。



研究团队以发展传感技术为特色，目前已扎根生物分析化学及生物传感器件等研究领域，以分子识别为基础，从生物传感界面构建、传感信号放大机制以及传感基础理论三个方面入手，在生物功能材料的有序组装、仿生微纳界面、生物传感与功能器件的构建等诸多领域做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工作。相关成果发表在 *Chem Rev.*, *JACS*, *Angew. Chem. Int. Ed.*, *Adv. Mater.*, *Anal. Chem.*, *Chem. Commun.*, *Bioelectrc. Biosen.* 等知名学术刊物上。5 年来，中心有一位教师破格晋升，成为北京科技大学最年轻的正教授，还有多位教师入选教育部、北京市的人才资助计划。

在张学记的主持下，中心与日本东京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南佛罗里达大学、瑞士联邦理工、瑞典大学、斯洛文尼亚国立化学研究所等 10 余所国外大学、研究机构及多家国内外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10 余项，其他各类基金课题几十项，并且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比如：在复合纳米结构材料探针的组装、化学传感机制和高灵敏传感技术方面发展了一系列性能优异的生物传感器；在仿生纳米材料制备和仿生生物界面构建等方面取得了多项创新性成果；受鼻黏膜中分形结构的启发，实现对凝血酶的快速灵敏检测，发展了高灵敏肿瘤标志物检测技术；在纳米传感界面的构建基础之上，发展了一系列高效生物分子探针的设计策略；以电化学技术和荧光技术为手段，建立了一系列可以快速、方便和灵敏检测核酸片段的新方法；通过集细胞转染和胞内分子高效识别多功能纳米探针的组装，实现了肿瘤细胞内某种特定分子细胞成像的检测。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团队上下的共同努力下，2013 年，生物工程与传感技术研究中心被评为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未来的任务是成果孵化

在搭建团队的同时，张学记身先士卒，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其中包括国家“千人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基础仪器专项项目“新型高分辨扫描电化学显微镜的研制”，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纳微一氧化氮电化学传感器及其用于卵母细胞受精过程中一氧化氮的原位时空分析”“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microRNA 分析及新型纳米探针的研究”，科技部、教育部科研项目及北京市科委“生物工程与传感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2013 年度科技创新基地培育与发展工程专项项目”等，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首先，在免疫分析、纳米生物传感、细胞分析化学和临床分子诊断以及微流控分析等方面，他创新性地提出溶胶、凝胶气相沉积法和 4 种多分析物免疫检测的分辨新概念，构建了一系列免疫分析新原理；研制成多种原创性的纳米生物传感器；建立了极高灵敏度的 PCR-电化学检测方法；开辟了纳米量子点电化学传感新领域，包括纳米生物传感器与生物芯片、纳米材料与生物分子相互作用、生物电化学与生物光谱等研究工作；致力于发展高灵敏度、高特异性、廉价、快速、便携的集成化生物传感器与生物芯片；通过生物分子与无机纳米材料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调控，发展新一代生物检测技术。

其次，在微纳型化生物医学工程技术领域，进行了微流控芯片分析器件的构建、纳米医学智能化药物载体和纳米驻极体器件的分



析研究。其中微流控芯片个性化医疗抗肿瘤药物筛选平台可以实现四大效果：一是在一块1平方厘米左右的微芯片上对多种细胞的图案化培养和药物处理，每一块图案化细胞仅有10个细胞左右。二是在药物处理之后的给定时间点对细胞进行凋亡染色的图像结果分析，能够对多种给药条件进行结果分析。三是在图像分析之后能够将单个细胞团块进行基因表达的分析研究，从而发现细胞产生耐药性的机理。四是在该平台能够完成从细胞高通量培养到细胞全基因表达谱的分析，从而完成“从图像到基因”的药物完全筛选分析平台的构建。纳米图案化与驻极体器件是非传统微纳米图案化技术的开发及其在生物、化学传感及能源器件上的应用，基于驻极体材料的自组装和聚合物刷的制备与应用。

同时，张学记还致力于开发智能化传感界面构建技术与方法，主要包括仿生界面的构建与应用及表面增强拉曼界面的构建与高效的检测分析。以生物传感应用为导向，合成多种生物纳米材料，将生物传感与纳米技术相结合，通过纳米组装与分子识别作用，开发多种原创性的纳米生物传感器。例如针对目前水下超疏油薄膜机械强度差等问题，受自然界中贝壳珍珠层的启发，基于天然黏土和聚电解质制备了仿珍珠层薄膜，该薄膜表现出优异力学性能、良好的水下超疏油性质和优异的环境稳定性。



此外，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生物识别技术作为信息安全和个人身份识别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已成为国际上身份鉴别领域的研究热点，其中指纹识别技术是最成熟、准确、价格低廉和容易使用的。为了探索基于电化学原理的指纹传感技术中的实验和理论应用基础研究，他建立和发展“电化学指纹传感器”的新概念和新方法，解决现有光学或半导体指纹传感技术对如纸币、纺织物、皮肤以及复杂彩色背景材料等表面的指纹不能传感或传感质量差的问题，张学记着眼于新材料、新传感技术在法医学证据采集方面的拓展，如潜指纹显现及图像采集技术。最近，张学记又将研究向第二代生物识别技术——指静脉生物识别及 DNA 生物识别推进。

不难看出，与癌症早期诊断系统一样，张学记关注的每一个项目，都更重视研究成果的产业化。他说：“创新包括原始创新、基础应用研究、产业化商业化等多个环节，要让成果转化必须要专业的转化平台和孵化器，需要既懂科技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利用我国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产学研”结合，加速开展化学生物传感器及其测量系统的市场化探索，是他给自己设置的主要课题之一。为此，2015 年，在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张学记牵头创立了中国生物监测产业创新联盟并任理事长。

回国 5 年多来，张学记在世界知名的科技出版社德国斯普林格出版英文专著 2 部；申请发明专利 25 项，获得国家授权专利 13 项；在国际著名学术研究期刊发表 SCI 论文 100 余篇，其中影响因子大于 5 的 50 余篇；在国际会议作大会报告、主题报告及邀请报告 25 次。2012 年 6 月，经中央提名，张学记当选为“千人计划”科学家中唯一一位中共十八大代表。2013 年，当选为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2014 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中国化学会理事；2015 年，当选为国际传感器科学会议主席。

这位曾经的瑞士杰出留学学者奖、GCAA 终身成就奖和世界杰出华人奖获得者，用一句诗意的语言诠释了自己的这一切——“一个人的巨大成功果实，往往挂结在爱国主义这棵常青树上”。

（原载《科学中国人》2015 年 12 月）



这条道，铭记终生

——我与老师樊凡的点滴往事

王慧敏

每次到武汉出差，我都会抽空到武汉大学去，目的是走走珞珈山的那条土路。

土路，缠绕在珞珈山的半山腰，依次串起了教工住的南三区、本科生住的梅园、研究生住的枫园。在一切都“被现代化”了的今天，这条剖土为基、杂树夹峙的弯弯曲曲的土路，能一直保持着原来的风貌，确实是个异数！

这条路，连着我和武汉大学的樊凡老师。20多年前，我在武大读研究生时，曾师从樊老师。当时他是系里最年长的老师，不仅学问做得好，且宅心仁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永远都保持着温文尔雅、不紧不慢，总让人想到“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这句话。

第一次走那条路，是新生报到后不久。那时候樊老师还住在南三区。那晚，具体是什么原因在老师家逗留久了，现在已记不清了。回去时，恩师执意要送。我说一个大小伙子，在校园里走害怕什么。说完，想匆匆逃掉。恩师一把拽住了我，回头急急对师母史老师说：“快拉住他，拉住他。我去找手电。”

恩师解释，前不久那条路上发生了抢劫案。于是，在那条弯弯曲曲的土路上，一老一少并肩在手电的光晕里迤迤走着，光柱把两人的身影拖得很长很长。老师那晚的话也永久印在了心上：你们搞文字的，只有不断增加学养，笔头才常有亮色；犹如树，只有不断施肥才能根深叶茂……



又一次被恩师相送，是两年后的一个雪夜。那次晚归的原因，至今仍记得很清楚：樊老师对我毕业论文的导论不甚满意，一遍又一遍地抠。细致到了每一个措辞，每一个标点。等到抠完，已经夜里一点多了。恩师探头看了看窗外：“还下着呢。我送你。”不由分说便率先出了门。到了底楼，他突然站住了：“等一会儿。”旋即折了回去。再下楼，他手里多了一样东西——一把手柄弯曲的破伞。他塞给我：“你拿着。伞布坏了，但可以当拐杖用。”

这一次，是一老一少搀扶着走完了那条土路。过了梅园，我催他回去，他不放心，一直送到了枫园路口。我又催他回去，他执意仍往前送。一直到了枫园三舍的台阶处他才站定，不断叮咛：“台阶滑，慢着点，慢着点。”

走到一舍门口，我回头看，他还在路灯下目送着我，风很大，纷纷扬扬的雪花扑打着他的肩，帽子上已落了厚厚一层……

20多年过去了，自己已从青年步入了中年，其间走过了多少路，实在记不清了。但珞珈山腰那条土路，始终如影历历。耳畔，也始终回响着恩师那款款的广西口音！

（编者注：2013年120周年校庆时，这条环山路已修葺一新，成了一条宽敞、整洁的水泥路了。）

（作者系新闻系1991级校友）



忆家父王世杰

王秋华

我小时候，正是父亲王世杰年轻力壮、终日从事教育或奔波国事的日子。平日我们子女少有机会与父亲相聚，但是每到周日，父亲无论如何忙碌，也会抽出一天时间带我们去爬山，到野外去散步，或观访深山中游客罕到的庙宇。登山散步时，他就会教我们念诗，或考验我们背诵诗词，我所能背诵的唐诗宋词差不多都是这样学来的。父亲有一支特别的手杖，杖头由两片可折合的圆形木环组成，杖端则是一支约6寸长的铜锥，走到稍平坦且可眺望远景的小山头时，他就将手杖插入土中，坐在杖头圆环左右分开形成的座凳上，朗诵诗词，或向我们讲他的童年往事。父亲的记忆能力绝佳，他晚年时常常叫我背些长诗给他听，白居易的《琵琶行》、苏东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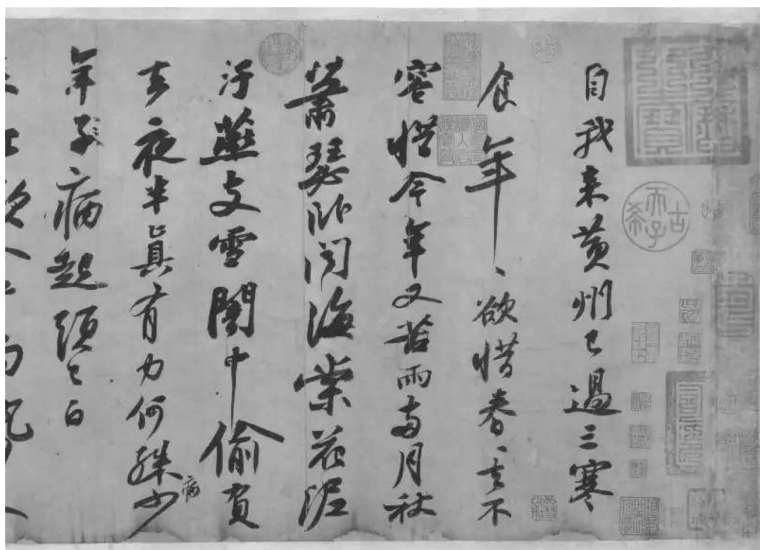
王世杰，字雪艇，湖北崇阳人



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等，有时我背不出来了，他就会替我念一句，令我非常吃惊。

我们家中有兄弟姐妹四人，小时在珞珈山武大附小“启蒙”。我8岁的时候，父亲离开武汉大学就职教育部，全家搬去南京。南京的住宅有三层楼，房子很大，父母子女好似不那么接近，但每年暑假我们到庐山牯岭度假，租一个小房子，一家人感觉很亲切，加以天天可以游山玩水，天天都是礼拜天……这是我们记忆中非常快乐的一段日子。中日战争爆发后，我们迁往重庆，为了避免轰炸，住在郊外一个名叫红岩嘴的山上。那时期父亲任职国民参政会及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在红岩嘴租地兴建了一所办公楼、三四十户工作人员和眷属的住宅及一所小学，邻居们都是同事及熟识的朋友，是个可爱的小社区。我们家就住在这两层高办公楼的一端，算是一个公寓，房间不多也不大，却因此增加了家人亲近的机会。那时只有我的小弟德劭就读红岩嘴小学，姐姐雪华、弟弟纪五和我都已在沙坪坝南开中学住校，每两周才能回家一天。也因为回家的日子少，周日及寒暑假在家的时间就分外宝贵。晚饭后必是陪父亲看画及念诗。父亲是在迁居南京后开始收藏我国古字画，并渐渐对字画培养出几乎如痴如醉的酷嗜。抗战期间大家日子都过得很苦，但是父亲只要稍有余款，就用来买字画。母亲了解父亲的个性，有时会笑着说：“你们孩子不要抱怨吃得不够好，爸爸的精神食粮比家里的物质食粮重要！”父亲收藏字画并不是为子孙积产，他希望能尽力收集流失民间及海外的珍品，将来捐赠给博物馆，供万人观赏。父亲有一个图章，上刻“雪艇王世杰氏为艺林守之”，这枚章只盖在他认为最珍贵的字画上。

我们在红岩嘴住了六七年。每年暑假，晚间天气好时，全家围坐在门前乘凉谈天。我特别记得父亲讲起的他的童年。我们老家在湖北崇阳一个很偏远的小镇。我国的老乡镇常常有一些非常诗意而可爱的地名，父亲家所在的回头岭、白霓桥就是很好的例子。父亲说他11岁时，家中送他到武昌去念高等小学，临行前他的大姐很认真地叮嘱说：“你到了武昌，人家问你家住在哪里，你可是不能说回头岭、白霓桥，那样人家就会知道你是乡下人，会瞧不起你



王世杰花重金从日本购回的苏轼《寒食帖》

(局部，苏轼原迹)

的！你要告诉人家，我家住在状元岭、凤凰桥。”我那没读过很多书的姑妈为了弟弟的前途，编出一些冠冕堂皇的地名，虽然有点可笑，却也感人至深。

父亲共有兄弟姐妹十人，他排行第五。他小时，祖母过于忙碌，多半由大姑妈和二姑妈帮忙照顾。过年时总是由两位姑妈把他梳洗好了带去看野台戏。那时家中设有私塾，由于父亲读书颖悟过人，老师建议祖父送他去武昌升学。骑驴到武昌需一整天路程，家中从未有孩童去武昌读过书，而父亲才 11 岁。祖母不放心，考虑再三后，决定派家中的会计先生陪父亲去上学；会计先生就在校门口摆了一个花生摊，早晚照应父亲的起居。后来，父亲到天津念书，参加辛亥革命，前往英、法留学，在家乡的日子就少了。父亲对家乡有极深厚的感情，对祖父母也极孝顺。常常说他今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及时多尽孝道。祖父先祖母而逝，父亲 29 岁学成返国时，祖母知道他快回来了，每天日落时就坐在门前的大石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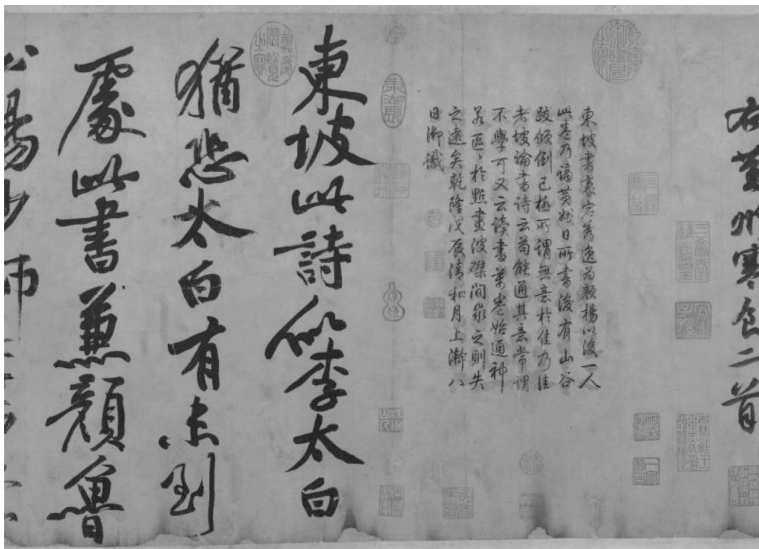


眺望，却最终未能看到他回来。老式的灵桌上，除供祭祖先的物品外，还供了一个父亲自英国寄回来的暖水瓶，暖水瓶是 20 世纪初的新发明，是父亲寄回给祖母泡茶用的，但瓶内胆已在途中震破，不能用了，祖母仍将它供在灵桌上。我能想象到父亲怀念祖母及感伤的心境。

父亲回国初期任教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是校长。1929—1933 年，父亲任武汉大学校长，虽然为时仅短短 4 年，但他对学校的开创、校园校舍的策划都投入了全部精力，他始终对武汉大学怀着最深切的感情，他的字画收藏中也常盖有一个“东湖长”的图章。20 多年前，父亲曾有计划要把他的收藏捐赠武汉大学，为武大设一个美术馆；并嘱我为他设计美术馆的建筑，但终因武大未在台湾复校，美术馆经营及古字画维护又不易罗致人才及筹集经费，所以在 1968 年将局部收藏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他 70 余件收藏则在 1987 年由母亲寄存台北“故宫”。寄存而非捐赠，是为了尊重父亲的遗志，如将来可能回归武汉，这批珍藏将由“故宫”移赠武大。

抗战期间，父亲虽然公务繁忙又忧心国事，但有书画为友，确实有助调解心情，他的好友多半也是能一同赏画的朋友，如罗志希先生、张岳军先生等。我记得有一次陪父亲与岳军先生前往重庆郊外山间去看故宫收藏，在崎岖的山路上坐了两三个小时的车，到了前不接村后不着店的山中，“故宫”的几位忠实的工作人员，穿着朴素的布衣，为只有粗茶淡饭的招待一再向我们道歉，父亲却因有画可赏，精神抖擞，连吃了三碗饭，还觉得乡下的青菜豆腐远胜过城里的山珍海味。在家中，父亲也吃得很简单，最喜欢豆腐及一些家乡口味的小菜，如千张皮、苦瓜、豆豉等。母亲是广东人，但她特地去学做了几样父亲爱吃的家乡菜，每逢过年都亲自做湖北腊肉腊鱼，我们家中虽有厨师，但只要父亲在家吃饭，母亲就一定亲自下厨为他烧菜。

1949 年，父母亲随国民政府迁台。1961 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首次赴美五大都市展览，是由父亲协助筹划的。多年来，父亲任“故宫”理事，曾主编《故宫书画录》《故宫名画三百种》《故宫书法》。1967—1970 年，与数十位嗜好书画之友人将各人收藏的



王世杰花重金从日本购回的苏轼《寒食帖》
(局部，黄庭坚手迹)

珍品集印出版，名《艺苑遗珍》，共名画5册，书法2册，甚受中外艺术界重视；但由于篇幅众多，印刷昂贵，后遂绝版。1971年，父亲又应友人敦促，将他个人的收藏以《艺珍堂书画》为名续印，提供给爱好美术的人士欣赏。

姐姐雪华和我都是在抗战胜利后就赴美进修了，弟弟纪五则在1949年赴美就读。纪五1968年返台定居。我是在1979年始迁居台湾。我在美国住了漫长的一段时间，父母亲也都曾数次往美小住，留给我们许多珍贵的记忆。我在纽约的小公寓只有一间卧室，母亲来时我就让给她住，自己睡客厅。父亲来美时常常接见客人，我便在公寓对面的旅馆为他租了一间套房，每晨过去为他烹饪早餐。晚上及周末如无应酬，父亲就到我家或到住在纽杰西州的姐姐家吃饭、休息。记得父亲主持“故宫”文物赴美展览时，适逢胡适之先生住在纽约。胡先生与父亲同庚，是多年老友，便每晚到父亲住的旅馆来畅谈。晚上10:00我回公寓时，他们还相谈甚欢。我担心离



开后两位老人家无人奉茶，胡伯伯则笑着对我说：“不要紧的，你可以回去，我会照应你爸爸。我是美国留学生，不像你爸爸是留英的，什么都不会，因为英国学生住处都有 charwoman(杂役女佣)，而留美学生无人伺候，至少都学会了替自己做三件事，那就是泡茶、煮鸡蛋和洗被子！”说得父亲和我都大笑不已。

姐姐和我自 1963 年起，每年轮流返台探亲；姐姐曾携带儿女，在她教学的美国医学院休假期间两次到台湾居住半年，并在国防医学院任教，这是父母亲很欣慰的事。我首次到台湾是 1963 年冬天，那时我们家住台北长安东路一段的“四条通”，是日式的平房，前后都有院子。住院区的巷道很安静，道旁种了榕树，每天早晚父亲都在巷子附近散步一小时。我的小弟弟德劭已婚，就住在邻近的“五条通”，他与妻子林美智那时已有三个幼子，最小的尚未满周岁，每天都会到我们家中游玩或吃饭，这也是祖父母的一大乐趣。后来台北日益繁荣，长安东路附近平房都改建为高楼，环境变得嘈杂拥挤。父亲原想迁居阳明山，母亲认为上街买菜、访友均太不方便，执意不肯，最终搬到仁爱路四段。1965 年，仁爱路四段才刚刚开发，只有两层楼的住宅，周遭尚是稻田，也是父亲散步的好地方。父亲一向注重养生之道，生活极有规律，每天 5:30 起身，必先做半小时运动，先打太极拳，然后做一些西方式体操，每天分两次散步一小时。午饭后他喜欢拿着一本《随园诗话》，坐着看一段时间后，便闭目静睡 15 分钟。母亲有时劝他上床睡长一些，他便说：“我是一匹马，白天不喜欢倒下来，站坐都能睡！”

1968 年纪五返台，初任教政大，复任职国科会，工作有相当成就，令父亲很高兴。纪五与张忠琳女士结婚后，育有一对孪生女及一子，增加了家中无限乐趣。我是 1979 年夏始返台定居，父亲有点生我的气，觉得我回来太晚了。那时他体力已渐弱，不能走长路或登山，加之台北的迅速发展使我们住处四周的稻田小径也都变成了高楼和大马路，汽车、摩托车增加太多，以致父亲不能出门散步，每日只能在小小的院子里徘徊，但周末我们一定会陪他前往阳明山散步。那时张大千先生也刚从巴西迁返台湾，父亲多了一位欣赏诗画的朋友，是一件乐事。大千先生好客，为人豪放，又是真正



王世杰花重金从日本购回的苏轼《寒食帖》
(局部，王世杰手迹)

的艺术家，不仅能诗画，还深谙生活艺术，是父亲晚年最喜爱的友人。我们在他府上度过了不少愉快的时光。

1980年1月的一天午饭后，父亲自餐桌站起时，忽然摇晃不稳，我赶紧扶他坐下，但他已不能再站起来。那时纪五出公差赴欧，我急忙与在美的姐姐通电话，由她安排请“荣总”的复健科诊治。父亲本来极不愿去医院，但是去到复健科，得知大千先生与岳军先生也每周去三次做物理治疗，这给了他不少鼓励。“荣总”的复健科徐主任，很热心地安排这三位老先生同时做复健运动，使医院的复健科增加了一些“常青俱乐部”的气氛！

经过数月的复健治疗，父亲已可在家中扶着栏杆步行，但终因年高体弱，未能真正恢复。后来他觉得太累，不肯继续接受治疗。我们在家中请了晚班护理(晚 9:00 至晨 7:00)，但又不愿父亲终日都由护理照顾，所以白天就分别由家中子、女、媳及三长孙加表妹淑文轮流照顾；母亲自然是父亲最忠实的看护与伴侣，每天都守在



父亲身边。

父亲那时自知年迈，老友适之先生、志希先生等都已相继去世，今生重返大陆的希望也日益渺茫，心中自是不免默然。一天我听见他坐在轮椅上，在花园中低吟苏轼的《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唐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云光？把盏凄然北望。”我也喜欢诗词，在美国时，曾将一些中国诗词译为英文。父亲鼓励我多做些翻译，也常常为我修正文词。我返台时，父亲已经退休。为了他的兴致，我又继续翻译。本来很想试着将我最欣赏的苏东坡的词全部译出，但因父亲看到《定风波》最后几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时，手持译稿一言不发，忽然泪如雨下，令我十分惊惶，赶紧把书稿都收起来了。苏东坡是非常豪放的诗人，但晚年不得志，谪居黄州，许多诗词都满怀悲烈，所以我后来不敢再与父亲一起读他的词。倒是有许多写在父亲收藏的名画上的诗词，是我们自幼皆能背诵的，念给他听，他会很高兴。

我这篇怀念父亲的短文，写得很乱，也不知该如何收尾，就在此抄录一首父亲旧藏明朝陈眉公的《风中柳词》，以表达纪念父亲百岁的心意吧。因为这首词是我们四兄弟姐妹都曾经熟记的，而词的内容也是父亲心目中的理想意境。

燕燕于飞，补苴旧巢堪宿，草堂宽，何须华屋。水儿一曲，山儿一幅，翠微中须眉皆绿。

拄杖敲门，有客来看修竹。但家怀，园蔬溪籟，菊花酒足，松花饭熟，日三竿图些清福。

（本文作者系王世杰先生次女）



怀念恩师李崇淮教授

王时杰

任何人只要多读、多看、多听，多实践，特别是加上多思考，他的知识就可累进再生产。

我 1945—1949 年在武汉大学经济系读书，李崇淮老师为我们讲授比较经济学。文质彬彬、一表人才的李老师，在讲课中详细地对比分析了美国与苏联的国情、制度、经济与政治的特点，使我们大开眼界。因为我们早就希望了解这两个对世界具有特殊影响而又互相对抗的大国。李老师的讲授对于我们这些对旧中国失望，正在寻找新中国的取向的青年来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为我们从理论上了解并在思想上选择社会主义，在行动上决定跟着共产党走，迈出了决定性的一大步。

毕业时，我和孔旭的论文是由李老师指导。他当时住在汉口三元里。我们第一次去他家请教时，他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李老师不仅对论文选题、主旨、结构、用意和实用价值详加指导，还对我们的生活、学习和未来提出建议，并对我们说，无论遇到什么问题 and 困难，都可告诉他，他一定帮助解决。

1948 年武大发生“六一”事件，三位同学遭枪杀，我们为了揭露反动派的罪行去募捐，找到李老师，他立即捐出了当时我们都未曾想到的巨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和赵源等几个人到中原大学学习党的知识和政策后，想到银行工作。去找李老师，他立即打电话给中国银行负责人赵忍安同志并获得同意。虽然后来中原大学留下我们做教师，未能去银行工作，但李老师对学生的关心使我们无不衷心



感激。

我们的同学，有家庭经济困难的，李老师知道后就立即资助。赵良在武大读书时就不时得到李老师的关照。孔旭解放初期生病住院，李老师多次去看望并资助，使他能得以治疗并保证了较好的营养。

毕业后每次到武大开会，我都会去看望李老师和师母，他俩总是热情接待，总要留我吃饭，并询问同学们的情况。他俩的好友毛恩培教授夫妇就住在我家旁，他俩每次看望毛教授夫妇时，都会来看望我和慧珍。后来我对乔九如老师说，李老师到你家时，请你马上电话告诉我，我到你家来看他，不能让老师再爬楼来看学生，没有这个道理。但有一次他听乔老师说慧珍扭伤了脚，又专门来家里看她。后来，慧珍不幸去世，他又亲自来我家悼念。恩师爱生之深情，令我终生难忘，使我深深地懂得了应当如何教书育人和爱护学生。

有一次，我去李老师家时，刚好他姐姐的儿子（曾任台湾“经济部长”）来北京看望他这位舅父。李老师陪他参观了不少地方，让他对祖国的大好河山有了初步了解，李老师还要他为祖国的统一多做工作。在李老师的父亲李更生倾其所有办学（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曾称他是爱国的教育家）后，李老师与姐姐便相依为命。他当时已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有了本质上的认识，所以没去台湾，留在武汉迎接解放。

我问过李老师，你作为民建中央副主席，为国家做了不少工作，你应该争取加入共产党才好。他笑笑说，我早就有过这种想法，但是党要我在外面协助工作，我只好听从安排，也许在党外真的还可多起些作用。

李老师历来治学严谨，又勇于根据时间、空间、条件的变化，探索和创新。早在1956年关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性质的讨论中，一般人都认为是对抗性的，他从民族资产阶级的实际出发，认为具有“两重性”，差点受到批判。好在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



抗性的，但是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可以用和平方法解决。李老师由此才得以解脱，未遭批判。

在关于纸币是否代表黄金的讨论中，老师与我校谭清教授的观点不同。谭教授仍坚持纸币代表黄金的观点，李老师却认为人民币与各国纸币都是信用货币（银行券），不再代表黄金。纸币代表的已不再是特殊商品的价值，而是商品总价值的等分值或与物价挂钩的指数。两人公开写文章反复争论，但在各自文章发表前均先寄给对方看后再发表，从而在争论中成了挚友。我为此还写过一篇小文章，赞扬这两个“货币大王”的高风亮节，获得参与讨论者的不少好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是由美国国际投机商索罗斯在美国支持下，从银行借出泰国泰铢，大量抛售，造成泰铢大量贬值，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东南亚国家和“四小龙”货币也纷纷贬值。美元汇率一低再低，股票下降，不少国家损失高达10%~50%。不少工厂倒闭，失业激增，人心惶惶。当时由于我国人民币坚持不贬值，才稳住了香港金融市场，最终制止了这次危机。就此事我特别请教了李老师，他告诉我，这是一场金融战争，是人为的。在经济社会信息时代，金融在市场一体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战争已不是冷兵器、热兵器时代，全靠士兵和武器在战场上拼杀了。现代战争出现了少数国家、少数人挑起的金融战、信息战等，兵不血刃就可屈人之兵而迫使对方俯首称臣。李老师关于现代新战争之说，提高了我的认识。

李老师治学与行事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运用理论去解决现实问题，为此他总是在战略、战术、方针、政策一直到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方法上下工夫。他利用参加各级人大、政协、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机会，不断为社会主义建设出谋献策。诸如：发展股份制经济、发展第三产业、重视科学教育、推行物价折实制度、发薪转账、推广支票存款、开放商业信用、发展集体所有股份公司、推广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的发行等。

特别是1983年，他根据武汉市经济发展滞后的现实，提出了“两通起飞”的战略设想。虽然有人质疑，说他不重视生产，搞“无



米之炊”，是主张流通决定论。我问过李老师：您辛辛苦苦日夜研究，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新观点却遭到怀疑和批评时，不感到委屈吗？他说在科学研究面前，本来就没有平坦的大路。在国家需要、对人民有益的时候，应当勇于进言。真理越辩越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个人一时的得失，又何足挂齿。“两通起飞”很快得到武汉市政府的肯定和采纳，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武汉市政府于1985年为他颁发了嘉奖令。他却只接受了一个花瓶作为纪念，未接受发给他的奖金。

李老师把经济理论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成为一个被大家肯定并崇敬的著名经济学家和战略、策略的设计者。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不仅显示了他的个人特色，而且对我们这些老学生的教学与科研影响深远，拨正了我们在新时期学习研究和解决新问题的航向。

李老师以92岁高龄安详仙逝。悼念会肃穆庄严，温家宝总理和李克强副总理送来了花圈。

崇淮恩师，您爱国爱民爱学生，无私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受到了极高的赞誉，您可以含笑九泉了。

（原载武汉大学校报2016年11月27日）



珞珈记忆点滴

王向规

人生易老，转瞬间就跨过了古稀的门槛。

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地萌生出怀旧情结。尤其是近年来，当不时听到昔时的老师、同学、校友，某某又“走了”的时候，心里总会油然涌起一阵难以抑制的酸楚，一番深深的感慨。当年在珞珈山就读时的许多往事，就会很自然地浮现在眼前，挥之不去。



我是“文化大革命”前 1965 年（1965 级）入校的中文系学生。“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将这届学生讽为“旧教育制度的末代皇帝”，被归类到“臭老九”（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的行列。毕业时被分配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我便来到了贵州省最边远的一个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紫云县的火花区（即现在的乡或镇）深山处，奉命在那里的小学里创办初中班（当时那里还没有中学）。3 年之后，恢复升学考试，我担任班主任的那个班，升学率全县冠首。而后，我便步入了仕途，并一步一个脚印艰难跋涉，进入到省直机关直至安全着陆，没有玷污武汉大学这块神圣的金字招牌，也没有辜负老师们的辛勤教育与殷切希望，心生欣慰。



二

翌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其势汹涌澎湃。不久，学校停课闹革命，许多老师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打倒了。学生们满怀激情投入革命，成天忙着写大字报（批判文章）、游行、参加批斗会，后来还有人参加了血腥的武斗……当时流行着一个时髦的口号，叫做“投入社会大课堂，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成长”。

即使在那样动荡的岁月里，老师们依然没有忘记关心和教导自己的学生。

1966年，我被选拔去北京，参加毛主席8月31号在天安门广场接见首都和全国各地学生代表的活动。我非常激动，回校后写了一首诗，以大字报的形式贴在宿舍的走道里。沈祖棻老师看到了之后，将我叫到她身旁说，你的《我站在毛主席身旁》这首诗写得很好，不是空洞口号式的宣示，而是通过几件具体事情的叙述，表达了你毛主席的热爱；词句不华丽，感情却很细腻、真挚，所以感动人；同时，有几处建议你再考虑修改一下，如“手抚摸着天安门城墙”，能不能改为“将脸颊紧紧地贴在天安门城墙上”，这样就会显得更亲切、情感更深沉。我当时还不知道沈老师是国内著名的古诗词大家，更不知道程千帆（国学大师）老师是她的丈夫。在“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尽管她和丈夫都受到了批判，却仍然不忘教导自己的学生，令我肃然起敬，至今不忘。

那时我很彷徨，后来成为了保守派，即所谓的保皇派。

在所谓的革命大批判中，我写了一篇关于20世纪30年代我国文化战线国防文学与民族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的大字报，后被校刊录用，再后来不知怎的被《人民日报》选登了。记得罗立干老师当时对我说，你可以在文艺理论方面继续下点功夫，并朝这方面发展，有不懂的地方尽管随时来找我。关心、爱护之情溢于言表，令我十分感动。罗老师是我们的文艺理论老师，可那时不让上课，没有他的讲台，他便将为学生传授知识的殷殷爱心，默默地倾注到



每一个学生身上。

老师们这种在危机四伏、自身难保的动荡年代里，不顾个人安危，依然关心、教导学生的忘我精神，成为了我后来工作的强大动力。

三

时间进入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斗、批、改”阶段，我们中文系等几个文科学生，被安排到襄阳分校进行“教改”。临行前的那天，何定华副校长（当时的革委会副主任）亲自为我们送行，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在选择分校校址时，我们跑了省内好几个地方，最后选定了襄阳的隆中。那里曾是诸葛孔明隐居的地方。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孔明出山，帮助他平定天下，进行了一次很有意义的对话，这就是后来流传千古的《隆中对》。我希望武汉大学的学生个个都能成为济世之才，相信在你们当中也有诸葛孔明式的人物，能写出《隆中对》这样不朽的文章来。

这番话让我们热血沸腾。

要知道，那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三国”仍被列为禁书。何校长讲这番话时需要多大的勇气，承担多大的风险呀！

很可惜，我们去创办的武大分校，并不是在真正的隆中，而是在距离隆中还有大约两公里左右的广德寺，但大地名倒也是叫隆中。当时那里是一个农场的场部，被征用过来作为武大分校的校址。寺庙里并没有菩萨，只剩下一座孤零零的多宝塔矗立在那里，经受着风霜雪雨的侵蚀。在那里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成天干的就是两件事：开批判会，参加劳动。劳动主要有三种：种菜（自己吃），帮助农民种植和收割庄稼，参加修建襄阳汉水铁路大桥。我被派去修大桥，吃住在河滩上好长一段时间。去隆中参观只能悄悄地偷着去。当时那里一片狼藉，满目疮痍，更没有读到《隆中对》。可想而知，那个年代，自然不会有诸葛孔明式的人物和《隆中对》式的文章问世。

尽管这样，我把何校长那一份深情厚谊、那片殷切期望，都深



深地珍藏在自己的心窝里。

四

当年的中文系，还有哲学系、化学系、图书馆学系及留学生部都住在四区，即后来的桂园。那时，每个区都设有一个学生食堂，大家凭票吃饭。票有两种，除绝大多数汉族学生吃大伙食外，另外还专门为回族等少数民族设有小灶，只有持小灶票的同学，才能够打到小灶的菜肴。除此之外，还有留学生食堂，不对外开放。少数民族同学也可以凭票打我们大灶的菜，只是一票不能重复使用。那年月国家还不富裕，生活艰难，每个月的伙食费 12.5 元。我们大食堂平时多是蔬菜，少有肉、鱼、蛋之类。若偶尔遇到藕块炖排骨、煎鱼、炒鸡蛋时，就是打牙祭了。每个人都会盯着师父的勺子，希望能多打一点。主食基本上是米饭或馒头。

我们年级有回族同学，每到开饭时，他们不会忙着去小灶打饭菜，而是先巡视一遍，见哪儿的菜更好、更合自己的口味，就在哪儿出手。我们这些汉族同学都十分羡慕他们。有时忍不住馋还会与他们悄悄私下商量，相互交换饭票去品尝小灶的菜肴，倒也小有乐趣，并见友情。

五

武大行政大楼前的广场，当年我们都将它叫做大操场，边上还有一个小操场，“文化大革命”前的每个周末，都在那里放电影，所以，我们又将它叫做露天电影院。

电影并不是免费的，两分钱一张入场券，师生同价。每个人带上一条学校统一配发的小矮板凳，进场后随便找个地方坐下就行。我家里很贫穷，无经济来源，享受国家助学金乙等补贴，除伙食费外，每月还有 1.5 元的零花钱。这就是我平时买肥皂、牙膏，看电影、乘公交车，偶尔买零食等费用的全部。教材是免费发送的。阅读书籍是不用花钱购买的，图书馆里应有尽有，只要你愿意读，什



么书都有，凭借书卡一次可以借到若干本，阅读完返还后可以再继续借阅。

那年月，平时的文娱生活非常单调，学校统一安排的，除每周一场电影外，几乎就无其他娱乐活动了。我每个周末都会去看电影，无论刮风、下雨甚或下雪，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几乎没有落下一场。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小操场的用途随即发生了变化，多用来作批斗老师的大会场，组织排队去，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发自内心的自愿的。电影依然还继续着，反复放映“样板戏”。我同样每场必看。

六

学校的领导被打倒或靠边站、许多老师被批判之后，整个学校成了无政府状态，“天下大乱”。

为达到“天下大治”，工（军）宣队进校了，对学校实行军事管制。中文系编为一个连，我们年级编为一个排。排长是一位年轻的军人，姓王，但不知他的大名，大家也无兴趣打听。还有一位女工人师傅，姓夏，年轻的妈妈，个子娇小，待人和气，我们都喊她夏师傅。

王排长中等身材，人长得也还算帅气。当时传说他正在追求一位窈窕女生，可人家没有买他的账。他懊恼、憋屈，觉得伤了自尊，就拿这位女同学的男朋友批斗出气，说他没有好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没有好好参加教育革命。但此举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引发了同学们的反感。恋人不仅依旧，甚至还由地下隐蔽变成了地上公开活动，感情愈益如胶似漆，以实际行动向他宣示着忠贞不屈，毕业时就正式结为了夫妻。

同学们对工（军）宣队一些人的做派看不惯，却又惧怕遭受打击报复，不敢吭气。怨气憋在肚里总是不好受的，几位同学便想出了一个恶作剧的歪点子。大家相约买来了几包盐煮干胡豆一次性嚼下，胡豆在胃里迅速发酵，聚集着大量的恶气。待到工（军）宣队



员来巡视我们学习(毛著)时,刚开口说话,就不约而同地响起了此起彼伏,或闷声、或尖叫的排气声,并散发出阵阵令人作呕的怪味。王排长他们被气得笑也不是,发火也不是,皱着眉头,捂着鼻子迅速离开了,我们则哄堂大笑,大家高兴得击掌庆祝自己的胜利。

这样的恶作剧,虽不太文明,但也实出无奈。试想一下,学校不上课,学生无书可读,成天就只搞些今天批斗这、明天批斗那的事;打打闹闹不停歇,不仅百无聊赖,更是虚度了光阴,浪费了年华,谁不为自己将来的前途揪心呢!

这次恶作剧,不仅是出了一口蓄积已久的闷气,更是一种黑色幽默,深刻的讽刺。

岁月易逝,转眼间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武大老师的殷切期望,同学的同窗情谊,还有珞珈的四季美景,永远铭刻在心,终生难忘。

(作者系中文系 1965 级校友)



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

吴湘韩

校友名片：

吴湘韩，1987—1994 年就读于武汉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国青年报社编委、全媒体协调中心主任，高级编辑。1994 年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至今在中国青年报社从事新闻采编、重大报道组织策划工作，是中国青年报社全媒体融合转型、中央厨房建设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在全媒体融合转型、重大报道组织策划、深度报道、日常新闻采编方面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长期致力于全媒体融合转型、深度报道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主创新闻专栏或采编的作品先后 10 次荣获中国新闻奖(其中一等奖两次)，多篇作品被大中学校作为教学案例或被收入语文选修教材。2007 年，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2016 年，获第十四届长江韬奋奖。





生命由时间组成。一篇新闻作品、一个版面、一张报纸的生命是有始终的，甚至是短暂的，但如果倾注足够的时间、情感、思想，虽然不能使其不朽，但也是能延长其生命周期的。

一篇报道改变了一名残疾青年的命运。这是湖南今日女报首席记者谭里和在 2014 年记者节央视播出的《好记者讲好故事》节目中讲述的故事。被谭里和称为“铁肩担道义”的记者就是我，时任中国青年报社驻湖南记者站站长。

从业将近 23 年，我始终怀揣新闻理想，不忘初心，维护青年合法权益，用新闻改变了许许多多谭里和的命运；守望社会公平正义，用手中的笔先后推动保送生制度、高考加分制度、公务员考试体检制度的变革；用脚采访，深入乡村，讴歌真善美，推出的吴奇修、冯圣兵等全国青年典型，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维护青年合法权益

那一天，参加完《好记者讲好故事》预赛后，谭里和手里拿着一份发黄的剪报，来到报社，站到了我的面前，剪报上面是我 13 年前写的头版头条报道《残疾考生为何难圆大学梦》。他拄着拐杖，嘴里不停地说：“如果没有你的报道，就没有我的今天。”这次在北京的意外重逢，我既惊喜又深深内疚。内疚的是，因为我当天上夜班，他在报社门外拄着拐杖等了我两个多小时。

后来，在央视的节目中，我知道他更多的故事：他上大学，来之不易。在我报道之前，他已经两次考上了大学，却被大学拒之门外；他的工作也来之不易，他连续两年参加一家报社的招聘考试，尽管成绩优秀，但社委会以他身有残疾、采访不方便为由没有录用他，最终是因为他的执著和真诚打动了社长，才圆了他的记者梦；他的爱情更来之不易，第一次上女友家见父母，却被女友的妈妈痛骂了一顿……

他用拐杖撑起新闻理想，曾和洞庭湖的渔民在船上一起生活了三天两夜；曾一个人翻山越岭到湘西，关注 81 户村民居然有 38 名单身汉的小山村……他家的阳台上放了一堆被他用坏的拐杖，一共



29 根。他说：“别人的新闻是跑出来的，我的新闻是爬出来的！”

2001 年 11 月，中国青年报社为我举办了个人作品研讨会，这是报社第一次为记者个人专门召开新闻作品研讨会。在维护青年合法权益方面，研讨会上报社领导列举了以下报道：湖南株洲二中持续多年的乱收费事件得到查处；因录取通知书被延误而痛失大学梦的黄芳圆了大学梦；谭里和等 6 名被高校拒录的残疾考生最终被大学录取；湖南衡山县部分被剥夺参加高考权利的考生得以参加高考。

2005 年，我成为特别报道部主要负责人后，带领团队把维护青年合法权益作为组织策划报道的重中之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对罗彩霞事件和王鹏事件的报道。

2004 年，18 岁的罗彩霞作为邵东一中应届毕业生参加高考，考了 514 分，没有达到湖南省当年 531 分的二本录取分数线。虽然当年有少数高校降分录取，而且她填报了第三批专科院校志愿，但罗彩霞没有收到任何一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书。也正是在那一年，她的同班同学王佳俊虽然高考成绩只有 335 分，却顺利走进了贵州师范大学读本科。在大学里，她的名字改成了罗彩霞，而真的罗彩霞对此一无所知。真的罗彩霞在落榜后选择了复读，并于 2005 年考入天津师范大学。2009 年 3 月，在银行的电脑上，罗彩霞偶然发现，竟然有一个女孩有着和她相同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并第一次看到了那个女孩的照片。时任中国青年报社特别报道部副主任刘万永和驻江西记者李菁莹对这起事件进行了相关报道，受害人罗彩霞最终顺利毕业，王佳俊的父亲王峥嵘也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

因举报同学公务员考试作弊被刑拘的王鹏，我们报道 3 天后情势就发生逆转，遭跨省追捕的王鹏被释放。王鹏的父亲说：“没有媒体的支持，我们家不可能翻案。”

回顾这些报道，我深深感受到了媒体的力量和新闻工作的价值，也感受到了职业荣誉和成就感。

传递基层正能量

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开始喜欢新闻事业。记得写的第一篇新闻



稿就是高二暑假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农村“五保户”打抱不平，当时觉得记者是一个可以为老百姓说话的职业。

大学和读研7年，我虽然学的是哲学专业，但选修了部分新闻专业课程，业余时间喜欢做一些采访、调查社会问题、写一些新闻评论。新闻采访的业余锻炼有助于我毕业后较快进入记者角色，而哲学这种思维“体操”训练对我日后形成自己的报道特色“功不可没”。我没有把哲学作为学问来研究，而是想经世致用，干预现实，从事调查性报道实现了我的追求。我总是要求同事多运用哲学思维，把反腐问题、高考加分问题等选题作为一个个课题来研究，充分占有材料，发现和呈现事实或问题不同的侧面，从而把一个选题做到极致，达到观止。

我曾在湖北、湖南驻站10年，深入乡村和城镇社区，了解底层民众的呼声和疾苦。喻国明教授2001年参加研讨会时说：“我们看小吴的作品不用大话套话，他用的都是被采访老百姓的语言，他的素材都是从生活最基层的现实生活中来的。”

驻站期间，每当洪灾、矿难、火灾、爆炸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我大多出现在现场，及时发回报道，体现了一个记者的职业激情、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1998年长江抗洪，我前期驻守岳阳，后期从湖北荆州到江西余干千里江堤都留下过我采访的足迹；2001年12月30日，江西万载县发生烟花爆炸事故，我与驻江西记者李菁莹一起突破层层封锁，进入爆炸现场，被执法人员打倒在地，但留下了《“封锁”与反“封锁”新闻战》等有影响的报道。当时有万载爆炸事故死亡了100多人的传言，甚至有媒体使用了“隐瞒死亡人数天怒人怨”的惊人标题，我小心求证，用令人信服的事实报道了“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应该还是比较准确的，真正报错了数字的是某些媒体”。结果招致同行的误解，但我身正不怕影子歪。

我采写《洞庭大规模退田还湖》的过程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人不给水出路，水就不给人活路。我敏感地意识到从“围湖造田”到“退田还湖”，人们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于是，我深入洞庭湖区采访，并利用多年参与抗洪报道的积累，写就了《洞庭大规模退田还湖》一文，发表在2000年1



月5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报纸上当即批示：“这篇文章写得好。朴实无华，但思路清晰，数据说话，令人信服。”随后，新华社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等机关报纷纷予以全文刊载。这篇报道还荣获中国新闻奖，被收入粤教版语文选修教材。

我践行正面报道为主的宣传方针，采写了许多有影响的人物典型报道，“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吴奇修的先进事迹，是我最早独家报道的。从1997年7月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报道他的事迹，并配发我写的评论，此后我一直关注、追踪这一典型人物的报道。

获“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的冯圣兵也是在我的笔下走上了中国青年报版面。他从高中开始资助一名比他更困难的贫困学生高敬霞，每个月都从少得可怜的生活费里拿出至少10块钱寄给高敬霞。大学期间，他做家教、打零工，省下近万元资助了数名贫困的高中生。

守望社会公平正义

“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美国著名报人约瑟夫·普利策的这句名言生动地道出了新闻记者的监督职责。一名新闻记者要履行新闻监督职责，离不开采写调查性报道。新闻媒体只有进行广泛而巧妙的调查性报道，才能尽到媒体的职责，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时任人民日报社记者部主任（现任社长）杨振武在我的作品研讨会上说：“我觉得一个33岁的年轻人，写出这么多有影响力，甚至有震撼力的作品确实是非常可贵的。我觉得吴湘韩敢于发现问题，抓住问题，他从一个具体的事件、一个具体的问题入手，抓住一个点，但是它涉及一个根本问题。”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我从社会和政府部门普遍关注、政府部门正在解决或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入手列出选题清单，用有影响力的报道积极推动问题的解决，集聚推动社会发展的正能量，推动社会前



行的步伐。

2000年，隆回一中发生震惊全国的高考保送生舞弊事件，14名保送生中竟有13名造假的。这是我和文汇报记者周其俊合作率先调查报道的。我至今还记得10多年前采访的情景：为防止被公关，我们一采访完就连夜乘坐长途汽车赶回长沙写稿。我们坚持不懈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连续报道，引发了保送生政策的重大调整。时任教育部学生司司长瞿振元说，湖南隆回一中弄虚作假案件被曝光后，我们按照基教部门和社会多方面的意见，决定走“兴利除弊”的路子。保送生要“压缩规模，严格标准，严格管理”。该系列报道获得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从此，我开始关注和研究高考制度存在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此后十多年，我组织策划的高考报道涉及高科技舞弊、体育特长生加分舞弊、高水平运动员招生造假、冒名顶替、民族成分造假、马拉松比赛作弊丑闻、武术加分造假、“三模三电”加分造假、特殊招生信息公开等许多方面。我参与采写并组织策划主编的“上千‘体育竞赛优胜者是水货’”系列报道获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在报道事件的基础上，我又组织力量查阅了除港澳台外，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公开的有关高校招生政策规定和2010年加分考生公示名单，并查阅了100多所重点高校的招生章程，在统计、分析这些资料的基础上，采访有关专家形成研究报告。2010年7月28日，用两个版刊登了研究报告。这组系列报道，以不同特点、不同类型的高考加分突发事件为依托，深入、全面报道了高考加分存在的问题和弊端。2010年11月19日，教育部等五部门发布消息，规范高考加分政策：奥赛不再吃香，严控体育加分。

我2005年担任特别报道编辑室主编之后，提出了“开掘真相，影响今天”的办版理念，并对栏目进行了个性化改造，专门设置了一个“打活老虎”的栏目《今日出击》，推出了一大批颇具社会影响力的报道，如《一个教育局长的“职务后”突击》发出后，这名卸任当晚提拔数百名教师的河北武安市教育局立即引起了纪检部门注意，后被查出权钱交易而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该栏目创刊不到两年即获得“中国新闻名专栏”称号和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而《宋江明验血求职记》等一组反映公务员考试体检作弊事件的系列报道，则推动了公务员考录制度进一步公平、公正、公开。这组报道源于部门编辑张凌于2011年10月25日在网上找到的一个线索——发帖人称自己在2011年长治市公务员考录过程中获得笔试和面试第一，却因体检不合格被拒绝录用。报道见报后，多位读者向中国青年报反映自己也有和宋江明类似的遭遇。中国青年报记者叶铁桥、白皓随后对部分考生反映的2011年贵州省公务员考录体检“罗生门”展开调查采访，于2011年12月2日、3日连续报道此事。

该组报道也引起了中组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公务员局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2011年12月6日，国家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司有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强调，“公信力是公务员考录制度的生命线”，并表示要严肃处理长治市公务员考录体检违规事件，进一步完善公务员考录体检规范。

2011年，该组系列报道共刊发16篇。2011年12月31日，长治市有关部门通报了对该事件的调查处理结果，10名责任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8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我组织策划的山西封口费事件系列报道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系列报道是中国青年报2008年度影响最大的舆论监督报道，也是监督新闻界影响最大的批评报道，推动了中国新闻界重建新闻公信力与记者社会形象的重大进程。报道引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中宣部领导、新闻出版总署领导的高度重视，有关媒体和责任人被查处。这组报道采访扎实，文风朴实，用证据说话，客观真实，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时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米博华在中国新闻奖评审会上评价这个系列报道时说：“以令人信服的事实，以扎实的采访作风，使报道极具冲击力，给人以极大震动。”

是他们，推动我们前行

2013年9月的一天，我收到了一个熟人久违的电话，一个事后引发“官场地震”的电话。来电者外号“熊大侠”“包青天”，真名



熊国剑，是我的一位线人朋友。

这一次，他报的料更猛：2013年3月17日，湖南红网出现一篇题为“江永县一批县官弄虚作假违法乱纪安排自己的子女”的举报信：6名在任的江永县级领导干部，为子女伪造在外地工作的档案，之后将其调回江永的行政或事业单位工作，以规避本应参加的统一招考。上级派了调查组下来，但最终也没见结果。熊国剑说，他之所以给我报料，是因为他被怀疑为举报人。“不管是不是我做的，领导都会认为是我举报的。”他想，还是通过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来为自己证明清白吧。我给报社领导报了选题，但领导权衡说缓一缓。后经不住熊国剑的反复催促，我一个多月后又找了一个理由给领导报题，终于获批。特别报道部的年轻记者卢义杰受领了这一任务，从广西“潜入”江永，展开调查。

2013年11月15日，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版独家刊发报道《湖南省江永县：一些领导子女“绕道”进行政事业单位》，并配发了写熊国剑的人物稿《我不是举报人，但还是想说真话》。在接受义杰采访的湖南省江永县官员中，熊国剑是唯一一名愿意公开刊出真实姓名的。中青报“报道发表之后，形势大变。江永县纪委当即成立调查组调查，两天之后即宣布媒体报道属实，7名被违规招进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子女被清退”。对此结果，熊国剑称，“完全没有想到”。熊国剑发来短信说，“有同事‘高呼中国青年报万岁！’，看看在我们这里公平正义有多么稀缺”。

这一典型案例还推动了相关制度的完善，堵住了制度的漏洞。湖南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研究查办违规进人案件的有关政策界定和处理原则，从制度机制上防止违规进人问题发生。

熊国剑的故事，只是特别报道部在过去10年上千个故事中的一个。在过去10年里，我们不知道遭遇过多少个“熊国剑”、报道过多少起腐败和不公。报道后，有些迅速得到处理，有些在持续报道或兄弟媒体的共同关注下实现了“迟到的正义”，还有些则如打到了棉花上或干脆石沉大海，成了烂尾新闻。

这些不是单靠一家媒体能解决的。所以，我们在工作中也常常会交织着有力与无力、迷茫与振奋、吐槽与激情，每每这个时候，



“熊国剑们”的存在，总给了我们前行的理由。他们身上的正直和执拗，不媚世俗和无所畏惧，是这个时代稀缺的品质。他们所坚守的，正是记者该坚守的，他们所不能容忍的，也是记者该披露和鞭笞的。有他们存在，记者就不会孤独，记者理应从他们身上汲取精神资源，成为他们的道义同盟者，跟他们一起开掘真相，揭露丑恶，守望社会，监督权力，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作者系哲学系 1987 级校友）



女生张静

王晓莉

要我来写张静，自然是因为，当年我们是门对门住着的大学生——人与人今生能结为同窗，都是缘于根本不知何时结下的很深的缘分。也许前世一起念过私塾呢，或是在某雅集上共同吟诗作对过呢——我自看了一些佛教书籍后，忍不住会这样想。

隔了这么多年，我最先想起的与张静有关的，或说与珞珈山生活有关的，竟是那最平凡的一幕：盛夏的中午，珞珈山蝉鸣如雨，热气炙烫。完全睡不了午觉。那时，张静从 409 室，我从 408 室，各搬一张小凳子出来，守着各自宿舍门，坐在桂园二舍四楼的走廊上说话，或是并不说话。走廊并不宽，两人交相走过时要略略礼貌侧身才不致衣衫接触。偶尔会从露台过来一阵穿堂风吹拂我们。更多的时候并没有风。而我们，也能够坐那么久。

我们并不是死党，但是心是有些许默契的。那样一种说不清楚的默契，也许就是因为都爱坐走廊吹风、都爱发呆。还有就是，对文字都有着某种似乎源于本能的热爱。也就是说，我们有部分特质重叠在了一起。

人与人的缘分深浅，说白了，就是看彼此特质重叠的面积大小。而我固执地保留这一幕几乎在所有珞珈山女生身上都发生过的盛夏记忆，也许是因为世事沧桑过后，我才发现，能够纯粹地乘凉、发呆，纯粹地上图书馆、写一些只为吐露心曲并不打算示人的文字，在人漫长的一生中，其实是太难得太稀罕了。也许就是那 4 年而已。

最平凡的，其实最奢侈。最无言的，其实最动人——张静一定



与我所想的一样。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武汉大学，张静为人所知，是因为她是当时兴起的“珞珈诗派”中唯一的女生。我现在有些后悔当时在校的游离状态，对于外部世界没有太多的关注，导致写这篇文章在谈珞珈诗派的细节时会有些捉襟见肘。我只记得有时展读校报，会看见张静的诗歌。就是这个天天一起上食堂、打开水、散步的女生吗？就是这个被男生偷偷暗恋着，又或许她也在偷偷暗恋他人的女生吗？虽然她写下的只是几行或几十行，但却透露出了一个令人羡慕同时也鼓舞人心的信息，那就是，女生原来不仅只是能歌善舞，女生不仅能编织毛衣，女生还能够用文字传达、张扬她的内心。诗人写诗都是像母鸡孵蛋一样隐秘，因此虽然门对门住着，我却从没有亲见过张静写诗时的样子，想来也是躲在蚊帐里或是跑到珞珈山上某张石凳子上一气呵成的。

但是，直到今天我还是认为，张静无论当时的写诗还是时隔20余年后的回归，于她都不是一种生存路径或职业使然——她毕业后经商、办公司，都是风生水起，一般女性难以做到。她无论何时的写作，都是为了她内心奔涌的感情，为了她试图保留这份真实的一种勇气，为了她在这人间早已安居却又时常流浪的心灵。从这点而言，她是个天生的诗者。她的生命力需要诗歌来表达来宣泄。

所以，张静对于写诗的情感，其实一直都是似有若无的。正是这样一种介于虚实之间的态度，使她的诗歌更少急躁、更少功利。不仅对写作，张静处理很多事其实都是这样的态度：她练习舞蹈、痴迷摄影，她对于旅游的狂热可以感动我们很多同学——做这一切，张静都是为了完善自己。简而言之，都是想要自己由内而外变得更“美”。

一个唯美主义者——我不知这样形容张静是否准确。但即使有偏颇，我想张静也是会理解的。面貌之美、艺术之美、自然之美……这一切的美，是盛装人的情感的容器。对这一切美的热爱，是人的天性，是人在生存之后更高的追求。况且，张静确实长得美。那时中文系都知道有个长得像史可的女生叫做张静——史可，那时是风头正健的好看极了的电影明星。这无疑是张静的一种不立



文字的荣誉。在我看来，张静的美，是俊美，她不是没有女孩子的柔弱，但是她展露更多的是直爽与率性，偏于俊朗之风——是这样的，当我们在女生身上看见俊朗，就好比在男生身上突然看到细腻一样，那样的美令人动容。

我并不想贴标签说世上有这样的女生或是那样的女生，有“复旦女生”或“武大女生”——这样的划分太单一因而会不够准确。但据我多年来不完全的观察，珞珈山下走出的女生确实有某种难以命名却又确实存在的标记与内涵的。例如，多灵秀、多浪漫、多情怀……张静就是这样的女生。这些痕迹在多年以后或许会被我们曲折的经历或坎坷的内心所磨损，但我敢说，它们从来没有消失过。

最近我又有幸系统地读到了张静 2014 年后写下的 40 多首诗歌。我一边读一边想，这是一个感情多么浓烈、此在感又太强的诗人。《趁还未太迟》《除开生死 本无大事》《唯一》《自今日起，愿如新生》……仅仅从她的这些诗歌标题就可窥一斑。是啊，时间飞逝、挽住生命，因为生命如此唯一。这些感受，从来都是诗歌或者说是文学的母题。也可以说，所有的写作，都是为了回答这些追问。

读张静的诗，根本不会意识到是在读诗。我们只是在读她的生活，她的内心。有一首诗《婆婆的鱼盔》，在我看来是张静非常出色的作品。从前婆婆做鱼盔给大家吃的时候，公公在看报，小孩子在玩耍。“我”在有意无意地看着，等着享受美食。一家人其乐融融。而现在呢，公公长眠，小孩子远走他方，婆婆也已失忆了。“我”“想做一次婆婆的鱼盔/却只记得味道/是干烧呢还是要放一点水/问谁 问谁”。这是诗歌的结尾。谁没有经历过家庭这个最小的社会单元的组合、成长、裂变及至消解呢？谁没有经历过亲人的逝去之殇呢？谁又不在阅历人世后对生命的“成住坏空”充满感悟呢？在尝试做婆婆从前教的一道名为鱼盔的食物却不能够的那一刹那，张静以她对生活瞬间的敏感，写下了这样的生命痛楚。简洁、细致，有如美食一样有回味之甘。

这样的诗歌是如何在张静心中埋伏、酝酿，终至于形成文字的呢？我并没有与张静探讨过。有太多话题了，我们似乎不需要谈论



这些。有一个细节我却牢牢记得：2015年5月，张静与其他同学一道来我所在的城市。我们欣喜地在宾馆门前合影。女生们都把随身携带的包放在镜头之外。突然张静对着摄影师叫起来，“等等，我要拿我的包。”随即她又自嘲说，“不背上这个包我不知道怎么摆姿势。”

她单肩背起她的那个包，斜侧着身子，留下合影。

我久久看着照片。那是一只大大的、适宜旅行的双肩包。那是一只可以盛装很多内容的包。那是一只可以摔摔打打的包。它与精致无缘，却与流浪、与闯荡人生，甚至与笑傲江湖有关。它搭在张静的肩上，与她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腿的确很匹配很和谐，有着与她融为一体的美感。

——那是一个在路上的象征。

那一刻，我想我窥见了张静的内心。

（作者系中文系1985级校友）



“理论界的鲁迅”李达

汪信砚

1956年7月，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去看望在武昌东湖宾馆下榻的毛泽东，毛泽东当面评价李达说：“你是黑旋风李逵。但你可比他李逵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而你鹤鸣兄却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算起，到全国解放，可称得上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哪个没有挨过你的‘板斧’？”“你就是理论界的鲁迅，我一直就是这么个看法！”毛泽东的这一评价，可以说是对李达一生的真实写照。

大 义

李达的“大义”，源自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表现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以及对国家、民族和党的事业的忠诚。

1913年、1917年，怀抱实业救国理想的李达两次东渡日本，先后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和第一高等学校，学习理工科。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后，留日中国学生群情激愤，李达率留日学生救国团到北京请愿。但是，留日学生救国团“预定唤起国内学生大搞救国运动的希望终于没有实现”。李达后来回忆说：“这次挫折，使我们深切地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于是，回到日本后，李达毅然放弃了理工科的学习，全力研读马克思主义。

1920年8月，李达从日本“回国寻找同志”。不久，他就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组建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和主编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秘密机关刊物《共产党》，负责筹备和组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党的“一大”后不久，李达创建和主持了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书籍；还创办和主持了上海平民女学，培养了王剑虹、王一知、丁玲等一批党的妇女干部。党的“二大”后，李达应毛泽东的邀请赴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湖南自修大学是一所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何叔衡、李维汉、夏明翰、毛泽民、毛泽覃等一大批党的干部都曾在这里学习过。李达主持全校教学，还亲自授课，并与毛泽东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担任该刊主编，使其成为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1923年暑期，李达到上海与陈独秀商议国共合作问题。听到李达在国共合作方式上的意见与自己不一致，陈独秀暴跳如雷，又是拍桌子，又是砸茶碗，甚至还破口大骂，好像要动武的样子。受了这样的刺激后，李达愤然脱离了他自己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后来谈起这段经历，李达说这是他“平生所曾犯的最严重、最不能饶恕的大错误”。不过，1924—1949年，尽管李达离开了党的组织，但他的信念却从未动摇过。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虽然脱离了党，却绝不脱离马列主义，决不做违反党的事情。”在这一时期，他不仅在大学讲坛上和自己的论著中继续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而且为党做了大量的外围工作。

1927年年初，李达应邀为毛泽东在武昌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期间，曾受毛泽东委托做唐生智将军的统战工作，对唐生智后来弃暗投明产生了重要影响。1932—1938年，受党组织的嘱托，李达曾分赴泰山、张家口和重庆三度为冯玉祥及其研究室讲学，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形式逻辑，使冯玉祥深刻认识到“若不相信辩证唯物论则我民族不能复兴”，为促使冯玉祥联



共抗日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在湖南大学任教期间，从1948年11月起，他受地下党的委托，以大量细致的工作促成了程潜的起义，为湖南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外，李达在全国各地大学任教，身边总是聚集着一大批进步学生，他经常向地下党推荐进步学生入党，许多人在他的引导下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坚定的信念使李达始终保持了革命者的气节。李达曾对他的学生吕振羽说：“不管形势如何变化、环境怎么恶劣，我这个‘老寡妇’是决不失节的。”大革命失败后，南京卫戍司令谷正伦想聘李达做顾问，李达愤怒地回绝道：“要我做刽子手的顾问，真是不把人当人。”后来，汪精卫、陈公博邀他加入国民党改组派，邓演达要他参加第三党，他也都拒绝了。1937年6月，蒋介石让冯玉祥做说客，想请李达和白鹏飞做国民党的参事，他们回绝说：“我们只知道教书，不知道做官！”1941年7月，李达在广东中山大学被教育部电令解聘。此后5年多的时间里，李达不得不困居家乡零陵以种田为生。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当零陵专员奉陈立夫之命诱劝李达跟着国民党时，李达仍然坚定地回答：“我是有坚定信念的，叫我轻易地改变立场、摒弃信念是难上难。”零陵的“维持会”曾要懂日语的李达为日本人办“公事”，李达愤怒地说：“我决不做亡国奴！即使我生活再苦，就是拖死、饿死、冻死，我也不会去给日本鬼子办事。”总之，正如邓初民在评价李达时所说：李先生“立身处世，心有所主，不为富贵、贫贱、威武世俗之物所撼，实有足多者”。

正因为李达始终坚守信念、不忘初心，所以党组织也一向都非常信任和高度评价他。1939年，在延安的毛泽东曾写信给李达，称赞他是“真正的人”。1948年年初，毛泽东曾三次电示华南局护送李达去解放区。同年11月9日，毛泽东写信给李达称：“鹤鸣兄：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1949年5月，李达抵达北平后，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同年12月，由毛泽东等人作历史证明人、刘少奇做介绍人，党中央批准李达重新入党，不要候补期。



大 智

李达的“大智”，最充分地体现在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卓越贡献上。

早在从日本回国前，李达就开始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多篇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并翻译了马克思《资本论》日文译者高田素之的《社会问题总览》和荷兰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于192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从日本回国后，李达立即投入了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先后发表系列文章批判研究系代表人物梁启超和张东荪的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第四国际“左”倾思潮和号称“中国社会主义研究第一人”的江亢虎对社会主义的歪曲，论证了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毛泽东所说的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都挨过李达的“板斧”，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的事情。

1923年，李达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的论题，认为“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并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论述了如何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自此以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亦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成为李达全部理论探索的鲜明主题。

1926年，李达出版了专著《现代社会学》，它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被人们称赞为“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该书出版后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至1933年共印行14版。据邓初民回忆，当时革命者“差不多人手一册”。后来，李达被国民党湖南当局通缉，所开列的“犯罪事实”就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

大革命失败后，李达痛感当时中国革命的理论准备严重不足，



遂潜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译介。1929年，他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论》《社会之基础知识》《民族问题》3部专著，在革命低潮中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其中，《中国产业革命概论》《民族问题》分别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的专著，而《社会之基础知识》则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任务和前途作了令人惊叹的深刻分析。李达指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和铲除封建遗物，中国革命的必然归趋是由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达于社会革命。1929—1932年，李达翻译出版了9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名著。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详细阅读了其中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先后写下了近2万字的批注。

1932—1937年在北平任教期间，李达撰写了《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社会进化史》《货币学概论》4部著作，其中，《社会学大纲》构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实践的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体系，被毛泽东称赞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毛泽东说他读了10遍，也是毛泽东批注最多的著作；后三部著作则分别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贯穿着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世界通史和货币学专著。这些著作不仅是“中国人自己写的”，而且都特别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例如，在《经济学大纲》中，李达尖锐地批评了当时中国经济学界只研究外国经济而不研究中国经济的缺陷，提出了广义经济学的主张，强调要“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和把握“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毛泽东在向延安理论界推荐《社会学大纲》的同时也推荐了该书，说“李达还寄给我一本《经济学大纲》，我现在已读了3遍半，也准备读它10遍”。郭湛波在1935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写道：“中国研究马克思及辩证唯物论，要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为最早，最有贡献”，而“在今日介绍成绩最佳、影响最大，当然是李氏”。侯外庐也说过：“抗战前，在北平敢于宣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党内党外都有”，“但是，就达到的水平



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

1947年，李达受聘于湖南大学，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法理学大纲》一书，成为“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的一位拓荒者和带路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达精心撰写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出了榜样，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他撰写的《谈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等著作，为宣传我国新宪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也给了胡适一“板斧”，深刻地批判了胡适宣扬实用主义的理论错误。他还受毛泽东嘱托主编了《唯物辩证法大纲》，注重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和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鲜明的中国风格。

大 勇

李达的“大勇”，是一种敢于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讲马克思主义就要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言行一致，决不能墙头一棵草，风吹两边倒。”这是李达一生的座右铭。

大革命失败后，李达被国民党当局通缉，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和生命危险，但他从未向各种反动势力的威逼低头，表现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大无畏精神。

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李达四处躲避国民党的追捕，于9月底在李汉俊的帮助下来到武昌中山大学任教，讲授唯物史观。12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包围武昌中山大学，搜捕进步师生。在许德珩的资助下，李达又秘密逃往上海。李达离开武昌的次日，李汉俊等人被捕并被军阀胡宗铎杀害。

1928—1932年，在上海国民党文化围剿的险恶环境中，李达不仅发表了许多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论著，而且与邓初民等人创办了昆仑书店，后又自己创办了笔耕堂书店，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在上海政法学院和暨南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李达的行动处处受到反动势力的监视，不仅被法国巡捕



抄家，而且被国民党特务打断右手和肩骨，致使他住院医治7个星期。他愤怒而坚定地说：“反动派想打断我的右臂，不让我再拿笔，要我放下武器，办不到！”

1932—1937年在北平任教期间，李达这位著名的红色教授自然也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李达一到北平，就受到国民党宪兵和特务的监视，蓝衣社特务甚至在教室的走廊上偷听他讲课。碰到这种情况，李达干脆“哑子讲课，以笔代口”，边擦黑板边板书所讲内容，听课学生不禁为他的机智和飞快的板书本领叫绝。吕振羽、侯外庐等人回忆说：当时，李达是北平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等校“进步势力的中心人物”，是“进步师生与反动派作斗争的一面旗帜”。李达对于自己面临的各種危险是有充分心理准备的。他身边一直放着一个铺盖卷及毛巾、牙刷等，随时准备坐牢。他甚至还做了大皮袄，准备在寒冬腊月在监狱里坚持写书。

1947—1948年李达在湖南大学任教期间，有三个反动机关都把他列为黑名单的第一名，他在校内外的活动都受到严密监视，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学校当局还故意不让他讲授其最有造诣的哲学和经济学，而要他讲授法理学。而他则表示，无论讲什么，“要我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办不到！”在讲授法理学过程中，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释法律现象，并巧妙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玩弄“制宪”的阴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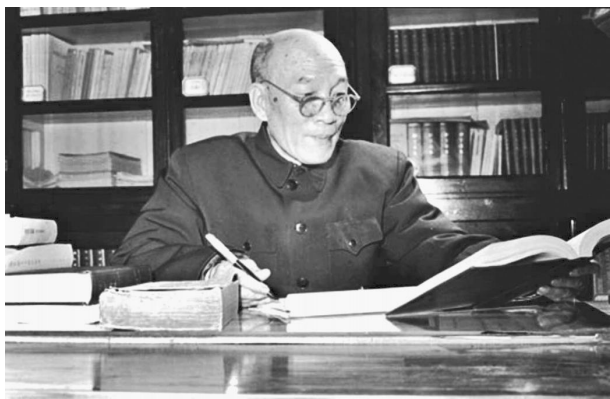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达的身份、地位及其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条件变了，但他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却始终如一。

20世纪50年代，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否定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原则。李达认为，这些主张是根本错误的。在一些文章和报告中，他反复阐述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强调社会主义阶段必须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必须遵循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原则。

李达坚决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1958年，他曾当面与毛泽东就湖北鄂城县门口的一幅标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认为，这个口号具有两重性，它肯定了人的主观



能动性；而李达则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不是无限大的，它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李达批评毛泽东说：“你脑子发热，达到 39 度高烧，下面还会发烧到 40 度、41 度、42 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受大灾大难。”李达认为，“如果不顾客观规律，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共产主义就会搞成破产主义，大跃进会变成大后退，人民公社会变成人民空社”。



正在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李达

李达也坚决反对和抵制 1958 年“教育革命”中的“左”倾错误。他认为，“拔白旗”“插红旗”这样的“革命”“混淆矛盾的性质”，“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挫伤了知识的积极性；发动学生编教材、与所谓的资产阶级专家“打擂台”，完全是“瞎胡闹”。他指出，这种所谓的“教育革命”扰乱了教育秩序，必须立即予以纠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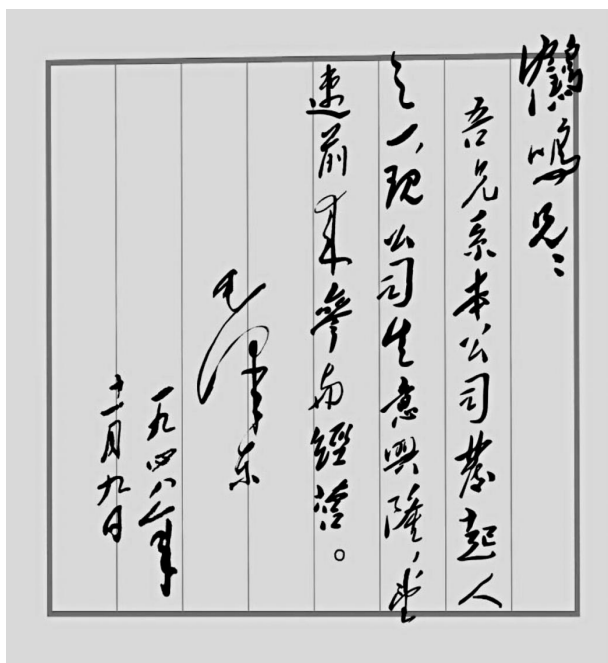
1959 年秋，得知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息后，李达对身边的人说：“现在本来应该反‘左’，怎么反右来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不会是‘反党集团’。”1961 年 8 月，李达在庐山当面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对“左”倾错误及其危害的看法。1962 年 9 月，他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回到家乡零陵调查“五风”危害的情况，给零陵县委和湖南省委提交了调查报告，并根据



调查结果明确表示 1959 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

1966 年年初，林彪等人鼓吹的毛泽东思想“顶峰论”甚嚣尘上。当时，李达正在根据毛泽东的嘱托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他对助手们说：“什么顶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要发展了？我们不要写这个！”有人提醒他这是林彪说的。李达听后更恼火了，激动地说：“马列主义是发展的，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怎么能有顶峰呢？这个说法不科学，不管谁说的都一样。”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达被诬陷为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帮头目并惨遭迫害致死，其罪名之一就是反对“顶峰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凶恶敌人”。李达为坚持真理奋斗到了最后一息。



1948 年毛泽东写给李达的信

（作者系哲学系 1979 级校友）



青年，任重而道远

许 锋

我登上了那个窄窄的阁楼。

阁楼没有亮灯。对面有一扇窗，透进来一点光亮。窗不大不小。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窗，一股春天的草木的气息扑面而来。站在窗口，能看见一山郁郁葱葱的风景。正对着窗的是一棵银杏树，拔地而起，直入云天。我踮起脚尖，尽可能地探出头去，局促的目光遥望远方。我的目光迷失在氤氲的雾气之中。这是春天，珞珈山芳草萋萋，百鸟啁啾，间或掺杂着乳雀唧唧啾啾的低语。

我坐在阁楼里的一把椅子上，定定地望着那扇窗。窗口略略透进来一缕清风，与阁楼柔软、温湿的木香混杂并融合；一点或明或暗的光照着我的脸，也直抵我的心。此时，我希望这样的光亮滞于静室之中，再恒久一些——便于从容地思考，一点一滴地打捞岁月的吉光片羽，回忆一个伟人——周恩来。他曾经一定也无数次地站在窗口，静静地遥望，那时，窗外的银杏树或者还没种上，或者正冒着新芽。他的目光，绵延而深邃，掠过草，掠过树，掠过山坡，掠过校园，掠过破碎的山河；他的眉头紧锁，宛如一个铸铁疙瘩。他是不是也坐在一把木质椅子上良久地沉思？只是，他的思绪经常要被若隐若现的枪炮声阻遏，他清晰地听到了跌跌撞撞的脚步声，听到了河流一样涌动的流民的嘈嘈切切，看到了阴云密布的天空和满目疮痍的中国。

这是武汉大学周恩来故居。

周恩来故居位于武汉大学珞珈山别墅群中的第19号楼，始建于1931年，是一栋坐北朝南西式两层楼房。阁楼蜷缩于二层之上。



1938年5~9月，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在楼里居住过4个月。

他们不是来听风看雨，修身养性的。

中国人素来以和为贵，只是，“和”并非一厢情愿的事情。“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南京失守前夕，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机关大部西迁武汉。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武汉设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周恩来从延安来到武汉，主管军事和统战工作，并任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此时，华北、华东的大片领土和北平、上海、天津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中华民族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有为青年岂可苟且偷生？1937年12月31日上午9时，周恩来在武汉大学作题为《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的演说，“我们青年再不能如过去那样地学习，找工作，结婚……再也不能依照平常的生活程序过日子了。战争了，我们再也不能安心求学了。”家国天下，没有国哪有家？周恩来激励青年走出校园，奔赴战场，同侵略者浴血奋战，保卫家园。面对日寇的铁蹄践踏和野蛮侵略，周恩来寄语青年要“努力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努力去争取独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国的来临”，“我们中国青年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而且要承担起将来建国的责任。救国，建国，我想‘任重道远’这四个字，加在中国青年的身上是非常恰当的”。

1938年秋，周恩来又在武汉大学连续两晚演讲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基本精神。而此时的武汉，早已不太平，已成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敌机的轰炸已是家常便饭。尤其是七八月间，其凶残轰炸的频率、规模及程度达到沸点，美丽的江城遭受了亘古未有的劫难，与武汉大学毗邻的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遭到毁灭性破坏，三栋教学楼瞬间成为废墟，师生死伤多人，教室里、书桌上、黑板上布满斑斑的血迹。武汉大学“活字典”、著名数学家李国平之子、武大历史学院教授李工真曾带着我们沿珞珈山路巡游，抵达此处。他介绍说，1938年夏天，空袭警报频繁，为安全计，人们就躲到防空洞或自家的床底下。中共武汉大学委员



会在《永远怀念周总理，誓将遗愿化宏图》一文中也有这样的描述，“……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周总理镇静自若，从容不迫地指挥大家有秩序地进入地下室，而他自己则最后一个离开会场。警报解除后，周总理又继续讲下去。”演讲结束时，“有位青年教师拿着一本小册子，请求周总理签名，周总理满怀着对青年一代的深情厚谊，在小册子的扉页上挥笔写下了‘周恩来’三个刚劲有力的字。这本周总理亲笔签名的小册子被当作珍贵的纪念品至今仍珍藏在我校。”

此时，阁楼之下，却是异常地寂然。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我站在逼仄的楼梯上，甚至听到了屋外簌簌的雨声。二楼有三间房，一间是会客厅，一间是卧室兼办公室，另一间小房是警卫人员的住所。会客厅不大，正面墙上开着两扇古色古香的绛色的窗，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典雅而别致；目光飘出窗外，绿叶荫浓，树隙之间，雾霭析出的光影仍是斑驳陆离。墙上贴满了周恩来当年活动的照片，我细细端详，那不再是一个英俊的目光炯炯有神的青年周恩来，而是顶着一头极短的头发，一缕坚毅在剑眉跃动，一缕忧患从星目闪现，消瘦的棱角分明的脸庞透着无比刚定的周恩来。

在这里，周恩来组织领导了“抗日活动宣传周”“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等系列抗日宣传活动；会见了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会见了国民党高级将领、民主人士、文化界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如此，此处有了一个生动、亲和的称谓——“国共合作抗日小客厅”。2001年，武汉大学周恩来故居作为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群的一部分被国务院列入第五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在这里，周恩来还多次找郭沫若谈心，促成其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周恩来此举意在使第三厅形成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团结各抗日党派和人民团体，团结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著名人士，成为在中共实际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斗堡垒。

走出故居，雨似是将歇未歇。我没有张开小伞，而是任由雨珠落到头上、身上。雨雾弥漫之中的珞珈山林木葳蕤，恬静葱绿，如



诗如画。我沿着蜿蜒的小径，逐级而下，台阶上满是夹杂着红的、黄的、绿的颜色的樟树的叶子。我拾起一片，脉络清晰，仿佛着了力道，无比遒劲。

边走，我边回望那栋被参天大树掩映的小楼，青砖红瓦，花树扶疏。我在想象当时身兼国共两党要职的周恩来每天忙碌地工作和生活的场景；想象他栉风沐雨，早出晚归，过往这条小径；想象二楼的办公室通宵亮着的灯光，一位注定要彪炳史册的伟人运筹帷幄，殚精竭虑；想象他站在阁楼，望着黑魑魑的江城，直至曙色初露，东方既白。

一颗水珠落在我的脸上，我听到了雨声，我也听到了挂在树上的风声。

我还听到了珞珈山下传来的青年的读书声。

（作者系经济与管理学院 EMBA2016 级校友，原载《人民日报》2017 年 4 月 17 日）



奋斗到最后一息的朱英国院士

肖 珊

那个种了 50 年水稻，一生心系国家粮食安全的“泥腿子院士”，走了。直到去世前的最后一个晚上，病床上的他还在辅导学生。

朱英国院士是著名遗传学家和水稻生物学家，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先驱，我国杂交水稻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为我国粮食安全、杂交水稻种质创新、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



2013 年 7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鄂州试验基地视察时，感谢朱英国团队做出的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努力，科技兴农”，并作出了“粮食安全要靠自己”的重



要指示。

病床前嘱托学生： “你们要以国家的粮食安全为己任”

即将读博一的罗肖隕，陪伴恩师走过了人生最后一程。8月9日凌晨，病房外，朱英国抢救无效辞世的噩耗袭来时，罗肖隕完全不敢相信：每餐把大部分饭菜留给他，总是慈爱地笑着，喜欢和他聊实验，晚上睡前跟他说“辛苦了”的老师，永远地走了。

罗肖隕的眼泪无声地滴下来。东方未白，他坐车去了鄂州实验基地，继续观察水稻生长情况，测量表型性状的数据。这是内心中他和恩师的告别，也是约定。

从6日起，罗肖隕一直陪护在朱英国身边。那天一进病房，朱英国就热情地招呼他坐下，问他实验进展情况，有没有遇到困难。跟往常一样，罗肖隕一五一十地汇报了实验情况，老师给了他很多建议。

“你们这一代年轻人是国家的栋梁，要以国家的粮食安全为己任。”只要聊到实验，朱英国都会以这句话结尾。

每次吃饭，朱英国会打开电视看中央一台播放的新闻，并把大部分的饭菜留给罗肖隕。“我撑着肚子吃完后，老师总问我吃饱了没，我赶忙说吃饱了。看着恩师一如既往慈祥的微笑，我心里想，恩师不仅关心国家粮食安全，还心系着学生的温饱。”

罗肖隕在日记中写道：晚上恩师睡觉的时候，亲切地对我说了声“辛苦了”。看着恩师微笑着闭上眼睛进入梦乡，我才发现恩师如父亲般亲近，至此我才深刻地理解“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含义。

“老师生病住院的这段日子，是我们交流最多的时光。他总是很关切地问我工作、生活的事，我提到的困难，他会立马帮我想办法。”博士生肖海军也是主动陪护朱英国的学生之一。在和导师朝夕相伴的日子里，肖海军更深切地感受到他对国家、对农村、对农民那种深入骨髓、融于血脉的爱。



“老师跟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年轻人要以事业为重，要有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肖海军清楚，导师放不下他的红莲型杂交水稻事业，担心事业后继无人。导师的微信昵称“红莲”，简简单单两个字，力如千钧地压在团队成员的肩上。



“老师走了，感觉丢了魂。”我校博士后工作站 34 岁的高峰双手捂面。他从 2008 年跟着朱英国硕博连读，2015 年年底毕业。那时，朱英国已被查出患有骨髓再生方面罕见的疾病。

高峰介绍，导师在与疾病斗争的两年多时间里，依然坚持到实验室工作，为杂交水稻重点实验室建设、2011 协同创新中心建设、鄂州基地建设以及研究生培养呕心沥血，常使人忘了他是个病人。

“恩师以身作则，把粮食安全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作为弟子，我们要继承恩师的衣钵，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薪火传递下去，完成恩师的心愿。”罗肖隽在实验间隙给记者发来的这条短信，是他内心对老师的承诺。

不忘习总书记的嘱托： “科技兴农，粮食安全要靠自己”

鄂州市杜山镇东港村，131 亩水稻实验田绿波荡漾，这里是杂



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鄂州实验基地。以朱英国为首的研究团队，在此进行水稻杂种优势机理、杂交水稻种质创新与基因发掘等多项研究。



时间回放到4年前——2013年7月22日下午，习总书记考察湖北期间，专程前往鄂州水稻基地视察，看望朱英国。

朱英国将基地培育的杂交水稻种子展示给习总书记。这些种子中有“珞优8号”“珞优10号”“两优234”等多个优良水稻品种。

“抛秧用不用秧盘？”“农民喜不喜欢抛秧？”“机械化程度怎么样？”在田间地头，总书记向朱英国提出了一个个细致的问题，这些都是农民关心的问题，也是生产环节中的重要问题。这让朱英国看到了总书记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关心，对广大农民的悉心关切，对农业高新技术创新的期待。

当听说朱英国培育的杂交稻良种推广种植面积已在亿亩以上，尤其是“珞优8号”水稻，已连续7年被湖北省列为水稻主导品种，连续4年被国家农业部评为长江中下游主导品种，累计推广2000多万亩时，总书记十分高兴，“您辛苦了！感谢你们做出的贡献，希望各位继续努力，科技兴农，粮食安全要靠自己。”

总书记的话让朱英国深受鼓舞，既感到振奋，也感到沉甸甸的



责任。他说：“我们首先要创新育种，农业上的核心技术，我们要自己创造。一定加快杂交水稻种植创新的步伐，保证我国杂交水稻走在国际前列。”

中国水稻种子不管是科研水平，还是种植能力都居世界前列，一直是稻种出口大国。但中国稻种市场过于广阔，使得国际大公司都想来占领。在此形势下，朱英国认为我们唯有自主创新，要始终走在世界水稻品种选育的最前列，培育高产、优质、抗性好的品种。

在国际公认的三系杂交水稻类型中，主要有袁隆平的“野败型”、朱英国的“红莲型”和日本的“包台型”，只有中国人培育的“野败型”和“红莲型”在生产中大面积推广种植。朱英国和袁隆平等通过努力，使得中国的杂交水稻育种从品种间杂交向亚种间杂交等领域拓展。更大的意义在于，从遗传多样性上讲，“红莲型”起到了隔离带和防火墙的作用。

用一生履行心底的承诺： 让天下苍生不再挨饿

朱英国 1939 年出生在湖北省罗田县河铺镇的贫寒农家，少年时代刻骨铭心的挨饿经历，目睹因粮食匮乏引发的悲剧，让他立下志向：让天下苍生不再挨饿。

1959 年，朱英国填报高考志愿时，3 个志愿全部填着“武大生物系”。如愿录取后，他选择了植物遗传专业。5 年后，朱英国毕业留校，专注于水稻科研工作。

幼时志向的种子，在大学的土壤里长成理性的科学精神。大学里，他常听高尚荫、孙祥钟、余先觉、何定杰、公立华、杨弘远、周嫦、汪向明等老师的课程和讲座。除了习得专业知识，还继承了一种朴实而坚韧的精神。这种精神是科学之光，照耀和指引着朱英国与他的后辈弟子们。

1964 年，朱英国参加了汪向明教授领导的水稻生育期遗传教育部重点科研组，开始水稻遗传研究。



当时，培育杂交水稻主要是在田野里做试验。要培育出稳定、成熟且能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水稻新品种，必须反复做育种试验，而育种只能在春天进行。为了追赶农作物生长所依赖的季节，加快水稻育种科研的进度，朱英国把目光投向了海南岛。

1971年11月，朱英国和同事用1 000多个套袋带上全部种子材料奔赴海南。1972年4月，上千个组合收割分类后，他们摘下一粒粒稻谷，剥去谷壳，带回湖北转育，秋后又继续转战广西南宁。

秋风乍起，奔赴广西南宁；寒冬来临，又转战海南岛；直到次年春天，才揣着希望的种子返回湖北。一年年，马不停蹄地追逐田野的春天，朱英国调侃自己是“水稻候鸟”，一年过三个春天。

追逐春天的脚步，听起来充满“诗意与远方”，但团队中人无不深知其苦。毒辣的太阳烤着后背，汗水糊满了脸，朱英国和助手们蹲在稻丛间，小心翼翼把住穗头，剪颖、去雄、套袋、授粉、封口，每个细节都得一丝不苟，直到又饿又乏才收工。

白天在田里劳作，收工后自己捡柴做饭。禾苗的天敌是田鼠，为了保护禾苗，他们把铺盖搬到田埂上，每天晚上拉电网、撒鼠





药、放夹子，彻夜与田鼠激战……一个春天，这样的日子有两个月；一年中，这样的日子有6个月。

两年后，他们利用红芒野生稻与莲塘早杂交，培育出中国新的细胞质类型“红莲型”不育系。这项成果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1973年，湖北省成立了水稻三系协作组，朱英国被任命为组长。不到40岁的朱英国，成为湖北省杂交水稻育种研究的领军人物。

1984年3月，经过大海捞针般的寻觅，农家品种马尾粘中一棵不育株被他和助手发现。又经过3年繁复的杂交试验，马尾粘细胞质雄性不育系终于成功培育出来，它就是“马协A”。

“马协A”的问世，拓宽了当时杂交育种的理论视野，2002年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同年，朱英国团队选育出“红莲优6号”，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以后又培育了“珞优8号”等，均通过国家、湖北等省市品种审定。



2013年5月，朱英国（左一）与袁隆平院士（左二）、谢华安院士（左三）等在海南考察红莲型水稻新品种“珞优8号”等产品



2007年9月17日，在湖北省农业科技创新中心试验示范现场的实测中，“珞优8号”创造出亩产823.4公斤的纪录，跨入了超级稻行列，成为朱英国奉献的又一硕果。

马协型和红莲型杂交水稻，作为朱英国的两大科研硕果，有效地防止了单一细胞质来源给我国粮食生产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为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目前，红莲型杂交稻累计推广已经超过1亿亩，湖北省农业厅已将“珞优8号”列入全省水稻主推新品种，还在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西等地推广种植，红莲型杂交稻成功走向全国，走进世界。

在“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如菲律宾、越南、斯里兰卡、孟加拉国、莫桑比克、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红莲型杂交水稻比当地品种增产20%~50%，认可度越来越高，种植面积增幅很大。

中国杂交水稻走向世界，具有重大意义。目前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中国的大国责任和义务。“楚国种，天下用。”对朱英国团队来说，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高水稻产量，也是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谈到为什么痴迷于水稻科研工作，朱英国说：水稻作为主要粮食作物，养活了我国60%的人口，是我国经济命脉之一。“我是农民的儿子，深知农村生产力的落后以及农民生产与生活的疾苦，我要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尽到自己的力量。”

要让水稻事业后继有人： 像培育稻种那样搞好传帮带

肖海军说，导师有两件事放不下：水稻事业、科研团队。

认识朱英国的人，都说他平易近人，脸上总带着笑意。他选择弟子没有条条框框，学生有求学的诚意、能吃苦，他就一心一意带在身边培养。朱门弟子中，大师兄、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代常的故



事很有代表性。

1975年，在湖北省沔阳县杂交水稻的培训与推广中，朱英国发现当时不到20岁，连初中都没毕业的杨代常非常执著地钻研技术，很有自己当年的那种拼劲，是个难得的好苗子。1985年，武汉大学招收首届插班生，在朱英国的极力帮助和鼓励下，杨代常考入武大，一路成为朱英国的第一个硕士生、第一个博士生。毕业后在美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学习工作，成为美国加州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和实验室主任。

2005年，朱英国电话催促他回国发展，杨代常毅然放弃美国的一切，回到母校武汉大学，“我深知，我要回去，要用我学到的知识去回报我的祖国，回报我的老师，尤其是要回报朱老师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对我的培养。”杨代常说。

杨代常办公室的大演示板上经常会留下诸多实验数据，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然后回到办公室，继续与研究团队做技术研讨。这样的习惯正是朱英国在他的成长之路上留下的深刻烙印之一。

2014年年初，朱英国凭借“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研究与应”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杨代常也同时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





等奖。

翻开朱英国留下的工作日志，2012年1月1日这一天写着，“培养人才是我们的职责，上午与胡骏交谈，希望他继续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完成基础研究任务，多发论文。”

胡骏，2001年进入朱英国实验室读博士，在导师的指导下，对红莲型杂交水稻的基因进行了逐一检测。2011年12月，胡骏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际植物学界顶级期刊《植物细胞》发表论文《红莲型杂交水稻育性恢复基因的分子机理》，揭示了红莲型杂交稻的育性恢复机理，并提出恢复基因分子复合体模型，推进了对育性恢复机理的认知。

胡骏这一重要论文的发表意味着，朱英国团队在红莲型杂交水稻育性分子机理方面的研究，继续走在整个世界的最前列。

2007年，以朱英国为学术带头人的遗传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武汉大学生物学成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朱英国非常重视队伍和基地建设，多年来他教书育人、言传身教，努力培养和引进高层次人才，为生命科学学院引进了多名高层次人才，建立起一支结构合理的研究队伍。

目前，朱英国一手带出的红莲型杂交水稻研发队伍形成了三支力量：以他的学生何光存、杨代常、胡骏为代表的基础研究队伍，以朱仁山、余金洪为代表的应用研究队伍，以及由深圳一家民营企业为主要代表的市场推广队伍。

同时，朱英国还常去农村，给农民作栽培技术培训。他认为，目前对于“80后”“90后”新农民来说，农村仍然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前提是不能满足于祖辈传下来的有限经验和常识，必须学习最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

“‘三农问题’要得到根本改善，应该从农业院校做起，从我们这些为农民服务的科学工作者做起。”基于这一出发点，他积极为农业发展献计献策，通过科技讲座培训，培养了一大批农业科技骨干；在湖北、云南、江西、海南、福建、安徽等地建立了15个院士工作站，为当地农业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家“973”计划



先进个人、全国师德先进个人、湖北省劳动模范、袁隆平农业科技奖、改革开放 30 年影响湖北 30 人……这位老先生的履历表上，闪光的荣誉何其多；但除去这些闪耀的光环，人们在一日三餐、一粥一饭之间，早已默默地记住了他。

先生虽逝，风骨永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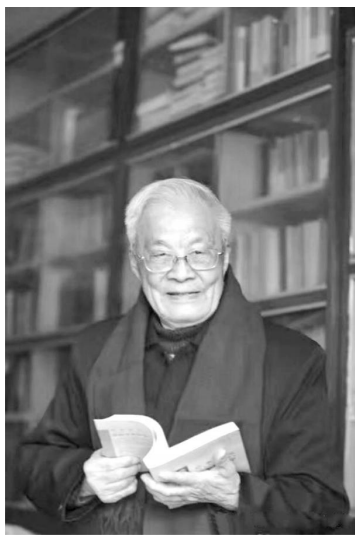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7 年 8 月 13 日）



我的哲学人生

杨祖陶

编者按：著名西方哲学史家、武汉大学教授杨祖陶先生于2017年1月22日上午在武汉去世，享年90岁。杨祖陶先生1945年进入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师从金岳霖、汤用彤、贺麟、郑昕、洪谦诸教授，1950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59年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他长期从事西方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专攻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与翻译。本文是他生前撰写的学术小传。





一、哲学人生

我祖籍为四川省大竹县，1927年1月15日出生在达县（今达州市）一个历代都重视子女教育，被乡里称为“读书人家”的家庭中。父亲杨叔咸为前清秀才，早年在唐山铁道学堂肄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在达县与兄长共同创办“商务印书馆经销部”，对提供中小学教材、传播新文化起到很大作用。父亲在我少年时去世。

我的三个同胞兄弟都先后受到大伯父教育之恩。大伯父杨伯钦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师范大学，是毕生从事教育事业的知名教育家。1937年我10岁时，父母决定把我也送到成都大伯家求学，大伯对我视如己出，高小、初中的学业都是在当地最好的学校完成的。

1942年，我不负大伯栽培考入了当时最负盛名的省立石室中学就读高中（1942—1945），在石室中学我陆续接触和阅读了倾向各异的书籍，尤其是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哲学更是令我陶醉和激动，受其影响立志学哲学，而没有步兄长们后尘学习热门的经济学。

由于一心想学哲学，1945年终于以同等学力考上了我朝思暮想的、名教授云集的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有幸成为在我国教育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的西南联大的末届大学生。

我当时怕考不上西南联大，还同时报考了华西大学哲学系，后者张榜在先，我已先期报到入学。华西大学风景如画，条件优越，况且我的大伯父时任校中文秘书长。但得到西南联大的录取通知时，我欣喜若狂，执意要去，开明的大伯父虽十分不舍，还是成全了我的志愿。我踏上征途，直指南疆，奔向春城。

当我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昆明，来到国难当头临时搭建起来的干打垒的简朴校舍和没有多少树木的近乎荒凉的联大校园时，眼前的一切与华西大学不可同日而语，但我情绪很高，因为心中在意的是自己对哲学的追求。我终于在这个大后方“学术自由的”“民主堡



垒”里，迈出了漫漫哲学人生路的关键一步。

1945—1950年是我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求学阶段。1945年一进入西南联大就感受到全校弥漫着浓郁的学术氛围，我忙着拜见自己仰慕的名师，找寻他们的著作。

我在西南联大的第一学年里上的是大一一般性的课程，唯一与哲学有关的就是金岳霖给文科学生开设的，可以说是哲学启蒙课程的逻辑课。金岳霖是把现代逻辑介绍到中国来的先驱，他精彩而严谨的讲课使我受到理性思维的逻辑训练，使我懂得了正确思维所必须遵守的规律和形式，这对我日后求学为学受用不尽。但我却没有因此改变自己在中学时代就树立的对尼采、叔本华意志哲学的信仰。

1946年4月，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复员迁回平津原址。在读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复员的学校，我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在等待复员的过程中，我们川籍同学相约一起先回四川，无奈我们坐的敞篷货车到贵州的七十二拐时突然翻了，我因伤休学，直到1947年7月才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复学。

1947—1950年，在北大学习的这3年对我的哲学生涯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三度进入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大师贺麟的课堂，聆听先生讲授的西洋哲学史、形而上学研究、黑格尔哲学研究三门课程。

其中黑格尔哲学研究实际上是贺麟主持的一个研讨班，上学期学习黑格尔的《小逻辑》，下学期学习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受到贺麟的启蒙、教诲、鼓励，我暗下决心要一辈子跟随他研究黑格尔哲学。

与此同时，我又以空前的政治热情，如饥似渴地博览马列著作，自然而然地使得黑格尔和马克思在我心中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我在青年时代就形成了没有黑格尔就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就不能洞见黑格尔真谛的朴素信念。这一信念在我风风雨雨的一生中从未动摇过，只有加深和坚定。

郑昕是我国第一个对康德做精深研究，能原原本本地、系统



地、融会贯通地介绍康德哲学的大家。我高度自觉地选修了郑昕讲授的有关康德知识论研究课程，并认真钻研了郑昕的《康德学述》著作。

是郑昕为我开启并带领我进入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学术大门，有了一些粗浅的领悟，日后我对康德哲学的研究探索不得不说是得益于郑昕的指引。

在北京大学的最后一个学年，我还有幸完整地聆听了学贯中西的哲学大师汤用彤开设的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两门课程。汤用彤讲授的内容可视为对哲学家原著的导读，他通过严密的分析，引导学生通观原著的本质内容和逻辑线索，先生这一做法，为我日后从原著入手、从第一手资料入手研究哲学树立了榜样。

1945—1950年，我完成了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的求学之旅。在金岳霖、贺麟、郑昕、汤用彤诸先生的影响下坚定不移地确立了终身研究西方理性哲学的方向。

1950—1959年是我在北京大学任教的9年。1950年，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兼作系秘书。当时系主任郑昕对我的工作很为赞赏，说我很有一点做秘书的才能。

在参加一年土改、从城内沙滩迁校燕园、全国院系大调整、下放劳动一年中，我经历了从哲学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教研室再回到哲学系的变动。

刚开始我从研究和翻译两方面着手进入黑格尔哲学：发表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黑格尔的哲学史观》，翻译黑格尔著《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中赫拉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两部分，以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序言。我毕业留系工作后不久，在学长赵宝煦、黄楠森的指导下从事马列主义基础的教学工作及协助苏联专家主持研究生班的工作。

这样，我就有机会更广泛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哲学方面的著作。可是，对马克思哲学了解得越多，我就愈发觉得不了解黑格尔哲学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我对黑格尔哲学的依恋就越深。

经我多次争取，1956年年底，我终于回到了外国哲学史教研



室，这得益于院系调整后，从清华大学到北京大学任哲学系系主任的金岳霖希望我回到他身边工作。回到哲学系后，我满以为从此可以把探索、研究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联系提上日程、深入下去，但是客观环境并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

1959年10月至今是我在武汉大学任教的漫长岁月。

1957年“反右”斗争后，这年冬季我随北京大学师生下放到贫瘠的上清水进行劳动锻炼，1959年我从上清水回校不久，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突然就得到到武汉大学任教的调令，国庆节后我就匆匆来到珞珈山，从此再没有动过窝。

我在武汉大学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时代。不论风云变幻，不管艰难险阻，我始终没有放弃对西方理性哲学的探索与耕耘，始终坚持教学、研究与翻译三者结合的为学道路。

我来武汉大学是与1957年“反右”斗争后高校形势变化有关的。陈修斋因受牵连不让上课，武汉大学哲学系匆忙来北京大学要求派人“支援”。

我在北大没有教过一堂外国哲学史的课程，家中还有一大堆难以想象的困难，来到武汉大学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匮乏，正常生活都难以为继。好在当时正贯彻“高教六十条”，阶级斗争的弦稍稍放松一点。

我披荆斩棘，奋发图强，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中开辟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收获了第一批研究成果：撰写了适应教学需要的40万字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铅印教材（《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一书的前身）；为湖北省哲学学会（李达任会长）首届年会撰写了5万字的长篇主题论文《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

在“文化大革命”年代，我的学术事业被迫中断。1968年武汉大学率先将哲学系一锅端到湖北襄阳隆中，在下放劳动和复课闹革命中挤出时间着手编写了铅印本《欧洲哲学史（试用讲义）》（全国哲学通用教材《欧洲哲学史稿》的前身）中的古希腊哲学、欧洲封建社会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部分，陈修斋在完成他的名著翻译后参加编



写了另外4章，我们共同完成了全书；之后我继续翻译黑格尔的《精神哲学》。

1978年，武汉大学哲学系结束了在湖北襄阳隆中长达10年的“斗批改”、开门办学，我又重返珞珈山，开始了哲学生涯的新阶段。

当时正值粉碎“四人帮”，百废待兴，我选择的是把一线教学视为天职，以学生为中心，主动负担恢复高考招生的1977、1978、1979三届哲学系本科生的西方哲学史课程的通讲工作，一两百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我力求以问题为主线，努力挖掘哲学家的深层意蕴和揭示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规律，被同学们评价为“带领我们在哲学史的迷宫里漫游”“听杨老师的课是一种真正的享受”。

此外，首次开出难度较大的研究型选修课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研究和黑格尔《小逻辑》研究，这些课程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也促进了我的科研工作的进展。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发表了从《黑格尔关于逻辑学对象的观点及其在发展辩证法中的历史作用》到《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的系列学术论文；出版了专著《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合著《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

从古稀到耄耋，我克服自身年老病痛的不利条件，卸下教学任务后，在没有任何补助的情况下，集中精力，历时7年，踏踏实实地推进自己的学术事业，在主导合作编译出版《康德三大批判精粹》、合作翻译出版康德著《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的巨大工程中竭尽自己的全力，产生了很好的学术效果和社会效益，经住了学界的反复考量。

此后，腰疾缠身的我仍马不停蹄地进行各项学术工作：80岁首译出版了恩师贺麟托付的格洛克纳版黑格尔《精神哲学》；完成了从网络走向正式出版的《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学术回顾集；85岁奋力首译出版了贺麟托付的黑格尔《耶拿体系1804—1805：逻辑学和形而上学》；87岁高龄时，又根据德文“理论著作版”《黑格尔著作集》第10卷，完成了即将出版的中文版《黑



格尔著作集》中《精神哲学》卷的重译。

二、学术成就

1. 开创了对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的研究

运用辩证逻辑，以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的矛盾为纲，揭示和陈述了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费尔巴哈及其向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发展的辩证逻辑进程，这在国内外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中还属首见。

在过去，德国学术界虽有关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论著，但从没有过从康德到费尔巴哈以及马克思的。普列汉诺夫的有关论著《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也只论述了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哲学进程。

尤为重要的是，他们都不是以运用辩证逻辑揭示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逻辑进程为目标和内容。我探索和研究的意义在于开以辩证逻辑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进程的先河，特别是从德国古典哲学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抓住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这个主要矛盾来揭示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辩证逻辑全进程。这样就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崭新道路。

1959年秋，我受命从北京大学调至武汉大学哲学系，很快就开始了主讲德国古典哲学的工作。当时生活条件非常困苦，校领导号召大家多晒太阳，保持健康。

当时，我完全可以按照既有的西方哲学教材走上讲台，但我执意要给自己压担子——自己编写教材。在编写教学提纲的过程中，恩格斯关于“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的论断深深地吸引着我，在我心里产生了解开这种发展的连贯性、逻辑性和必然性之谜的强烈冲动；而列宁关于近代哲学认识的圆圈运动（“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设想，像一道划破黑暗的闪电，在我眼里显示出了了解谜的前景。



这就促使我把揭示和描述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作为自己长期研究的中心课题。我坦白地承认，正是解决这个课题的兴趣和需要，成为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原理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论述进行一番广泛深入的研究的真正动力，也成了我思考和探究有关德国古典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各种问题的特殊视角。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我自信已经依照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及其方法论原理，大致弄清楚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阶级即经济-政治基础、实践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思想基础即近代哲学及其向德国古典哲学提出的问题和任务之后，就向自己提出了着手编写一部以探索和揭示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逻辑为目标和特色的教材的任务。

我的想法得到了哲学系和所在教研室的支持。那是一个物质条件特别困难的时代，连一张普通的稿纸也难见到，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以一种现在也难以想象的竞技状态来完成这项自选动作。

由于时间紧迫，这项工作只好马不停蹄地以边讲授、边编写、边由印刷厂印发给学生的方式进行。就是这样，到课程结束时，将所散发页集中起来装订成册，同学们居然有了一部 40 万字的铅印本《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 40 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

当时对于出版著作没有强烈的愿望，这部讲义在抽屉里一放就是 30 年，直到 1993 年才删繁就简、整理修订后以《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一名正式出版。

《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一书问世后，引起学术界普遍关注，有人称之为“哲学史方法论典范”。关于我所运用的哲学史方法论原则，在该书中作出了这样几点结论：

(1) 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不是一个随意的、偶然的过程，不是个别天才人物头脑中一闪念的产物，而是基于人类思想文化和哲学的已有成果之上的一个有规律的逻辑过程。

(2) 不过，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是内在的、隐藏的，必须去其偶然材料，得其带有本质意义的材料，去突出其内在的逻辑线索；之后反过来用这一逻辑线索去统摄那些偶然的材料，使其纳入一个



被理解了系统中。

(3)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必须有一个高出于他所考察的对象之上的视角和立足点。“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马克思语),每一个后来的哲学思想体系都是理解前一个思想体系的钥匙,每一种哲学的内在意义和思想价值,都只有在后来的哲学中才能得到更好的阐释。

(4)除了哲学思想本身的逻辑进程之外,一个时代的哲学与该时代的整个社会状况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且哲学思想是通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受到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制约的。

这一关于方法论的原则被学界认为对哲学与哲学史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2002年,在《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一书的“再版前言”中,我又将所运用的“方法的核心”做了一个自认为至为精当的概括:“这就是要把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学之统一的唯物辩证逻辑应用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现实历史进程的研究”,而所谓应用唯物辩证逻辑,就是以它作为研究的指南,去发现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固有的内在规律和逻辑进程,实质上也就是要在这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出与之相应的唯物辩证逻辑的观点。

这就是说,要揭示和阐明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发展,是一个受其固有的辩证法则支配的、由自身的内在矛盾推动的、螺旋式上升的、必然的辩证逻辑进程。

2. 创造性地研究康德哲学

康德哲学是我在阐明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基础上第一个深入研究的对象。而从“范畴先验演绎”出发深入探索康德哲学则是我确立和遵循的研究康德哲学的整体思路。哪怕有天大的困难,我都必须拿下“范畴先验演绎”这个进入康德哲学的桥头堡。

(1)首次揭示和论证了康德哲学最重要、最困难的“范畴先验演绎”是一个由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的圆圈”。

范畴先验演绎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最核心、最重要也



是最难的部分，但它又是通向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的钥匙，只有把这部分搞通了才能真正进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从而进入批判哲学的大厦。

而“范畴先验演绎”首先遇到的就是它的构成问题：它究竟是如《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所说的由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两部分构成，还是如第二版所说的只有客观演绎？这两种演绎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这是康德研究中至今仍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问题，我知难而上，进行了艰苦细致深入的攻坚研究，作出了上述令人瞩目的回答。学术论文《康德范畴先验演绎初探》被《中国哲学年鉴》认为是康德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进展。

(2)突破以为康德只有一个批判哲学体系和对其性质简单化的成见，揭示和阐明了康德批判时期里先后出现的三个不同体系：以解决我能知什么、我应做什么和我可以希望什么为内容的“科学(未来)”形而上学体系，它由于预定的自然形而上学只有开端而是一个未完成的体系；以解决上述三个问题和人是什么这个总问题为内容的哲学人类学体系，这是一个各组成部分尚未协调一贯起来的体系。真正完成了的批判哲学体系具有三重性质：解决形而上学可能性问题的形而上学“导论”，真(自然)、善(道德)、美(艺术)统一的形而上学体系和以揭示知情意三种能力的先天原理为内容的先验人类学。

康德哲学的三个体系和批判哲学的三重性质有力地表明了康德在解决哲学何去何从问题上的永不停息的探索性和创始性，这是康德哲学永恒魅力之所在。

(3)突破对康德思想发展的单纯描述的局限，以矛盾为纲，揭示和论述了康德思想发展从早期理论自然科学阶段直到后批判哲学阶段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由此展现出了康德思想发展进程的这样一幅千真万确、栩栩如生的画卷：“在他的内心世界里，近代各种对立思潮互相激荡，思想风暴此起彼伏、连绵不绝，思想革命的潮流汹涌澎湃、曲折反复，一旦形成了容纳百川的海洋，新的思潮又在海底涌动兴起。”



(《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编译者导言)

3. 创造性地研究黑格尔哲学

黑格尔哲学是我心目中“主题的主题”，从逻辑学出发深入探索黑格尔哲学是我确立和遵循的研究黑格尔哲学的整体思路。这不仅需要我进行高度纯粹的艰苦的思辨，还考验我是否具备足够的、不顾一切地研究哲学的耐心。我体会到没有耐心是绝对不行的。

(1)首次从黑格尔逻辑学对象的特性出发，详尽地阐明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与辩证法的辩证统一关系：建立逻辑学必须也只能用辩证法，而辩证法也必须和只能由逻辑学来制定，黑格尔的逻辑学因此只能是逻辑学、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四者统一的逻辑学体系。

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揭示和阐明了黑格尔建立逻辑学体系的五大方法论原则：逻辑学、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统一的原则；意识的经验发展和主客同一的纯概念发展一致的原则；纯概念自己运动的原则；纯概念的逻辑发展与历史发展一致的原则；逻辑学与经验科学一致的原则。

由于我在为中国哲学界纪念黑格尔逝世 150 周年提供的论文《黑格尔关于逻辑学对象的观点及其在发展辩证法中的历史作用》中，重申并有力地论证了黑格尔逻辑学是逻辑学、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四者统一的新见解，贺麟称它是一篇在黑格尔哲学中走出了新路的佳作。

(2)首次提出主体性这个黑格尔哲学的基本概念只是在其逻辑学中才得到了透彻处理的观点，进而系统地考察了逻辑学中主体性的发生史；主体性从作为形式概念的形式主体性、到作为目的性的实在主体性、再到作为理念的真实主体性的辩证发展；最后，将此种发展和提高归结为“从潜在的主体性到绝对的主体性”的无止境的、一次又一次地向更真实的状态前进的辩证发展历程。

这篇《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体性》论文，在 1988 年的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令与会的德、法等国著名专家们感到惊讶，并得到了他们的高度评价和赞赏。



当时参加会议的青年学者、现任复旦大学教授的邓安庆后来撰文指出：这篇论文“展示了一个中国学者以德国式的思辨本真地理解和批判地重建黑格尔哲学的精深思想，让国外同行惊讶不已。他们惊讶的是，在刚刚结束‘文革’的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却有学者可以跟他们站在同一个水准上讨论德国主体哲学问题！”

(3)运用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则和方法，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证了贺麟关于黑格尔体系构成(以《精神现象学》为全体系的导言，以逻辑学为全体系的中坚，以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统称应用逻辑学——为逻辑学的应用和发挥)的创见及其意义(拨开黑格尔《哲学全书》体系的唯心主义迷雾，直接展示了黑格尔哲学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真实关系：一方面逻辑学及其范畴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来自精神现象学，一方面逻辑学与精神哲学、自然哲学之间不是什么唯心主义的外化和回到自身的关系，而是逻辑学和应用逻辑学的关系)，从而有利于正确地理解和研究黑格尔哲学。

三、“必得其真，务求其新”的治学原则

在我的学术研究中，“求真”是第一位的，在求真的基础上“务新”，即力求在前人止步的地方有所前进、有所发现和有所创新。我认为“求真”与“务新”两者不可偏废，而应当统一起来，并无止境地从一个层次进到另一个更高的层次。

这是一个艰苦的但也是愉悦的上下求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注重把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结合起来，立足前沿，选题上避易就难，程序上埋头从基础做起，力求从第一手资料熔铸提炼出真知灼见。

我的一篇篇学术论文都是一个个重要的专项研究，短则万余字，长则三五万字，从来不是唾手可得的应景之作，而是呕心沥血、反复探索、日积月累逐渐完成的。我认定，凡我拿出手的东西，哪怕是一点点心得也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我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领域中求真务新的第一步是开创了对从



康德到黑格尔哲学的逻辑进程的研究，把它看做是理性哲学的矛盾进展过程（见《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

30 余年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求真务新，认识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自身就包含有非理性主义（意志主义）的因素，将其发展看做是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既对立又重合、交叉的矛盾进展过程（见《德国近代理性哲学和意志哲学的关系问题》）。

关于引进西方哲学究竟有什么用，我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经历了一个艰苦的求真务新过程。1998 年 10 月，在芜湖西方哲学讨论会上我力排众议，主张引进西方哲学不是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而是要人看到原原本本的西方哲学。

经过将近一年的反复思考，我认识到在此问题上必须把“实用”之“用”和西方哲学的本性所决定的，它固有的“作用”之“用”区分开。

于是我在 1999 年的“新中国哲学 50 年学术研讨会”上大声疾呼：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引进我国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源自古希腊哲学而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达到典型高度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贯穿在西方近代启蒙思潮中以个体独立和自由意志为核心的“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

在以后的半年内，经过艰苦的反复探究，我修正了自己原先对于“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的看法，认识到这种精神同上述理论精神一样，也是源自古希腊哲学而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达到了典型的高度，它不同于“理论精神”之处仅在于它是人和人类历史行动的客观原则；并进一步认识到这两种精神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批判地改造、继承而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固有的两种根本的精神。这些观点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 2001 年写成和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一文。

1957 年，我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观》一文，1993 年我深感有必要再回到这个论题上来，写成和发表了《黑格尔哲学史观再认识》一文，在对这个重要问题的求真务新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此文不仅更加精当地把黑格尔哲学史观的核心归结为他所发现



的，以“哲学只有一个，哲学史是这唯一哲学发展的历史”等四点内容所构成的“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而且更加广泛、深刻、集中地揭示了黑格尔这一发现的合理性和当代价值。

这就是，它不仅有助于科学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过去哲学的本质联系，而且更在于它有助于正确地说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应有的关系，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发展就必须同时关注、承认、肯定和批判地吸收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理内容和总结其经验教训，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发展史的研究者应有的职责和任务。

四、坚持真理，敢说真话

在几十年的哲学生涯中，我的学术研究始终围绕着心中的目标进行着，我自认为自己最大的特点在于为人与为学的一致性，始终坚持自己的追求与信仰，从不趋炎附势、朝三暮四，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干违心的事。

从学术上我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不因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改变，不趋时髦，不赶浪潮。我深深感到，坚持真理不易，讲出真理尤难，因为这需要更大的勇气，得准备承担可能的风险。一个真正的爱智者，应当努力把这两方面统一起来。

古希腊没有所谓奴隶哲学，这对于学习过、更不用说研究过西方哲学的人来说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但在1971年，一些“上、管、改”的工农兵学员出于对“奴隶们创造历史”的误解，在我刚从养猪场匆匆走上讲台讲第一堂课后，就立即贴出大字报对我没有讲“奴隶哲学”进行了气势汹汹的非议，并提出“有奴隶哲学”的主张。

他们的这一举动立即得到哲学系领导、分校领导、珞珈山总校领导以及工、军宣队领导的支持，并号召师生就此问题展开“大辩论”。这时，只有我一个人站出来坚持“无奴隶哲学”。

大辩论从襄阳分校一直进行到武汉大学总校。我不得不单枪匹马奔赴珞珈山总校小操场大会讲台，面对黑压压的人群和学员、教师对手们，轮番展开激烈的辩论。



我拒受校领导“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指示，顶住《光明日报》站在“有”的立场对这场所谓的大辩论所做整版报道的压力，始终坚持“无”。有意思的是，当时哲学系的教师几乎一边倒地赞同“有”，为“有”找论据，并为在辩论中如何取胜出谋划策。极个别教师虽然对我表示支持，但却绝口不言“无”。

后来发展到居然有的外系教师提出不仅“奴隶有哲学”，奴隶还有政治经济学，甚至图书馆学，不一而足。鉴于此，校领导也就只好见好就收，不再就奴隶有无哲学继续辩论下去了。

也许在哲学、哲学史研究这样一些抽象的理论领域坚持真理、说真话比较容易一些吧！

其实不然，因为在这里往往会甚至必然会和奉为圭臬的某些观点、提法、规定、信念等发生冲突，因而也就需要更大的勇气。例如，在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上倡导必须引进西方哲学中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就要冒风险。

在《21 世纪中国哲学前景》一文中，我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主体地位”及其本身的发展，只有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不同观点、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之间的“百家争鸣”中才能实现，这样提出问题就要不怕别人说这是在为“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造舆论或鸣锣开道。

五、淡泊名利，乐于默默无闻干实事

人们对我最深的印象是与世无争，淡泊名利。我是能够与同辈、晚辈合作共事的，因为我真正地不惜一切埋头干实事，超负荷承担重任，笨鸟先飞，笨鸟晚归，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在目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浮夸浮躁、追名逐利的情况下，我还是能够保持自己的学术阵地和学术节操，我求的是自己的心安。我深深体会到，只有淡泊名利，才能“坚持真理，敢说真话”；也只有淡泊名利，才会乐于默默无闻地干实事。在我的思想里，没有名利的空间，因而也从来没有过摆脱名缰利锁的挣扎，而只有干实事的愿望和冲动，干实事在我不仅是职责和任务，而且更是心灵获得



愉悦和满足的源泉。

没有人干实事，再好的设想、规划、蓝图和理想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因此而受损失的就只能是学术和教育事业。干起实事来，我从未丝毫“吃亏”的感觉，甚至在别人看来实在是近于“迂腐”；相反地，在我的脑海里倒是不时会浮现出一种“舍我其谁”的自信和坚定。

“文化大革命”后期，工农兵被推荐上大学。我响应系领导做好教材建设的号召，着手进行《欧洲哲学史》(试用讲义)编写工作。我先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写起，陈修斋在完成《人类理智新论》的翻译后也投入了这项工作，我们共同完成了这一教材建设。

系领导对此非常满意，当即决定铅印，由湖北省山区小县保康的小小印刷厂承担。我放下《精神哲学》的译事，从襄阳分校到保康印刷厂整整做了三个月的“小工”，帮助工人师傅辨认底稿上的字迹以便正确地拣铅字排版，排好一页又帮忙校对一页。

这样的实干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想象的，这是我难忘的一段经历。谁料到这部从山沟里飞出来的讲义竟成了后来影响广泛深远的国家教委规划中的“高等学校哲学专业教材”《欧洲哲学史稿》(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一等奖)的前身。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文责自负”观念的淡薄，“史稿”后记没有写下编写章节的分工，更没有这段实干的点滴记录。

在主导合作从德文原版新译康德“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的7个寒暑里，我作为第一著作权人，全力地、默默地、夜以继日地埋头对电脑上以日译3000字的速度接踵而来的100万字的初译稿进行精心的审视、重译、校改。本着对学术、对历史、对读者，更重要的是对自己负责的精神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

正如初译者在《判断力批判》的译者序中叙述的：“翻译工作的程序是，首先由我在电脑中译出一个初稿，打出样稿，然后由杨祖陶先生用铅笔仔细校订，我再根据校订过的样稿加以订正。由于电脑操作，省去了许多重复抄写的麻烦。

“但使我和所有见到过杨先生的校订稿的同事们感到吃惊的



是，尽管我在初译时尽了最大的努力小心谨慎，力求少出或不出错误，但仍然被杨先生用极细小的字体改得密密麻麻，几乎要把原文都淹没不见了。

“算起来，杨先生校改所花的时间，比我译出初稿的时间还多得多。这种认真的态度，在目前国内的翻译界还是很少见的，所以我的第二次订正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甚至比我自己直接翻译还更加令人望而生畏。”

我认为采取流水作业式的三段式（电脑初译—手工校改—电脑订正）的合作翻译过程，既保证了翻译的质量也保证了翻译的进度，是一件优势互补、合作双赢的创举，曾被学术界视为两代学人合作的典范。但为了扶持后学，我在署名上安排自己为校者，而安排合作者为单独的译者。

我觉得，经过我这样的工作，有了质量保证的康德“三大批判”新译本得以问世，学习者和研究者有了可信的新译本使用，这就足够令我的心灵愉悦和满足了。

当时我没有如黄树森先生在《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年》序中所说的那样考虑到，在这样放弃署名的权利的同时，也就放弃了我作为译者之一对这些译著、对学术界和教育界所应负的责任。

不仅如此，由于我执著于学术本身，完全没有注意到今日的学术环境已大为改变，反而为某些人提供了便利，在学术界制造了极大的紊乱，但我坚信，读书的人自然会明白，不读书的人管他干什么？

1959年我调到武汉大学，根据系领导的指示与安排，我负责的西方哲学史教学小组、教研室一贯以德国古典哲学为方向和特色。

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主持教研室工作时一反这个传统的安排，建议和支持教研室以在国内占有一定优势的西欧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为中心和方向，招收这个方向的硕士生，并举办这方面的全国性大型学术讨论会以扩大影响、壮大声势、提高知名度，而我自己则宁愿坐冷板凳，一如既往地潜心研究我热爱的德国古典哲



学，重在探索的过程，一个一个问题地，长期沉下去、深入下去，直到自己认可，不急于出书，不忙于开会，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是我最大的乐趣。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7 年 1 月 23 日）



窦文涛： 这辈子最好的住处是武大樱顶

张 聪 贺 俊

校友名片：

窦文涛，1967 年出生，河北省石家庄人。1989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曾供职于广东人民广播电台。1996 年加入凤凰卫视，1998 年推出的闲谈节目《锵锵三人行》坚持了 19 年。他擅长引导嘉宾发表个性化的大胆言论，谈笑间充满趣味性和知识性，为海内外观众所熟知。2005 年，他被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持人专业委员会推选为 2004 年度最佳电视主持人，并获评“最佳谈话节目主持人”。





从武汉大学毕业 27 年了，窦文涛依然在这里留下了许多传奇，熟悉他的武大人都能讲出一两段轶事。

2016 年是凤凰卫视成立 20 周年，窦文涛是创台的老员工之一，他的招牌节目《锵锵三人行》做了 18 年。昨日，他和同事们一起来汉为“老东家”庆生，并发布“凤凰”的全新媒体产品。

一张桌子，三张椅子，他就像老舍先生《茶馆》中的掌柜王利发，和嘉宾们坐在一起锵锵出声，嬉笑怒骂，聊天下事。“观众们不用太当一回事，就是聊天。”他渐渐把做节目当作“游戏”，在被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畅所欲言，和观众分享这种天马行空的状态。他也越来越游刃有余，就像烧瓷器的老师傅，烧出的成品越来越多。

在武大读书曾拥有最好的住房待遇

记者(以下称“记”)：武汉大学是您新闻理想起始的地点，这次又来武汉为自己所在的新闻单位庆生，您觉得武大的这段岁月给您的最深印象是什么？

窦文涛(以下称“窦”)：大学毕业之后我很少回武汉，这个城市给我的最好东西就是在武大读书的四年时光。武大是最漂亮的大学，四季有花，我读书时学校没有围墙，就在山水之间。

我们那时的学生在武大无拘无束，老师上课不点名，学生只要修够学分就合格，外系的课可以去听。我在武大图书馆看了很多砖头一样厚的书，像 18 世纪的法国哲学之类的，今天听起来不可思议，但那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时尚。还有诗歌节，很多同学是湖北口音，就找我去朗诵。感觉很有意思，有很多故事。

记：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对您以后的工作有没有影响？

窦：每个人的命各不相同，我的命就是比较自由，到武大也是很自由的环境，干什么都是前头没有人。我读武大新闻系的时候，前头只有一届学生；我毕业工作到广东省电台，台里刚成立普通话的新闻频道；在那儿待了几个月，赶上了中国广播从录音播出到直播；到了凤凰台也是初创，没有条条框框，自由发挥，才有做了



18年的《锵锵三人行》。

记：影响这么大，那您对武大的感情一定是特别深。

窦：透露一下，我这辈子最好的住房待遇竟然是在武大（笑）。樱园上头有三个老门楼，靠近湖滨方向那个门楼是校广播台，我一个人在里头住，三间房一条走廊，全套的音响设备，女生到我那儿开舞会。结果我大三搬回了普通学生宿舍，可能跟开舞会也有关系（笑）。

找到界限就找到了自由

记：《锵锵三人行》已经做了18年，一开始，您能预料到它能坚持这么久吗？

窦：很多人讲我的节目是谈话、清谈、言论，我觉得聊天更贴切，就是生活里的聊天。“坚持”这个词不准确，我没有硬挺的心理，近些年甚至可以说是享受。感谢老板能容忍我在《锵锵三人行》没广告的时候继续做节目，这是个小众节目，我是个小茶馆，小本经营，压力不大。

记：三思而后行，公众场合说话有时候也是有风险的，《锵锵三人行》有类似顾虑吗？

窦：人真正的成熟就是给他自由，文责自负，“凤凰”给了我这个自由，对我来说需要自律。如果我说错了话，我和台里共担风险，公共媒体人的脑袋里都有个警察。在我的节目里，很多嘉宾是为了发表观点而来，观点就是他们的生命。但对我这个开茶馆的人来说，观点是一种谈资。我喜欢有限制，给我画个圈儿，在被允许的范围内找到接近极限的乐趣。打破界限是有风险的，但找到界限就找到了自由。

记：您觉得自己在人情世故方面游刃有余吗？

窦：我有跟人交际的能力，没有跟人交际的爱好，很少出门，朋友们在一起如果有人活跃气氛，我就不说话，有人说我是做谈话节目做累了。



经常觉得自己无知得可怕

记：在传统媒体被新媒体挤压的态势下，您对《锵锵三人行》的未来会不会感到迷茫？

窦：在当今这个时代，有远见的人会迷茫，而鼠目寸光的人不会迷茫，所以我不迷茫，我每天眼前的事都顾不完，看不见远方，也顾不上看，没空迷茫。

记：如果有一天不用工作了，您会做什么？

窦：现在还没有养老的钱，我还得努力挣钱。很多年轻人说不想工作，我很有共鸣，我也不想工作。如果我有了足够的钱，不用工作了，我会比现在还忙，因为我爱好太多了，光看书时间都不够用，到死都看不完。我经常觉得自己无知得可怕，所以要多看书。

记：人到中年，您会不会也有那种中年人常见的愤怒？就是对现在这个社会有一些看不惯。

窦：我觉得，不靠谱的人，哪个年龄段都有；聪明的、善良的人，也是哪个年龄段都有。如果你看不惯，那就是你有自卑感，当你觉得成竹在胸、全权在握的时候，就不会有看不惯的。你看不惯是因为被刺激到，与其看不惯，倒不如想一想。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16 年 11 月 29 日）



我与学生

郑公超

20 世纪 70 年代，国家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到了 80 年代，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社会对管理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国家越发认识到发展管理学科和培养管理人才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在这种背景之下，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于 1981 年成立，而我也于第二年的 12 月从部队退伍，被分配到这样一个新生的单位担任系党总支人事组织干事。

经济管理系 1983 年 4 月调整为经济与管理学院，进而成为现在的拥有庞大的体量和强大的学术能力的大院。但在创建之初，仅开设了企业管理和投资经济管理两个专业，前者主要为经济管理部门、公司、国有大中型企业、“三资”企业和企业集团培养高层次的管理人才，后者主要为建设银行、投资银行及其他金融部门、投资管理部门、大中型企业、“三资”企业培养投资管理人才；同时，还设有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和企业管理两个专业硕士点。党总支书记胡春芳，系主任李崇淮，副系主任许俊千、孔祥祯、冯文权，团总支书记边江，办公室主任江平等同志，紧密团结在一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截至 1983 年，已有专职教师 37 人、坐班教辅人员 13 人；到 1987 年 9 月，先后有三位教授担任系主任，分别是第一任系主任李崇淮（1981.10—1983.6），第二任系主任樊民（1983.6—1986.4），第三任系主任郑琴縠（1986.4—1990.2）。

在学生培养方面，经济管理系于 1981 年招收了第一届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生，共计 37 人，由李北平老师兼任政治辅导员；次年招生规模扩大到 82 名，该班由边江老师兼任政治辅导员。到 1983



年8月，1983级经济管理专业与国际金融专业本科生入学时，党政办公会研究决定，由我和叶永刚同志分别兼任这两个专业的政治辅导员，这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有了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经历。当时，虽然自感水平有限，但还是下定决心努力完成好组织交给的任务。

为了提高新任政治辅导员的工作能力，学校学工部在新生进校前对全校院系推选的政治辅导员进行了集中培训，并且下发了《武汉大学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手册》；同时，党总支书记胡春芳亲自找我谈话，希望我能不负组织的希望照顾好、培养好经济管理系招收的这批即将入学的优秀学生。这些鼓励令我信心大增但也压力巨大，在系统性的教育与培训之外，我主动查找资料学习，初步了解了政治辅导员所应负责的工作，掌握了作为一名合格政治辅导员所应具备的能力。

与此同时，为了让学生们能够在大学期间健康成长，在他们进校前，我就和同事做了几项调查，为日后工作开展做好了充足准备。第一，档案调查，我们先后到校学工部、档案室查阅分配到我班的63名同学的个人档案，从中分析、了解学生的思想表现、家庭现状、学生的个人特长等基本情况。通过了解，这个班共有学生63人（在大学二年级阶段，又招入插班生9人，转班生4人，共计76人），其中男生47人，女生16人；团员共60人；来自城镇的22人，占34.9%；来自农村的41人，占65.1%。63名同学分布在14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湖北省28人，湖南省6人，河南省5人，广西壮族自治区2人，四川省4人，江苏省2人，浙江省2人，安徽省2人，青海省2人，宁夏回族自治区2人，贵州省2人，云南省2人，陕西省2人，江西省2人。第二，生活条件调查，我了解到这个班的同学大部分来自农村，许多同学家庭条件较差，甚至还有孤儿，进校后，他们面临着吃穿等基本生活保障问题。第三，住宿问题调查，来自两个专业的学生进校后，全部被分配到桂园八舍，需要尽量协调分配好他们的住宿，解决8人搭配组合的问题。第四，组建班委会和团支部，以及调查了解每个学生的特长、爱好等。

我首先想到的是要解决学生的吃、穿、住问题。经与金融专业



叶永刚老师商议，为了两个班级女生的安全，计划安排女生全部入住桂园八舍五楼；因男生偏多，计划安排经管专业的男生住一楼，金融专业的男生住二楼（金融专业是第一届，系里建议给予适当的照顾）。为了便于学生入住，我提前两天把新生宿舍认真彻底地打扫了一遍，并且按照 8 人一间的宿舍标准粘贴了每位学生的姓名标签。

当年 9 月份新生进校报到，我带领经管专业 1982 级的老生按照学校的统一布置安排，开始了为期两天的迎新工作。当时系里只有一辆三轮车可以帮助新生托运行李。系领导、系行政人员和 1982 级的老生们对 1983 级新生的到来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周到的服务。在规定时间内，经管专业的 63 名新生和金融专业的 27 名新生全部报到，完成注册。在学生报到完毕的第二天，学校和各院系专门组织召开了新生入校欢迎会，我系党总支书记胡春芳和系主任樊民在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新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且向同学们介绍了学校和我系的学科建设、科研师资建设和课程设置情况。会上，胡春芳书记正式向学生宣布传达了由我担任 1983 级经济管理专业政治辅导员，叶永刚担任金融专业政治辅导员的决定。之后，我与叶永刚老师分别组织分管的班级组队参观了校园和动物标本楼。晚上，我们基于对学生的调研情况成立了班委会和团支部，当时的班委会成员有：胡昌宏（任班长）、陈红担（任副班长）、祝方东（任学习委员）、董红兵（任生活委员）、胡国斌（任体育委员）、陈民喜（任卫生劳动委员）、张红（任文艺委员）、宋灵恩（任课代表）；团支部成员有：陆世军（任团支部书记）、王国会（任团支部副书记）、梁从容（任组织委员）、白江帆（任宣传委员）。

我组织同学们认真学习了学校相关的校纪校规，使同学们尽快熟悉大学环境，适应大学生活。之后是奖学金的评定。我们班大部分同学来自农村，因此助学金的评定面放得较宽，希望尽可能解决好农村同学的经济困难问题。此外，我还投入大量精力解决农村同学过冬的盖被穿衣等问题。使同学们进入武大后不受冻、不挨饿，能够放下思想包袱安心学习。

自从担任了 1983 级政治辅导员，我将部队的作风带到了学校，



要求班里的同学早起床、早锻炼，严格遵守学校的作息时间表。除正常工作外，我还坚持跟班参加了两学期的听课。我认为要使新生能够顺利从高中过渡到大学，必须从进校开始就让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第一学年，我经常在上课期间检查学生宿舍，督促同学们去上课；有时，我也有意识地跟班上课，并和他们一起学完了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和资本主义部分；同时，我几乎每天下班后都深入到学生班级参与他们的集体活动，主动与同学们交心谈心，打成一片，很快我们就建立起了和谐的师生关系。他们称呼我为小郑老师，将我父亲郑琴臻——他们当时的系主任称为大郑老师，后来许多同学在毕业后还一直把我当成他们的老大哥。

春节期间，我便与父亲商议，把不能回家的同学接到我们家过年；平时有些同学想改善生活，我便将他们请到家里，买上肉菜，大伙自己动手包饺子、下肉丝面，像一家人一样。

那时候不提倡大学生在校谈朋友，我也经常反复强调学生要以学习为主，最好不要谈朋友。后来有的同学说，他们在大学期间没有找到朋友都是我管得太严的缘故，他们当时太听话了。其实不然，后来我才知道，少部分同学还是在偷偷谈朋友，只是因没有经验，成功率比较低，这都是后话了。与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光特别快乐，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每回想起来，那些场景还历历在目。

1985年，经济管理系的团总支书记兼1982级经济管理专业政治辅导员边江因个人事业发展需要，向组织提出了调往深圳沙头角某银行工作的申请。这一年边江老师调离了经管系，1981级的政治辅导员李北平老师又去北京某大学进修一年，这样1981级和1982级的经济管理专业就没有了政治辅导员。经过各方面考虑，系党总支决定由我兼任系团总支书记，并担任1982级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政治辅导员。在李北平老师进修期间，由我代管1981级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政治辅导员工作，由叶永刚老师接替1983级经济管理专业、国际金融专业学生的政治辅导员工作。

我担任1982级政治辅导员不久，学校取消了政治辅导员制度，实行学生导师制度，我与同学们的联系变少了，但由于我当时还兼任团总支书记，同时担任院里的党委组织员、学生党支部委员，经



常代表组织与要求进步的同学谈心交心，对他们还是比较了解的，当时还介绍了一批同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 1981 级经管专业的胡勇华，1982 级经管专业的林瑞亮，1983 级经管专业的刘涛、王国慧、张新安、陆世军等。

1984 年 10 月至 1987 年 6 月，李凡、陈红、潘正平、胡国斌、卫志刚、陈光全、祝方东、张新安、王国会、杨秀冬、陆世军、刘涛、宋灵恩、董晓霞、杨战威、李安广、胡昌宏、吴艳、宛士雄、汤正涛、叶长贵、伍启军、张凡鉴、袁光平、宋云、杨向群、陈华、甘世发、张东祥、柴月平、祖晓军、冯浩、汪水文、董红兵、白江帆、范丹梅、张红、严炳洲、刘明波、夏频、陈民喜、韩国丽、沈福宝、郁俊、张烈军、彭南林 46 名学生被发展成了党员。经济管理系经济管理专业 8302 班被评为 1985—1986 学年度先进集体，陆世军、胡昌宏被评为经济管理系 1983—1984 学年度优秀学生干部，陈光全、王国会、陈红、宋灵恩、桂昭志、汤正涛、陈民喜、卫志刚、张东祥、宋云、胡国斌、刘涛、李启才、刘贤芝等被评为经济管理系 1983—1984 学年度三好学生，刘涛、陈光全获得 1983—1984 学年度甲等奖学金，陆世军、王国会、张东祥获得 1983—1984 学年度乙等奖学金，甘世发、叶长贵、伍启军、张凡鉴、卫志刚、陈红、陈民喜、宋云、汤正涛、董晓霞获得 1983—1984 学年度丙等奖学金，陈光全被评为 1983—1984 学年度优异生、1985—1986 学年度三好学生标兵，并荣获 1985—1986 学年度校级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汤正涛获得 1985—1986 学年度校汉语知识写作竞赛一等奖，并被院党委授予尖子学生称号，陈光全、祝方东获得 1986—1987 学年度校级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伍启军、张凡鉴、吴艳被评为 1987 届优秀毕业生。1987 年，这届学生圆满完成了本科阶段的学习任务。

毕业时，班上 18 位同学考入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暨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昆明工学院、宁夏大学等高等院校攻读研究生，其他同学按国家计划被分配到国家、省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毕业近 30 年中，每有学生返汉，只要有机会我们都会聚一聚。这些年我出差各地，都得到了



工作在祖国各地的同学们的热情接待，我们尽情畅谈，重温过往，仿佛还是朝夕相处的老师与学生。这也让我真切地地悟到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深刻内涵，心中充满着为人师表的自豪感与幸福感。

2013年，适逢经管专业1983级相识30年，50多位同学于金秋十月从全国各地重返校园。故地重游，大家一起重温了那段温馨美好的岁月。10月4日上午，同学们在校行政楼举行了“武汉大学经济管理83级相识珞珈30年座谈会”，校、院系领导，任课老师代表和我本人都出席了会议，同学们为自己爱戴、敬仰的老师们献上了一束束鲜花。

1983级校友、武汉市洪山区委书记刘涛博士汇报了经管专业1983级校友学习和工作的情况。30个春秋，沧海桑田，珞珈留下了大家的人生印迹。毕业20多年来，大家坚守理想、努力拼搏，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了重要成绩：有的成长为学术上造诣颇深的教授；有的在商界叱咤风云；有的已是各地党政机关单位领导。武大副校长谢红星对校友们的返校表示热烈欢迎，他回顾了武大的历史，感谢广大校友对母校建设和建设的大力支持。谭力文教授也在会上作了报告。师生们畅所欲言，赋诗感怀。

为了迎接这次聚会，作为曾经的辅导员的我们倡导编一部纪念图集。资料收集过程中，得到了同学们的大力支持。最后，这部名为《树高千尺 根系珞珈》的纪念图集在我与1983级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下完成，它成了1983级每位同学和任课老师的永久纪念。为了给这部图集增光添彩，我特意登门拜访了老校长刘道玉先生，80岁高龄的他右手已不能写字，但特意用左手为我们班作了“管理世界大有可为”的题词；老书记胡春芳、经济系主任郑琴嫫老师也分别作了题词。

我虽然是他们的老师，但更像是他们的朋友。现在每每回想起与他们相处的那些日子，心中总会生出阵阵暖意。但愿我与我的学生们能在天命之年安享生活、阖家欢乐。

（作者工作单位：武汉大学档案馆）



青年女科学家王艳丽： 专注才能成就科研梦想

张晶晶

校友名片：

王艳丽，199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05年获中国科技大学理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中青年领军人才。获第九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创新奖，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日前，2016年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名单公布。该奖项2004年由全国妇联、中国科协、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共同设立，旨在表彰奖励在基础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取得重大和创新性成果的青年女科技工作者，是



国内针对女科学家群体的重要奖项之一。

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共有 111 个单位和 38 名专家推荐、提名有效候选人 215 人。经评审委员会评审，产生了 10 名入选者。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艳丽名列其中。《中国科学报》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她，分享关于科研、关于生活的许多故事。

专注是做科研的基础

在山东出生成长的王艳丽，因为讲话温柔，常常被误认为南方姑娘。记者问她是不是因为大学在武汉读书的关系，她回答说并不是，自己从小讲话就如此。其实她并不喜欢讲话和表达，对数学、物理课本里的定理和方程式感兴趣得多。

1992 年，王艳丽初次离开山东，就读于武汉大学微生物及免疫学专业。在武大，她开始真正领略科学的魅力，也坚定了在科研道路上走下去的决心。

谈到做科研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王艳丽回答说是“专注”。大学的某次英语课堂上，老师请同学们讲出一位自己最喜欢的人。大部分同学的答案都是名人明星，轮到王艳丽时，她想到教学楼旁边的爱因斯坦像，便回答说是爱因斯坦，结果同学们哄堂大笑。

但她却是真心的。“爱因斯坦非常聪明，做事情又专心投入，我非常欣赏他。”

从事科研工作压力之大一直以来都是科学共同体内的热门话题。或许在外人看来，科学家们不过是坐在实验室里摆弄瓶瓶罐罐，在电脑上计算些看不懂的数字符号，但实际上他们要面对超长的工作时间、发表论文的强压力及各类基本的生存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专注往往成为一种奢侈品。

王艳丽笑言：“科学家比农民工还要辛苦，虽然不是重体力劳动，但工作时间每天都很长。”尽管如此，对于很早便明确了要在科研路上走下去的她来说，科研仍然其乐无穷。要说如何做到专注，重点就是“要集中火力解决一个方面的事情”。



科学家的荣耀时刻

王艳丽长期以来集中火力的领域，正是结构生物学。虽然博士阶段才正式接触，但很快她便意识到这是自己想要为之倾注无限热情的领域。

“结构生物学非常有趣，自然界中很多难以解释的事情，在对其分子进行结构解析之后便会豁然开朗。”

她领导的课题组在 CRISPR/Cas 系统的结构生物学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揭示了 CRISPR 系统从感染的病毒中获得免疫原性的分子机制和 CRISPR 系统通过小 crRNA 分子降解病毒核酸的机理，阐明了 CRISPR/Cas 系统抗病毒的作用机理，为 CRISPR/Cas 系统在工业、农业、医药和生物技术等方面的应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除此之外，她还在 RNA 干扰领域取得重要成就，揭示了小 RNA 介导的调控目的 mRNA 的分子机理，为 RNA 干扰技术在核酸药物开发和疾病治疗等方面的应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迄今为止，王艳丽已在 *Cell*、*Nature*、*PNAS* 等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论文在近五年中的 SCI 总引达到 800 多次。在不久前召开的 CRISPR 大会上，几乎所有主报告人都提到了王艳丽和她的同事们的工作。而能够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对于每位科研工作者来说都是倍感骄傲和自豪的。这样的褒奖于王艳丽而言，既是对过往工作的肯定，也是对她坚定走下去的鼓励。

我眼中的女科学家

与女科学家谈“女科学家”的时候，大部分人得到的第一个答案都是“我并不喜欢‘女科学家’被单独拿来说事儿”，王艳丽也是其中一位。

刚刚颁布的诺贝尔奖再次成为社会热点新闻，女性诺贝尔奖获得者之少，也是大众进行解读的诸多角度中的一个。尽管不少研究



已经证实，在从事科学研究这件事情上女性和男性在天然条件上并不存在优劣差异，但就结果来看，女科学家们依然处于天平翘起的那一端。

谈到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王艳丽给出的答案与 Facebook 首席运营官、畅销书《向前一步》的作者谢丽尔·桑德伯格的答案非常相似：在职业发展的更高阶段，女性“坐在第一排”的意愿似乎会越来越弱。

对于需要坐得住冷板凳的科研工作者来说，执著且专注的态度更加重要。

“科研工作确实是枯燥的，我们比较幸运地在这个年纪取得了一些成果。做科研需要极强的决心，需要努力去做。别的行业应该也都是如此。无论从事哪个行业，希望大家在作出选择之后，都能努力坚持到底。”王艳丽说。

（稿件来源：《中国科学报》2016 年 10 月 21 日）



我们的导师陈美兰先生

周元镐

在武汉大学当插班生时，我们班上的党支部书记龚绍东曾批评过我。因为我曾对他说，在我心里，不仅把我们的导师陈美兰老师当作一位博学的良师，同时也认为她是一位美丽的大姐（大学设导师，同于小学、中学的班主任，对全班同学的德智体全面负责）。龚绍东驳斥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绝对不能错了辈分。我的反击似乎更为有力，我说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德高望重，为什么全国人民都喊她“邓大姐”呢？



1985年，武汉大学中文系招收的首届作家班和插班生班学生进校，插进了1983级编为8303、8304班。我们插班生班为三班，



作家班为四班。在此之前，中文系已有 8301、8302 两个班，陈美兰老师原本是这两个班的导师，因为学校对我们特别重视，慎重地安排了陈老师做我们班和作家班的导师。为了我们这两个特殊的成人班，陈老师可谓操碎了心。早我们两年进校的一、二班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又忌妒又羡慕，撒娇说我们把他们的导师抢跑了。

当年我们班共有 17 名同学，已是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的有我、陈应松、彭兴国（野莽）、王伟举、宋骥弘、朱华姿、曾静平、吕新琼（石川）。周百义来自河南，为河南省作协会员，入校前，还是潢川县文联的副主席。来自部队的有空军的龚绍东、武汉军区的何三怀。专攻语言学的有李云贵。另外几名同学洪琼、张法德、简兆麟入校后先后也入了会。

2012 年 10 月，陈美兰老师在武大从教 50 周年，她的弟子从全国各地赶来武汉，为她举办庆祝会。从这天起，我们不约而同地改口称她为美兰先生。会上，美兰先生在介绍我们首届插班生的同学时，不无动容地说，这个班进校时本来是 17 棵青松，比沙家浜芦苇荡的 18 棵只少一棵，可惜在校期间有两棵被虫蛀了，夭折了……

其实，美兰先生的心里话，还有许多没有说出来。自我们班和作家班毕业后，武汉大学又招了若干年的插班生和作家班，但心力交瘁的美兰先生从此不再给这些学弟学妹当导师……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真对不起美兰先生。我们这个班精力太充沛了，隔三岔五地就要弄点事情出来，让美兰先生招架不住。她无暇顾及其他，一心只想我们安全毕业，平安离校，暗暗祈祷千万不要在考试方面出问题。可越怕事越有事，我们班一个同学期末考试被挂了红灯。而按学校规定，只要有一门功课挂了红灯，这个学生就不能正常毕业获得毕业文凭。美兰先生菩萨心肠，不知做了多少工作才让这架险些折翅的战机平稳着陆。这个同学的一生得救了，两个班也临近毕业了，美兰先生也总算松了一口气。

我毕业后先被分配到江汉油田，后改派湖北省文化厅。领导本来要我留厅机关的，但我吸取了插班武大两年的教训，坚决要求下基层，不走仕途搞专业。美兰先生听说了我的选择，非常高兴，说



我的路走对了。

但我中途还是有了一官半职，被调到文化生活报社主持日常工作，担任常务副社长兼第一副总编辑。时值武汉大学 100 周年校庆，我给中文系送上了一箱磁枕，那在当时是一种高科技玩意，据说有安神降压、醒脑明目的疗效。我把礼物交给了兄长般的於可训老师，并特意拜托一定要给我们的恩师美兰先生送上一件，算是我这个半路出家的武大弟子的一点孝心。

以后的岁月里，我陆续出了几本书，有中短篇小说集，有纪实文学，也有长篇小说。每出一本书，我自然都要呈送美兰先生指正。这里丝毫没有洋洋报喜的意思，我只是想，学生只有奉上劳动成果，才是对老师最好的报答。

在送上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下》时，我对美兰先生和於可训老师都发出了邀请，请他们参加湖北省作家协会为《天下》举办的作品讨论会，但事后於可训老师见到我时笑着说他请假了，美兰先生也没有出席，这让我很有几分失落。

我知道，作为国内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美兰先生对每一位作家的作品要求都很高，对她的学生自然要求更严格。记得在武大听美兰先生授课时，她就说过一部优秀的传世之作，除了艺术特色外，还必须达到“三度”这个标准：即哲学的高度、历史的厚度、思想的深度。这个衡量作品的尺度让许多作家及作品汗颜。在我的文学创作实践中，自然不敢忘记美兰先生的教诲，一直在努力实践，把每一部作品都当作是先生布置给我的作业。

师生小聚满堂欢笑。先生居中，被女同学包围。美兰先生听我们叙旧，眉眼间始终含笑，满脸有幸福溢出。先生高兴，我们也很感动，能做先生的弟子，是我们的福分。

珞珈山上，同窗两载，求学两载，同船过渡，五百年修。同学情谊，师生情分难得，既有今生，当有来世，又何止百年千年啊！

（作者系中文系 1987 届校友）



青年女科学家王琳： “新丝绸之路”上实现报国梦

周韵曦

校友名片：

王琳，200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基地班，2010年获布朗大学生物医学博士学位，中组部“青年千人”，曾任哈佛大学研究员，密歇根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再生医学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4年当选中华医学会再生医学分会常委，曾获再生医学“王正国创伤医学创新奖”，“霍英东青年教师奖”，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017年被中国科协和中国妇联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中国青年女科学家”。





作为丝绸大国，蚕丝中国人再熟悉不过。当精美的丝织品为人们带来美的体验，丝胶（蚕丝组分）的生物学价值却长期被忽略和浪费。通过近5年的系统研究，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再生医学中心主任王琳创新性地挖掘出丝胶的独特价值，她的系列原创工作不仅改变了丝胶的命运，也为更多人重新拥有健康打开了梦之门。

学成归来 报效祖国

“长久以来，我一直有种特殊的报国情结。”王琳告诉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自己出生于一个医学世家，父母都是知名医学专家。“他们曾在国外长期留学深造，但最终都选择了回国报效祖国。”幼时曾与父母一起出国的王琳，随父母在莱茵河畔的美丽小城洪堡度过了美好的童年。也正是这段经历，让她长大后选择了基础医学作为自己的职业，并在赴美留学多年后依然沿着父辈的足迹，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在世界生物医学研究最高学府布朗大学读博时，王琳接触到医学研究方面的最新思路、最新方法、最新技能和最顶尖的科研工作，也有幸看到一群优秀的华人同胞在科学领域里畅游和搏击的身影。“他们的科学精神和伟大成就让人发自内心地敬佩”，这让她在心里埋下了选择投身科研的种子。

当时，她的丈夫也在美国另一所高等学府工作，为了报效祖国和母校的培养，王琳夫妇双双谢绝了导师的挽留和许诺的国外发展机会。2012年，王琳通过“青年千人计划”回到祖国，回到最亲切的家乡工作。对此，她尤为感谢国家的培养和国家海外人才计划的远见，“我们国家这么大，很多地区仍然还在贫困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选择对科研进行这么大的投入非常不易，且很有远见；国家的信任让我非常感动，也深深感到自己作为科研工作者肩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对祖国和故乡有着深深的依恋，在国外时总感觉像浮萍。”王琳告诉记者，外边的世界虽然精彩，但时常让她有漂泊无依的感



觉。回到祖国的怀抱，才让她感觉像小树真正扎根了，发自内心的踏实又温暖。

“报效祖国听上去似乎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但其实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就能实现祖国对我们的期望。”回国后，长期从事再生医学与创伤修复研究的王琳创建了华中地区首个再生医学研究中心，带领团队长期致力于新生物材料研发及其在创伤修复中的应用研究，并开创性地开展对丝胶(sericin)生物材料的研究及应用。

创新工作“变废为宝”

她的创新工作“变废为宝”地将缫丝产业的废弃物丝胶回收利用，转化成具有高科技附加值和独立知识产权的、可用于创伤修复/再生的丝胶组织工程生物材料，在国际上首次成功研发适用于外周神经修复的丝胶神经导管，以及成功研发了新型丝胶生物支架、可注射水凝胶及多种多功能新药物载体。

一系列原创工作开创了丝胶在再生医学与创伤修复中应用的新领域，使我国在丝胶组织工程产品研发领域走在了国际前沿，并将有可能提升我国传统缫丝行业的现状，再次驱动我国在丝绸行业的引领作用。一条“新丝绸之路”在显微镜下正徐徐展开。

除了将丝胶生物材料应用于对外周神经、中枢神经与心肌的修复，王琳还带领团队将丝胶生物材料的应用拓展到皮肤、软骨、骨骼肌等多种组织和器官的创伤修复领域，并实现着不断的突破。王琳希望，未来能通过自己的科研工作产出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中国制造的组织工程产品，并为改善人类健康开辟新途径，造福广大病患。

一系列在国内外再生医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原创性研究成果，让王琳多次受到行业和学术领域的肯定。2014年，她当选中华医学会再生医学分会全国常委；2015年，她获得再生医学首届“王正国创伤医学创新奖”和“霍英东青年教师奖”，2017年，她被评选为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在多年科研工作之后，我深知科研道路的艰苦和不确定性，



不仅要能吃苦，还须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但仍然决定要坚定地走下去并且尽量有所作为。”作为导师，王琳治学严谨，关爱学生，注重育人，经常用自己的经历来鼓励学生和女性科研工作者们。

鼓励女性 投身科研

在王琳看来，研究与生活并不对立，而是并行的，“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扮演好身为女性的各个角色，但并不苛求完美，尽量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平衡点，这样才能持久。”

科研实验本就充满困难与挫折。踏上这条艰辛路，挫折是常态，经历失败更是家常便饭。这就要有“不断重新再来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的意志”。王琳表示，困难与挫折面前，一定要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打不垮的精神韧劲，同时“发挥女性特有的韧性，持之以恒地努力，相信温柔的力量；温柔的小女子，也可以做成一番事业”。

2017年2月28日，王琳被授予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称号，这个奖项的宗旨在于鼓励从事科研的女性。“好的花朵需要好的土壤”，谈到女性教育，王琳认为，好的环境和教育对于女性的培育非常重要。

“轻视和不尊重是对女孩最大的伤害，会造成长期不良的社会后果。因为每一个女孩都是未来的母亲，而母亲又肩负着继续向下一代传递价值观、培育下一代的职责，一个尊重母亲、尊重女性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王琳希望，在全中国、全社会都能普遍形成关爱女孩、重视培养女孩成长的环境和氛围。同时，“女性自己也要做到自尊自立，自强不息，要不断努力克服自身的弱点，形成自己完整独立的人格，要勇于追求卓越，有所作为。”

她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女性投身科研，希望社会给予能更多的扶持，更多的鼓励，希望将来能出现更多的女性科学家”。

（稿件来源：《中国妇女报》2017年4月24日，作者系中国妇女报·中华女性网记者）

校友文苑





大九湖之恋

陈应松

这是上天遗落的一块平地，并盛满了高山之水。在天气晴朗的时候，会有人遥指白云缥缈的那片大山说，在那上面，有耕耘和放牧的人，他们住在天上。但是有人会问：他们在那样高耸的平地上生活，人和牛会不会从山顶上掉下来？

大九湖在鄂西北神农架的一隅，那里流传着“薛刚反唐”的民间传说，并说这是薛刚反唐的秘密基地。薛刚确有其人，历史上也曾辅佐庐陵王李显，他为报全家灭门之仇，而参与了讨伐武则天。

这个传说充满了苔藓的气息。在莽莽的高山老林里，这片曾经虎奔狼窜、野鹿遍地的大沼泽，是一条川鄂古盐道的道口。土匪常在此剪径并筑寨。说它是薛刚神秘的屯兵反唐和练兵之地，也属正常。这里也是传说中的野人出没之地。高寒山区的冷水鱼在这儿怡然自得，就像这儿的居民一样，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来的。此地海拔1700多米，刚好在神农架的雪线之上。如果有雪过早地到来，这片寒冷的区域就与世隔绝了，山外的人们不知道那里的人在漫长的冬天里是怎么熬过来的，是生还是死。林海和雪原把他们湮没了，无声无息。春天的时候，湖面解冻，他们又会出现，和他们的渔船与牲畜，在那片野花盛开、碧水超然、童真满地的地方打鱼、放牧。

这个神奇的地域被海拔2800多米的群山环抱，所有的地名也十分奇怪，一些小村落的名字为帅字号、一字号、二字号、三字号、四字号……一共九字号，加上帅字号，10个依次排开，明摆着是打仗布阵用的，也像是营地。大九湖夜晚来临的时候，无端会



有一种紧迫感。远处的草丛中牲畜和野兽疾奔，空气崩裂，湖水颤抖，喁语低嚷，像是有四野伏兵，一场烟尘滚滚的大战在即。接着雾气浮动，炊烟从林中和山坳里逸出，带着临战的警惕，悄然飘拂。

就是这里，从四川大宁通往湖北或者更远的河南、陕西的川鄂古盐道，正是悄悄翻过川鄂边界的横梁山、五等垭子、四方台。四方台是一座奇特的像棺材的山。那些背夫，来到大九湖，可以放下几百斤重的盐包，在湖边洗一把脸，在山脚的大车店待上一夜，就像背夫的歌里唱的，在“油渣子一样的被子”里瑟瑟发抖。如果碰上风雪弥漫的冬季，在雪线之上的他们，向山下茫茫的雪野眺望，想念自己的家乡，在这高高的山上，会唱一曲辛酸的《背盐调》：“……背盐的清早把路上，走什么三道沟、九道梁。菜子垭、田家山，背篓、打杵、脚码子响。长岩屋，烤干粮，大九湖里好荒凉。太平山上打一望，一望望到家门上……”

曾经被遗忘的、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泽，在夜晚翻出古老的泥沼气息，连它的植物都带着淤泥的气味，久久萦绕在山坳间和村庄里。它周边巍峨连绵的群山处在大巴山东麓，与莽莽苍苍险峻的秦岭相接，是这两个巨大山脉的交汇碰撞地带。紧连现在的重庆二县：巫溪与巫山。在另一面，它的西北面，又与竹山和房县的大山相连，再过去便是秦风浩荡的陕西。它的“一脚踏三省”之说是依据的。

说到我挂职神农架的那年7月，我们抱着两个西瓜翻过神农顶。我和画家但汉民，民间文学家、搜集整理汉民族史诗《黑暗传》的胡崇峻，开着一辆吉普，到了海拔2600米的猴子石保护站，已经冻得不行。在那儿烤火吃西瓜。然后一路北行，穿过坪阡，到达传说中的大九湖。我记得那是一个无限安静的高山上的下午，一望无涯的草场，但我不想说草原。那个夏天是再也找不出的安静，满地黄色的旋覆花、红三叶草、开着红花的江南蒿、白花的灯笼花迎接我们。鼠李和棠栌在远处的草地上，在浅浅的沼泽中摇曳。还有开着小黄花的独摇草，一茎直上，在无风的时候独自摇晃着，自得其乐。成群的猪和牛在那儿怡然游荡，当地的绿鸟鸡在草丛中到



处乱窜。我们在黄益成老村长家吃饭，晚上我们盖着八九斤重的被子。傍晚时分，我沿着牲畜踏出的小道去暮色中的草场散步，被人撵了回来。牛羊们渐渐模糊的影子急匆匆地往各自家中走去，牛铃叮当，几乎没有人。半夜我们听到了山上狼的嗥叫声，月亮里孤鸟的影子像箭一样刺破这儿旷古的天空。

住在天上的人们和天上的故事其实十分简单，就是群山环抱，风动草伏。天空中只有云影和偶尔出现的盘旋的苍鹰。一团团像挤出来的泡沫般的云彩，从山顶出现，就像一个偷牛贼潜行而来。在长满野草的一些田垄间，还有人种植着苞谷、洋芋和荞麦，但田里的杂草比庄稼还要茂盛。

我一直认为在高山顶上的生活是充满遐想的，那里肯定与我们不是一个世界。我看到民国时期的房县县长贾文治在《神农架考察记》中这样记载：“大九湖为川鄂相交之高原盆地，东西狭而南北广，纵横 50 余华里，面积 37 500 余市亩。乃巫、房、巴、竹行旅之孔道，为川鄂商业交通之要卫，地形超越，山水环抱，有控制川巴之优势。土地平旷，流水不通，浸酿成湖，不利农作……”我还读到一位当年剿匪老干部的回忆录，说他们当年来到这里，看到碧波荡漾、水草丰茂的湖边，住着许多渔民。湖边还生活着一种特有的野鹿，就是草鹿，双角直伸，重达几百斤。因为湖水消失，草鹿绝种。有一种土鱼，钻进泥沼中，有土腥味。还有一种野生稻，碾出的米圆溜溜的，煮出的饭香味扑鼻……我喜欢这旧时大九湖的意境，沿岸的渔民和渔船，这高山上的渔家，他们向天空撒网，向白云捕鱼，这种景致何尝不是仙境呢？

一个巨大的伤痛的事实是，20 世纪 70 年代，在学大寨的蛊惑下，有人觊觎这片湖泊湿地，为将这片湖泊湿地改造成万亩良田，当地出动数千人开挖了盆地的落水孔，将湖水引入地下暗河溶洞，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水没有了，但“良田”不长庄稼。因为是冰川遗址，湖底全是石头漂砾，沼泥虽然深厚，在劳动力奇缺的情况下，荒草比庄稼长得更快。那些湖边的渔民和渔船不知去向何方，仿佛他们从来没有在这儿生活过。那时候，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片高山湖水的重要。不就是个天池吗？如果我们的古人将它命名为神



农天池，而不是湖的话，也许会逃过一劫，但填湖造田的政治需要，使得它成为了被杀戮的目标，生态灾难就这样降落在这几万亩水域的高山顶上。

一直以来，让其蓄水的呼声不绝，我在我的《夏走大九湖》的文章结尾写道：“最好是采取措施，完全恢复她湿地的原貌——重新成为名副其实的、碧波荡漾的大九湖，这可能就将是国内已知的最大高山湖泊了。不过这只是一种怀旧般的憧憬，但，也许真有一天，它会变为现实，让神农架的雄峻和神奇，青葱和广袤都倒映在她的怀抱中，这莫不是地球的幸福！”

这一天终于来了，愚蠢的一页翻过去了。湖，又回到了群山的怀抱，大九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高山湖泊和湿地。

我会被水俘获。这正是我一生伤痕累累过后需要静憩、摆脱、湿润和洗濯的地方。只是它藏得太深，太远。在极限的干渴和疲惫中，承受这山风与湖波吹过的幸福和晕眩，恍惚与感激。现在想来，我是追寻这片雾中的风景而来的。水生雾，雾生景。那被雾霭紧裹的，与山相依的湖泊，有一种把群山推向很远的幻觉，所有落入湖中的山冈好像非常遥远，好像在云端，在心的私密处。

那些山各有雄姿，从水中看，似乎是从云上蹿出的鹿，正在草场上欢跃。而在湖的对岸，一些牛在深沉的雾气中哞叫，吃草，纯银样的波光围绕着它们。挂甲峰的影子是无比美丽的，这是我唯一能辨识的山峰，其他不知名的山峰有着不知名的美。雾气不仅在水面上，也在山间蒸腾，这让山冈浸润在了水之上，浮着一般，摇晃着，沉入我们的冥想。山与水生成的雾气往往是蓝色的，你会很爱这种蓝，是一种混合的蓝，混合了天空、山冈、树木、湖水、水草和水汽的蓝。它太浓酽，村庄、田垄会洇成这种蓝色，像是一下子跌入染缸，小路、沼泽、奔走的牛群，全都掉入这种比梦游更不可思议的蓝色。这里是神话中蓝衣人的出没之地。天空从远处的村子上撕开了一条缝，就像破晓。永远，这片地方，都在薄雾中破晓。它是永远的早晨。

大九湖的晨雾大约是最美的，轻柔得像紫玉，云影和山影一旦明亮就会蹒跚坠入湖中，仿佛宿酒未醒。或者，干脆它们就是一整



夜在水里浸泡着。一两株树很好奇，它们走近湖边，窥探这些山影的命运。结果它们探出头看时，发现了自己曾有多么自恋。它们搔首弄姿，陶醉在自己的轻佻中，和自己的影子调情。这个早晨多美啊，与山水的暧昧也有可能是一种美。

当太阳从山顶出来时，那些雾，就像一层乳液，给草场和牛羊们抹上一层柔软的奶油。雾是大九湖的魂，是这块湖水的精魂，是它点化这湖泊之美的神奇手印，是它袖筒里扬起的魔术的烟雾。雾使山冈、湖沼和树林的层次，在那薄薄的雾缕中被分割，被突出。水把山拉成一片一片的，就像那些会使各种中国画皴法的画师。有一些岸渚，恰到好处地伸进浅沼，把一簇簇棠棣、椴木、红桦、虎皮楠推到那儿，而这时，树和紧挨着它们的村庄无一例外地发白，像是被寒冷所照亮。那种光芒，带着纯粹的沉静，藏在山脚下，和雾一起浮起，一起盘旋上升，撑开雾，像是一场冬雪的传说。水与山的蓝色在这里总是饱满的，一致的，像是一个基因，一种遗传。

那些倒影，还是那些倒影，我不能绕过它们，我不能不与它们共恍惚，同沉浮。除了雾，大九湖的倒影是很值得留恋的。如果你恍惚，它会让你从沉沦中拔起；如果你凝神，它们会展翅飞腾，像诡谲的精灵。但是我们不可能没有这样一个易逝的和揉碎的世界，让水来处理这比现实更迷人的空间，深入到水的深处，稀释我们心中的沉重的阴影。山的纹理，树的繁芜，层次和节奏恰到好处，色块明朗，光线阴阳的切割顺着山的走向。这一切，水把它们接纳以后，成为另一个山与树的世界，在水的世界中，它们深情纠缠，融为一体，轻与重，妖与朴，真与幻，共同参与创作了一幅旷世的云水图景，也让山和树有了低头一笑，临风惊鸿的妩媚。

最喜欢它的夜色，仿佛等待一个人终于尘埃落定。在天光的覆盖下，树和山的影子呈放射状，那些裂开的纹路千丝万缕，全顺着湖面游荡散发，像无数条游蛇钻进夜的睡巢，像天空中树状的闪电凝固在某个瞬间。

大九湖的星空因为水而气象浩荡，水天一体，遥相呼应。四围的群山似乎为星空腾出了一个位置，就在大九湖的头顶。这片天空的星星，正被群峰托举着，拱卫着，敬奉着。无数双宽厚的手掌，



伸向天穹。那些星光，宛如从群山的峡谷间射出的神秘光束，在天空中漫舞。我曾在一个夜晚遥望过大九湖的星空，眼里不由自主地潮湿。我们遭受过什么样的狙击、混乱和惊吓，挣脱出来，难得赶在一个万籁俱寂的时刻与它们相遇？我们的内心有多么惶恐和不安，而星星压下了我们的惊悸。与你离得如此之近的水晶天穹，天上星光如絮，水中银河倒悬。我坐在湖边，沉默如亲人的星空就像母亲在村庄擎起的灯，守望着我，引领着我，安慰着我。它们近在咫尺，有着巨大的瀑布般倾泻的温情。在这样壮阔飞腾的夜空，生命有一种青葱生长的力量，有穿行天地，阅尽风霜的惆怅与悲壮。在最黑暗孤独和寂静的地方，会有那么多闪烁的东西。哦，黑暗如此富有，如此奢华，这是你亲眼所见吗？夜空的鲜蓝色，是谁在擦拭它，搁在我们头顶亿万年了，依然没有一点陈旧感，这是何等高贵优秀的品质？！

月亮突然间升起来了，碾盘似的，光滑，厚重，立体，大九湖遽然间变成了一块大浮冰，像是从大水深处冲上来的。而后，它荡漾起来，细细的波纹，有着古朴的激情和敦厚的举止。那些荡过来的波浪，从四面八方赶来，从山谷里游来，神秘的水，像是大山聚集起舞的精灵，是野兽、草木、石头和雾岚的魅影。星星在向上腾起，水花在迸射，就像一万个女妖在夜晚的山谷里蹈浪沐浴。这也是山与水悄然交媾的时刻，星与浪缱绻的地方，每天夜晚，它们的故事都在这片湖泽上演着。

不知怎么，我会忽然想到它的秋天。我在雾霾的城市写着大九湖时，我对它的秋天有一种高朗的信任和寄托。如果我不歌颂秋天，我的内心就会开始寒冷，笔会凝滞抽筋。我写过《神农架之秋》，我的热烈的文字足以抵挡一个又一个寒冬的欺凌。到了秋天，水是一如既往的清澈澄净，像一位道行极深的高人谨慎地碧蓝着。群山之间，红叶泛滥，红色的火泼泻到湖面上，久不能熄。

秋叶红了的时候，太阳从金色的树丛间泼泄过来，打在湖面上，浪花在秋风的鼓动下卷起了高高的、火光熊熊的金潮。这是相当激动人心的时辰。云彩层叠振奋，迈向高山之巅。一会儿，在沉淀之后，湖上的红叶不知是谁抛撒的，竟覆盖了所有的水，遮蔽了



天空，让天空在缝隙中穿梭，支离破碎。然后，它们将干干净净地等待着风雪的降临，就像就义那么悲壮无声。灯心草黄了，莎草也黄了，还有一些植物半青不黄。辽阔的草甸上，喧闹的夏日已经结束，细长柔软的芦苇，像深山中修炼过的女妖，白着它们的头颅，撑着纤弱的躯干张望着，也绝望着。雪会来，沿着四山的峭壁，踏着森冷的水，越过山壑到达这里，它们仿佛有预感。它们的身影那么疏寂寥落，把激情的一生耗尽了，向水而泣，摇曳着它们感人至深的白穗。

冬天在这片高山湖泊早早到来，雪开始播撒，湖边静悄悄的。好像听到了湖沼那荒凉和重创的呻吟。行人已经远去，他们曾经在这里留下的温暖心事，现在留给了风雪。我们的心也被吹裂。没有封冻之前，湖水格外汹涌愤怒，好像在流放的远方被吞噬和凌辱的呼叫。所有的树枝，脱光叶子的落叶乔木、依然青翠的常绿乔木和灌木，都还站着。波浪们兀自狂躁，无人理解的诉求和碾压声，一夜之间，就被残忍的冰冻住了，割去了它们的喉咙，喑哑得像来到世界的尽头。树枝镶嵌着晶莹的冰凌，太阳恍然出来，树影斑驳，森林里的雪覆盖了大地的创伤。冰被阳光磨亮，山的光芒像新鲜的橘皮一样耀眼。但是到了夜晚，古老的冰在这片大湖中呼啸嗥叫，犹如荒兽。雪一层一层地堆积，不让生命动弹。那就在山民家里吃腊蹄子火锅，喝几盅自家酿的苞谷蜂蜜酒吧。大九湖的腊猪蹄太有名了，这些腌制过的，用松柏枝熏得焦黄的猪蹄，在火塘放有花椒的煨锅中冒着辣泡。门外明亮的雪原作为一只酒盅的衬景，是相配的。然后在风雪寂落和遥远的狗吠声中，在温暖如春的火塘边打盹。

春天里的花在这里太多，我不想过多地浪费笔墨描写它们。冰雪开始退却，蒲草从水中醒来，各种看似冻死的蕨类植物、苔藓——大九湖独有的泥炭藓、凤尾藓、赤茎藓、疣灯藓，开始复苏。金盏花、翠雀花、野罂粟、飞燕草、紫堇也开花了。抱蓝蓼、谷蓼、箭叶蓼和水蓼是这儿与菖蒲和莎草一起热爱湖沼的居民，它们从山外的春风里迁移来。红色的酢浆草，紫色的老鹳草，宽大的南方山荷叶，都在这大片的泥炭沼泽、睡菜沼泽、苔草沼泽、香蒲



与紫茅沼泽中招摇过市，状如薰衣草的大片紫色的鼠尾，一串串冲天而起，把春天撑得如此蓬松多情，敢爱敢恨。木姜子黄色的花穗在灌丛上如锦缎般挑着，居高临下地笑着。动物和牲畜们会来到湖边喝水、嬉闹、搜索食物和交配。这是所有生命和爱情苏醒的季节。

在春雨中，一切都蒙上了忧伤的面纱。我尤其喜欢在没人的时候走上小径，谛听水中的声音，和被风无端叩响的波浪的唼喋。那些异域的声响让我们困惑，许多陌生的事物和景色让我们敏感茫然，挑动着你清算世界粗暴伤害我们的过程。某个傍晚，风向我吹来的时候，灌木丛那树叶摩擦出的幽暗响动，好像古老幽灵的影子。“咚！”的一声，它们又跳入这个越来越温暖的湖里，内心的光亮总会独自临水闪烁。

“湿漉漉的孤独”，这是法国诗人克洛代尔说的。因为大九湖柔和的抚摸，那些钻出水面的浅绿色的蒲芯和芦芽，和从山坡上滑下来的春风，那样清澈潮润，沁入灵肉。一个远行人和独行者，我一直追寻并热爱着这“湿漉漉的孤独”，我此时想起在早晨的薄雾中，湖边那个熠熠闪光的几户人家的村子，它的上空飘浮着漫长的烟霭。哦，山与湖的乐趣让人生情，这是上苍的慈悲。我渴望着有一天能够在这里傍水而居，在傍晚与那些消失的野鹿之魂相遇。躺在满天星空下，手中握着一颗捡拾的陈年橡果。

大九湖，作为一个多年与你山水相逐、风尘磨尽的恋人，我不得不说：我爱你。

（作者系中文系1987届校友）



大潮赋

何五元

潮之州，“潮水往复”得其名。大海在其南，群山拥其北，左控闽漳，右临惠广，依山傍海，天南形胜粤东门户也！

汉置揭阳，隋设潮州，退之兴教化，唐宋启新猷。“十相留声”，成一时佳话；八贤前后，垂几代高风！嗟乎！蕞尔渔村遽变海滨邹鲁，弹丸之地崛起岭海名邦！

潮水往复兮大潮起，潮人搏浪兮千万里！视海如陆，如履平地，冒险射利，惟我潮人！一船目汁一船人，一条浴布去过番，漂洋过海不复回！下南洋，闯北海，来往东西岸，经营南北行，海内外交名立万，越古今舍我其谁？六百里潮州海岸线，皆为踏浪扬帆大码头；五大洲依稀人烟处，尽是落地生根新桃源！

潮水往复兮大潮涌，潮人破浪兮逞英豪！三分天注定，爱拼才会赢。敢为人先者，潮人也！君不见，有潮水处皆有潮人，有潮人处皆有商机！素喜买卖经商，三尺刀口敢舔血；热衷大小贸易，九重浪里能夺金！经商时打分打厘，行善处一掷千金！冒险犯难，逐浪弄潮誓扬男儿胆魄；急公好义，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潮水往复兮大潮升，潮人斩浪兮任纵横！一叶舢板行三江，走东西南北；百尺红船闯四海，赢春夏秋冬。血液中，流淌商道根本；骨子里，浸润商业精神。言必行，守信走天下，五百年潮商常青不败，终成三大商帮之首；行必果，重诺闯神州，两千载教化至诚无敌，造就百年商埠之都。

呜呼！夫天下之商，聚于潮人，潮人之秀，萃于寰宇。大商守信，守礼，守忠义；潮人旺家，旺国，旺天下！胸怀家国，大潮通



四海；放眼天地，光耀我中华！

（注：国际潮团联谊年会，是以海外潮人社团为对象的全球潮团联谊交流平台，其宗旨是联络同乡，促进联系。是世界潮汕人大团结、大发展的标志，每两年举行一次大会。第十七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于 2013 年 11 月 12~14 日在武汉国博中心隆重举行，来自世界各地 138 个潮团的 3 500 多名海内外潮籍精英相聚江城，本届主题是“大潮汇荆楚，万邦展鸿图”。《大潮赋》应大会邀请而作。）

（作者系中文系 1984 级校友）



夏日东湖清晨即景

珈 言

我以为自己是绝对地起了个大早的，想象中 6:00 的东湖应该是太阳刚刚从湖面升起，正慵懒、温和地注视着这个新鲜的世界；可赶到东湖边，却只见太阳的金辉已将湖面映成一片彩色，凝眸处是浅粉和淡蓝，极目处则已蔚蓝一片。

真的来迟了！好在东湖、东湖绿道都还是宁静的、清新的，相对于白天和傍晚的嘈杂、浑浊和喧嚣。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绿道上已有了三五结伴、全副装备的自行车爱好者呼啸而过，演绎着属于他们的速度与激情。

更有早起、满满都是爱心和幸福的年轻夫妇，带着幼小的孩子在做着骑车练习：天真可爱的孩子虽然将自己小小的自行车骑得歪歪扭扭，却因知道有父母的呵护及保驾护航，义无反顾地前行着……

那些早已入定的垂钓者，在金色的晨曦中将自己化作风景的一部分，他们应该不只是在钓鱼，更多的是在钓心情、钓自己向往的生活吧。

一位老者立在湖边，用竹笛吹奏着一支明亮、欢快的曲子，是否不经意间已吹皱了一池湖水？

梅园里的割草工人正在勤奋地工作着，嫩草发出的淡淡清香让人确切体会到了“沁人心脾”这个词的真正内涵，不得不在内心佩服老祖宗造词的准确精到，还有那只可意会、不可言表的丰富意蕴。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画面和意境，在数次



于东湖赏荷中早已领略，此时入眼的则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别样美景，翠绿色的荷叶、亭亭玉立的荷花，在初升的阳光中摇曳生姿，轻轻絮语，诉说着自己的前世今生。

.....

一阵缠绵悱恻的歌声传入耳际，打破了周围固有的宁静，歌声由一位疾行老者的随身听发出，当然知道播放的是邓丽君的歌曲——太熟悉了，曾经那么喜欢邓丽君和她的歌，可以说她的歌声陪伴了我的整个青春时代。可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却觉得这歌声是如此突兀、如此的不合时宜。我茫然地看着那位至少 70 岁的老者，不知在静谧的湖光山色中，听着这缠绵、伤感的歌声是何种心境？

或许是时代变了？或许是我变了，我的心境变了？

邓丽君在华语歌坛绝对是一个难以超越的传奇，她是几代人心中永远的记忆，虽然早已离开了这片江湖，可江湖上依然满满的都是有关她的传说：在珞珈山环山道上，经常可以碰到一些老者听着她的歌在散步、疾走，这应该是大多数人追求的、存在的最高境界了吧？

最近几天天气晴好，东湖水面平静如镜，只有微波荡漾。天，高远辽阔，一望无际；云，疏淡轻薄，如鹅毛笔轻轻曼曼地扫过，在不经意间增添了几分活泼与灵动。

我静静地伫立在柔水拍岸、不时发出细微声响的东湖边，看着那由于湖水日夜冲刷而变得更加光洁圆润的、一颗颗大小不等的石头，想起多年前一位作家朋友的话：你不能总像这东湖里的石头，永远只接受一成不变的湖水的洗礼；你得开放了自己，学会去容纳、去包容、去接受外界一切不一样的东西！

性格即是命运，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是原来的我，仍然站在原地踏步，没有成长、没有进步，过着自以为正确的日子。一生只爱一个人，一生只做一件事，在简单中丰富，难道不也是一种生活？

弘一法师在圆寂前留下绝笔——“悲欣交集”，是否悲悯于滚滚红尘中愚顽不化的芸芸众生，是否为自己的终于解脱而欣喜释怀？弘一法师是伟大的音乐家、书法家、教育家、戏剧家，他的



《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人人耳熟能详；他应该是生活在丰子恺先生所说的“人生三层楼”第三层“灵魂生活”上的、真正的智者吧，已然悟透一切，才能毅然决然地摒弃一切荣华富贵、功名利禄，遁入空门；那么，凡胎肉身、芸芸众生中的我，又驻足在人生的哪一层楼上呢？

“胳膊伸直，注意划桨的节奏和力度……”

突然而至的、一阵阵由扩音器发出的声响打破了四周的宁静，惊飞了湖面上自由嬉戏的水鸟，原来是划艇队出来训练了，他们有的二人一艇，有的四人一艇，教练则开了小小的摩托艇紧随其后，在大声地、不停地纠正着队员们的动作；划艇所过之处掀起一条条长长的、运动着的水流，如微风吹过碧绿的草原，一下就又恢复了平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不知他们每天要在这骄阳似火的湖面上训练多久，他们黧黑的皮肤告诉了我训练的艰苦卓绝！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对他们也是合适的吧？愿他们在这艰苦、枯燥的训练中，不只是承受辛苦，也能有享受和快乐……

珞珈山，东湖水，终于让我有了终老自己的理想之所！

（作者系中文系 1983 级校友）



盛在纸碗里的青春

申思婕

开学了，我却不会再回到学校。

2017年7月1日，我像无数个平常的早晨一样醒来，阳光穿过窗帘的缝隙照在地板上，看不出是晴天或是阴云。

我坐起来，看着另外三张空空荡荡的床板。我沿着梯子下床，穿衣、洗脸，然后把洗面奶护肤品装进箱子，最后把拖鞋摆在椅子下的位置，拉起行李箱的拉杆，看了一眼依旧凌乱的屋子，和被遗弃的、孤单的洗衣盆，关上了宿舍的门。

走到楼下时，我叫了一声常常因为自己的晚归而争吵的阿姨。我说，钥匙我放下了。阿姨一反常态地、和蔼地笑了。她掏出一张20元的人民币，对我说：“押金拿好了。”

宿舍楼外依然在施工。像四年前刚到时的场景一样。天是灰的，空气是潮湿的。

菜市场过早的人依然络绎不绝。喇叭里防臭鞋垫和保健偏方的广告依然响亮。

坐在出租车里，过电影般地、一幕幕影像不断倒退、远去。黄鹤楼、长江、晴川阁挨个地同我告别。

那是我对离开武汉那天并不准确的记忆。



我问自己，为什么那么喜爱武汉？是待的时间久了？生活方式习惯了？或是在这里有喜欢的人和朋友？



和这些都没有关系的。就像喜欢一个人，看到第一眼就喜欢了，哪还顾得上想合适不合适习惯不习惯呢？

我想起那些夜晚走在大马路上的日子。纷乱热闹的霓虹灯，或者租界狭窄的单行道。喝了酒，就坐在路边的台阶上打闹；没喝酒，就大声地站在路中央唱歌。

夜宵摊的老板是热情的。说着我听得懂却不会讲的武汉话，问我们要不要多加一份汤包或米酒。然后就胡乱地聊着有的没的，吃着不是羊肉的羊肉串。

我想起看过的最美的夕阳。美得恨不得不要眨眼，要将那样的感动一秒不落地统统地倒映在眼球里、脑海里。在傍晚 5:30 的江滩，先是流火的红色，又变成镀金的橙色。颜色融进长江里，而后渐渐地随江水流到看不到的地方，最后剩下灰蓝的云布满整个天幕。

路灯亮起来了。像商量好似的，粉蓝的灯光同时点亮整座城市。有声音沉稳悠远地汇入空气——“铛——铛——铛”。

你听，汉口教堂的钟声响了。

二

我想再没有一座城市比武汉更暴躁了。

也许是天气太糟糕了，所有人都在发脾气。买早点时，老板在发脾气；坐船时，码头的船夫在发脾气；逛公园时，公园的保安在发脾气……他们的声音浑厚、底气十足，像自带风箱，说话时呼啦呼啦地响。

他们喜欢欺负非本地口音的外来者，当事情未按照他们的意愿发展时会毫不留情地喊出“个标滋养滴”，当有人表现出不如他们聪明时嗓门会大得像装了喇叭。

可是没有人比他们更热心了。

我想起那些在奇奇怪怪的街上吃东西的日子。是很奇怪的，武汉几乎所有的街道都在卖吃的。垃圾袋、纸碗、一次性筷子散落一地，汤汤水水的洒在地面，一不注意就会黏到新买的小白鞋。



我学会了所有武汉人都会的绝活——端着纸碗走一路吃一路。过早的时候，左手手掌端着盛着热干面的纸碗，小拇指勾着装在塑料袋里的米酒，右手拿着筷子吃，无名指和小指一弯，还能握一个鸡蛋。

日子是过不完的，有的是时间浪费。一整个早上都可以用来吃饭。消磨时间是廉价的，一碗面只要4块钱。

离开武汉后，我再也没有见过4块钱一碗的、盛在纸碗里的粉面。

夜晚是最开心的。在东湖边、在风光村周围晃荡，或者广八路也行，总之一切廉价的、热闹的、喧嚣的地方都是可以在夜晚玩个痛快的。扎啤只要70元的酒吧，20元可以包夜的网咖，好像永远也玩不够。

然后走在凌晨3:00的校园，谁也不知道可以去哪里，反正往前走就对了。事实上就是这样，无所顾忌地、只要往前走都是没错的啊。

无数的秘密发生了。在黑暗里，在以为看不到的角落里。楼道里女孩的哭泣，树林里星星点点的手机屏。

江边，一位母亲折断一支芦苇，给了自己的小孩子。远处的汽笛声响起了，淹没了两个穿着校服的女孩的笑声。

大概没有什么场景比这更温柔了。

三

记忆的流失是迅速的，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是与庸碌一同发生的。

我不再记得起是谁同我去过哪一条街巷，是谁在牌坊下突然起誓似的告白，是谁在天蓝得不像话的夏天请我吃了又甜又冰的冰淇淋。

可是反过头去看写过的每篇小说里，确实都有一条江贯穿其中。

是在这座城市发生的，任性、成长、收敛、平静。



我不再有能力写出干净真挚的感情，不再走在街上忽然有强烈的表达欲，不再听到喜欢的歌欢欣鼓舞，不再冲动地在零下的气温里背着相机去拍城市的剪影。

我失去了灵感，河流正在迅速地干涸。晃神的瞬间，摇头笑笑也无能为力。

至少在武汉的日子是真实闪亮地活着的。体验过那样的感觉，也不应当觉得人生是遗憾的。

只是某天在街上看到有人端着纸碗吃饭时，忍不住想想，原来那些盛在纸碗里的、被我们一口一口咽下的、填补了无数无所事事的早晨的，是青春啊。

（作者系新闻学院 2013 级校友）



东湖，最优美的邻居

王晓莉

走出武汉大学桂园二舍的门，向右拐上一条两旁栽满绿树的长路——这路穿过毗邻武汉大学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现武汉大学工学部），中间有一段十分陡，前后则是平坦的——然后一脚跨出书院的大门，眼前便陡然出现一大片茫茫苍苍的水，那水凭借它自身内在一股恒久而温和的力量，总在一波扣一波地、微微地不息浮动，开阔、宁静地一直延伸向看不见的前方。

我走了无数次、从来也没有厌倦过的东湖就到了。这是武汉人的东湖，也是武汉大学每个学生的东湖。更是我的，1985—1989年的东湖。我那么熟悉它，它的一年四季，它的静与动，它的宁静与波澜。

离开武汉有28年了。关于东湖的消息时常传来，我知道武大与邻校有了新的融合与合并，东湖以及周边道路也有了诸多改造，很多地方都与我17岁来到东湖边时大不一样了。去年我重返母校，特意起早来到我记忆中的这条前往东湖的路上，我徘徊着，寻找着一种无以名之的东西。我发现这条路已经改造得更为宽广，路上的建筑、人，路上的那种气息，于我已十分陌生了。

然而，在我心里，这条路是定格的、不可能被改造的。我时常会在头脑里一遍遍走这条路，走到东湖边去。走到青春岁月里去。仿佛东湖住在了心里，连我的血液里也仿佛回响着17岁时那东湖的波涛声。特别是，每当到达任何一个地方看见任何一个湖，我总是不可遏制地要想起东湖。就如前年在敦煌，在鸣沙山的月牙泉边，当所有人都为突然看见沙漠中那一湾罕有的清水而惊叹时，我



还是有一瞬间突然忆想起了东湖——东湖就这样成为初恋一样恒久的记忆。就这样成了我心目中世上所有湖的最佳代表。

我总是在心里说：东湖，是武大最优美的邻居。没有湖比东湖更美。

推而广之地说，武汉大学每个学生，与东湖都是亲近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关于东湖的故事吧。我与东湖，也是如此。记得一到武汉，收拾好行李，怯生生四处探寻。第一次走到东湖边，我就被它浩大的面积、近乎庄严的宁静吸引了——在人生最灵动的年纪，遇见这一湖灵动的水，这种吸引是天然的，并不需要做广告宣传单。

每个城市几乎都有湖。杭州西湖，昆明翠湖，我现在所在的城市也有很多湖，但是没有一个湖比东湖大。东湖，可以用“辽阔”形容——而这个词，本来是形容海的。午间饭后的散步，我们往往只能绕 $1/5$ 或是 $1/4$ 的湖。我们边看表边走，“哎呀，还有 30 分钟要上课了”，于是赶紧从临近东湖的枫园校门进校，匆匆赶往教三上文学概论课或者去樱顶的老教室上英语。但是到周末，我们就想来个东湖“全面游”或者说“深度游”了。大学一、二年级的人，最爱扎堆。扎堆吃，扎堆打牌，扎堆出门游逛。记得大学一年级，我们十来个同学，也不知谁提议的，竟然步行去了东湖对面的磨山，一路上兴冲冲地，走了将近 4 个小时。等到日落西山，我们往回返时，既累，又没有公共汽车可坐，只得又沿着湖水走回来。等回到宿舍，人都走傻了。

我们只知道走着去东湖很容易，却没有想到回来时的艰难——这多像一个与青春、与此后漫长人生路途有关的隐喻！

武汉夏天的午后，其实非常热。但我从来不午睡，我和好友在食堂里吃完饭，连宿舍也不回，就那样手里拿着碗，围湖而行。阳光虽然是白花花的，经过周围绿树的筛漏，落到我们身上时也并不怎样炙烤。只有知了不停地叫，才提示这是武汉的炎夏。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影响。我们一直地说，或者也有一直沉默的时候。我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呢，现在我竟是一句也不记得了。而为了什么而长久地沉默，也成了记忆里的谜。



晚上的东湖边，感觉更美。黑漆漆的，连路灯都很少。我们绕湖散步，湖风吹拂，嗅觉灵敏的人能够闻到水生物发出的微微的腥气，蟋蟀与其他的小虫在暗处不甘寂寞地低语，提示你身边湖水虽是静默，生命却仍在其中生生不息。行走的我们，往往听见黑暗中迎面而来或是在身前身后有小小的说话声，你知道附近有和你一样的人在走，在思考，在交流，在恋爱，你却看不到他（她）——再没有比这更美好的神秘了。

我还偏爱下雨时节的东湖。雨滴在空气中、在湖面上赶赴后继，天地间蒙蒙漠漠的。这时候打一把伞，一个人独自沿着东湖边走，偶尔一两个骑自行车的人披了雨衣快速地从身边穿过，更增添了一份静意。此时最能体会天地之阔大之冷静，最能够面对自己的内心。这时的东湖，真是适合沉思，适合涤荡自我或人性缺点，适合与自然亲密融合的好地方。

而隆冬季的东湖，又别有风味。此时湖的色泽是偏黯淡、浑浊的，有一些轻微波澜像皱纹在脸上蠕动。伸进湖中的长长一截木栈桥，其他季节年轻学生都偏爱在上面玩闹，现在太冷峭，他们也不来了。无人的栈桥，像一根粗黑的墨线，笔直延伸进东湖。它因此显得孤独、坚毅。这时的东湖，像一个城市的老隐士，一个缄默的智者。岁月在它面上留存了衰老，它的波下却是贯穿了对生命的了悟，是平静、松弛与无比的沉着。

我还要说说东湖边的树木。一个湖，没有树的护卫或陪伴，是单调平面的。美，无论如何需要陪衬。没有孤立存在的美。形形色色的、高矮胖瘦的树木，是东湖这只大地眼睛的睫毛。它们越绵密、修长，东湖越有姿容，大地越有表情，越美。东湖的树木是太多太绿了。且不说武大的秋枫，在东湖水边娇艳欲滴。光磨山植物园，就是植物的天堂。在大学最后一个春天，我曾独自一人去过一次磨山，在湖边的草丛里呆坐许久。很多年我并不明白自己这一自发举动的含义。但是现在我想清楚了，那是我与东湖、与校园的一个临别仪式——在草木的清香与静谧里，在水鸟飞掠而过的温柔的东湖水面，我们想要记住的，日后很容易想起的，往往都是生命中美好的人与事情。是的，就因为这个，有必要有那样一个独自的、



庄严的告别。

告别真的到了，并且如此长久。秋天嗅闻桂花，冬天与梅花耳鬓厮磨，夏夜有漫长的湖边闲聊、漫长的周末电影，春季则是没完没了地去赏樱花、赏桃花、赏蔷薇花。在东湖边，这些确实都是很寻常很容易做到的事情，现在都成为一种奢侈的怀想了。在那个时候，所有人兜里都空空如也，所有人却因为拥有这无价的一切而无比地富有。这种精神上的富足感，现在对我也成为一种带有自我警醒意味的回忆了。

我真是想念东湖。

何其幸运，在我的官能最为清明澄澈的时候，遇见同样澄澈清明的东湖。“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辽阔的东湖水，却于“无言”中养育、给予了我们可以受惠一生的同样澄澈清明的内心气质。以后世事混沌，以后诸事无常，然而想起那一湖清水，我心便渐安、渐定、渐宁。

何其难忘，那收藏了我的青春岁月的烟云深处的东湖！你是我最优美的邻居。而行走在你身边的我，是你最微小又最安心的部分。

（作者系中文系 1985 级校友）



追忆我们的似水流年

谢春枝

人的一生总有些难以忘怀的地方，它们伴随着我们的记忆，沉淀着一些难以言说的情怀。它们如同一个个音符，跳动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交织成漫长岁月中永远也抹不去的旋律；又如同一朵朵浪花，飞旋在我们的生命之河里，幻化成我们蓦然回首时的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珞珈山，便是这样一个地方。

我的本科阶段有幸处于中国新旧文化思潮最争奇斗艳的时代。更有幸的是我的母校武汉大学，拥有国内乃至世界最美的校园，春有樱花夏有绿柳，秋有枫叶冬有红梅……如果说珞珈山的钟灵毓秀赋予了每一位学子诗意人生的话，那么，母校的人文氛围更是从血液里让我们脱胎换骨。就在这诗情画意的环境里，我们谈理想，谈人生，谈诗歌，谈音乐……可以说，珞珈山的每一块石头，要么不要搬动，只要稍一搬动，那里面都藏着我们青春的记忆！珞珈山的每一棵树，要么不去触碰，只要略微触碰，那年轮里就会抖落出我们青春的欢笑！

大一的时候，我常常和几个室友在课余钻进图书馆，坐在阅览室宽大的桌旁，挑一本自己爱看的书或杂志，一看就是半天。时至今日，我对大学时老师们所教授的许多课程早已经淡忘，但在图书馆阅览室看书的那些时光却挥之不去。记得那时图书馆的二楼是自修室，和现在一样，常常是人满为患，但那是我夜晚自习时最喜欢的去处。明亮的灯光下，偌大的自习室只听见飒飒的翻书声和笔记声，而这声音往往让我年轻而浮动的心沉静下来，变得很空很静，从而读进去了许多枯燥乏味的专业书籍。我就这样，常常沉醉在这



样的氛围中，直至闭馆的铃声响起。

那时，图书馆门前还没有现在这样漂亮的广场和草坪，有的只是泥泞的小路、没脚的野草和低矮的灌木丛；现在的教五楼在当时也还只是一片树木丛生的小山坡，下了晚自习后，必须翻过这片小山坡才能走上通往桂园的路。所以，月光下，总可见三三两两的学生，在婆娑的树影中穿行，偶尔会听到女孩们的笑声和男孩们的歌声，使紧张了一个晚上后的放松和惬意，在清朗的夜空中传得很远很远……

那时借书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是开架书库，也就是现在的校档案馆。满满两百多平方米的大书库，充斥着架架的图书。比起现在总馆流通借阅部的开架书库当然是少得太多，但在当时也足以让好书的我眼花缭乱。我曾暗做规划，要把世界名著从A读到Z——现在看来，这个计划恐怕一生的时间都难以兑现，而在当时，确实激励我读了不少好书。回想起来，一生中受文学书籍熏陶最多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中学时的学校图书室，另一个就是在大学图书馆的开架书库里。

青春时期是最爱做梦的时期。在那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代，珞珈山的风花雪月常常会带给青年学子一些莫名的忧伤，母校的山山水水都曾安抚过我躁动的心灵，而我的许多梦想和忧伤可以说都留在了母校最古老的地方——老图书馆。

有段时间，我常常独自从桂园后的小山，沿着那条蜿蜒的小路，到樱园顶上的老图书馆去看书。不为别的，只为老图书馆那古色古香的回廊和高大的落地长窗。我会选一处面窗的书桌，这样，在温书之余、在写稿的空隙，一抬头，便能将窗外的风景尽收眼底。位于全校最高处的老图书馆，它的窗外，除了疏影横斜的树梢树枝外，就是灰白或淡蓝的天空和偶尔驻留的几片云彩，但我心中的梦想，却常常能穿越这古旧的藏书楼，飞得很远很高。

往往，当我从书本中抬起头时，窗外已是暮色时分。独行在老图书馆和桂园之间的山路上，身后的老图书馆那沉沉的气度还郁结在心，而远处的桂园，早已笼罩在满天的落霞里。山上稀疏的树木和嶙峋的山石，都和刚刚离开的老图书馆一样给人一种古朴和苍凉



感，在我的心中引起一丝淡淡的惆怅。有一阵子，山脚下的竹林里，总会传来一阵琴声，有时是《梁祝》，有时是《沉思》，琴艺说不上精妙，可能是哪个学生在练琴。但在那样的时候，琴声从半山的竹林中漫延出来，往往会丝丝缕缕地拉拽着我，使我不由得放慢脚步。与山下喧闹的人声相比，斯景斯琴，直给人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1998年，阔别母校8年的我，又回到母校的怀抱，读研、留校、攻博，并在图书馆度过了第二段长达15年的职业生涯，直到2016年再次离开校园。

回想与母校的漫长情缘，无论在校还是离开，自己从未感到过心与珞珈山有须臾分离。无论多么贫瘠的土壤，无论多么纷杂的境遇，武大4年浸润于心的梦想一直支撑着我，抱持初心，即使低到尘埃里也要努力地生根、开花、攀延不息；因为它，我曾在无数个夜晚，敲打着键盘，看着心里最隐秘的渴望一字字在屏幕上舞蹈；因为它，我在大雪封城的那个清晨，一步一滑地蹚过校门口到桂园那条积雪的道路，终于在考试开始后的第28分钟跌跌撞撞地冲进教三楼的考场；因为它，我也曾500公里长途奔袭，两天8小时不到的睡眠，在夤夜灯火的机场，在清晨寂寂的城市，穿着高跟鞋最后一分钟冲刺到考官面前……只因为，珞珈山教会我，无论所处何种环境，都要相信：人生能有几回搏！让自己发挥到极致，就可以做到最好！

母校，也给了我无限的创作灵感，我所有文学作品的环境原型都根植珞珈山：鉴湖的枯荷，遮住来路的垂柳，枫园的红叶，桂园操场旁那棵与地面倾斜达30度的槐树，秋天的情人坡银杏叶铺陈出绵延的金黄……在学校时，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去那些路上走走，一样的藤蔓，一样的老树，一样斑驳的石壁，一样层积的落叶……如果不是鬓边不断新增的灰发和眼角若隐若现的细纹，我常常会以自己仍是30多年前那个见花落泪、睹物伤情的小女生！

即使离开了学校，每每忆及校园，闪现在脑海的，都是那些难以忘怀的画面：

超凡奇崛的老师，才气横溢的学子，花样翻新的桥段……让这



所百年名校日日充满期待，从来不乏惊喜！

也许，多年以后，我们已经不在，我们中的许多人也已永远地离开，但珞珈山却在，武汉大学这样一个历时弥久、人文气韵愈加浓厚的地方还在！所以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许多海外学子千里迢迢返回母校的时候，老图书馆是他们必经之处，不只是老图书馆那独特的建筑风韵，还在于它已成为一代代莘莘学子求学和成长的象征。因为承载了太多的梦想，所以它的飞檐才有一种腾飞的气势；因为见证过太多的沧桑，所以它的琉璃才有一抹超然的色彩。常常，我看见两鬓斑白的老人，伫立在老图书馆楼前唏嘘感叹，山风吹拂着他们的头发，也吹拂着他们苍老的脸上那依稀的泪痕，老图书馆已成为他们青春岁月中挥之不去的情结；常常，我也看见即将离校的学子，身着学士、硕士或博士服，三五成群地簇拥在行政大楼前合影留念，在快门按过之后，这些热情而自信的毕业生们将各奔东西，渐渐被人际的沙漠淹没和消融。然而多少年后，无论他们是抑郁寡欢还是青云得志，照片上那些灿烂笑靥后的绿色琉璃，将成为他们午夜梦回时流连缠绵的故地！

正如珞珈山的樱花一样，盛时清雅艳丽，落时风流缱绻……母校将她的每一个孩子都打磨成一颗颗钻石，无论拥有怎样的向度，只要你面对燃烧的太阳，都可以折射出独特的动人光芒！在我人生最好的年华，有幸与她相遇，宛若一枚经年沉淀的酒曲，投入到我的生命之河里！从此，无论惊涛骇浪还是峡谷幽涧，这河，便烙上了珞珈山的永久印记，每一滴水，都散发出一路的醇香和意韵……

（作者系图书情报学院 1986 级校友）



珞珈山的春天

许 锋

那几日，住在珞珈山旁，每天清晨，我都要站在窗口听一阵子鸟叫。五点多的时候我便清晰地捕捉到了第一只鸟的清脆的啼鸣，似乎总是那只，我很快熟悉了它绵长、温润而且悠扬的叫声，我知道，是它完美地终结了一夜的寂静或者迷蒙，启封了一个新的清晨。但我仍是保持着聆听的姿态，没有起床，没有开灯，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它需要一个完美的聆听者。此时夜色尚未褪去，鸟就在窗外不远，它需要一点时间启明建筑，驱走倦潮。接着，第二只、第三只、第四只……像是幼儿园的孩子从梦中醒来，片刻的迷迷瞪瞪之后，一下子欢闹起来，此起彼伏的叫声穿越厚重玻璃的阻隔，在聆听者的耳边忽隐忽现。我便下床，打开窗，将窗口尽力扯开。这扇窗几乎是夹在树木之中的，我一伸手能拖住树叶。我没有尝试，这个动作过于粗俗，也会惊着它们。我只是轻微地探手试了试，没有风。这个动作对于珞珈山而言，对于一座高楼的一扇窗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但鸟儿们仍是发觉了，正如我已经看见它们在淡淡的雾霭之中留下的剪影。它们在蓊郁、健硕的树间扑簌簌地呈直线、曲线或者弧线飞翔，叫声时而短促，时而悠长，咕咕，唧——唧，喳喳，啾——啾，翎毛带动了风，风推送着气流，气流裹挟着叫声，叫声旋了一股股草木的气息扶摇而至，从下边，从左边，从右边，从上边，似乎从四面八方涌来，瞬间便覆盖了整扇窗和一位聆听者，浓郁且清新。

这是珞珈山春天的早晨，是武汉大学的早晨。

走在路上，鸟叫声便更加真切；走一路，听一路，没有断层与



片刻的凝滞。鸟儿们似乎不知疲倦，兴奋得忘乎所以。可是，谁会觉得它们的声音聒噪呢？整日置身于钢筋混凝土丛林中的人，偶尔见到鸟儿，听到鸟叫，内心都是欣喜的——或者窃喜，仿佛那叫声听一声便少一声。而我，已经听了很久——这样的生活，即便三五天，很短暂，稍纵即逝，已经格外让人满足与幸福。走一阵，我会停下，仰望那一棵棵高耸入云的树，樟树，梧桐，不知名的树，我在看树，也在看鸟儿，我的目光循着声音寻找鸟儿们的踪影。我知道它们也是喜欢亲近人的。它们胆怯又迫不及待地想闯入我们的生活，与人近一点，再近一点；确定你没有伤害它们的动机与动作之后，便开始落在你家的阳台上，甚至由阳台而至厅内，甚至穿越客厅，自北向南，由东而西，这个过程，对它们而言，对你而言，何啻一个仪式？前面冠以“神圣”二字并不过分。这是一族与一族的融合。此时，你万万不能做的是关闭任何一扇窗，一面门。你尽可以读书，喝茶，听你的音乐，说你的家常话——有时候，无视这些天之尤物的闯入，置之不理，反而是一种高贵的礼节。

依着珞珈山缓步而行。山路逶迤，时而上，时而下。路两旁是茂密的林子和茂密的叶子。林子随着山势起伏，柔肠百转。山色空蒙、清丽，草木翠绿、鲜嫩。昨夜的那场雨还挂在枝头、草尖，你站在树下，只是跺跺脚的劲儿，雨珠便情不自禁地落了你一头、一身、一嘴，舔一舔嘴角，甜甜的。被雨打落的红色或黄色的叶子或是铺在路上，层层叠叠，或是散落在草间、亭台，如青年们设计的传递春天讯息的一张张精致小巧的明信片。

这个季节，武大的樱花也开了。在草木莽莽榛榛间，猛然望见一树樱花，那艳丽，那矜持，那高傲，由不得你会一愣，心会一动，停驻，舍不得离开。你会站在树下，看着那些粉红的含苞待放的花蕾；你会凑得再近些，微距离地端详那些娇嫩的花瓣；你会闭上眼睛，贪婪地呼吸花瓣弥漫的芳香。你能感觉到一缕淡淡的香正流过你的血脉，滑过你的意识。我静静地站着，目光宁静而隽永，如同注视熟睡的女儿。清晨的珞珈山路上，除了鸟语，没有别的声音。我可以旁若无人地孤芳自赏。我也没有摇，摇和拽一样，对于花木，始终很粗俗。我轻轻地弹了弹花枝，花瓣间的雨珠洋洋洒



洒，掺着花香，落了我一脸。花瓣微微地颤动，却很自负，一片都没有落下。

成气象的樱花长在樱园。樱园里的樱花已经悉数绽放了。远远的，你看见盛装的白，闻见密集的香，便到了。这时候还早，四周没有什么人声，但我知道，也仿佛看见，摩肩接踵的人正在路上，宛如盛唐时赶着赏樱的盛景，白居易不是有诗云：“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枝便当游”。我很庆幸，此时，这个宛如云朵一般的世界是静止的，氤氲的雾气屏蔽了世间的一切闲杂之音。只有繁密的花瓣千姿百态却又杳无声息地开着，你不由得惊叹樱花既有梅之幽香，又有桃之艳丽，且清寂与孤傲，像一名来自宫廷或者民间的、穿着白色汉服的绝色女子。

珞珈山的雨，又在林间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我听见雨落在枝间，落在花瓣上；我听得到草木丰茂的生长，花瓣噗噗盛开的声响，间或，一只只鸟儿，从珞珈起飞，唱着春天的歌，在苍穹划过一道道精美的弧线。

（作者系经济与管理学院 EMBA2016 级校友，原载 2017 年 3 月 29 日《人民日报》）



最是青春好读书

王新才

如果将人生分作四季，那青春就是人生的仲春到初夏。这是一个万物生长发舒的季节，我们的身体和心智就像迎风招展的花草树木欣欣向荣，但越是在这样的时节，越需要阳光雨露的滋养。而我们祖先留下的书籍，正是这样一种精神财富，可以陶冶我们的性灵。

我们的祖先，他们也曾在这片大地上生活，他们也曾是一棵花草，一株小树，曾自由自在地，或者艰难曲折地生长，繁荣。不可避免地，其中大多数难以幸免于岁月的劫难，在历史的长河中销声匿迹。而必然地，总有一些奇花异木不屈不挠地开花散馥，为我们平凡而枯燥的生涯增添品味的空间。当一个人基于生活的苦难或馈赠，在人生的旅途中努力应对，勤于思索，善于发现，他们思索的结晶以及发现的成就就成为其他人学习借鉴的范本。他们结下的累累果实使得他们的生命之树得以常青，他们长久地在生命的丛林中默默地开放着，装点着人类的生活与进程。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千奇百异的风景。只要我们留心，就能体会到高山的峻伟、河流的蜿蜒，就能感受到花朵的美丽、树木的茁壮，就会发现每一枝花草都有其奇异之处，必须用心去体认。也正是在这样的体认中，我们的灵魂会悄悄发生变化。我们感受一朵花的红艳，美就走进我们的眼睛从而塑改我们的容颜。腹有诗书气自华。我们的气质正是来自于这样的塑造。如果我们不去体认生活中的美，三日不读书，就会如古人所说，对镜觉面目可憎。一个人的容颜会不断地发生改变，先天的容貌固然来自



于遗传，但后天的变化却取决于我们自己。

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最是青春，最是需要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最是青春好读书。

(作者系图书馆学系 1981 级校友)



入学卅年感怀

吴伟文

要历数 30 载风风雨雨，我得把十根指头来回屈过三遍，说指头里藏着年轮我深信，每一圈都是风霜的刻痕。

这十指已非卅年前在校园调弦弄琴的指，它们随我一同涉世，30 年锤炼足以百炼成钢。

在繁复的世事中，它们一再练习如何举重若轻，像拈起一支烟那样拿起一件件大事小事。

此刻我又点燃了一支烟，想起曾这样燃烧过的那些激情、热情和豪情，想起就这样灰飞烟灭的那些理想、梦想及念想，惊觉成败利害、宠辱得失，甚至岁月、生命，太多的东西转瞬如烟！

酒也是我所迷恋，我在它的芳香中都迷醉卅年了，做个酒中仙多惬意呀，常常就梦回了故园。

我曾将四载青春交与一座叫珞珈的山丘，在桂园的客舍桐荫中织了 4 年的学子梦，最深的热情不是献给书本而是给了弦歌，最深的折服不是呈给教授而是给了罗大佑。

我用一把木吉他歌唱那流水的青春落花的梦，我犹记得当年的掌声与舞台，见过幕启时的灿烂，也觅得掌声里的知音。

烟、酒、音乐皆是好东西，没有它们，我无以度过后来那些奔波的白天、孤寂的长夜。

我放足万千山水间，也已阅人无数，早该知晓了江湖的深浅；我一直想抽身离去，努力寻找到达彼岸的那一叶轻舟。

我活得认真，却也任诞；认真令我肩膀沉重，任诞容我轻舞飞扬。我眼前的世事，如行云流水，如过眼云烟；只是尚有一缕真



情，总是停留，缭绕，不死也不老，于是小心收藏好，如一把经年绝版的紫砂壶，只宜在月白风清背人处，拿出来，独自抚摸。

（作者系中文系 1985 级校友）



水调歌头·忆老武大

陈 卫

明镜飞花在，何处惹秋霜？
长袍乌发，才俊青涩珞珈郎。
难料硝烟四起，大炮飞机军队，冲突扰家邦。
群鸟越江急，山路谢樱芳。

壮士腕，豪情志，唳天飏。
谈诗论道，细叩学问立人强。
漫步东湖日暮，鸟语清晨相问，午闻舍间香。
音貌风华去，天地两茫茫。

（作者系中文系 1995 级博士研究生校友）



珞珈晨音

陈 卫

一声长，一声短
居——居——，查查
这是鸟儿的清晨朗诵会
谁在主持，谁在倾听

它们在模仿昨天
老图书馆里的相聚，吟诵
那里，漂泊回家的诗魂
一一问候

（作者系中文系 1995 级博士研究生校友）



诗意的珞珈赋我光华

陈 勇

当梦随一颗露珠，在草叶上滚落而醒
珞珈山的晨曦，穿过自由的鸟鸣和密林
斑斑驳驳地覆在过往年轻的笑脸上
每一行足迹都比诗更有诗意

四柱八方的牌楼，把天空划破
母校的一笔一画都渗出流云
那些殿堂级的名字，被繁花捧在掌心
又被东湖的潮汐一遍遍擦拭

这百年的深味，参天大树也不足以表达
只有跑过讲堂的风，把时光刻成雕像
把那些金色年华分成了届，与群鸟一起惊飞
怀旧的樱花上，谁在摸索岁月留下的文身

诗意的珞珈赋我光华
就算没有恋人，也会被浪漫的记忆吞吐
夹带更烈的乡愁，从年轻的背影里破土而出
发光的种子转瞬成林，郁郁葱葱

每一次，离得越远，越是觉得亲近
我的手穿过密织的诗意，仍有桂香盈袖



有一束樱顶的反光，柔柔地罩着
而珞珈铺陈的，便是最富引力的那条地平线



请把所有的荣光都种在珞珈山

陈 勇

请把所有的荣光都种在珞珈山
种在那个安放我们青春的旧址上
123 岁的绝美，一朵樱花不足以表达
一首诗，也不能倾尽记忆的桂香

大师的讲堂，继续流芳百世
往往比深秋的落叶还要拥挤
沙沙的落叶，垫着你的脚步一路远走
走成下一位大师、巨匠或弄潮者

此时，珞珈山已折叠成扉页
在醒目的论坛中，在激情的诗会上
在各种成果握紧奖杯的耳柄时
情怀与担当，是你最亲和的招贴画

一种别样磅礴的视野，激荡江湖
从长三角、珠三角，向环渤海漫延、升腾
珞珈文化的地图上，有多少精神标注
就有多少豪情为之震颤、远播



壮志凌云的校友啊，你成为这荣耀里的一束光
便是珞珈丛林里一颗闪光的种子
一个多世纪的传承，让这山愈发巍峨、高耸
内心的骄傲也更加挺拔、灵透

用你我紧连的手臂环抱世界吧
珞珈人气脉相通，气韵相融，气势如虹
让燃情的热血汇入同一个时代的奔流
最美的风景，只领受最炫目动人的春秋

（作者系中文系 1985 级校友）



丁酉初秋，时值武大中文系 83 级 毕业三十年，同学集会东湖翠柳 客舍

耽嘉福

珞珈桂园香未现，
东湖翠柳见秋波。
分飞卅载今重聚，
寻梦校园笑语多。

(作者系中文系 1983 级校友)



沁园春·珞珈山

黄德华

万里江山，千古风流，落驾楚王^①。
 引孙权避雨，观音袈落，四光选址，雪艇坤扬。
 国有成均，阔明宁静，天下读书好地方。
 闻公道，珞石成珈玉，文武齐昌。
 造人出品^②脊梁。
 更有大学三要^③焕章。
 习坎孚示教，脱胎换骨，明德求是，双创^④图强。
 桂雨枫红，梅香樱雪，满地青春向太阳。
 永难忘，到东湖戏水，众志激昂。

(作者系化学系1988级校友)

① 楚王：指楚庄王。珞珈山原名落驾山，因楚庄王在此山挫败子越政变而名。故这里是楚庄王霸业开始腾飞的宝地。闻一多先生点石成金，把它改名为珞珈山。

② 造人出品，出自武汉大学第三任校长周鲠生教授的《大学与研究》，他提出大学使命是通过造人出品，引领社会健康发展。造人，是指造就人才，出品，是指研究出有品位的学术成果。

③ 大学三要，出自国立武汉大学第二任校长王星拱教授的《大学任务》，大学三要：道德表率、理论高深、技能富民。

④ 双创：指创新和创业。



步原韵再唱年度捐赠（2017 年） 有感

孔令仁

人生紧迫又一年，梦路长亭道远艰。
力绌心余迟许恨，筐恩补报得安惭。
不言桃李有源水，无价汗滴落驾山。
武大师生霄汉志，硕学强校壮怀宽。

余憾位卑烛影微，不矜薄意自芳菲。
涓涓流注汇川海，切切至诚融悦羸。
老躯翘企新樱顶，青秀辈出补天维。
冀期校友挥旗鼓，共助珞珈绘焕辉。

（注：原韵见 2016 年《武大校友通讯》第 329 页。）

（作者系原水利电力学院 1962 级校友）



东湖三题

刘传铁

行吟阁

尽道屈平湖畔行，
飞檐画栋志清名。
学人切莫究真伪，
社稷民生处处情。

楚天台

碧浪白帆映远天，
荷香楚韵绕檐间。
轻纱曼舞云中树，
踏浪江城入秀帘。

落雁岛

鸟语花香漾岭旁，
林间水上任徜徉。
时人莫羡渔人路，
梦里桃源落雁乡。

（作者系中文系 1977 级校友）



老工学院楼

刘代高

巍巍殿堂立中央，规矩严整仪堂堂；
四隅崇楼四金刚，众星捧月护四方。
中庭广阔通浩宇，环廊回曲周边厢；
琉璃晶莹映碧天，长空氤氲润霞光。
玻镜透明覆着瓦，阳光如瀑浩气朗；
流金溢彩相辉映，登顶环顾心荡漾。



老理学院楼

刘代高

圆形穹窿立顶端，天体宇宙迷浩瀚。
幽曲楼道九回环，恍如迷宫数道关。
扇面梯形教室阔，教授讲习声音欢。
主楼副楼依山势，科学研究宜登攀。

（作者系生物系 1969 届校友）



遇见珞珈

李福信

知了红枫上，
金秋桂飘香。
雪舞梅园，
故事当年，
樱花烂漫正春光。

最记得，
烟波东湖上，
琴声悠扬，
飞波逐浪。
云影荡漾心事，
擎云少年向远方。

三月花开正好，
吆喝一声同往。
遥看故园美，
珞珈山上，
有樱花怒放，
有云霞万丈，
有伊人遇见，
知交故旧寻常，
昨夜星辰吐心香。



万水千山走遍，
珞珈总在梦乡，
少年而今已沧桑。
回眸樱花路，
有心思荡漾，
有心情芬芳，
少年心翼犹飞扬。

(作者系经济管理系 1985 级校友)



相约樱顶

李立屏

不知道你会从哪来
我只能相约在樱顶
这些年很多都变了
但我的心意，和那个地方
还没有改变

那时候一早读外语的地方
还不叫情人坡
现在我们可以一起去走走
装作当年没有成功的爱情
含笑年年开满欢喜
悬铃木结满相思

要不是一往情深
桂花香也不会那么浓烈
要是能借个小板凳
一起去小操场看场电影
不管有没有结局
你还是我那时活泼可爱的姑娘

梧桐树满身伤痕
并没有影响它长成参天大树



我盼望你和春天一起到来
心里的石头
一个个都会在春风里化解

(作者系日语系 1983 级校友)



咏珞珈故园律诗六首

刘鲁颂

其一 桂园

劝君八月且还乡，
 年少不宜耽桂堂。
 香郁卧床疑醉死，
 金黄过径信癫狂。
 青春放纵秉烛旦，
 书酒成痴到病盲。
 误入此园迷魏晋，
 风神落拓胜文章。

其二 樱园

难忘长阶入岭深，
 浅红一带绕初春。
 经风骤落乱心雨，
 映月薄飘迷志云。
 光镜聚焦倚树客，
 露台漫坐看花人。
 当年书信若还在，
 字里犹留圆瓣痕。



其三 梅园

若赋高格到小冈，
梅枝疏朗两三行。
风柔月下弄清影，
人静林中浮暗香。
窃慕笃学邻舍女，
笑谈斫树采花郎。
至今不解清晨雪，
足迹谁家两对双。

其四 枫园

转过一山别有天，
风清气爽静观间。
枫林叶阔老成貌，
师友道合国土言。
刺股犹嫌寒夜短，
映囊权当上元闲。
伊人只在此园里，
细雨霏霏伞不前。

其五 湖滨

惬意莫如湖畔莲，
情闲致逸忘流年。
白鸥数点烟波里，
绿树横云水连。
碧吻双鱼丝草弄，
青衫五友柳枝衔。



兴来沧浪纵身跃，
寒夜中洲到月边。

其六 珞珈山

珞珈何幸有青山，
翡翠飞来落玉盘。
日蔽森森环秀树，
峰回磊磊竞突岩。
入微方悟境生境，
登顶更知天外天。
众友振衣谈笑处，
吾与点也暮春言。

（作者系中文系 1985 级校友）



毕业三十年聚会有感

刘文杰

母校别离满卅年，
而今聚首珞珈山。
四载耕耘成共话，
半生创业付笑谈。
隐隐丛林浮翠瓦，
层层楼宇噪秋蝉。
去日良多情更久，
筵前把酒意尤酣。

（作者系中文系 1983 级校友）



珞珈，我们那匆匆的年华

刘予丰

我爱珞珈
爱那些樱花般散落于斯的
斑斓的梦想
缤纷的年华

迎新季
那不知疲倦的知了
是乐队演奏热情的小喇叭
那凌空舒展浓荫夹道的悬铃木
骄傲地展示
岁月检阅过的仪仗队
气宇轩昂，高大挺拔
那八仙过海竞相争艳的招贴
是学长们满脸稚气夸张着色彩的涂鸦
而旗帜啊
是学姐们在初秋的风中
扬起的长发
是那些带着浅浅酒窝的青春笑脸
未思倾城，笑靥如花

忘不了初进珞珈
我们透过山林的阳光
向着世界的眺望



那初生牛犊的懵懂
那顾盼自雄的豪情
在深秋金黄的银杏中向远方铺展
未来尽在空中
世界就在脚下

东湖之滨
那晨曦中伴着春寒的奔跑
有我们青春的挥洒
珞珈山麓
那黄昏中弥漫着桂香的沉思
有我们少年维特式的迷惑
樱花丛中
那装腔作势的黑白照
记录了我们曾经的青涩
十八栋下
那些对先贤的凭吊
沉淀了师长们深情的教诲与嘱托
也沉淀了我们曾经的攀爬与长大

那些梧桐飞絮里无语的感伤
那些栀子花开时朦胧的向往
那些芳草地上的追逐与呼喊
那些琉璃屋宇下的静思与凭窗
那一场春天深处莫名悸动的甜美初恋
那一次秋尽江南追着远飞大雁的无边遐想
甚至某次寒夜卧谈
某位朴实木讷的室友
突然色情的喧哗
所有那些
所有那些
如草帽歌一样迷失在山谷的
我们那匆匆的年华



最后都定格在
情人坡，那长长的告别
老牌坊，那豪迈的出发
定格成一张看不够的永远的老照片
定格成某个冬日午后
洒满阳光的草坪上暖暖的回忆
或者
雪夜火炉边讲给儿孙们的伤感的故事
嗯
那时的我们
那时的珞珈

今天
我们那匆匆的年华
在自然的四季里
已慢慢对焦
重合为生命的四季
于是
我们像珞珈那些山树的年轮与落叶
多了皱纹，白发

可否找回
当年珞珈的山雨中
那些被淋湿的最初的眺望
那些不再能出席的
我们当年的青春啊
从岁月的那一头
在暗黑的帷幕中
怔怔地望着我们
没有应答

(作者系经济学院 1984 级校友)



珞樱情

陶佳珞

我
认识你很久了
你
是珞珈山最有故事的花朵
每一次绽放
都仿佛在深情地诉说

往事如烟
青春如昨
幽香轻拂中
朱窗碧瓦已写满新的故事
玉笺飘飞处
芳草又绿情人坡

多少梦想
似琼纱一样纯洁，曼妙
多少情怀
如白云一般缱绻，婀娜
短暂的灿烂
匆匆地离去
无声地诠释着生命的
美好与脆弱



你
再停留几日吧
尽情享受这
珞珈山水
珞珈青春
还有如潮的赞美，讴歌
尽管
我的诗笔
那么苍白，笨拙



七律·咏东湖绿道

陶佳珞

一条碧链绕湖中，
串起明珠映秀峰。
梅影樱姿妆曲径，
荷香菊馥溢长空。
听涛柳絮年年舞，
落雁芦花岁岁逢。
杳渺逶迤涵楚韵，
千秋绿道拂清风。

（作者系中文系 1987 届硕士研究生校友）



“佛山缘·珞珈情”迎新记

涂鹏博

时维阳历九月，序属丁酉季夏。佛山翠而禅城碧，浩波淼而俊贤齐。呜呼者，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此间亦如是，佛山珞珈校会，雄踞华南胜地，眼瞻羊城新都，豪拔岭南头筹。有大善而不自彰，不可不谓至仁也；有大德而不自矜，不可不谓至圣也。

其时昆榕细带雨，芭蕉淡卷愁，天公巧作美。前有肖长，摇旗呐威；后有杨兄，鼓声造势。珞珈诸友，应肖、杨之盛召，群赴新明，毕会东江，以迎入禅新友。始有肖长佳训，言述母校情谊，语盖校友风华；余等如沐春风；追先辈之情采，感珞珈之盛谊，振吾辈之雄心。继有杨长懿范，别有天地；言及校会架构，语略自身经历，开合之间，如获御龙之术；鞭辟入里，往通有无，言未尽出，意自超然。其余诸训长，亦皆俊贤；纵横捭阖，挥斥方遒。

余等小子，有如此之良机，行如此之盛会，不可谓不幸也。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当如此也。惟愿余等诸生，并穷才智，以报佛山，来馈珞珈，志于珞珈之道，据于珞珈之德，依于珞珈之仁，游于珞珈之艺，砥砺前行，方不负诸贤长之迎新用心。思及于此，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作者系弘毅学堂国学班 2013 级校友）



远在记忆之外

田 伟

你在远处，记忆在更远处
(而我，一直在远处看着你)

如果为了想你，用不着照片
如果为了慰藉，闭起双眼就行
(而我，一直在你的城堡里)

樱花雨，情人坡
月凉如水，越想越迷
枫树红，梅花开
雪落无声，越想越痴
(而我，常常穿越四季，忽现忽隐)

想念你的想念
不是银装素裹
不是樱云烂漫
不是荷舞湖滨
不是秋林尽染
是自在，是空寂
仿如传说，而不可说
(而我，如旧时明月，遥挂在玉门关外)



一叶入扁舟，相遇于心海，不语天涯
牵手于青葱，分别于时光，一骑红尘
(而我，挂在那时衣襟上的青春，倏忽已然百年)

一瓣落英就是一滴眼泪
一滴眼泪就是一地烟火
散落的思念不懂喧哗
念一次，流一次
流一次，了一次
(而我，了无可了)

然后无尽，然后寂灭
铅华洗尽，半世从容

(作者系中文系 1984 级校友)



让错过的美好如群星散落

吴根友

不要相许来生
就在今世
让错过的美好
如群星散落，在
各自的天空，发光

不要抱怨现世
混浊的古代
经时间过滤
有一泓清泉
以洪荒之力
带着人性的善良
穿越世俗的大地
汨汨向未来流淌

满天星斗
是创世以来
错过的与相遇的
美好
在风雨飘摇之后的夜里



用善意的目光
看着那夜行的人们
给他们以希望与方向



楝 树

吴根友

对于你记忆的稀薄
正如你花味的清淡
苦楝也成荫
小学老师的半句诗行
是东湖绿道唤醒我
关于你的唯一精神遗产
老家门前那棵楝树
稀疏的叶子细小的花瓣
还有我当年出入门槛时
对你似看非看的遐想
都随老屋的坍塌
父母的远去
退居在高铁速度
也无法抵达的他乡

暮春花香合奏的华章
一种似曾熟悉的味道



让我在漫步中盘桓
蒙茸的灯光指引我
好奇地来到你的身旁

你的树干粗糙而乏伟岸
你的花容清素而略俭寒
仿佛贫家之女
唯有一袭长裳
为向我佛布施
褪衣躲进黑暗
你，在送春的祭坛上
唯能献出淡淡的清香
你似有若无的清味
如温柔呢喃的燕语
唤起我幽幽的念想
茫茫人海中偶然的我
是否也像你一样
在这丰裕而又匮乏的世界
献上一份朴素而清纯的芬芳

湖风荡漾
楝香咬耳
余音不绝
梦里遗响
悠悠苍生
我亦楝花

（作者系哲学系 1989 级博士研究生校友）



少年游·楚天千里正秋色

王 浩

楚天千里正秋色，一江两岸阔。珞珈苍苍，东湖汤汤，清风饮壮歌。

峥嵘百年同感彻，上下共求索。山水一程，三生有幸，弘毅志家国。

（注：2017年9月7日来校报到，有感于武大勃勃新机而作，遂定永做珞珈人，永怀珞珈情。）

（作者系经济与管理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校友）



水调歌头

王新才

珞珈诗派同仁以珞珈秋为题征咏，因思 1981 年秋入住桂园，至今三十六载弹指，不能无怀。

一霎倦怀动，欲舞珞珈秋。金风才抚林树，天地火同流。犹记桂香初放，撩拨青春意气，携月共登楼。三十六年事，因在月中浮。

老斋舍，狮子顶，最怡眸。平湖东指万顷，逐浪乱飞鸥。我有平生心思，不觉渐随生老，唯付醉方休。木叶忽惊起，渺渺似予愁。

（作者系图书馆学系 1981 级校友）